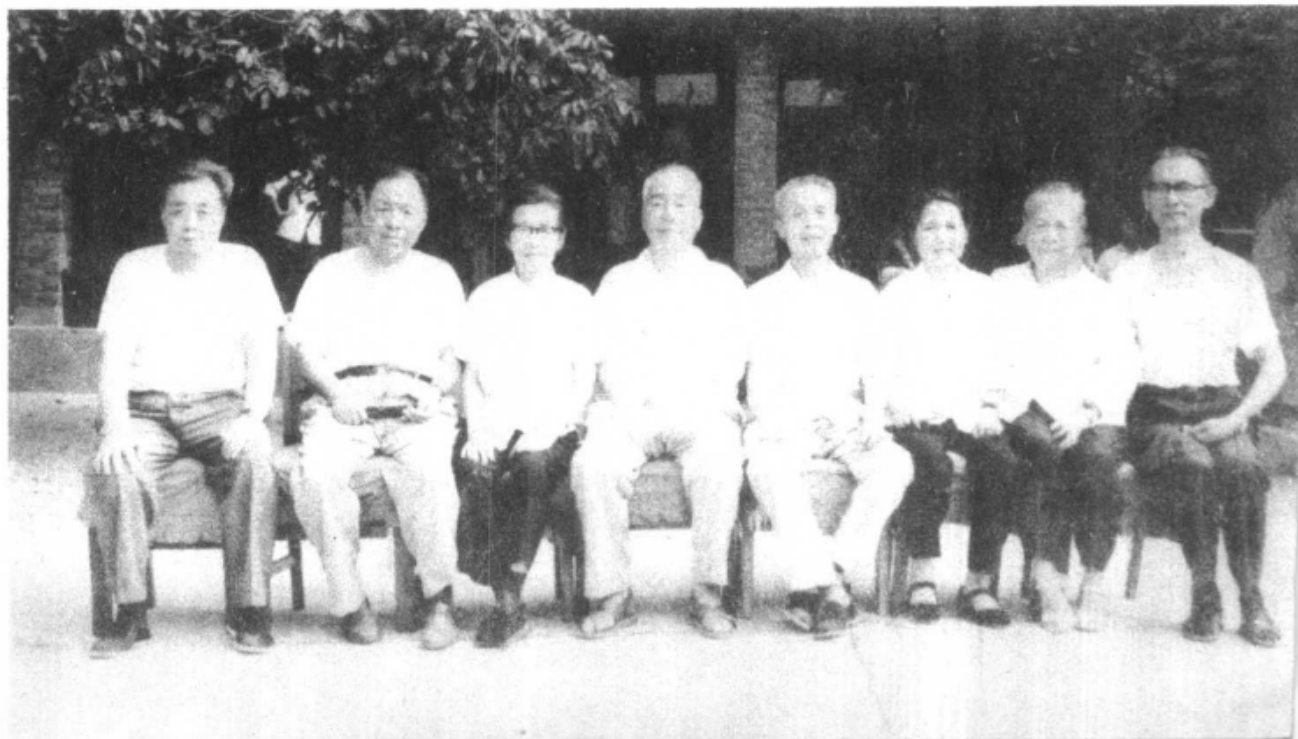




郭有义在写回忆录

中共开封工委老干部座谈会，1983年8月9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召开。自左至右：唐醒民、曾洁光、马志新、郭有义、曹志真、李瑞兰、姚汝安、马良。





1947年开封学生反内战、反
饥饿、反迫害游行大示威

1983年8月9日上午9时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孔祥祯与郭有义会晤



1983年郭有义在
马府坑旧工委门口





郭向心 胡万杰二烈士



张绍儒夫妇及其儿子（1949年摄）

内 容 说 明

这部革命回忆录选集，包括党在地下工作中的工运、兵运、学运和民运，共二十三篇，约二十三万字。如按系统划分，大致可以说由四部分组成。一是由作者从事地下工作十余年的亲身经历写成，计十一篇；二是作者任开封工委书记时所掌握的一支白军队伍——现已通称为“一支地下军”——的斗争故事，计八篇；三是作者一位老战友的地下工作经历，其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英勇行为，与作者和作者所领导的地下工作经历无逊色，故由作者撰述下来，计二篇；四是开封工委在郑州电信局和军闻社所开展的地下工作和斗争，也很出色，计二篇。从时间来说，历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汴郑解放；广袤涉及三省一市，很多事件又是同时并发，长期共存，所以不能完全按先后次序来写，虽然作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尽量按事情发生的次序编排，仍不能随心所欲。请读者原谅！

84.1.17.汴

作者自序

我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党员。如果从我参加革命时间算起，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就在北平加入了社会科学研究同盟北平分盟（简称社联）。如果从这个时间算起，到一九四八年郑汴解放为止，十五年只多不少。我参加社联是在地下，入党也在地下，入党以后的工作，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地下，这期间也不能说根本没在根据地呆过，但屈指计算，零零碎碎的合计起来，至多超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就这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其中还有很多时间是地下工作而占用了。如关于地下工作的学习培训，计划、总结，请示报告等。总计起来，地下工作的岁月不少于十五年。故本书定名为地下工作十五年。

在这十五年的地下工作中，我的足迹踏过了一市三省，经历了蒋介石宪兵第三团蒋孝先在北平的残酷镇压，长期目击过日寇在河南沦陷区的血腥统治。……在这暗无天日、漫漫长夜里，魑魅张牙，魍魉舞爪，究竟错捕多少，冤死若干，已难统计。但只就我在河南地下工作七年中，就有十九人次被捕，十一人牺牲。其中固然也出了少数几个叛徒，但绝大多数被捕党员、都是临危不惧，宁死不屈，不破坏组织并严守党的秘密，不陷害同志并舍命捍卫党的领导。在法庭上公然斥责敌人，在刑场上高喊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我如果不是同志们竭力保护，用生命捍卫，有我

几个也死了。所以我是幸存者。但我常想：人的生命所以宝贵，就在于他能创造价值。我今天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就是写回忆录。我要以《春秋》的笔法，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寓褒贬，别善恶”，对叛徒，我要口诛笔伐，对烈士和地下其他有功之人，我要歌功颂德。以励来兹，以育后人。

“事如春梦了无痕”，
赖有文词勒梓桐。
壮值乱离愤投笔，
老逢盛世怡砚耕。
精神文明建设贵传统，
物质文明在革新。
慢晒笔过鸦成阵，
优良经验遗后昆。

我不自量力，不矜棉薄，一心想把这十五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用秃笔把它写出，只求达意，不计辞藻。如果我不把它写出，则这些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故事情节，尤其是一些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每一念及，则使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为此我在庆祝建党六十周年河南日报征文时，我写《古稀之年话今昔》（载《河南日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三版）一文结尾时就写过一首七律，如下：

人生七十今不稀，
兀兀穷年撰史诗。
烈友血斑犹在目，
敌顽霜刃宁忘遗。
万山红遍阳光献，
千里冰封热血摧。

无数丰碑英烈影，

纷来沓至叩心扉。

我现在已经是欲罢不能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在我十五年的地下生涯中，面对着“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顽固派），面对着把共产党员当作百斯笃菌（霍乱，见《灭共歌》）的日寇，我在敌区长期埋伏，后来铺的摊子也大了，虽谆谆教导每一个党员都要在任何环境中恪守秘密工作原则，要经得起考验，但在特务如毛、警探如林的社会里，连《马氏文通》（清朝马建忠著，关于中文文法的书）储藏都有了罪过，指此书为马克思的书，因为是“马氏”，人逮捕，书没收，所以本书把监狱斗争专写四篇。一方面揭露敌人乱抓乱捕；一方面也就描写了我们共产党人的“精忠贯日月，浩气满乾坤”的宁死不屈精神。

最后，让我引证胡耀邦同志对山崎丰子所说的几句话作为我的序言结尾吧！他说：“我们的工作有光明面，也有缺点，这是事实。我们历来坚持毛主席提倡的两点论。假如你把中国写得太好了，那就不真实。除了写好的，缺点也可以写嘛。”（1984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

我的地下工作，十五年时间，不仅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回忆录是要求真实的；所以我这部书是专求真实，不计成败。中国古代向来就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高见。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每日每时都是在各种敌对势力互相冲突或竞争中过活。我们地下工作的处境，那就不言而喻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旁

观者清，当局者昧”。切盼读者以自己之昭昭，启发作者之昏昏。

1984.12.24 于汴

目 录

内容说明

- 作者自序 (1)
- 第一篇 北平学运对我的陶冶 (1)
- 第二篇 我在陕西省的一段地下工作经历 (14)
- 第三篇 拆东墙补西墙
——征日伪的税，筹我们的经费 (32)
- 第四篇 我在沦陷区所经历的珍珠港事变 (43)
- 第五篇 破军运巧炸漳河桥 (55)
- 第六篇 红波冲破沉沉夜 (74)
- 第七篇 妓女检治所对革命的贡献 (85)
- 第八篇 “达成大陆交通之使命” (96)
- 第九篇 开封情报站的尾声 (111)
- 第十篇 弥天硝烟擎火炬 (131)
- 第十一篇 缅怀胡万杰烈士 (155)
- 第十二篇 一支地下军 (177)
- 第十三篇 张绍儒如何进入兰封沦陷城？ (196)
- 第十四篇 地下军的主力是如何成长壮大的？ (210)
- 第十五篇 轻民赋广开财路 (225)
- 第十六篇 张绍儒被关进了日本宪兵队 (235)

- 第十七篇 张绍儒第二次入狱 (247)
- 第十八篇 开封解放前夕城防鸟瞰 (260)
- 第十九篇 地下军的地下交通及其联络站 (271)
- 第二十篇 党在刘茂恩部队中的工作 (280)
- 第二十一篇 段广兴在狱中 (304)
- 第二十二篇 卡住他的脖子
——忆郑州电信局的反饥饿斗争 (317)
- 第二十三篇 军闻通讯社记者的神通 (331)

第一篇 北平学运对我的陶冶

小时的生活环境

我的家，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山坡上。是一个“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的地方。尽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是我的家乡，依然是钻燧取火，“三纲五常”。尤其是我生长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祖父、父亲都是清朝遗老。不过我出世时祖父已故。父亲却对我印象是深刻的。他“不度德，不量力”，自诩为书香门第，必须有人继承他家书香。我弟兄二人，老大已经随父经商，那么书香的继承当然就落到了我的身上。父亲厌恶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更深信“无主乃乱”，因而梦想有朝一日真龙天子还会出现，开科取士当然还会复兴起来，所以自小就教我熟读孔孟之书，谙练诗赋之艺，幻想叫儿子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父亲常教导我说：“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好了进秀才”。但最低限度也得叫我安份守己，守家在地，反正不能去上洋学堂。他把学堂看作是异端，洪水猛兽。谁家孩子如果上了学堂，那就非坏不可。我父亲的看法虽然错误，却也抓住了一些事实。那时上学堂的人多属纨绔子弟。他们上学堂多数没学到学

识，只是学了一些洋气皮毛，有的还逛窑子，长了杨梅大疮。所以父亲对学堂畏如蛇蝎，无论如何是不叫孩子去上学堂的。父亲的意思是想把我束缚在他的封建家庭。他有百亩土地，还在镇上开中药铺，放高利贷，他认为我守住他的家业，一辈子就吃用不尽。可是他的话，我一点也听不进去。我只想读书求知识。我认为知识才是真正财富，贼偷不了，水冲不走，风刮不去，雨淋不湿。但我想求的知识并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洋学堂里所讲的史地、自然、英文和算术。我们县城就有高等学堂（实际是现在高小），我虽无缘进去，但“墙里说话墙外听”，他们干什么，那是偷不了的。我虽然读孔孟之书，但忠君爱国在古书上是有的。皇帝已经不存在了，无须忠君，但黄帝和蚩尤作战，周朝和猃狁角逐，曹操北征乌桓，孔明南擒孟获，岂不都是为了救国？因此爱国之心，我从古书上是得到了启发的。爱国就得有科学。当时我想：外国尽欺凌我们，它们比我国强就是由于它们的科学发达。中国如果想富强，也非发展科学不可。于是，我的科学救国之心油然而生。可是父亲不允许去上学堂，我只得在私塾里蛰伏着。

可是在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患脑溢血症死了。经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到我十九岁那年五月，遂说服长兄和慈母，背井离乡，束装就道，到太原上了新民中学。那时我们全省才有一所大学，两所高中。初中也寥若晨星，我家离山西近，所以到了太原。

开始接触了党的教育

我到太原上了新民中学。新民中学设在新南门外。距新民中学不远的满洲坟，还有一所中山中学。中山中学的学生中有我一位同乡名叫崔生锡，他邀我和他在中山中学宿舍联榻而住，到新民

中学走读。我照办了。

中山中学总共才几十人，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我在这里遇到一个闻喜县的学生，名叫李得陵的，课余之暇，我们常在一起闲聊。有一次，他和我说：“俄国原来也受帝国主义欺侮，革命了，就不受欺凌了。中国要想强盛也得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所奉行的，因此我们应该加入共产党。”他还时常向我宣传世界语，他说：“全世界都实行了共产主义，就会走向大同。因此语言也得统一，于是波兰扎曼荷夫发明了世界语，现已普及各国。”关于后一个理论，我倒是十分赞成，因我读过《礼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段引文是描写了中国古圣贤所幻想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我对它十分憧憬。所以我和李得陵很谈得来。当时我十九岁，他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他个儿不高，家贫，衣着朴素，但性情很活跃，交际很广，用今天的眼光回忆，他是个共产党员无疑。不过他向我没有明显暴露过。他常于业余时间带我去学世界语，当时我也确实学到一些，但后来因为没有应用的场合也就忘记了。但入党我是不干的。因为孔圣人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且党的繁体字是由尚黑二字组成，我想党字既是尚黑，必然不是光明正大，很自然地我就把结党和营私联系起来。我不赞成党，所以就不能入党。因此对党向我伸出的手，我没有把它拉住。

社会科学对我的启发

一九三〇年的夏天，阎冯汪蒋大战中原。我记得阎锡山当时很

讲迷信。他从太原出发头天驻防获鹿，幻想中原逐鹿，鹿死其手；第二天驻防彰德，获鹿之后，施行德政；第三天驻防郑州，表明“威镇（郑）四方”。可是，迷信终归是迷信，没过几天，同年秋天，阎冯汪大败而猬缩太原，蒋军乘胜追击，炮声隐隐，机声嗡嗡，太原秩序大乱，已不能在那里安心求学，我遂转学北平。到北平后，已是一九三一年二月，我插班在大同中学初中部三年级第二学期。在这里，我遇到一位河南遂平县的同乡名叫赵平华的。谈起现代科学，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大谈社会科学。并向我传授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由此我懂得了社会发展法则，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但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分阶级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冲突组成了社会的整体。因此这种社会形态过渡到那个社会形态，不是和平的转变，而是靠阶级斗争来实现。那么，阶级斗争就必须有党领导，党是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先进的党领导，阶级斗争是不会成功的。从此我才茅塞顿开，懂得了阶级和党，奠定了我后来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一学期的时日匆匆过去了。暑假时我考入了北平大学附属高中。

凡是三十年代初叶在北平学界呆过的人，都晓得北平学校当时有几座红色堡垒。我所上的“平大附中”也算得上其中的一座。在这里也遇到几位同乡同学向我宣传抗日，宣传马列主义。

我上学的时代背景，是我一入高中就碰上了“九·一八”事变。日军借口“中村失踪事件”，占领沈阳，而蒋介石却抱不抵抗主义，呼吁于“国际联盟”。于是，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开会声讨，示威游行，检查日货，赴京请愿。北平学生爱国不敢后人，便急起行动，纷纷集会，和全国一样，反对日军占领沈阳、吉林等侵略行动，并电请国民政府发动抗日，收复失地。

可是卖国求存的蒋介石，哪把人民的愤怒放在眼里？哪把人民的呼吁听进耳里，竟于十一月三十日，丧心病狂地发表演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掉转矛头指向人民。“众怒难犯”，古有明言。所以到了十二月十日，北平学生和其他各地学生一样，忍无可忍，遂派出请愿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火车不让上，学生们便卧轨；不让我们上，你也不能开。僵持的结果，学生胜利了，代表团终于乘上了火车赴南京请愿。

这时我已恍然大悟，书本抵抗不住日本的飞机大炮，科学唤醒不了蒋介石的救国之心。我决心舍掉死读书的信念，参加到革命行动的行列中去了。

参加“社会科学研究同盟北平分盟”

前已言之，我校是当时北平学校中的红色堡垒之一。当时我虽然还只是个学生，但同学和同乡都愿意和我接近。因为我的见解不落伍，行动也积极。我记得，在宿舍就可以看到图文并茂的党内刊物《北方红旗》。我记得，有一期《北方红旗》上面，就画有一群学生带着急躁情绪找共产党的画面，大家东张西望地问：“共产党在哪里？共产党在哪里？”一旁有人回答：“共产党无所不在。只要你积极工作，努力抗日，共产党就会来找你。”在宿舍里，还可以看到《列宁主义初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河上肇《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等。我也读到了一些左倾进步小说和诗歌，如高尔基的《母亲》、日本“改造社”所出版的一些刊物等。我初步懂得了什么叫“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什么叫“普罗莱塔利亚”（无产阶级）。这些教育触动

了我的一颗幼稚的心，使我的处世哲学、生活方式以及言论和行动都有很多改变。从此，我的西装革履脱掉了，好阔气、讲排场的心理变化了。嗅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味道，懂得了阶级、剥削，高楼大厦与贫民窟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时起，我从生活到意识逐渐地向着“普罗化”方面走去。也是从这时起，我才身着蓝大褂和进步同学同乡一起，到东岳庙慰问与访问难民，到商店检查与抵制日货。终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的一天，楚树藩同学领来一位师大同学同我谈话；谈话以后，决定吸收我参加“社联”（全称：社会科学研究同盟北平分盟）为盟员。从此，我对抗日行动更积极了。有些场面使我终身难忘。

有一次，我到师大（那时师大在和平门外大街）去参加全市学生检查日货运动，因为全市行动，声势大，费时长，虽然大家在“恨晨光之熹微”中就离校前来了，可是在师大后操场集合好时，已经日上三竿了。当局早有所闻，那时正是东北军卫戍北平的时候，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号召下，军警宪一齐出动，骑兵也参加巡逻，马蹄得得，刀枪凛凛。等到学生队伍如潮似地涌到大门口时，军警宪早把师大的铁栅栏大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双方拼搏夺门，门里波涛汹涌往外冲，喊声震天；门外刀枪如林往里逼，杀声动地。进进退退，退退进进。僵持很久，多亏我们那个斗争经验丰富的总指挥，至今我还记得他那身材和气概。高高的个子，虎灵灵的眼睛，英俊的气宇，长形的脸庞，站在队伍头前的一旁。当他几十次的喊冲冲不出去时，他便使出了激将法。他高举拳头向大家大喊：“我们就停止在这儿还是要冲出去？”

“冲啊！冲啊！冲啊！”他的喊声未落，大家早已一齐高呼，声如海啸，势若潮涌。在大家“冲啊！冲啊！冲啊！”的高

喊猛冲下，那时我正置身前列看得真切竟把军警宪的密林林的刺刀逼得后退几步，检查日货的队伍正如黄河决了堤，哗哗跃跃排山倒海地漫到了街头。高喊：“反对日本占领东北，走私华北！”但因军警人多，早把街头占满了。对挤到街上的学生又打又逼，我的脊背和两腿，都被枪托子打得疼痛难禁。在军警宪和学生众寡悬殊的对比下，前者又手舞兵器，横冲直撞，死捶硬打，结果，终于把学生检查日货队伍的先锋又一起赶回了师大校门。街上军队越来越多，终于把师大校园前后都包围了。学生们在师大校园被围困了一天。傍晚以后，大家互换衣帽，翻过南北邻居的房舍陆续散去了。

这次检查日货运动过后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一些同学正在宿舍闲聊，有的还在看书（这幢宿舍是三间通房，住有二十几位同学），忽然来了几位学生打扮的不速之客。声称他们是十七中学生，用激昂的情调，诉说他们学生会的几位负责同志已经被捕，说得有名有姓，煞有介事，切盼我校同学对此有所表示。宿舍同学信以为真，在座的有学生会负责的，也有学运积极分子，都纷纷表示愿意呼吁、营救，那几位“十七中同学”便说他们还要到别的学校去联系，希望我们学生会也出人协助。于是我们那个学生会负责同志便又去找来几位学生自治会的人，与他们偕行而去。没想到那几位“十七中同学”原是特务装扮的。所以我们学生会的那七位同学，跟他们一出校门便被捕了。在警察局看守所押了一个多星期放出来了，但他们已被特务盯上不能工作，学生会只得改组。我临时被推选到学生会负责，但我也被警察盯上了。平大高中的校址在中南海运料门里边，运料门外边的马路西就有一个警察派出所，归北平市警察局内六区署管，我的一举一动内六区署掌握得很清楚。当时内六区署有个署员是我的林县同

乡，名叫刘万昌，是他把情况告诉我说的，并叮嘱我“小心点”。后来我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蒙混敌人，终于免遭毒手。当时我们同学中有很多左倾幼稚的做法，如我们一个同乡同学名叫王树淇的，给他乡下的父亲写信要钱，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教义，称他父亲为“父亲老兄”，使他父亲大发雷霆，说“你既然称我是老兄，老兄很多，何必向我这老兄要钱？”

大学生活与当时时局

我是一九三四年暑假考上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一九三三年的“塘沽协定”无异开门揖盗。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的《天羽声明》，竟把堂堂中国悍然视为日本的保护国。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从已经被他占领了的我东北地区，调遣大批日军进入我山海关以内。无耻的蒋介石政府于同年六月又和日军签订了《何梅协定》，并为其卖国行为辩解说：“日本终久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需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日军大举入关后，除连续制造挑衅事件外，还经常在北平近郊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炸毁了不少的田舍并伤亡了不少的居民。国民党的冀东专员殷汝耕，竟公然投敌，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由此，日寇施展其“以华制华”的毒计，唆使殷汝耕经常派一些汉奸武装，到北平附近及其城关进行骚扰、掳掠。同时，由山海关到北平的北宁铁路沿线和横列在北平北面的长城沿线也都集结了大批日军；在北平的西北方面，还驻有受日军指挥的李守信和王英等的土匪汉奸武装；日寇的侦察机时时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桓，故意吓人，其飞行员常常探头窗外鸟瞰，日军天天在平郊打靶，炮声响彻城内。华北与北平市的人民面临

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尤有甚者，荷枪实弹的日军，可以在东单操场练兵，可以在街上横冲直撞。他们恣意到市政府门口朝里小便，在中国哨兵的刺刀上划火柴抽烟，可以任意逮捕和屠杀中国人。总之，那时北平已经名存实亡，华北已经沦为日寇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大学都派有日本留学生，实际是为了监视中国学生运动。

正在这样国将不国，人心惶惶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象一缕晨曦似地照亮了中国大地。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东北各省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挽救民族的危亡。……

这篇宣言，我是于一九三五年秋季开学后，在我们法商二院的阅览室里阅览板架上看到的。它唤醒了全中国的人民，打击了汉奸亲日派。处在抗日前线而政治嗅觉最敏感、抗日行动最积极的北平学生大军，遂举行了震撼全国、闻名世界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学生爱国运动。我当然被卷入了，现在还历历在目。这两天的伟大日子，只隔一周，而且都是星期一。所以各校学生都是星期日就做了准备。当时我们学校学生会的主席是裴鸿昌（后改名裴孟飞）。一二·八的晚上，我们在学生会的领导下，把集合地点、时间都通知了积极分子，并把北平学联的宣言

散发到每间学生宿舍（一般是乘他酣睡之际从门缝给他塞进去的）。因为这种行动人多，学生中也有特务分子，不知从哪里泄露了消息，被当局知道了。天一亮集合起来要出发时，才发现学校已被军警包围。门外枪刀森严把大门给堵死了。无奈，我们少数几个人才从后墙跳出了大街。经过层层折磨，迨赶到新华门前时看见了集合的学生队伍，才得到消息说不必到天安门前集合，那里的会址已被军警占领，把集合的人冲散了。近午时分，约有数千人的学生队伍集合在新华门至六部口一带。人多势众，军警已经驱赶不动。只是吩咐请愿的留在这里；过路的，看热闹的一律走开。指挥部的人派代表到新华门前要求见何应钦，可是朱门紧闭，门禁森严。岗哨说“何主任公事忙，无暇接见。”这就把请愿的人激恼了。大家哗然，纷纷嚷嚷：几天以前，日军指使一些浪人和汉奸，纠集了五百多个地痞、流氓、白面容、瘾君子等打着小旗、喊着：“实行华北自治”、“中日提携”、“共同防共”等反动口号，招招摇摇来到北平军分会找何应钦，何不忙，就是从这个新华门把那些人请进去到居仁堂，毕恭毕敬待以上宾并圆满答复。于是学生们蜂拥而上要闯门，后来才出来一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向大家点头、哈腰，说：“何、黄（郛）二主任都因公事不能出来，让兄弟代表向同学们讲话：请你们都回校好好读书。……”他才刚刚说了这么几句，一片霹雳似的口号声压住了他的话音。“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把那个家伙吓得抱头鼠窜而归。

指挥部看出请愿不成，便率领队伍向东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武装保卫华北！”迨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反动的摩托化部队和军警手舞大刀向学生冲杀过来。学生们几路横队

紧紧地手挽着手向前挺进，他们竟出动了消防大队和保安团队向赤手空拳的学生队伍水刺刀劈，弄得王府井街头水血横流，凝结成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根据遗臭万年的《何梅协定》，北平军分会撤消，所有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机关及嫡系部队和宪兵第三团等一律迁往保定，本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蒋介石命令宋哲元、王克敏、王揖唐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现所谓“华北自治”。准备于十二月十六日粉墨登场。于是北平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一二·一六”大集会。

我们学校被编在第一大队里。我们拂晓出发，分散前进。我们“异途同归”地按规定时间陆续都到了天桥。城内外其他学校学生也是“殊途同归”地分散着到来。集少成多，九点来钟就到达万人之众。已达到计划人数。到中午十二时竟聚集了三万多人，超过了计划人数的两倍还多。当即举行大会，作出了六项决议，并通电全国。即日起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北平怒吼了。

大会后，已经斜阳西挂，当即举行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大军，由前门大街北上，准备进城游行。但先头部队到达前门时，前门已经囊沙叠垒地堵上了。并由武装军警严阵把守。不得已，队伍便西去向和平门走。到和平门时情况和前门一样，队伍只得继续西行。到宣武门时仍和和平门一样，学生只得在城外就地宣传。学生的赤忱感动了市民，市民有送水的，有送饭的，前来慰问者不断。晚间，路灯突然一灭，武装军警和特务暴徒，便使棒舞刀向学生打起黑仗来了。一时乱劈乱砍，乱打乱骂，陷入了一片混乱。我一看路旁有个电线杆轮廓，便顺杆爬上，顺房坡走了几家，好容易找到一条小胡同，顺墙头往下下时，一失手，摔下来了，把右腿关节摔伤，次日雇洋车回校，经过按摩、烤酒精灯、烤电等

方法治疗，半年多才愈。

这次，我校学生算是都回来了。可是全市别的学校则被捕二十余人，伤无算。十二月十七日天津《大公报》发表消息和评论，指摘当局对学生打击之过火。

从这时起，学校即遵照大会决议罢了课。接着就组织了南下宣传团。我因腿伤未参加。二月，全市民先队（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已经成立。我院民先队由徐德乾、龚杰才和我三人负责组织了起来。我们三个人分工是：总务（即队长）徐，组织龚、宣传我。但因他俩都是党员，其他工作很多，民先队的工作实际由我负责。其中主要工作是：发展队员，组织与教育队员，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主张，请人讲演，召开座谈会，推广新文字学习，举办流动图书馆以及对外联系和市总队部接头等。

参加“民先队”与入党

一日下午，我和市总队部的人，化名友三的，约好在宣武门内的西城头上会晤，我如约而往，在晚霞抹红了西方的天边，掩映着“千万家似围棋局，百十街如种菜畦”的北平古城的炊烟雾列的时候，我登上城头，西行不远，便瞥见一位中等身材、着一件浅蓝色大褂的青年立在一双雉堞中间向外远眺，我想不会有一个人在这里单调无聊，他一定是在这里等人，便照约定暗号打口哨三响，立即得到他回眸凝视，低吟“春城无处不飞花”。我说“友三”，他说：“行宜”。俩人相对一笑，便各自找一砖头挨近坐下。我们谈完工作后，我即向他申述很多队员想找党的关系的意图，可是找不到。他问我：“你呢？”“我也想找。”我答。他淡淡地向我说：“咱们都一样，互相找找看吧！”

一周后接头的日子又到了。会面的地点仍在原地。友三问我“找到党的关系没有？”我说：“没有。”他告诉我说：他打听了一下，我们学校有，叫我等着，以后会有人找我。

此后，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天下午，我的同班同学裴鸿昌笑嘻嘻地走进了我的房间，我很了解他，便请他坐下。闲聊了一会儿，我就向他说：“我向民先队总部申请入党，人说咱们学校有，会有人找我。可是一直没人找。”

“这不来了吗？”他说。

我说：“那太好了。”

接着他就考察我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审查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入党要求和入党志愿等。我一一如实以对。最后他吩咐我按照上面所谈几项，写个申请入党报告，不过又加了一项对党的认识。

次日，我便把入党申请书写好交上。二周后，裴答复我上边批准了我入党，没有后补期。从此我成了中共正式党员。这是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事。这时起，徐德乾就辞掉了他的院民先队总务的职务，由我全面担负起来了。暑假后，我被选为院学生自治会组织部长。

第二篇 我在陕西省的一段 地下工作经历

临时大学的学生工作

我在陕西的革命生涯，是从临时大学上学开始的，所以我这篇回忆录先从这个题目开始。

临时大学是由三所大学合组而成。这三所大学是：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平大学（不是北京大学，它是首都南迁后，由滞留在北平的八大院校合组而成）。这三所大学是“七·七”事变后，奉命由平、津迁至西安的。校址设在城隍庙。

我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四年级学生。这三所院校原注册有好几千名学生，可是我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到校报到时，总共不过一百多名学生。后来陆续又来了一些，可是也陆续又走了一些。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迁往陕南时，学生人数也只有几百名。学校是社会的缩影，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社会既然动荡不宁，而学校又如何能够安居乐业？

那时学生动向主流有三：一是投笔从戎，到前方去抗战，这

把大部分人吸引走了；二是延安“朝圣”，真如朝山进香的虔诚信徒们一样，把西安通往延安的公路（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全国各地汇合而来的）摆满了；而剩下在学校囊书的也就为数不多了。

我之所以留在西安，是因为中共（地下）陕西省委分配了我工作。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不服从组织分配。

尽管学生来的不多，而教授却来的不少。有些固然是来教书为国家培养人才，有些也只是为了来领高薪，有些是为统治阶级说教或者搞特务工作。当时教授的待遇是很高的。少则二、三百元，多则三、四百元，或者更多。如果他们不来，上哪里去领高薪？可是光有教授没有学生是不行的；没有学生，教授就会被解聘。当时有的系班没有学生，只要看见学生的影子，教授就要争先恐后地去拉拢，惟恐他们一扭又走掉。那时学生生活较苦，尤其家在沦陷区的，如无后方亲友接济，那生活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几经交涉，始每人每月发给七元伙食费。而教授们则住在远离学校的西京招待所。其住宿费，每人每宿至少七元。恰好是学生一个月的饭费。他们的豪华阔绰，不逊平津。

在阶级社会里，有群众的地方就会有阶级斗争。当时我们的临时大学和其所在地的社会一样，学生中间也是分了两派。一派是主张坚决抗日；而另一派则侧重于防共。前者主张抗日必须发扬民主，把所有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实行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合作，建立抗日民主国防政府，发动全民抗战；如此，必须适当改善人民生活，以励民气。而后者则只害怕各党派与无党无派“别有动机”，也害怕全民起来无法控制；所以特别强调国难当头，人人应作出最大牺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特别强调服从政令、军令统一；提出：“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即使在讲抗日的时候，他们也只

主张由政府 and 军队来抗战。当时学校组织了一个临时学生自治会，上述观点，除在课堂、墙报以及私下谈论争辩外，往往在学生自治会的会议桌上激昂地争辩起来，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几致动武。当时我是临时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对这种斗争，体会很深。

学校有临时党支部，也有“民先队”组织。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学校民先队队部，接到了一帧红光艳艳、金字煌煌的邀请书，大意是：

周恩来同志从山西前线回来，途经西安，今晚七时在七贤庄一号举行西安市各界人士座谈会，请届时光临！

.....

我也是学校民先队负责人，所以这份邀请书，我首先看到。周恩来同志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七贤庄一号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重地，这是多么高贵神圣的邀请啊！我兴奋得手舞足蹈。这件事我“当仁不让”，必须亲临。请帖上规定派二人参加。于是晚饭之后，我就约了另外一位校民先队负责的同学，偕同前往。七时开会，我们六点半就到了。

在一幢长方形的会议室内，灯光荧荧。地中央摆了一长溜铺有浅蓝色桌布的桌子。桌子周围摆了一圈椅子，在椅子后面，靠壁还摆了一圈长凳。参加会的人到齐后，我估量了一下，大约有一百多人。因为是西安各界，自然党、政、军、民、学、工、商、都有。不过就衣着看，还是上层人士居多数。桌上摆有烟卷和茶水，墙上挂有毛主席像。一位光艳艳的伟人端坐在会议桌边的一进门的那一头。他，中等身量，椭圆脸，浓眉大眼，气宇旷达，态度和善，着一套旧的黄呢军服，这就是周恩来同志。他，刚由山西前线回来，胡须满颌，带着战地仆仆风尘。

会议开始了，周恩来同志面向群众，谦恭有礼地说：

“今天是座谈会，想听听大家对抗战的意见，是否允许我先说？”他一边说，一边用他的炯炯目光扫视会场一周，以征询大家的意见。

“请周先生先说。”会场众口一词。

于是，在众目睽睽、屏息敛容、十分庄重的气氛中，周恩来同志象洪钟一样的声音响开了。他一边用他那动人的话音往与会者耳朵眼里送；一边又用他那双锐利的眼光，巡回瞭瞭每一个在座者，使每个在座者都感觉到他是对我讲话，仿佛他是在和每个与会者“促膝谈心”。使每个人的思想都不会“走火”。他——周恩来同志，把全会场一百多人的注意，都吸引在他身上。外国人常说周恩来有魅力，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他讲话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大意是：他从山西前线回来，前线战争有些失利。不过大家不要惊慌，不要互相埋怨，而是应该如何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问题。……日本侵华是有长期准备的。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准备侵华，到现在已有六十多年之久，而我们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尚不到一年。就拿军用地图来说，敌人用的是二万五千分之一，而我们的是五万分之一，详略相差一倍。在敌人的军用地图上，不仅列有僻壤穷乡的小村的名字；那个村庄有无水源；甚至哪个地方什么地形，宜使用什么武器；什么季节、什么气候，什么气候下使用哪一号膏枪油，也都有标志。总之，一句话：地形、地物、水文、气象，应有尽有。……

他讲了三小时，从十九点起到二十二点止。讲完之后，他征求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没意见。可是“没意见”的话音未落，突然在会议桌边的中间一段站起来一个人，他高举拳头，声音古怪地说：“我有意见”。大家齐看此人：中等年纪、身躯羸

瘦、个头不高、面色苍白，着一套灰色毛哔叽中山装，活象一个大烟鬼。有人认得的，说：“这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他大喇喇地质问恩来同志说：

“周先生！你一口讲团结，二口讲共同对敌；我问你，你讲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明天敢不敢叫上报？”

“我希望明天见报。”恩来同志明快地回答。

可是明天及其以后，恩来同志的讲话，终未见报，而且连这次座谈会的消息也未发。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反面人物很不少。在我身旁，除坐有同来的我们那位民先队同学外，而另一旁则坐了学校的王教官。他可能就是来监视我们的。当时学校共有三名军训教官，一律是军统特务（复兴社分子）。军训教官主任名叫李在冰，他的官阶是陆军上校。王教官是中校。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少尉助教。在这次座谈会后没过几天，李在冰在早操训练会上作“精神讲话”时，趁我没去（因我头天晚上熬了夜），指名诽谤我说：“郭有义还是共产党，一点朝气都没有。‘一日之计在于寅’，他现在还在睡懒觉。‘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象这样，叫他上前线去打仗，行吗？……”

我对军训课不感兴趣，就是因为它没有武器训练，尽是“精神讲话”，“挂羊头卖狗肉”。当时学生们常说：“不怕飞机轰炸，就怕‘精神讲话’。”

在城隍庙西院的学生宿舍后一排，驻有城防司令部的防空排。它这里人少房多。为了地下工作方便，我和防空排长商议（当然不能和他说明为了什么），借了他们边上的一间房住了进去。可是助理教官急忙搬进来和我同住。这间房子没有门，是用一块没有合页的门板遮挡着。他趁我不在时搬了进来，还翻了我的卧

具。

《西北》社的工作

隆冬的一天晚上，临大党支部通知我：“省委要从我校挑选一名宣传干事，办理机关刊物并管理一些文化界的关系（包括党与非党）。经支部研究，决定你去，看你有无意见？”

“服从工作需要。”

“明日下午四时，有个叫陈程的来找你，你在宿舍等着。”

次日上午，我就向学校告了病假，并把学生会及民先队的工作大致交代了一下。下午就在宿舍专一苦练。果然一种不错。

十分宽敞，一间顶两间。事实上，它从中间用一堵木板墙隔开，早已成了两间。言明每月租金十元，但无女眷者免开尊口。这可把人难住了。

“我们去想办法。”我们看罢房子后，我向房东说。便紧锁双眉离开这里。

嘴说是“想办法”，也不过是为了把人家拖住——先不忙租给别人。而办法在哪里？眼前还是一片黑。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当晚回到学校，与常和我接头的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位民先队员同学一说，她慨然允诺，情愿冒充我的女眷，完成我的租房大事。

事情就照这样办了。不过，她只是于我乔迁的当天来此住了一宿，阴历除夕又来应付了一回。“临时大学，临时同学，临时夫妻。”我感谢这位女友对革命工作的支持。

我的工作任已如上述。省委每月给我四十元经费，除十元付房租，十五元归我生活支出外，其余十五元是叫我订阅报刊，以便学习和批判。

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省委机关刊物《西北》杂志。这《西北》二字的刊名，还是由毛主席亲笔题的。我记得当时拿来六方毛体《西北》字块，让我们挑选。我们挑选了其中一方颇为潇洒隽逸的《西北》二字镂成刊首。这就给我们《西北》杂志增加了光辉，提高了声价。至于我兼管的一些文化界的关系，也就是起个联络传递作用，并收收党费。

说起《西北》（西安图书馆现存有）杂志来，倒有很多戏剧性的故事，譬如主编是欧阳钦（即陈程，笔名杨清，是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后为书记兼宣传部长）同志，责任编辑是我（笔名林放）。可是我俩都在暗处，而出头露面的却是徐冰如和李初梨

两同志。刊头上印的社长是徐冰如，编辑人是李初梨。他俩都住在许士庙街十五号，“西北社”的招牌就挂在这里。实际他俩对《西北》杂志的具体事情管得不多。只是开编辑委员会审稿时，他俩参加一个。

一次，国民党省党部来人干扰，问他俩，

“你们这个刊物有什么背景？”

“我们办这个刊物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初梨同志回答。

其实，他这是明知故问。因为我们这个刊物在陕西省出版局备有案，并领有出版许可证。徐冰如同志原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也是西安事变的策划人之一，在西安早已声名卓著。李初梨同志在来“西北社”以前，原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书。他们是干什么的，国民党人心中很清楚。

这个刊物，十六开本。开始是周刊，后来是月刊，再后是不定期刊。到一九四〇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即由西安迁往三原县云阳镇，这里有一一五师留守处掩护，后又迁至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四月，因环境不好，销路受阻，被迫停刊。

《工商日报》与西安高中对我的掩护

自从我到了省委机关以后，工作是十分繁忙的。学生身份就失掉了。在白区，如果想长期埋伏，必须另找职业掩护。我已经托我们教宪法的老师章友江教授，通过他和西安高中（临大未来以前，是西安的最高学府）校长王捷三留美同学的关系，把我介绍到西安高中教《伦理学》，可是欧阳钦同志又通知我叫我去担任《工商日报》社社论编辑，我只好两份职业都兼上。因为社长刘文伯，原是杨虎城将军的一位高参，比较开明。该报的总编辑

是张性初，一个脱党分子。不忘共产党的关系，所以中共陕西省委员会特被邀兼上该报社社论编辑委员会，言定每月酬金一百元。但因省委负责同志都很忙，无法分身，叫我一人去。不过，我到了之后，总编说：“你一个人来，给你六十元就够生活了”。我当然不争这个。就这样，我干上了《工商日报》的社论编辑。我利用这块阵地，根据省委的指示，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起到了一定的团结抗日的舆论作用。

在这个期间，有一天，听到我们一位同学说，我们的老师武剑西先生在天水(实际在西安)行营当上校秘书。他是我在北平上学时的德文老师。他的籍贯是河南巩县，我是河南林县；因此，我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同乡关系，一向比较接近。不过，我对他的政治身份不摸底。知道他左倾，在北平，“一二·九”运动时，他以名教授的身份，带头游行，可是他又不是共产党，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纷纭。这时我就特意问了一下欧阳钦同志，有关武剑西的情况。我才知道：武剑西，原名武兆镐，也是中共旅欧总支部的人，在柏林小组；因为他自高自大脱离了党。欧阳钦同志(原属巴黎小组)说：“他别的也没有什么。”摸了这个底后，我才敢于同他大胆来往。我专程到行营去拜访了他，从此我们益加密切。正是此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开封遇到他时，他作了我们河大“六·二”学运的先锋。

临潼一瞥

一提临潼，读者立刻就会想到温泉和骊山。温泉因杨贵妃浴过而“流芳”千古，有“太真浴罢”之美画；骊山因蒋介石避弹而遗臭万年。再说，这里在古代就很著名。在唐朝诗人杜牧的

《阿房宫赋》上，就有“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之句，形容阿房宫之宏伟。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以西安《工商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和欧阳钦同志一起，从西安登上火车到了临潼。

我们到临潼车站下了火车，没去访问县城，径向华清池前去。好在路程不远。下车后，迤迤向西南走去，不远便有一座朝东开着的豁达大门，门楣的青砖上浮雕着华清池三个大字。墙外有条渠水，自西往东，热气腾腾，白浪滚滚。妇女们坐在两岸水边浣衣，谈笑风生。

我们进入华清池院内，径去贵妃池买票洗澡。一般的温泉浴池洗一次收费二角。贵妃池加倍。其实，水是一样的，就是设备有些不同。贵妃池是由唐山白方块瓷砖砌成，而一般池只是普通青砖砌成，外抹一层水泥面。水的温度相当热，不禁令人想起“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白居易《长恨歌》）的佳句。

我们浴罢出来闲荡，瞥见池的西边兀立着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门窗敞亮，曲栏彩画。屋前红杏初绽，绿竹婆娑。挂有旅社招牌，专供游人憩息。据说楼后有一幢高级而幽雅的平房，是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住过的地方，现已成了禁地。我们在庭院稍事逗留，便出门向骊山走去。

我们边往山上攀，欧阳钦同志边给我讲西安事变的故事。他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派其心腹团长孙铭九去指挥早已奉命担任保护驻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安全的队伍，对蒋介石发动了拂晓攻击。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忙叫卫队拚死抵抗。蒋的卫兵被击毙三百余人。蒋措手不及，仅着睡衣，

光腿、跣足，便逾西墙而逃，爬上驷山。不顾荆棘刺腿，哪管砾石割足，只是抱头鼠窜。周围枪声大作，火花乱飞。他在慌忙中依稀瞥见有一嵯峨岩石，屹立在山巅近处，侧面还有一道仅可容身的裂缝。他在绝望中萌了生机，心想：‘真是千年立石等来人。也是我蒋某命大’。便箭步进入岩石缝里。”

他说到这里，煞脚、仰脸，给我指了一下接近山顶的那块黑呼呼的大岩石，并说：“我们上到那里去看看。”

我们缓步向那块嶙峋爬去，费了一个多钟头工夫，累得我们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才上到那里。回顾山下，人似侏儒马似兔，高大的树木如草蒿。头晕目眩，使我们急忙回过头来。

那块大岩石，有五间高楼那么大，背山巅屹立在那里。裂缝前的那一半已被推倒，为了纪念西安事变，蒋介石的信徒们，在后边那一块额头上，自右至左镌刻了“至大至刚”四个比斗还大的字，字画上涂了朱砂。正面两边还镌刻有与横额字体大小相称的对联。上联因年久健忘记忆不起，只记得下联是“龙虎山中，安危石山，国家民族基础系焉”。书丹署名陈诚。

据欧阳钦同志说：

“那天早晨，一直到钟鸣九响，才在这里找见蒋。蒋一见孙铭九便气呼呼地说：‘你枪毙我吧！’‘不敢’，孙说。‘奉副总司令命令，来请总司令入城议事。’接着就把他搀扶到山下，上了卧车。……”

这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楔机。历史上的任何英雄豪杰，都只能顺着历史车轮去转动，才能显示出英雄的本领；否则，犹如螳臂当车，只能自取灭亡。

汉 中 行

一九三八年春天，日寇开始远行轰炸西安。临大在西安不能安定，终于奉命改名西北联合大学，于三月八日向城固迁校。学生大队步行，教职员视其能力所及，乘汽车、马车或骑马，也有坐小卧车的。那时宝鸡往南无火车。本来我是决定不去了的，没想到五月初的一天，欧阳钦同志突然指示我：“毕业考试快到了，你去领张文凭，以后在国民党区域工作还用得上。”

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把我急坏了。按历届惯例，毕业班的毕业考试，总是提前举行。又听说宝鸡到汉中的汽车票很难买。有些人到宝鸡连住一两个月都买不上一张汽车票，勉强买上一张，汽车到路上也是尽出事故。那时我国不能制造汽车，也不会炼汽油，全凭外国进口。车是破旧不堪，往往带病运转；加上汽油缺——其缺乏的程度，提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因此，发油量往往是不足的；就这不足的汽油量，驾驶员还想从中捞一把。从宝鸡到汉中尽是下坡路，驾驶员的窍门是：关上油门往下溜。加上车的机件不好，所以一路不是抛锚，便是出事。特别使人担心的是：沿途崖路险窄，傍山偎水。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涧沟无底；而且弯路回环，稍一不慎，便车碎人亡。为了不至过分延误，我到省公路局找了一位熟人，买了一张从西安到汉中的直达车票，于是我从西安出发就坐上了汽车。临行时，欧阳钦同志交给我一份带给中共陕南特委的密件，叫我带到汉中。如何送给收件人也都告诉了我。密件是密封的，内容我不知道。我把它暗藏在身上。路上虽经几次检查，都以我的《工商日报》社记者的名片给应付过去了。

在宝鸡住旅社，见有些房间的门扇上都标有俄文卡签，进一步证实了苏联正在援助我国抗战。钉有俄文卡签的房间，是给苏联航空员准备的。可惜好景不常，后来就听说苏联空军不来了。因为重庆太不友好，航空员歇班时都不允许自由上街买东西。

从宝鸡到汉中，沿途所见：种大烟、抽大烟的不少。同时看见汽车司机也很散漫。赌博、宿娼、“打黄鱼（中途自己捎客，光收费，不给票）”，屡见不鲜。在这条漫长的山路上，赶不到站时，到路旁农家投宿或避雨，有的司机一进门，比衙役进入“犯人”家还厉害。借东要西，甚至把人家的门扇卸下当铺板。使人“夜不闭户”。

在峰回峦障、“修柯低拔，骈织承翳”的留侯庙上，遇到了王捷三，我才知道西安高中也在往洋县搬家。他以为我离开西安也是为了躲飞机，便小心翼翼地问我：“这几天又来炸了吗？”我用藐视的口气回答说：“几架飞机有什么可怕的。”他一听我的口气不对，立即改口说：“光凭空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车行至褒城境内，遇到一辆北上的载人卡车，和我乘的卡车（那时载人载货都是无篷卡车）交错而过。那车上的乘客向我招呼，我一眼认出那正是我们毕业班的几个同窗。他们大声嚷给我：“毕业考试已经结束，我们分配了工作。”

车一闪过去了，无异给我浇了一头冷水。“不到黄河心不死”。既已到了这里，身上还有重托，我就毫不动摇地任车飞奔。

车到汉中后，我衔命而往，找见特委负责人，把机密文件交给他。“如释重负”。转身便在南郑闲荡，始知这里已是南国风光。河山秀丽，人物灵巧，连他们使用的农具也比北方轻便。鱼米丰富，物价低廉。惟地面潮湿，患疥疮者多。使我不得不常存戒心。素面四分钱一碗，肉面五分一碗。二两装的一碗大米饭，

四分钱一碗，肉菜也不过一角一盘。如要烧鲜鱼，一盘为一角二分。炒素菜也就是五至八分。

我在汉中住了一宿，第二天坐滑杠到了城固。学校设在城固城内文庙里，但法商学院还在小西门外的关帝庙。

我到了关帝庙一打听，我班同学到这里来过的共有七人，已于五月十二日（现在是五月二十日）考完，毕业分配走了。我象考秀才误了场一样，那样倒霉。找院、系，都不管。我直接去找徐诵明（原是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现为西北联大校长）。他问我：“为什么没随校迁来，你留在西安干什么？”我诈称“因病未来”。“为何不请假？”“我想病好了就来的”。他默默考虑了一会儿说：“人家都上了一个半月课，你缺课不能考。”“我补课。”“学生毕业了，教授都走了，没人给你补。”我气愤地说：“我这四年学业，废于一旦。你不给我文凭，能不能问过良心？”后来，“蘑菇”的结果，他允许我秋天开学后再来补课。不得已，我就仍回西安去了。九月间我又来，正赶上院反动当局C.C.派张北海要解聘沈志远、章友江等一批左派教授，学生正在挽留。当局不听，激起一场挽留进步教授运动。请愿、罢课、示威、游行，历月余未平息。我本是受过学生运动“洗礼”的人，见学运就想“染指”，因此我以在校学生身份参加了挽留运动。后经汉中当局采取了武力镇压，逮捕了一些地下党员与民先队中的积极分子，但也减少了一些解聘教授的人数。学潮暂时告了一段落。这个期间，学校整个没上课，所以我也没补课。学潮告一段落后，系里给我出了两道题，作为毕业考试题（本届毕业生都没做“毕业论文”）。

第一道：《学生运动我见》。

第二道：《什么叫“精神讲话”？》。

这两道题出给我，其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开始我有点作难，后来，我突然想起事变前有年暑假在北平举行全市中学生毕业会考时就出过类似这样的题，已经有人作过巧妙的回答，现在我何不效法前贤？

于是，我对第一道题，在文内写道：

“夫学生运动者，乃学生强健身心之必修课也。就其概略言之：有田径、有体操、有游泳、有滑冰、有登山、有越野、有滑翔、……量其体质，就其环境，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可以活血脉，壮筋骨，提精神，补元气。有关一生之事业成败，尤为民族优生之大事。所以向来办教育者都把体与德智并提。我中国人向被世人看作‘东亚病夫’，若不把学生运动大力开展，则何能使我中华民族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对第二道题，我同样是给他乱扯了一气。

我豁上他不给我文凭；不过，文凭后来还是给了。

本来，领到文凭我就要回西安，但突然接到陈程来信，说王捷三已内定晋升省教育厅长，叫我速到洋县西安高中报到，诈称来此继续任教，一俟王捷三动身回省任职，便跟他回到教育厅谋得“一枝之栖”。这样，我仍然把报社和教育界的职业都占上，好继续管理文化和教育界的党的关系。

王捷三取代周伯敏担任教育厅长，是陕西省的复兴社战胜了C、C.派。周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外甥。常恬不知耻地说：“陕西省只有两个文化人，就是我和我舅。”现在这个文化人被撤换了。但C、C.派在教育界是有势力的。所以虽然胡宗南（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当时驻扎西安）秋天就和王捷三通了封官许愿的电话，可是直到来年早春二月，王捷三高升厅长的任命状才

姗姗而来。我还是经由章友江教授的说情，得到王捷三的同意，遂摒挡行李，随他北上。他还带了一名庶务员。我们三人分乘了三乘蓝韩小轿到了汉中。

从汉中北上要搭汽车，王捷三不愿去扒车厢壁，以他厅长的身份硬挤进驾驶室。他的个子大，不仅把司机助手挤上了车厢，还把司机师傅挤得驾驶不便。

到宝鸡后，有姓王的一位朋友给厅长“接风”，把我们三人都请去了。说是吃饺子，却先上来十几道名菜。山珍海味，水陆并陈。王捷三看见珍馐罗列，名酒散香，不禁风趣地说：

“啊呀！这形势越来越严重。”

可是，“兴极悲来”，王捷三酒后失言。他忽然瞥见男东道和女主人白发红颜，不相般配，便触景生情说：“抗战以后，出现了很多‘伪组织’。”他说的倒也是实话。抗战以后，有很多人逃难仓促，夫离妻散，各奔一方。有的还“鱼沉雁杳”，生死难卜。因此，有些人就不甘寂寞，另觅新欢。这家男女主人正是这样。“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王捷三也可能是说言直谏，也可能是信口开河，但男女主人的脸可就立刻泛红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弄得这场酒会不欢而散。

从宝鸡往西安是坐火车。因为有厅长的关系，车上有些照顾。王捷三对我很客气，拐弯抹角地叫我到西安后利用《工商日报》给他吹捧。我也应付着。

到西安后，当时教育厅设在二府街路北，后来才搬到新城内的西北角和省府一起。这时正值春节前夕，他把我分在督学室，任命我为巡回指导员——委任级督学。

我到职不久，便派我到彬县出差。那里有一所初级中学，盖了一些房子，要厅里去验收。我于一天早上，从西安出发，搭长

途汽车到彬县去了。去以前我在厅里了解了一下，彬县中学的校长名叫范重子，是复兴社的人。他用的一个体育教员，就是他的同志。这里与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壤地相接，斗争前沿，所以我不能不提高警惕。

我早八时从西安出发，到彬县时已是下午四时。到学校后，因我是上级机关来的，他们又知道我是王捷三的人，所以对我特别奉承。刚好碰上那晚专员（彬州专区）请客（也许是为我特设，因为在宴会上并未见有别的客人），还把我邀至首席。我和专员并不相识，可是他对我特别亲热，使我不能不疑窦丛生。彬县县长也在座，对我也是特别捧场。尔后，复连几天，都由范重子陪我游览彬县名胜，如花果山、水帘洞、大佛寺等，彬州八景，无一遗漏。在一次朝会上，范重子要我给学生讲话，我用群众的口气讲了国共两党应团结抗战的主张，不应相互摩擦，抵消力量。结果，我那天晚上去睡觉时，发现床上放了一把钢刀。我明白这是对我的警告。我本来想给他扔出去，表示愤怒；可是我一想：说不定晚上就有人来暗杀我，我便把它藏在枕下，权作自卫武器。我彻夜未眠，警惕到天亮，可能人家知道我已有备，所以平安过去了。但天一亮我就告辞回西安。从此，我重新嗅到了“抗日有罪”的气氛。

国共合作形势已经逆转，以暗杀宣侠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高参）同志为凶兆，八路军办事处周围便被很多化装特务包围了。他们或扮作小商，在办事处门口摆摊儿，或以别的幌子作掩护，在办事处门口盯梢。那时省委通知我们没紧要事绝对不许到办事处去。有时到办事处去一个人，就会有人在门口偷偷给你摄了影。过几天，你就会在别处被捕。有时也不捕你，但跟踪侦察，看你都到哪里去。或者在你家门口布暗哨，看有谁到你家来。

在这种形势下，省委在西安立脚已有危险，故于三月底撤往云阳。

到本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停发了八路军及新四军的经费。省委已走，七贤庄又不能随便去，我在西安正感到孤独无援时，省委已派交通送信来调我了。

我在教育厅“挂冠”而去。但对《工商日报》的社论编辑一职，这原是省委的委托，“对外的窗口”，我不能淡然置之；于是，请示省委批准，找了一位代理人——他的名声没有我红，也是我们的同志——继续在那里干。

省委派一辆蓝帏马拉车来接我，停在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我找了一套八路军军服，挂上中尉副官军衔胸符和一道金俩花的领章，便于第二天早上坐马车离开七贤庄。一出胡同口，碰上王捷三（他由崇礼路到新城去上班）坐的洋车（这时汽油缺，厅长都“自动”坐洋车），着一套黄咔叽布中山服，戴一顶法兰绒德国盔，我（坐在辕板上）俩面面相觑，默无一言。旋即错过，分道扬镳。

到了北门，守门戍卒看见我是军官，还给我敬了立正举手礼，接着就叫开箱检查，发现我皮箱内有西装，他们惊异地说：

“以前红军可没有这些！”

“我是八路军。”我淡淡地答了这么一句，便驱车出了北门。

第三篇 拆东墙补西墙

——征日伪的税，筹我们的经费

“干部地方化”

一九四一年春，我来河南沦陷区开辟地下工作，是投的一个本家爷爷郭城蕴。他当时任伪河南省财政厅长。伪组织的大员，本来是日本人的傀儡，真正当家作主的是日本人。日本当时统治沦陷区是军管制。拿当时河南省的沦陷区来说，伪组织中县、团级以上的单位都派有日本顾问。顾问是由当地驻军派、当地驻军管，并随驻军的变动而变动的。伪财政厅当时有三个顾问。厅一级顾问是入江；厅下稽征科顾问为村山；开封市营业税局顾问为扈江。伪组织的华人长官调动一般不许带私人，想安插一个听差也不易。郭城蕴到河南来时正碰上这个困难。所有厅内或厅属人员都是前任厅长吕东荃和入江顾问安排好了的。但后来随着日寇的统治深入与其战线的延长，情况又起了变化。

日寇侵华多年，积累了不少统治殖民地的经验。当它开始侵略到某个地方，由于它过分残暴，只要铁蹄一到，人们早已“桃之夭夭（逃之夭夭）”，剩下不逃的，也不过就是一些地痞流

氓，想乘火打劫的人。所以它抓不到好人。人们就说：“日本到死什么地方尽用坏人”，实际它是抓不到好人。不得已而求其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兵到安阳时就是这样。它杀人盈城，尸遍地，稍有人性者都已遁入山林。或逃往大后方。只有一个兵痞萧瑞臣，他却领了几个龟孙在小西门里跪迎日军，日军把刺刀搁在他的脖颈上，说：“杀啦杀啦！”他明知日本只是吓一吓，不会来真的，所以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日本兵认为他是“好样儿的！”遂把他扶起，任命为伪彰德县维持会长，第一任县长，又第一任伪省长（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主席）。但这些“饮鸩止渴”的举动，老奸巨猾的日本帝国主义，宁肯多做？所以随着关内侵占地盘的逐步扩大，就逐步从关外把它已经占领多年而豢养有素的鹰犬，即所谓“满洲国人”源源运进关来，撒在华北的所谓四省（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三市（北平、天津、青岛），无孔不入，无处不有。要员、翻译，这些人尤多。可是，随着日本的侵略战争逐步扩大，波及印度及印度支那，以至向南洋进军，用的走狗越来越多，显着原有鹰犬左支右绌，所以就不能不从当地物色。同时也因为日本在华北逐步站稳，有些华北土著绅商又从后方逃难回来，而这些人既有财产，又在一些落后阶层中有点旧威望，恰好原来在华北当政的“满洲国人”和当地那些痞子和流氓都已在民众中臭了，也该给他们调换个地方，所以这时日本便在华北提出了一个“干部地方化”的问题，目的是想起用一批当地的“正派人物”而代替原来那些威信扫地、声名狼藉的人，给日伪的华北政权注上点新鲜血液。这在当时华北伪组织中引起了很大的矛盾，激起了不小的冲突。我进来时正赶在这个冲突的浪头上。这种变化是自上而下的。这时上自省长已换了人，厅长也大部分是华北人代替了东北人。不过，这种变化，老奸巨猾的日本

帝国主义，采取了渐变的手法。

“朝中有人好做官”

我于一九四一年春到伪彰德县税务局时，这里还是东北人当局长，凭着臧蕴的亲笔信，才给了我一个三等科员。三等科员的月薪伪币为五十二元，一等科员月薪伪币为六十一元，各分所长的月薪伪币为六十元，略低于一等科员。可是任何一个分所长的派头都比一等科员神气。尤其是车站分所长，那个富态豪华的劲头，比起局长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使我这旁观者看来真是莫明其妙。当时伪彰德县税务局有两个肥缺。一是稽征科，握全局税收之枢纽；一为车站分所，掌全局税收之门户。因此，这两个美差，就成了历任局长竞争之地。我在税务局当科员几个月，到了凉秋九月，忽然换了局长。由一个“瘾君子”的王局长，换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崔阁铭。前者是东北人，后者是天津人，也是华北人代替东北人的实例。这时由于形势发展，大员莅任也可以带僚属，所以崔局长来时就带来一位姓陈的当稽征科长，把原来一个姓王的科长顶替了。车站分所长一职，他没有带人来，准备委我。因我自到彰德税局当科员后，死记着党指示我要设法进入开封，因开封是日伪省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为此，我曾几次给臧蕴写信，请求爷爷把我调开封，可是，他不敢，总觉着我来到“和平区”还时间短，根柢浅，不能遽然答应我。但他知道这样也不能安我的心，所以他趁着新局长来，就委托新局长来了提拔我。崔局长也还真听他的话，一到任即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担任车站分所长。这对我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可是，我十分知道现任车站分所长姓李的根柢，他是“满洲国人”，走

的入江顾问的门子，“善财难舍”，这个肥缺，他是不会轻易罢手的。便问局长说：“那不李所长在那儿么？”崔阁铭笑了笑，把他面前桌子上摆着的一封信推给我，说：“你看看他的辞呈。”

李所长根子硬，但好做作。每逢有新任局长来到时，他总是递一个辞呈，以观风向。结果是每次都被新局长挽留下，因而提高了他的身价。他的呈文我没看，可是我知道他的鬼蜮伎俩，便问：“他这是诚心还是假意？”

“我管他诚心还是假意。这是他作茧自缚，我撵还撵不走他。……”一顿，又说，“你的事情，我来时厅长对我有交代。”

他既然说到这里，我也就等着好事。可是没想到“准李辞职由郭递补”的签呈报厅之后，不久又被厅里驳回来了。正如我之所料，李所长是个伪君子，他在彰德一递辞呈，即跑到开封去告状。一手掂着鼓囊囊的钱皮包，一手挈带着一个花枝招展的粉头，跑到入江顾问处去诉苦，哭哭啼啼，说崔局长一到就逼他辞职，而委任的新所长竟是郭厅长家里的人。入江一听大为恼火，立即跑到厅长办公室去质问。经臧蕴好言解释，说：“李所长亲笔写的辞呈，没人逼他。辞呈现在。新委的所长和我是同姓，不是我家里的人。要按俚语所说‘天下同姓是一家’，这样说成是我家里的人，自然也可以。”可是顾问不听，只得把原呈驳回。不准李所长辞职，说他是税务老手，经验丰富，所请辞职一事，应毋庸议等因。

签呈驳回后，崔阁铭大发雷霆，立即把我叫去看那回文，并拍案大叫：“厅长说话不算数，中国人还算人不算人？”他脸青脖胀出租气，眼盯着摊在桌上的那一纸驳回的呈文。出了一会儿大气之后，在我的劝导下，他又把口气放缓和说：“我个人没啥，都象

这样，以后厅长再说话，下面如何执行？”急得他直跌足。

我一看这事弄僵了，再说我也不甘心失败，便向局长建议，由我亲自到开封去斡旋。他同意后，我便到开封去了。

我到开封后，在公馆见到了臧蕴，把崔阁铭对厅里驳回呈文心怀不满说了说。臧蕴一点也不激动，态度雍和地把入江对那呈文的意见以及厅里驳回的经过和我说了说，然后就和我商议去不去车站分所的问题。他说：“我想车站华洋杂处，是是非之地，咱们读书人又不会营私舞弊，何必去担那份风险？局里不是有一个一等科员缺吗？我的意见你干上一等科员好，比分所长每月还多拿一元钱。”

我不同意。一来我看中了车站分所的税收，二来我是要抢占那块地盘，直到这时，我还蜷居在局里集体宿舍，一个屋子住了三个人，对我的秘密工作进行很不方便。但这话我又如何能对一个大汉奸说？只得向他说：“崔局长的意见是：这么办，对三爷的威信不好。以后你再说啥，下面就不好执行了。”

经我这么一说，他埋头考虑了一下，最后只得答应我：“再和日本人说说。”

这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傀儡政策也有改变，一改以往的唯我独尊态度，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略微让着点。所以对这件事情，他们商议的结果，来了个妥协的办法。把李所长调清化（道清铁路终点站）当税务局长，才正式任命我为车站分所长。这样一来，彰德税务局就成了伪省长陈静斋和伪财政厅长郭臧蕴的合股买卖。因崔阁铭是伪省长的人。我担任车站分所长，等于厅长向省长身上割肉，“分我一杯羹”。

“税官税官十官九贪”

我到车站分所当了所长以后，但下面人事未动，使我有职无权。当时车站分所编制共五人。即所长一人，雇员一人，稽查一名，税警两名。此外还有两名编外人员。一是我带去帮我做地下工作的额外雇员周同乐；二是炊事员兼杂役魏小八。征收大权完全掌握在雇员陈宝善手里，他是李所长的旧人，根本不买我的账。很长时间，都是他一手遮天，把我和周同乐闪在一旁。我们两袖清风，他却脑满肠肥。我们也觉着其中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里。

日伪时期的税收种类很多，收税的机关也多。举其大者言之，就有三种。一曰统税局，主管烟酒印花等专卖事业的征税事宜；二曰契税经理局，主管房地产的买卖成契按契纳税事宜；三曰营业税局，即我在伪彰德县从事的这种税局。后者业务又分两种。一为坐商税，一为行商税。坐商税一月一征，征收税率按营业额的千分之几征收。统由局稽征科办理。行商税以营业为准。只要货物易手，变卖一次就得纳税一次。税率是由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十，依其与民生的关系和价值昂廉而定。日本人的货不纳税。这一来问题就多了。有的是贿赂日本人给其打掩护；有的干脆给日本人算一干股（即不拿资金而分红）来蒙混。税收人员常为查这些人的货物报税问题而挨打受气。

税率是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总署统一制定的。伪华北的四省三市的各税务局、所，征收室的墙壁上都挂有印好的税率表。税票是由三联单组成。第一联，在商人照章纳税之后，由征收员裁给商人，“货随照行”；第二联，分所每日于下午四时向

局缴款时，交局核对，即存局备案看票上金额和缴来的现金是否相符；第三联是存根，由分所归档备查。营业税亦名流通税。只要货物流通就得报税。流通二字在经济学上是指商品交换而言，但俚俗的见解往往把它和流动混淆了。因此，有的只要看见货物流动就要人纳税。以致有一头毛驴并未成交而只是一日之内途经税卡两次就被截住报了两次税。所有以上所说，并未包括“各土司”的各自为政、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猛于虎”的苛捐杂税。那时安阳西乡有位老夫子，过年时在其家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今日出捐，明日出捐，日日出捐”；下联是：“一年饥荒，二年饥荒，年年饥荒。”

别的且不谈，就拿照章纳税来说，名堂也很多。如“大头小尾”票，“虎头蛇尾”票，都可使税官不露声色，即宦囊充裕。此外，又有“以多报少”，“以优报劣”，甚至不开税票迳入私囊等。所以在日伪时期完全可以说“税官税官，十官九贪；一个不贪，手中无权。”税收又有淡月和旺月之分。一般说来，中小城市的税收淡旺与农忙农闲有关，与农作物和土特产等的播种、收获期也有关。拿我当时在安阳的情况来说，一般规律是秋天至春天为旺季，夏天为淡季。当然这与气候也有关。如夏天雨多，商人走动不便，因而形成货运稀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一九四一年冬季十二月，正是旺月时期，可是光见大宗货物运行，不见税收增加，经仔细查堵，突然抓住了陈宝善的一张“虎头蛇尾票”。原为四十吨花椒，合价洋一万六千元，按百分之五的税率征收，应纳税洋八百元。在三联单的税票上，其第一联是按真实情况写的，而在第二联和存根上则改写为一马车青菜合价洋七十元，收税金一元四角。这样，八百元税金只往局里报一元四角，剩下的七百九十八元六角，便饱入了私囊。他的贪污办法很多，除上列

在货物和税票上捣鬼外，还有刁难商民的办法。行了贿的，他与人方便；否则恣意刁难，不予放行。因此他的眉高眼低都可招财进宝。所以，城关厢的商家，同业公会、商会，没有不巴结税务局的。每逢过年过节，都少不了一份厚礼。我抓住陈宝善的赃证便把他告到局里，革掉了他。当然革掉他也不是光为了争权夺利，而主要的是为了方便我地下工作。革掉他后，我便请求局长，把周网乐的额外雇员，补成正式雇员了。但为了使陈宝善不狗急跳墙，又答应他，每月他的三十二元薪水朝我拿。

再说革掉陈宝善也不是光抓住他的弊病就能办到的；为此，我还贿赂了崔阁铭三百元。他虽然也推辞了一番，但终于以“暂存”的名义收下了。

“越烧香鬼越多”

那种社会，是一种鬼蜮世界。越烧香，鬼越多。在崔阁铭收了我的三百元贿赂后，他谋算车站分所是个名副其实的肥缺，所以紧接着一九四二年初，就给我派来一个姓方的小青年，约二十二、三岁，细高个，容长脸，着一件灰毛哗叽棉袍，操天津话，来到了分所。一来就口气挺大，自称是局长的仁侄。自诩多年经商，很懂税务。“郭所长是书呆子凭门子吃饭”。当然，崔阁铭也向我交代过，说和他父亲是朋友。他仗凭局长势力，总想和我“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和我当面说：“有事咱们几个主要人共同决定”。我说：“大家商量着办。”又说：“好处咱们平分”。我说：“有饭大家吃”。他在周围各商家招摇撞骗，说自己是副所长；将来他熟悉了情况后，就会当正所长。所以有些人就称他方所长。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对我的威胁。“磨杵见寻驴蹄印儿

总是有的”，后来，我终于抓住了他的弊病，请局长把他调走了。

事情如钱塘江的潮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把姓方的撵走后，分所还是不得安宁。一天上午，我正在分所忙于征收，局里来了人。陈科长偕同办事员张恩尧，手提公事包，昂昂然来到了分所。声称要查对最近一个时期的票照，我便把他们迎至所长室。

当时税局车站分所，设在北厂街九兴胡同尽头，天顺货栈之内。总共两间西屋，是个套间。套间是由一堵纸壁隔成的。纸壁上的门口不能安门扇，吊了一方布门帘。外屋是征收室，里屋是所长室。

我把他俩迎进所长室后，让坐在办公桌旁。即给他们从文件柜里取出春三月的存根。张恩尧便把这些存根摊放在桌面上，又从皮包内掏出票照第二联放在一旁。他把这两种票照逐张核对，又在算盘上拨拉，陈科长在一旁全神贯注地看着。可是整整弄了一个上午，一点错误也没找到。因为第二联和存根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甲等于甲，乙等于乙。怕的是第一联和存根或二联对，可是这第一联已由商人带上“货随照行”去了，他们没得捞上。中午，我怜悯他们白辛苦，请他们到馆子吃饭。饭后，张恩尧扭空避开陈科长，悄悄告诉我，局里有他，不会有啥事。他是我的熟人。我在局里当科员时，他和我并桌办公。我乘机收买他，给他装入兜里一百元伪钞，并吩咐他以后每月照拿。

“剜彼之肉医我之疮”

我把局里弥补好，分所打扫“干净”之后，便和周同乐计议，只要不是直接压榨商人使他们增加负担的税收，而只是损害日伪“以战养战”基金的，则所有以前李所长和陈雇员所用过的舞弊办法，我们一概“萧规曹随”。仅仅两三个月工夫，我们除花销外，还积蓄了三万准备券，存在双和益马掌柜处，以备工作之用。后来，我到开封后，因币值跌落，我把伪币换成黄金由黄广源（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第一军驻汴办事处主任）给保管。我们的开支主要有三项。分述如下：

第一项，改善分所同仁生活。我们分所六个人实行了吃饭不收费的制度，每日三餐都是大米白面肉浇头。当时配给粉一袋（二十公斤装）六元二角，但它又毛又糙，市民称之为毛面，我们不吃，我们买市场的八元多一袋的“洋面”吃。大米、小米也都可以买上。除白吃饭外，我还“偿资有差”地分给他们一些津贴。当然他们自己也有一些“外快”。“经手三分肥”，这是当时的一句谚语，这不过是就一般经纪人而言。我们税差，经手就有八、九分肥。“鸡子尿尿，隔（各）有便道”。“不瞎不聋，不当家翁”，我对他们的捣鬼手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项，津贴当地的地下同志以及上面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

第三项，给根据地购买奇缺物资，如西药、电池、无线电灯管及铜金等。当然我们也用“鸡鸣狗盗”的手法偷盗敌人一些。这后一种办法不在本文详述，待另文补叙。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这两句古话，很适合我在这里引用。在那种社会里，钱可通神，又能使鬼。我们有了钱，买上咽下，都用钱去说话，因此使很多人都和我们有了交情，真是“有请必到，无话不谈”。甚至一些敌伪的秘密文件，也不避讳我们。

我在河南地下工作期间，自一九四一年至日本投降，上面给我派了八个人来，都由我把他们安排，在他们未找下职业以前，一律由我包办开支。即使他们找下职业，有了收入，有需要时也还给。其他一些有工作关系的人，如有困难，也适当帮助。所以后来得到滕代远同志的表扬。说我在整个抗日期间，经费完全自力更生并对根据地有所帮助。到解放战争期间，我虽然从上面领了十两黄金，但后来又给上面交还十一两二钱，还不算留给当地同志们的。

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在开封建立情报站时，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自己出钱在开封马府坑街十九号后院买了一所房子，十九间，花房价二千四百元伪币，连报税等开销共掏腰包二千七百元。

在解放战争期间，上级又给我增派四人。这时工作由情报站改成了工委，工作多，当地发展的人也多了。开支自然比过去大。但由于我过去有积蓄，所以在学运中接济困难学生，工运中接济困难工人以及在一九四七年组织受到大破坏时营救被捕同志，也都是由我筹措。这些细节不在这里一一叙述，因为在别的篇章内都还会提到。

第四篇 我在沦陷区所经历的 珍珠港事变

轩然大波在太平洋掀起

一九四一年我在日占领区的彰德县，以伪彰德县车站税务分所长为职业掩护而从事地下工作时，十二月九日清晨，广播一响，突然听见放送出一则骇人听闻的新闻：

“中华社东京十二月八日电：

日本神勇荒鹫（轰炸机）×××架于八日未明，突然袭击美国强筑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使它停泊在该港内的上百艘军舰，被炸起火，酿成一派烈焰飞腾、浓烟蔽空的火海。多艘舰艇沉没，人员死伤殆尽。太平洋上的军力对比优势已转入日方手中。”云云。

接着又听见广播了日皇对英美的宣战诏书以及日本内阁的各项战时措施文告。真是轩然大波，白浪滔天。

转眼，上班时间到了。同仁们都来报到，商人们陆续来所纳税，嘴上都揭掉了“免谈国事”的封条，每个人都很自然地发表一些对珍珠港事变的意见：

“英美真狗屎，一触即溃。”

“小日本，小日本，就那么一股猛劲儿。中国都拿不下来，英美更别想。”

“不管咋说，总算给黄种人出口气。英美再不能小看黄种人了！珍珠港事件，真象‘雷公打豆腐’。”

“自己不争气，光靠别人还行？”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兔崽子、王八羔放狗臭屁。

当晚，从广播里又听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通知，号召其所辖四省三市自十二月九日起至十五日止在各主要城镇用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举行庆祝“友邦”珍珠港大捷宣传周。如举行民众大会、报告会、座谈会、讲演会、搭松坊、张标语、演文明戏、踩高跷、玩社伙、画宣传画和出墙报等。

次日上午，我便接到伪局通知，下午二时在局长室召开科员以上人员庆祝珍珠港大捷座谈会。届时，我便前往，恰值气候不佳，北风凄厉，尘土飞扬，乘车沿途观看，只见路旁的墙壁上以及小西门外的城墙上，都刷了一些新的大字标语。如：

“东亚兴亡，在此一战！”

“打倒侵略，实现共荣！”

“打倒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实行全体主义，反对自由主义！”

“反对民主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

在冲衢要道，有些“衣冠禽兽”，正在监督着苦力们扎松坊；各机关门口都在结彩，悬旗，新民会的人在作街头宣传，但行人们皆掩耳而过。我到局门口下了车，只见局门口也装潢了一番。门头上挂了一条红纸金字横额，内容为“击灭英美”。

我付了车资，跨入局门，迳向局长室走去。进入局长室后，举目一看，人已基本到齐，我找了一个空板凳头坐下。席未及暖，主持会议的事务科萧科长就宣布开会了。他先讲了一下今天开会的意义和性质，然后又说：“今天这是座谈会，是否可由崔局长先讲？”

与会者默不作声，崔阁铭便厚着脸皮先讲了。他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无耻地说：“‘友邦’在珍珠港空战大捷，是我大东亚各民族的一声春雷”。接着他就缅怀往事，愤怒斥责英美帝国主义百余年来如何在东方横行霸道，罗列了很多英美侵华事实后，又举上海外滩公园门口钉有“华人与狗禁止入内”的木牌为例，使人无可辩驳地确信东亚各民族应联合起来去打倒英美的理论。我立即顶了他一句说：“听说虹口（日租界）昆山公园门口也钉有同样的木牌？”他白了我一眼，接着就又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说教了。他说：“这场战争是一场新旧秩序之战争。”他确信“以凡尔赛和约及华府条约为基础的旧秩序必然崩溃，而以日德等国推行的全体主义与统制的自由，以冀获得‘物质’之平均分配与各国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必然胜利”。后来，他还联系到中国国家之命运，荒谬绝伦地说：“中国复兴建设的希望，全寄托于这次大东亚‘圣战’之中。”因而他奴颜婢膝地嘱咐大家：“都要灭私奉公、廉洁生活，竭尽全力去支援‘圣战’”，云云。

他的讲话，真如同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此时天色已晚，萧科长惟恐崔局长老眼昏花看不清底稿，忙去拧灯照亮，豁然，十数名与会人员的丑态就毕露在灯光照耀之下了。有的频频打盹儿，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在吃零食，有的在吸白面，把一个兴致勃勃地为“友邦”说教的崔阁铭，弄得愁容满面，深慨税界同仁，腐化堕落，不问政治，一至于斯。不禁长叹一声戛然停

止了他的讲话，并请大家发言。大家寂然无声，会场冷落下来。主持会议的萧科长，从兜里掏出老莱士怀表一看，六点已过，只得宣布会议暂时结束。但吩咐各科室、各分所在此宣传周内，本着局长今天会议上的指示精神，分别举行座谈。宣布散会。大家自去。

揭破敌人的欺骗宣传

散会后，我即返回分所。晚饭后，在电灯照耀下，我卧床休息，脑海中翻腾着车站分所的座谈会如何开法。分所人虽不多，但环境挺复杂，因为它是伪组织中的一个基层细胞。在编制的五个人中，两名税警倒还罢了，虽不进步，也不反动。而稽查和雇员，却都是汉奸气十足。尤其是日本人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替黄种人出气，使受了多年英美欺负的中国人，一时懵懂，便欢欣鼓舞了起来，梦想中国可借此获得解放。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和额外雇员周同乐两人，也不过真是星星之火，是否能够点燃周围，都还大成问题，而燎原当然就更谈不上了。

我正静卧在床内心分析所内环境，外屋传来一串脚步声。那脚步声是又轻又快，很象税警陈时明的步伐。我即喊他的名字，他已应声而入。我抬头一看，果然是他。便指了一下桌边的椅子让他坐下。他坐下后，我告诉他桌上有烟。他一看是红锡包，淡红纸包闪亮，烟丝气味芬芳，早已乐得眉开眼笑，抽出一根塞到嘴里，边擦火点烟，边笑着说：“我到所长这里来，就是赚得抽一根好烟。”

“我这里光有好烟。”接着我就问他，“你对日本进攻南洋觉得怎样？”

他只管抽烟。停了一会儿，才说：“所长不是下午到局里参加了会议，还不比我知道？”

“明天还叫咱们分所也开。各人可以谈谈个人的看法嘛。”

“那呀！”他答应着，先猛抽了一口烟，然后才断断续续地说，“我觉着日本人占的地面宽了，对我们有好处。”

“你这话，”我说，“我不懂。”

他慌忙解释说：“你看，朝鲜人比东北人吃得开，东北人又比我们吃得开。所以人们说：‘朝鲜人是日本人的儿子，东北人是日本人的孙子，华北人是日本人的重孙子’。因此我想：如果一旦日本占领南洋，叫我们到南洋去，那时我们不也就吃得开了吗？至少我们可以比现在的地位升一级。”

“照你这样说，亡国越早，资格越老。”我觉着他说得蹊蹊，心一急，便从床上坐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当个老亡国奴，二鬼子，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之后我便仰脸质问他：“你讨厌朝鲜人和东北人那种劲头儿不讨厌？”

“他们那种劲头也很惹人讨厌”，时明说。“人们把他们叫‘高丽棒子’，‘二鬼子’，就有轻蔑的意思。光他们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慢劲儿，就够惹人讨厌了。”

“是嘛！”我说，“想吃谷子自己种，仰人鼻息，还不受人欺侮？”

“可也真是！”时明仿佛茅塞顿开。只见他眉头一展，脸色开朗地说，“别看他们在我们面前张牙舞爪，可是到日本人面前他们就摇尾乞怜了。譬如我们以前的王局长，在我们面前架子十足，而到日本人面前，虽对一个普通商人，也是毕恭毕敬，满脸堆笑。”

“这就对了。”我愉快地说。“我们要永远记住：日本人是

日本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不要上它那‘同文同种，共存共荣’花言巧语的当。即使同是中国人，也是有好有坏。十个指头也不一般齐；何况我们和日本既非同文，亦非同种。固然，日文中用了不少汉字，就连其五十音图的‘假名’，也是汉文偏旁，但它的发音不同；有很多字，字形虽然相同，而字义却又不一样。当然少数也有字形字义相同而字音也相近的。可是这种把外来语直接使用，各国文字语言中都有，这也不能作为同文的根据。同种就更谈不上了。它是大和族为主体，我们是汉满蒙回藏为主要民族。如果说都是黄种，因此说成同种，倒也勉强。可是它的用意不良，它所以这样说，不过是想把它这次对太平洋出击，说成是为了东亚和平，为了给黄种人抱打不平，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使大东亚各民族共存共荣。其实这只是一片鬼话，不过是想动员大东亚各民族共同联合去击灭英美。说实话，还不是想叫东亚各国都听日本指挥、出人、出钱去为它的战争目的牺牲。而到头来还是它一国之内少数人得利，就拿我们自己所干的事情说，同样都是经商，为什么中国人纳税，日本人就不纳税？”

“不平等噢！”

“对呀！无论他说得多么好听，‘提携啊’，‘亲善啊’，‘万邦协和啊！’‘王道乐土啊！’而不平等待人的事实存在，剥削、压迫照旧；日本人吃大米、白面，中国人吃毛面、豆饼；日本人偷了东西或弄坏什么，都往中国人头上安，我们就永远不能听他那一套。”

这一席对话把时明说得心服口服。夜已深，他站起来要走，我叮咛他：“我们开座谈会时，你发表些意见。”

他唯唯而去。

次日中午，我利用午休时间，分所没人，和周同乐交换了如

何开好分所座谈会的意见。接着我俩又分头去做同仁们的工作，并决定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二时在分所征收室举行“庆祝珍珠港大捷座谈会”，除通知分所同仁全体参加外，并邀请局里来人莅临指导。

开会的那天下午，我把人集合好后，因为天冷，把屋门关好，可是门又被推开了。一个衣冠楚楚的青年小伙儿，大摇大摆地唱着走了进来。

“蛇无足而走，
羊无头不行。
日本帝国呀！
是我们东亚各民族的带头人。”

他只顾得高兴地唱着、走着，进来了，却忘记了关门。一股冷风卷着尘土刮了进来，大家不禁闭眼扭脸以避风沙，因而对他十分不满。坐在门里的陈时明，立即把门砰声一关，表示抗议。在征收室后墙根坐着的同乐向这人开了一个玩笑，说：“你的尾巴太长了！”

我一看是局里来人，象个钦差大臣，为了煞一煞他的威风，以平民愤，便用揶揄的口气喊了一声他的绰号，说：“哦！人头儿太次郎来了。”弄得他满脸通红，正欲发作，我莞尔一笑，把红锡包香烟递给他。他一看是好烟，觉得还瞧得起他，立即接过烟包，转嗔为喜坐到桌旁椅子上了。

这人名叫黄文林，本地人，年纪不过二十郎当岁，小圆脸上长满了粉刺疙瘩，嘴里镶了两颗金牙齿。他在局里顶了一个税警的名额，实际作着局长的密查工作。不过，这个密查，不查货物不查商人，专查局机关和局属分所同仁，看谁有无贪污中饱、行贿受贿之事。可是他并非秉公办事，而是随心所欲。谁捧了他，

贿了他，他就“上天言好事”。谁如果怠慢了他，他就捏造一些事实到局长面前告你。因而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人头儿太次郎。这个意义不难理解，就是因为人缘太次，末尾的郎字是仿照东洋人取名的习惯给他加上去的。为了圆场，我又把他媚抚了一番，并请问局里有何指示，让他先说上几句。他也真不客气，即说：

“我发表点个人意见。这个战争是东亚全体被压迫民族与英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他激动地阐述了黄种人应齐心竭力向英美帝国主义出击，使东亚人得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之后，接着他又公然给日本侵略者辩解了一番。说日本主张共存共荣与英美的片面侵略迥然不同。并强词夺理地罗列了一些对比事实。最后他强调要以不眠不休的精神来为大东亚“圣战”献身。

接着是嵇查黄连山发言。此人年近四十，说话还常好激动；文化不高，特好掉一些生硬的字眼。他说：“东亚者乃东亚人之东亚也。其中以日‘满’华为主体。美国人不让别人插手美洲，来了个门罗主义。他们知道把美洲安上门，擦上墙；我们为何不可来个洞牙主义。圈成洞，安上牙。”

他把与会者惹得哄堂大笑。但雇员陈宝善替他圆场说：“东亚主义。”

“我就说洞牙主义”。他不自觉地坚持着他的错误说法。

大家还是笑他，他不管，仍然继续说他的：“多少年来，我们受尽了黄毛子、蓝眼睛的欺侮。洋枪大炮一轰，传教士、鸦片烟，潮水一般地涌了进来。不仅把我们的领土践踏了，甚至连我们的空气也污染了。中国不行，‘满洲国’也不行，可是日本行。它是我们的近邻。常言说：‘亲不亲，老乡邻。’日本现在出兵

南洋，主要是为我们黄种人争气。我们能自暴自弃吗？”

黄连山正在得意洋洋地为日本进攻南洋吹喇叭，没想到恼坏了一旁坐着的陈时明。他向他反唇相讥说：

“黄先生！你说的比唱的好听。怎么日本人当太君，当顾问，只委了你一个小稽查？”

黄连山听见一怔，象一根钢针扎进耳朵里。不禁火冒三丈，砰的一拳砸到桌子上，瞪起发怒的两只牛眼看了陈时明一会儿，愤愤地说：“稽查怎么样？在办公室有椅子坐，到货栈有茶喝，还不比你当个税警强。一年四季都在站大街，任风吹、日晒、雨淋和雪盖，弄不好还得挨耳光子。”

“我们这亡国奴还不就是人家的出气筒，哪象你们有日本爹、日本爷的！”

“你骂谁？”黄连山象谁捅了他一刀子，气势汹汹地站起来便向陈时明扑去。陈时明也不示弱，站起身来挥拳抵挡。双方支起了码码架。同乐去劝架，因为身材短，刚好钻进他俩中间，伸起双手想把他俩分开，但一时又分解不开。陈宝善站起来想去“左扯”，嘴里说着赞同黄连山的话。我只怕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厉声呵斥大家都坐下谈。两个打架的才松了劲，大家纷纷归还原座。我才乘机向大家说：

“座谈会，座谈会，顾名思义，与会者只兴坐着谈，不许站着说，更不能打架斗殴。刚才黄稽查和陈时明只因语言相激，便动起武来，这是极端错误的。就我个人的看法，我觉着兵凶战危，战争扩大总不是好事。‘万邦协和’才能达到真正的‘共存共荣’……”。

大家听见我的发言，虽然不赞成这场战争，而还援引了一些协和语，也就不怀疑我另有背景。门外还有很多商人等着报

税，座谈会也就就此结束了。

两个中央文件的作用

当我正在焦心上级对太平洋战争不知作如何指示时，在一个寒风凛冽的近午时分，地下交通员周化元同志风尘仆仆来到了分所。我把他迎到所长室，他从粗布棉袄怀中掏出一本小书递给我。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是一本石印《甘露寺》。我暗忖这是密书秘密文件，正要问他此书从何而来，他却凑过来向我附耳，

“这是上面派人送来的。人还在官司（周化元的村名，在安阳西乡，距城三十余里）等着哩！”

我一看桌上摆着的“康拜因”怀表，双针叠摆在十二点上，便喊同乐领他父亲（即地下交通）到厨房去吃饭。他爷儿俩走后，我趁中午没人在所，便把屋门关好，把《甘露寺》唱本摊在桌上，拉开抽屉，取出显影药水，用药棉蘸上在书上涂抹。涂完之后，一看，原是中共中央两个文件，使我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这两个中央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我迅速把桌上拾掇了一下，便给上边来人写了一个回条。上写“收到《甘露寺》一本”，并署上代名尤义。回条写好后，恰好化元老伯已经吃完饭回来，我便把收条交他，他带上，匆匆离开分所。

我决定把《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油印散出，把《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在党内传达，澄清思想。所以，当日下午就打发同乐去文具店买十大张彩色莲丝纸，叠一叠，用包袱皮包好提回来。他照办了。晚上，我趁分所没人，

即到附近面粉公司借来铁笔钢板、油印机和油墨等。恰好当晚老天助我，彤云密布，雨雪霏霏，路断人稀。我和同乐乘机在所内刻印传单，夜半告成。至于分所同仁，平时晚上也没人在家。这里若不介绍几句，后世之人如何得知。当时中国人在沦陷区给日本人干事，一般都是小则为生活，大则图享受。税务局的人有“外快”，白天弄到的钱，晚上就要找地方去出脱。否则日积月累，钱就无处存了。钱这种东西，说也奇怪，“来之不明，则去之模糊”。所以当时人们讥讽税家说：“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占鳌头”。他们夜游不在，正便利了我们的秘密工作。

当夜我们把传单印了一百份，次日雪霁，我和同乐分别把印好的传单暗带在身上，好在冬季棉衣厚，人们看不出，借口出去查税，便分头去把传单送给有关系的工人、伪军和商人等，再由他们往外散或贴。同时即顺便向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油印机及其附件及时还给了面粉公司。

第三天，这个传单便纷纷出现在火车皮上、街头墙壁上及其他公共场所。人们议论纷纷，说共产党进城了。把警察、宪兵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出动了很多人，驱逐围观传单的群众，并用水和刀子，洗刷和撕刮这些传单。

其后果是：有些人恐慌，觉着天天防共，共产党还是进来了；有些人仇恨，说该把散传单的人抓住；而大部分人则清醒了头脑，明白了中国的大敌还是日寇，中英美苏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日德意法西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不久，一九四二年的新年到了。新民会奉日方之令，为了庆祝太平洋战争旗开得胜，勒令家家户户除旧桃换新符。家家户户当然奉命惟谨。但内容多所含蓄。如新民路一家理发店门口，贴

了这样一副：

蓬壶未削有何面颜

污垢不除负此头颅

明眼人一看就晓得此对联的内涵：“蓬壶”（胡）者，日本之古称也。污垢者倭寇也。

第五篇 破军运巧炸漳河桥

邂逅相遇，邀叙契阔

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我在伪彰德县税务局车站分所上任不久，一日下午在街上闲荡，忽然碰见我在北平上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俩人都大吃一惊，没料到阔别几年又在此地相遇。她的名字叫牛爱菊，本是安阳城内人。我于这年春天初到伪彰德县税务局时，也曾到她的故居北门西街打听过，只见宅院成墟，人影不见。询问左邻右舍，说她在事变时已外地逃难，父母搬到唐子巷亲戚家居住，使我怅然而返。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邂逅相遇。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两人眼里传神，眉毛说话，都明白新民大路熙来攘往，华夷交错，车水马龙，众目睽睽，不是谈心之地。不过这里恰好是在爱菊的单位街口，她向我说，她就在这胡同里一个学校教书，要我到她那里坐坐。我便随她而往。到了校门口，才从一条大木牌的墨字上看见大书“大日本国民小学”七字。我立即问她：“你在这里担任什么课？”她轻声说：“教华语”。我问：“学生都是日本人吗？”她答：“都是日本居留民子弟。主要是车站日本职工子弟。”“他们能懂吗？”

“用日语讲解，咱们不是在高中学过日语吗？”

我和她边说边往里走，抬头看见一位华人老头在传达室门口的一具杌子上坐着，彼此互相对看了一眼，他没问我，我也没向他打招呼。我们继续往里走去，这地方在事变前原是中国铁路上的扶轮小学，我本是来过的，可是如今大变了样。迎面而来的金碧辉煌的八角亭，这是过去所没有的。除一杆日章旗在八角亭的黄灿灿圆锥形的尖顶上凌空飞舞外，在八角亭的亭檐下也挂了很多金字红旗。走近一看，才看见正门头上悬一块阴字黑匾，用金粉刷过的“靖国神社”四个大字，夺目耀眼，其余一转红旗上，则绣着各种颜色的字迹，如“忠魂永存”，“武运长久”等。

我们绕过神社继续往后走，横在神社后面的一座大游艺室里，喧声四溢，乒乓间闻。又往后走是日本人新盖的一幢红洋房，听爱菊说这是学校教职员办公室。办公室两旁都是原来的旧教室。再后是一个大操场。爱菊的住室则是操场东南角一片桐、柳掩映下的两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这都还是原来扶轮小学遗产。

爱菊的房间是两小间一通的破东屋，我随她进入房间，看见陈设也非常简单。一张单人木床，床上衾茵俱全，窗下放了一张三屉桌，桌上放有文房四宝，还靠墙在一片绿色的铁夹板中间紧挨紧地挤了一、二十本书。她让我坐在桌边的一把破旧椅子上，她则跨在床沿陪着我。她头一句就问我：“你不跟随学校到西安去了吗？”我说：“是的。”“可是我到临时大学去找过你，没有找到。”“那时可能我已离开学校。”于是她眉头一皱，满面疑容问我：

“你怎么到这边来的？看你还穿上西装！做的日本人的什么官？”

我从容回答说：“官不大，小小的税务局车站分所长。”我说着话鸟瞰了一下自己穿的新制的一套法兰绒西装，诙谐地说：

“居官不在大小，能弄钱就好。替日本收税，还是个美差事。”

她眉开眼笑把嘴一噘，然后笑盈盈地说：“有什么任务？”

她和我在北平同学时，本来都是“社联”盟员，彼此的根柢都互相知道。不过她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读完高中就回到安阳原籍到扶轮小学当教员。因为彼此互相了解，所以我也就模模棱棱地说：“任务很多，总括一句是抗日。我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

她一听，身子一颤，立即从旗袍腰扣上抽出一块红花手绢，来擦她的双流两泪。擦了一会儿，又抽抽噎噎地说：“我自从离开北平，也就离开了组织，离开了党，回到这安阳小城。虽能敦叙天伦之乐，可是国将不国，救国无门，热血青年，宁能蛰伏。不久平津又沦陷了，国民党不战而逃，日寇长驱直入，幸而我跟随铁路员工撤往后方，想到延安又无人介绍，就在西安难民窟内潦倒。既无安居之幸，只有流离之苦。今春家庭捎信说母亲有病叫速回，便又千里跋涉返回故土，托人在这里谋生。我想你来是有任务的，只要有救国的机会，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我看她意诚辞恳，伤心国事，遂向她婉言说：“咱们本是高中老学友，彼此都了解。咱们情况也都一样，暂时在这里谋生活，谁也没有忘记抗日救国，你不要怀疑我是共产党员，我还不够那个条件……”“你别骗我！”她打断我的话说。“是真的。我还不够，不过我从后方回来后，在家乡，稍事逗留，听接近……”我伸手张开食指和拇指做成一个八字，接着说，“这个的说，咱们同学彭定乾（即彭涛，解放后任化工部长，已故）就在太行，我专程去拜访了他，并说明我到敌区作事，他叮咛我搞情报。可是

我不是此地人，人生地不熟，耳朵背得很。你在这里有机会和日本人接触，听到什么了告诉我说，我转上去，就算咱们的救国行动。”

“那我完全可以办，腿勤一点，利用家访就可以。”

接受任务，抓紧家访

自从我和爱菊谈话之后，她常于黄昏到学生家进行访问，一方面看看学生，同时也就征求家长对华语课的意见并留心要完成的任务。时日匆匆，不觉已到了一九四二年暮春，在五月上旬的一天黄昏，她家访来到了车站机务段一号房的门口，这是机务段长兼运转室主任能代明贤的住宅。她举手在门框上按了电铃。里面叮铃铃一阵脆响过后，传来了一串急促而轻盈的步伐。门灯突然一亮，门开了，出现了一个剪发头，着海军服的白净脸姑娘，叫了一声“牛先生！”接着就是深深一躬，仰起脸来，说了一句“コンベンワ”（晚安）。

爱菊一看这个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六年级学生能代穗子，立即莞尔一笑纠正她说：“你和华语老师说话，应该用华语。”

穗子臊得腼腆一笑，说：“我在家说惯了日语，下次一定改正。”

爱菊抚摸了她的头并说了原谅她的话，即问：“妈妈在家吗？”

“妈妈出去了。”穗子仰着小脸说：“爸爸在，有客。”

爱菊皱了皱眉头，想转身而去，但里面传出了洪亮的问话声“タレカ（谁）。”

“牛先生！”穗子扭头朗答。

“イテシヤイマセ（请进来）。”里面又大声嚷出。

爱菊便把穗子拉上往里走，经过庭院，进了房里的内走廊，便看见着和服的能代在紧靠房门的一间纸门外面的踏脱上站着笑嘻嘻地伸着右手，爱菊向他鞠了躬，握了手，正要脱鞋进屋，只听能代吩咐穗子说：“把牛先生领到隔壁先坐一会儿。”爱菊只得随穗子往隔壁走去，但她从能代身旁往他的卧室睨了一眼，通过敞开的纸门瞥见里面的炕桌边坐了一位着西装的青年日本人。

爱菊随穗子来到了隔壁房间。这个房间是个地板间。有桌椅板凳、茶具等。爱菊想：这大概也是个小会客室。

穗子把老师让坐在桌边椅子上，并亲昵地给老师斟上茶。爱菊问她在华语课上有什么问题，她说：“我去拿课本来。”便出去了。

隔壁谈话声继续了起来，爱菊听得一清二楚。仰头一看，原来是头顶上的天花板的泥埤掉了一大片，露出来的灰板条缝隙就把隔壁的谈话声清清楚楚传了过来。她只听得隔壁用日语大骂八路军，说八路军是土匪，是百斯笃（霍乱）菌，特别是他的百团大战把皇军害苦了，……现在大本营决定叫北支派遣军暂停渡河作战，把已经集结在黄河北岸准备过河的那几个师团，立即命令他们回师北返，对华北进行反复的、持久的大扫荡，把华北的八路军斩尽杀绝；通过治安强化运动，真正把华北的新秩序建立起来。……

爱菊一听这是谈军事问题，便聚精会神，侧耳倾听。她听出此人讲话口齿清楚，语言流利，而且斩钉截铁，口气宏阔，显然是那青年人的声音，可能还是上级来人，不象能代的拙嘴笨腮。

接着听见那声音又继续说：“重要的是：‘擒贼先擒王’。根据北支派遣军的意图，首先要消灭八路军在辽县的总部，其余则

不战自溃”。

能代插话说：“是的，给它来个一扫光，使我们日章旗插在太行山的高峰上，迎风飘扬。”

爱菊越听越生气，不禁柳眉直竖，杏眼怒张，长吁了一口闷气。

只听那青年又说：“我这次是奉开封铁路局的命令，来这里和你们探讨皇军北上时的备车问题。”后面的几个字，他几乎唧唧得使人难以听清。

“ハイ（是）”能代严肃地回答，“请你把部队过衫的番号、人数、装备及其需要机车车辆告诉明白。”

这时候，爱菊在隔壁忧心如焚，听觉更趋集中。只听那“开铁”的青年说：“有三个师团于本月中旬陆续从你们这里过路北上，预定时间是：川岸师团本月十五日由新乡开来开往石门；铃木师团本月十七日也是由新乡开来开往石门。这两个师团都是路过这里。但二十日井关师团则是由开封及阳原武、封丘、滑县一带乘火车或徒步开来到这里集中，二十时从你们这里开车，到站是邯郸。需用的各种车辆，我已同大谷口站长讲过了。你这里也是机车问题。常言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所以我除和大谷口站长具体布置外，特来看看你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爱菊在隔壁听见能代大吃一惊，叫苦连天，哀求说：“我的石田サン（先生）。平常我们每天才准备九辆机车，一个师团过境，至少需要十列车皮，再加上一列先驱车，就是十一列，连我们平日的需要共需二十辆机车，我们满打满算才十二辆机车，有些还正在检修，这我们如何能应付得了，我希望叫新乡、开封、归德各支援我们三辆，或许可以勉为其难。”

他们说到这里爱菊听见隔壁沉寂了一会儿，然后才听石田

说：“我回去向盐川部长报告一下，看怎么办。”一顿又说：

“我看你不要指望，必要时可以把正常的客货运中断一下……”

正在这时，地板间的屋门咿呀一声响了，打断了爱菊的静听。她扭头一看，原来是穗子拿着课本进来了。

爱菊佯嗔正要质问她的来迟，她却先抱歉地说了“牛老师，来了一个小朋友，我和他说了几句话，一时来晚了。请原谅！”

爱菊一听转嗔为喜，抿嘴一笑说：“没什么。”

爱菊接过课本正要给学生讲课，忽然听见一阵木屐响动，把一个着和服的能代带进了房间。能代一进门就深深一躬，客气地说：“牛先生久等了。”

“没什么”。爱菊说，“这不我在这儿给学生教课吗？”

能代说：“请到隔壁坐，客人走了。”

爱菊跟能代来到了他的卧室门口，登上踏脱，脱掉皮鞋，按着能代的指点，进入了能代的房间。能代也脱掉跋拉板儿进来了。俩人分宾主坐在榻榻米（炕席）中间的炕桌旁的坐垫上。在能代给爱菊斟茶的当儿，爱菊一眼看见后墙上贴有两条彩纸日语标语。其中一条写着“军事，秘密ハ夫妇ノナカデモモレテワイケナイ（军事的秘密虽夫妇不得共知）”。爱菊这时才明白能代让她先到隔壁等等的意思。

能代给爱菊倒上茶坐好后，爱菊便开口向能代说，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来给家长汇报一下学生学华语的情况并问问有哪些意见。

能代迭说：“不忙不忙，你喝点茶，坐一会儿。不看看我的古玩玉器、珍珠、玛瑙、珊瑚树？你看那张条桌上摆的丑颜六色，”他指了一下一边墙根的条桌上的陈设，问爱菊：“好看不好看？”

爱菊心里十分腻烦这些，觉着日本的高级职员也不过是一些声色狗马之徒，又看他嬉皮笑脸，斜乜溜眼，不怀好意，遂“虚与委蛇”了几句，告辞而去。

爱菊从这里出来，已是明月当头照，夜市人喧闹的时分。她躲闪着警探，特务的眼睛，绕了一些弯路，才来到车站税务分所。正好我一人在家，她向我把在能代家听来的话一五一十向我说了，我对她勉励有嘉。

乘务员计炸漳河桥

这时候，我们铁路工人中已经有了三名党员。这三名党员是魏傲（司机），邵跃扬（司炉）和刘润梓（机手，即后来跑交通运电台的那个人）。我除把牛爱菊报告的日本三个师团分批北调的情况速报根据地外，当即于一个晚上召集这三位铁路工人在邵跃扬家开会，计谋破坏。

那天晚上，我和这三名工人在一盏无罩煤油灯的照耀下，围坐在邵跃扬家的铺有毡席的土炕上。当我把日军三个师团于最近将分批过彰的情况告诉他们并要求他们设法破坏后，他们个个愤慨，人人激昂，都明快表示这是他们抗日救国的好机会。不过我提醒他们，“咱们是地下工作，上级指示我们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所以我们这不是沙锅子捣蒜——一槌子买卖”。

他们才冷静下来，默默考虑，但每个人的眼睛都在扑眨扑眨地看我。

我也在默默考虑，敌人很滑，三个师团我们都破坏不可能，在一个时期只能作案一次。如果这样，就该让川岸和铃木师团都

先平安过去，这样敌人就会滋生太平麻痹观念，我们好集中力量给井关师团最后一击。想好了之后，我就把我的意见说给了他们，他们也都表示同意。

接着我们就研究如何破坏井关师团过彰的问题，润梓说可以叫武工队来埋地雷炸个鳖孙。跃扬说用不着，它二十日二十时才由彰德站开出，我临时背上橇杠，带上手钳去拔掉它几条铁轨夹板上的道钉，它就会出轨。

魏傲说：“这些办法都不好，铁路上有护路队，我们白天去目标大，晚上去人家戒备严……”

“我们想法把护路队引开”跃扬打断魏傲的话说。

“那也不是容易的”。魏傲说，“即使你把护路队引开，巡道车来了你又怎么办？我的意见，他要能叫我们开先驱车，给兵车开路，那就好办了。”

“怎么？”跃扬说：“你想用日本人的水雷撞击敌舰的办法，那等于鸡蛋碰石碾，粉身碎骨。”

我和润梓都劝跃扬先别着急，让魏傲说具体一点咱们研究。

魏傲慢条斯理地说：“我说的办法，我想是可行的，不过得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先驱车；第二，还得我们三人同在一个机车上；第三，又必须在大铁桥上；第四，后头紧跟是兵车。”

魏傲尚未说完，跃扬又打断说：“你这四个条件很难办，我们不是一个乘务组，怎能让我们上一个机车上？”

我看他们争执不下，便要他们谈谈车站情况。

跃扬说：“车站出了大布告，命令所有铁路员工从即日起一律不得旷工或请假，必须按照《社训》（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社训，等于社员守则，共四条：一、宣扬善邻友好之大义；二、达成大

陆交通之使命；三，完遂灭私奉公之职责；四，躬行修身齐家之常道。规定办事），违者严惩不贷！……”

润梓说：“十万大军过彰是大事，所以检修车间正在检修车辆。”

魏傲说：“有些机车也在检修。整个车站和各段室都忙得团团转。”

我说：“好。我就是要知道这些。我们不是规定过铁路工人四句行动口号（给他干不给他好好干，身在曹营心在汉，平常佯装作良民，节骨眼上就捣乱）吗？现在已经到节骨眼上了，你们应把咱们的行动口号用各种方法宣传出去，使大家起来故意和日本捣乱，拖延它的运兵准备工作，检修作业计划，他越不叫旷工请假，越要和他针锋相对，装病或磨洋工。”

他们三人都说：“好。”并一致表示坚决照办。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又说，“问题的另一方面，你们要用事实证明：为什么日本人开兵车、客车，专叫中国人开先驱车，还不是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开上先驱车头前踏雷，遇有沿途危险先让中国人送命，日本人才好安全通过，有没有这种实例？”

他们都说有，并举了一些实例。我说：“好，有实例就行，你们一宣传，开先驱车的乘务员都纷纷躲开，不听调遣，你们临时乘乱到司令所（调度室）周围转悠，他的先驱车开不出去临时就会把你们抓去，你们便可将计就计。”

他们三人一致说好。

这里需稍加解释。那时的先驱车，工人一般称它为踏雷车。这踏雷车是由五节车厢组成，车厢内一律装上垃圾或碳渣，挂在机车头里，由机车推之而行。机车后面也有守车（即工具车）。

那时因为我军常常破坏铁路或埋地雷，先驱车出动频繁，遇有兵车或重要客车运行，前面必有先驱车。这和解放以后只有中央主要首长乘火车出门前面才有先驱车不同。

怎么尽是铸工和磨工？

“春日迟迟正好眠”。那天黎明时分能代尚在榻榻米上和老婆同衾共枕，鼾声大睡，墙壁上的电话铃叮铃直响，把他从春梦中惊醒，使他心中非常烦恼。谁这么早就来电话，搅得人连觉也睡不成。他任之听之，漠然置之。可是那电话铃偏偏响个不停。他没好气地爬起来去接电话，一听，原是“开铁”运输部打来的。询问他当天机车准备得怎样？他才猛然一惊，想到今天正是那五月二十日，井关师团下午过彰的日子。他一时来不及检查，便贸然回答说：“这是大事，决无问题，我们早安排好了。”电话耳机撂下了，可是他心中不摸底，万一机车准备不够，岂不要他的脑袋？于是他又急忙抓起话筒找副段长兼检点室主任高鹤鸣说话。高鹤鸣电话里也是答复能代无问题，但心中同样无底。于是他也慌了，撂下电话就跑来检修库查问。他急踉踉跑将到检修车间时，就被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他正要发作斥责一大早谁这样莽撞，忽然一声“报告”阻止了他，并说：“副段长，我正要找你。”他一看此人手中还拈着一张纸条，原来是检修班长老王。便一把揪住他的领口说：“我正来找你，四台机车检修得怎么样？”

王班长结结巴巴地说：“还有两台没有完成，料不够，人手也差。这不是一个领料单，我正要找你来批一下。”把他手里拿着的那张纸条举给高鹤鸣。

“你胡说！”高鹤鸣气得把王班长的领料单打落在地，恶狠狠地斥责他说：“料，你们都领齐了。人，从检修一开始我就从新乡大修厂给你们调来十个技工，怎么又说人手也差。”

这一吓，王班长慌了，他立即给高鹤鸣前作揖后叩头地说：“段长啊！调来十个技工不错，可是来的人没有请假旷工的多。而且出番（上班）的也不好好干，站站停停。”

“不是有布告不许旷工请假吗？谁准他们的假？”

“段长啊！还用准假，他们自己就不来了。我想这都是受的共匪的蛊惑，你没见这几天车皮上，墙壁上，甚至厕所里，到处写着‘身在曹营心在汉，节骨眼上就捣乱’吗？”

“都是谁没上班，谁不好好干，你把名单开给我，我来惩办他们。”

“是，段长。那个料……”王班长把领料单拣起来又请高鹤鸣批。

高接过料单瞅了瞅，看见上面写着：铜套两副，铜瓦四个，紫铜管五十米，……尽是一些铜料，现在铜贵如金，想必是工人偷走了。可是不领给他任务更完不成，一狠心，就在料单上签了字。

王班长拿上料单慌忙领料去了。高鹤鸣次第进入几个检修库都看了一下，确实还有两台机车未竣工，但修理工人很不带劲。有的懒洋洋地在磨蹭，有的简直就在那里闲站着，问他们为什么不干活，他们说：“等料哩。”

高鹤鸣看罢之后，掏出怀表一看，上班时间已到，想能代这时已经上了班，忙转身到运转室来给能代汇报。

能代在运转室刚刚打发走一批乘务员，就看见高鹤鸣垂头丧气而来，忙问他：“怎么样？”

他说：“还有两台机车没修好。”

能代问他为什么没按计划完成？他就把检修车间的实际情况说了说，最后还说：“车、钳、铆、锻、焊工不多，铸工磨工倒不少。”

能代一听大为惊讶，便问高鹤鸣：“检修一开始就叫新乡往这儿调技工，怎么搞的？你光调的铸工和磨工。”

“不是那，”高鹤鸣说，“铸（住）是站在那里不干活，磨是磨洋工。”

“バカ（混蛋）”能代大骂一声，气得头摇身晃说不成话了。

漳河桥变成鬼门关

这几天，中国工人和日本人捣乱，已经把他们整得够呛，而今天，天也不作美，暮春天气，狂风猎猎，沙石飞扬，草木摇撼，行人遑遑。井关师团还是按照预定计划陆续来到了。

尚未过午，就听见街上人喊马嘶，引擎隆隆。我佯装查税冒着风沙出去溜达，只见修长而宽阔的新民路上，塞满了东洋大兵，并夹杂有坦克，炮车，卡车，吉普和成群的战马。每个鬼子兵都是仆仆风尘，活象个土地爷。有的呵欠连连，有的睡眼朦胧，有的打盹儿，有的端着军用水壶喝水，——总之，一派疲惫不堪的景色。可是他们正在喘气休息的当儿，忽然一股馥郁的香气，送到了他们的鼻端，他们心中十分蹊跷，大风天哪来的芬芳。接着又依稀听见有金声、玉振，悦耳赏心。侧耳倾听，只见这种声音由细而洪，由远而近，寻声远眺，又朦朦胧胧看见成群结队的女裙衩，顺着队伍的空隙嫋娜而来。她们越来越近，已经看清了，

她们怀里抱着乐器，手里提的慰问袋，还有提暖水瓶，茗碗和洗脸盆的，这时他们才明白这是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组织起来的“高髻云鬓别样装”的慰问队来慰问皇军的。这也本是日本的陈规旧习，每逢有皇军过境，必须发动妇人会来慰问一番。

慰问开始后，则见这里一簇，缝缝补补，那里一摊，斟酒举觞；有的盥洗饮茶，有的咀嚼干粮；有的互通款曲，有的漫谈家常；有的载歌载舞，有的又拉又唱。使大兵们最受感动的还是日本的《樱花歌》和朝鲜的《阿里郎》。前者挑动起人的春兴，使人倍思家乡；后者打开了人的情窦，使人落入情网，因此激动了他们的反战情绪，使他们顿时引吭高歌，反战厌战的绝唱

“國ヲ出テカテイク月ソ”，

（出国数月来，）

共ニ死ヌキテ” コノ馬ト

（死和马分不开。）

攻メテ進ンダ山ヤ川，

（涉水跋山，行军打仗，）

トツタタジナニ血ガカヨウ。

（唉！连缰绳也受了血光之灾！）

“ココハ才國ヲ幾千里，

（背井离乡数千里，）

離レテ遠イ支那ノ。

（来在这遥远的中国异地。）

紅イタ日ニ照ラサレテ，

（夕阳正在红光中西沉，）

友ハノツエノ石ノド。

（战友在嶙岩下命毙。）

按照日人劳军的惯例，过境皇军部队不开走，慰问团也不能离去。今天十分不巧，开车时间到了，却不见动静。虽然远离家乡的士官们乐得在这里多玩一会儿，可是井关心情很是沉重，因为军贵神速，在这里一直耽误总不是好事。人马、枪炮、弹药等虽早已登上火车，兵车和装甲车也升腾待发，惟先驱车一直开不出去，就一切都僵化在这里了。为什么先驱车开不出去？因为找不到中国乘务员。灯光下，他在车站站台上绕台徬徨，一眼晃见了参联络部长田中的黑影，即厉声把他喊住，没好气地呵斥他说：“你还不快到运转室去问问是怎么回事？不然先驱车也叫铁道兵（铁道兵全是日人）开上走。——”

田中说了个“是”并拍的一声立正敬了举手礼，旋踵而去。

田中领了一伙随员气冲冲走到运转室一把揪住能代，叫他立地想办法开先驱车并把井关的意见转达了。顿时吓得能代浑身哆嗦，面无人色。恰好这时高鹤鸣气喘吁吁地哭丧着脸从外面走了进来，站在被揪扯住的能代面前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报告说：“还是找不到人。”

“你去找铁道兵！”能代把井关的旨意传达给高鹤鸣。

高鹤鸣不敢违拗，心想也只有这个办法。忙转身而去。可是他离开运转室向铁道兵营房走去的时候，一股愁思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想：叫铁道兵开先驱车这是违反社章的，不出事故便罢，一出事故，到那时空口无凭，一切责任就推在我头上了。他正愁得无法的时候，一眼瞥见三个黢熟的黑影在黄昏的灯光下逡巡。他虽然叫不来他们的名字，可是准知道他们是三个乘务员，遂忙“喂！”了他们一声。那三个人还真听话，一齐站在那里听候吩咐。

他说：“你们不都是乘务员吗？军运任务这样紧急，你们怎么在这里闲逛？”

“今天没有我们的班。”三人齐声回答，竟扬长而去。

“回来！”高鹤鸣急了，立即把他们喊回。他们一凑近，他忙说：“不管是谁的班，你们随我到运转室去。”

这三人倒也随和，即随高鹤鸣向运转室走去。

运转室已被井关部队的人包围了起来，高鹤鸣远远看见了。为了解围，离老远就嚷给包围的大兵：“先驱车乘务员来了！先驱车乘务员来了！”

包围运转室的大兵都在昏暗中朦胧看见副段长身后跟的三个黑影，便给他们闪出一条路来让他们通过。

田中一看果真是中国乘务员来了，遂慌忙转身去向井关报告，并命令包围运转室的大兵都去上车。

三个黑影跟随高鹤鸣走进了运转室，高鹤鸣向坐在办公桌后头的能代报告了抓到这三个乘务员的经过后，这三个黑影已经一字儿站在能代的办公桌前报到了。只听：

“司机：魏傲。”

“司炉：邵跃扬。”

“机手：刘润梓。”

报名后，他们又按规定背诵了《社训》和《乘务员守则》。

之后，能代即给他们布置了任务，并交待了路线情况和行车注意事项。三位乘务员各自把主任的命令及叮咛记载在各自的“手帐”上，又照本宣科地复诵了一遍。能代认定领会无误，便下令开路。

当这三位乘务员走出运转室后，魏傲便到检点室领机车，跃扬和润梓到材料库领油料和工具。

不久，他们都来到ミ力口1536机车旁，擦车、膏油，润梓则钻到机车下面佯装拾掇什么去把炉灰箱门打开。然后他们鱼贯登上机车各就各位。加了煤，上了水，迨挂上先驱车驶离彰德时已是二十二点过五分，晚点三小时零五分。

他们开着先驱车驶离彰德后，又继续按预谋办法做炸桥准备。润梓拿起一把小榔头，跨到一个翻炉篦柄旁弯腰把柄卡咣咣地从下往上敲了几下，使它恰到好处，既能卡住篦柄又不至自己脱开。接着又去把另一边的柄卡照样作了一番。他刚刚做作完毕，对面就射来两道刺眼的亮光。他们明白这是段里的“カド”ウ（巡道车）巡道归来。于是双方都用灯语答话，把头灯弄得明明灭灭，并互相减速准备煞车。顷刻双方的车距已经很近，各自放汽停轮或煞车。魏傲疾速走下机车去和巡道车组碰头，并了解了前面线路情况无甚障碍。巡道车组将巡道车撬到一旁，让出路来，魏傲便重新登上机车鸣笛前进。

日寇的力ドゥ本是铁陆两用。套上汽轮可在公路上跑，抹掉汽轮就在铁路上行。一辆カドゥ可坐五人，上面装有探照灯和机关炮。

魏傲他们的先驱车已越过丰乐，离津河桥不远了。他们三人都做了思想准备，一派红光从后边射来，使沉沉黑夜突然如同白昼。铁路两旁的树行和无垠的麦田都被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根据以往经验，知道了这是兵车前驱的装甲车。

日寇的装甲车一般由十节车厢组成。每节车厢两侧及前后方都有枪炮口。机车夹在十节车厢中间，又推又拉。头尾车厢的头尾，都装有可以左右旋转的两千瓦的大探照灯。

“日本人从来不信任中国人，”坐在司炉位置上的跃扬嘟囔说，“前面先派巡道车，后头紧跟装甲车”。

“这也有好处。”坐在司机位置上手摩手把的魏傲说。

“对了。”拄着铁铲背朝炉门站着的润梓说：“正好掩护我们。”

车轮滚滚，先驱车已经跃上了漳河桥。大桥被轧得发出了一连串的吱吱隆隆的吼声，早已分站在两个翻炉篋柄边的跃扬和润梓，只听魏傲大喝一声“踢！”邵和刘即各自飞起右脚把各自把守的早已将要脱柄的柄卡往上一踢，脱离了卡子的两只篋柄便一齐匍匐了下去。驾驶室下发出几声哗喳，哗喳，半膛炉火已经漏入漳河。搁在枕木和铁轨上的小火团，火焰熊熊。先驱车因为机车在后，漏火后又将篋柄拉起，炉篋合上，早已过了桥。可是红松枕木见火即灼，由枕木燃烧而又引起铁轨融化或变形，桥已被破坏。当时两岸桥头日军都筑有几丈高的护桥碉，并派有皇军守卫。桥上的火光理应看见，怎奈御尾而至的装甲车上的大探照灯光线太强，把他们的眼睛刺激得无法正视，竟没有分清桥上的火光与探照灯光的区别，所以漠然置之。装甲车也是因为探照灯把乘务员弄花了眼睛，所以当他把车毅然滚上铁桥时，驶到断桥处，满载武装士兵的头两节车厢竟接连跳桥而下，栽入河中，其余车厢也都受到激烈震荡。有的被拖入河中，有的被震出铁轨。紧跟在装甲车后头疾驰而至的几列兵车，又被互相撞击，弹药爆炸，火光烛天，车覆人亡，人哭马叫，一片凄惨。有的火葬，有的水葬。其损失伤亡情况，已无法统计。等到魏傲他们三天后从石门回来时，漳河桥尚未修复。他们只得由磁县绕上游坐船过河。但一到彰德就被捕了。关在宪兵队拷问三个多月，他们坚不承认，并辩驳说：“我们过的时候桥是好好的，要是我们炸的，我们也炸不去。我们还能自己炸自己？”宪兵队无法，又把他们放出。

牛爱菊也受到多次审查，因为开铁运输部来处理此案时，石

田从能代处追问到牛老师，硬说她在隔壁听了他们安排军运的谈话。可是她坚不承认。能代和石田又找人共同到能代家原地试听了一番，没有查出什么。因为这时地板间的天花板已经抹上了泥埤。所以查究了一阵也就丢开。但那年暑假，日本国民小学把牛爱菊解聘了，我只好把她送往根据地去学习。

第六篇 红波冲破沉沉夜

一

我于一九四一年春，由延安派来河南做敌占区城市工作，指定归“集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情报处领导。任务是：“搞战略情报和军事情报”。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当时是日寇侵华最猖獗时期，也是我抗日根据地最困难时期。在这个时期，日寇已经开始在华北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把全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沦陷区）、“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和“准治安区”（游击区）。在“治安区”与“非治安区”之间，设置了种种障碍，如：深沟高垒、密筑碉堡、密布特务、屯以重兵，加上它在“治安区”扩编伪军，强化保甲，组训民众，实行军管，真是层层设卡，步步为营，这就使得我们和敌占区我党地下人员往来、物资运输和情报交通，要过重重极其险恶的难关。我们的通讯方法在开始一段是很落后的，通常是靠徒步行走，把通讯稿写到衬衣上，或写在纸上缝入鞋底内，或用蝇头小楷（钢笔也行）写到油光纸上，塞进烟卷里，进行传递。后来由于敌人查得很严，我们又改进了一步，但

也不外是俄国先烈们早期革命时使用过的方法，用鸡狼毫小楷笔蘸上牛乳或象牛乳一样浓度的米汤，写到纸上（我们一般是用旧唱本或古书，写在它的字行中间），到地点后再显影出来。这样做倒是没有出过事，就是速度慢，有急事就会耽误。

我初入敌区时是在安阳市（日伪叫“彰德县”）城内，总部在桐峪镇（山西左权县境内），相距四百余里，步行至少得五天。后来，总部由桐峪移到麻田（仍在左权县境内，桐峪东南数十里）。我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又转到开封，相距约七百余里。当然开封至安阳一段通火车，但至少也得六天时间（单程）。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回太行汇报工作，滕代远同志（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兼情报处长）接见了，并指示正式建立开封情报站，由我任站长，还说给我配备一部电台，连报务员都确定了。我立即问报务员和电台是否和我一起走，他说：“随后即安排。”

话说到这里，我就回开封了。

二

已是菊黄柏苍时节。一日午休正酣，朦胧听见门铃响动，接着而来的是一阵噔噔的皮靴踏地声敲击着我的耳鼓。我疾速下床凭窗远眺，看见一个伪军官手提一捆大葱，正在院里趑趄打问，有词为证：

正在朦胧午睡，忽听门号丁当。

慌忙揭幔望凭窗，一位伪军来访。

军便服装草绿，勋章绶带金黄。

鸭舌便帽当遮阳，一捆葱提手上。

脚着马靴黑亮，眼蒙“二乘”墨光。

东张西望又嚷嚷：“主任哪房歌响？”

女仆心中忐忑，“太君”仪表轩昂。

正拟问客来何方？屋内传呼“德旺”。

“德旺”，是刘澜梓同志的化名。他原是“彰德机务段”的一名投炭伙（即现在的见习司炉），我在安阳时吸收他入党，经常利用他的职务之便，给我们侦察铁路沿线敌人的军、政情况，并给我担任秘密交通。这时他已打入敌人的一四八一（特工）部队，可以穿军装、挂少佐（等于现在的少校）衔，也可以着便衣或军便服。这次，他穿的是军便服。

我把他迎入屋内，他把那捆葱如释重负地往门里轻轻一放，无限感慨地说：

“好险！”

我瞪着惊异的两眼，看他胸前所挂的勋章，栉比鳞次地排满了。其中最奇怪的是，有“河南省县知事联席会议纪念章”、“华北增产模范奖章”、“击灭英美英雄奖章”、“支援圣战能手奖章”等等。

“你这英雄、模范人物，行走还有什么不便？”我笑谑地问他。

“你猜这是什么？”他回过头去指了一下他进来时放下的那捆葱。

“什么？——那里面包有东西？”

“对。电台，我用葱把它裹住了。”

“啊！”突如其来送电台来，我兴奋极了。

接着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提到里屋。我爱人李瑞兰同志也早已从床上下来，欢喜若狂地看着我们把这捆大葱解开，里面露出一块白布包成的、一个有一只小桶大小的包袱。一半四棱八

角，一半鼓鼓囊囊。我们意兴盎然地又把它白布包皮剥掉，一个象点心盒大小的小木匣和一束电线、还有三块方电池（每块约六寸见方、一寸五厚），便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又把木匣打开，则见两架黑色报机并排放置在里面。电键翘起，灯管发亮，铜线萦回，金黄耀眼。我们欣赏良久，其乐融融。但不懂机器者不能开机器，报务员没来，只得把它原封原包，深藏密窖。

之后，我才和润梓到客房坐定，茗烟助兴，谈起他沿途运送的过来了。

“我是在沛然（白沛然，地下党员。住安阳市大西门外集市街三十四号）接上的。”润梓说，“总部派人送到官司（安阳城西三十五华里的一个小村，是当时地下交通联络点）；化元（周化元，地下关系，官司村人）大伯又把它装在粮食口袋内，用独轮小车送到白家的。白不便在家久存，抓住我这次赴彰的机会，便要我带来。

“我想了一下，这事非同小可。上火车查得紧，必须把它伪装好。我仔细打量这个包袱，忽然想到大葱比它高。现在正是刨老葱的时候，我便跑到街上购得一捆大葱，掂到沛然家，把这包袱一围一缠，掂了掂分量也合适，便急速装扮了一下。”说到这里，他指了一下他胸前所挂的那一排耀眼的紫绶金章，然后又继续说：“想办法上了火车。”

“怎么？”我打断他的话问，“你什么时候参加过县知事联席会议？还挂着县知事联席会议纪念章。”

“哦！”他笑了，“这全是证章店里重金买来的。”说着又指了一下他胸前的金、银奖牌。

“还真唬人。”我也笑了，“就凭这些牌牌路上就不查了吗？”

“查也查来，我还能叫他查着？在彰德上车时，我事先把它托给机务段煤台工王坤同志。当我在站台上快要上车时，王坤掂着一捆葱急匆匆从机务段那边顺铁轨走来。气喘吁吁地边走边喊：“润梓弟！快过中秋节了，你把这捆大葱提上。”我便接过来提着上火车。但日本宪兵刺了我两眼，这使我警惕了起来。一上火车，我便把它放在别人的座位下面了。如果查不着，下车时我就拿上；查着了，我只好自认晦气。车到新乡时，从站台上跑进来一个日本宪兵。他用宪兵所特有的锐利眼光和警惕神气，东瞅瞅，西摸摸，一下子看到我塞在别人座下的这捆葱，便问：“这是什么？”我说：“葱。”他没追究是谁的。一看我这样的货主，认为无大问题，也就过去了。”

“到开封车站呢？”我打断他的话问。

“我没走开封车站。”

“你从空中飞来的？”

“不。我坐大车（畜力车）来的。”

我正要问他乘火车怎么又改为乘大车时，可是他又立刻接下去说：

“我从大马庄下的火车（那时火车是从新乡往东南行，径走开封。大马庄是开封以北第一站）。提着那捆葱到一家饭馆吃饭，刚坐下，便瞅见一位胳膊上戴有五方面军（庞炳勋部）袖章的兵也走了进来。饭馆里已经坐满了人，他左顾右盼找地方。我便心生一计，向堂倌要了一个凳子，叫那位‘丘八’坐我身边，向他递烟倒茶，酒肉招待。他一听说我是一四八一部队的，便受宠若惊地对我既敬仰又感激。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开封来，到这里办点事，现在要回开封’。我俩越说越对劲儿。提到如何回开封时，他说他到这里采购了两头生猪，有大车（畜力

车)可以坐上。不知他是采购的还是勒索的,我没顾上细问。吃饭以后,他就去迫使一位农民,把大车赶来。车上捆绑着两头大肥猪,又给我把葱捆提上去。让我和车夫跨辕而坐,他和两口大肥猪挤坐在车厢里。就这样,我们一官一兵,坐着载猪的大车来到了开封。只是进城门时,按规定下了车,向日本宪兵敬礼并出示证件后,便未经检查就进来了。”

我听他说罢,十分高兴,除口头表扬外,又奖给他二千元“准备券”;并呼妻唤仆,陪他打了四圈牌(麻将)。晚上,还盛筵款待,以示庆祝。

三

一个月后的一日午后,我穿戴整齐,正要出门,便见有一位风尘仆仆的青年,垂手站在门口,声称要找郭主任。那时我的公开职业是伪开封市契税经理局事务股主任。这位来客,中等身材,红长脸,头戴一顶咖啡色的旧礼帽,身着一套半新不旧的黑布中山装,外罩一件黑色旧呢大衣。我一眼便认出这不是别人,正是我久已盼望的报务员来了,不禁惊喜地喊了一声“小金”,就把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他原是我一九四〇年秋天从延安出来时的旅伴。不过,一留根据地,一赴敌占区。三年的睽违,而今又重逢了。我把他迎到客房,盥洗休息,茗烟叙阔。

“路上顺利吧?”

“这不是,”小金喜孜孜地从怀中掏出他的“良民证”,给我看着说,“有这哩。”

“叫张立富吗?”我瞅着他的“良民证”上的名字问。

他点了点头。

“这又是咱们自己制的吧？”我拿过他的“良民证”来，端详了一会儿，说：“和敌占区的没什么两样。”

“我的职业怎么办？”

“当我的听差怎样？”

“这不有个女佣人，用两个人行吗？”

“她，我可以另行安排。”

我们一边抽烟，一边闲谈。我不觉自警自戒地说：

“这城市是资产阶级汇萃之所，也是生活糜烂发霉之地，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稍一不慎，便会堕落。所以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艰苦奋斗的传统，要学荷花出污泥而不染。……”

不料立富一听，以为是刺他的，便立即郑重其事地说：

“这些道理我明白。咱们是长征过来的。爬雪山，过草地，嚼皮带，吃树皮，还被国民党军从陕南一直追到新疆。且战且走，几天几夜不合眼。跑得连干粮都没有了，返回来再从死人身上搜寻一些剩馍、干饼，啃上几口，继续西行。茫茫荒原，浩浩戈壁，千里无人烟，几天不见水。我们赤脚光膀，和叫化子一样。到新疆后，由于盛世才当时还亲苏，对我们二、三两团逃到那里的人作了掩护。那里有苏联领事馆，还有从苏联回来的我党的首长，对我们这些炮火余生，倍加关怀。为了使我们学有专长，便在那里办了无线电通讯学习班。我就是在那里学的技术。”

我一看他说话带气儿，产生了误会，便好言抚慰，夸奖了他一番。有西江月一词为证：

年纪虽然不大，见闻甚是博深。

雪山草地尽都经，吃苦耐劳算甚？

西鄙学成技艺，前方锻炼功能。

今来地下搞斗争，一切自当堪信。

四

三天以后，我把女佣人打发走了。那天正是上级规定的联络日子。当时鉴于法国巴黎地下电台被敌人侦察破坏的经验教训，上级指示电台不能经常使用。除紧急情况外，规定一般为逢一、逢五零时起用。这天夜晚，正是十一月十四（天明十五）日。本来大家应该先睡一会儿再起来操作，可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每个人都兴奋，因此，想入睡也不可能。立富虽然在刚来的那天晚上，乘夜阑人静之时，已经把电台机器及其附属物都仔细检查过一遍，可是今天刚吃过晚饭，他便又慌忙钻进暗室里，拧亮电灯检查去了。

我和瑞兰也坐不住、躺不下，也就一起去围拢着他。这时我才突然想起机要员的事，便问立富说：

“上面没说配机要员吗？”

“没。”立富答，“上面说敌区组织要精干，要我一身兼二任。”

“密电码呢？”我想总该有个密电码本子吧！

“在我脑子里。”立富答得很干脆。

“你能记住吗？”我有点难以置信的样子。

“这好记。”立富想，“一共就是两个音：‘·’（迪）和‘一’（达）。”

“不是四个阿拉伯字码才组成一个汉字吗？”

“是的。这也是用音符。如：·一为1，··一为2，····
··，····一、······一、一·····组为3509。不过在

电键上只是两个音，也可以说是一个音分长短二声。”

“成套的词汇你都能记住吗？”

“这没有什么成套不成套。这是活字印刷术。谄练的机要员和报务员，在音符与汉字之间，印象都很直接。

在我和立富谈话之间，瑞兰插不上嘴，只是一旁静听微笑。

后来，我一看怀表已二十三点，便督促立富具体准备。

“我早观察好了。”立富自信地说，“把机器安在小北屋，好接天线。”

我们三人各自拿了一部分东西，由暗室出来。穿过月黑星明、万籁俱寂的深幽院落，被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我们来到了小北屋门口，立富叫瑞兰把她所掂的那束天线扔在门外，她照办了，但她立刻又抢先一步钻入屋内，拧亮电灯。立富和我冲着灯光进入屋内，把机器和电池都放在窗下桌上并接好，立富还擦了几下电键，然后我们就一同出来安天线。据滕代远同志告诉我，“这是总部运往敌区的第一部电台，”技术确实还比较落后，机器笨重，天线也过长，足有三十米。

立富把天线的一头系在腰间，一蹦跃上了门楼至东屋之间的墙头，爬上二门（实际是这院子的大门）顶，把系在腰里的电线头拴到门顶横脊的兽头上，便回身离开那里，沿南屋（门楼是南屋的东头）房坡西行。到西头后，他象过两山对峙的山峡一样，又一蹦跳到西房坡上，沿西房坡北来，直至屋脊北头。他向我们做了手势，我们把天线的另一头给他扔上。他把这一头拴到西屋房脊北头的兽头上，并把它扯直。一条细黑绳便斜挂在我们情报站机关的上空。

买这所房子时，我就仔细观察过周围的环境。它的大门不临街，虽说是马府坑街的房子，可是它通向马府坑街去，还要经过

一条足有七十米的长胡同。胡同的两侧还住有三户人家，胡同的临街口是一座柴扉。十九号的门牌就钉在这座柴扉的门头上。从大街上看，确实不怎么样，但里面还是不错的，青堂瓦舍七葭三，天井还是砖铺地。西屋后头为北陶胡同，危机时，可逾垣而走。

天线的西半段，垂下来两根相距五寸宽的平行线，中间被一些等距离的小木片横隔开来，宛如一架窄的软梯挂在天线上。

不久，立富从房上下来，把梯型垂线的下端两头，从窗户引入屋内，接到机器的屁股后。他便面对机器坐到桌旁，把耳机戴到头顶上捂住两耳，听了一会儿，便手按电键，随着他的右食指尖的疾徐起落，便发出一连串的嘀嘀嗒嗒的音响。

夜已阑，瑞兰自去休息。剩我一人陪着他，看有什么问题。过了一会儿，立富面部的表情，逐渐发生了不平静现象，眉头越皱越紧，霍地把手丢开电键，忧郁地说：

“奇怪！总部离这儿不过四百公里，对方的讯号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发不过去。”

我对这事一窍不通。在根据地时，我觉得机要工作很神秘，总是躲远一点。没想到这个工作，今天找到我头上来了。我看发报机和收报机上都是两支灯管，便说：“我看发报机是否讯号太弱？咱们想办法在发报机上增加一支灯管怎样？”

“上哪儿找去？”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再试试看。”便又嘀嘀嗒嗒试验了一阵，依然是只能收不能发。无奈何，他只得暂时罢手。

我们立即去拆天线，藏机器。

第二天，我到街上买了一只灯管回来，立富把它增加到发报机上。等到二十一日凌晨，我们终于发出了第一次电讯，并迎来

了总部的贺电。

“牛、金，祝你们建台成功，工作胜利。滕十一月二十三日。”

牛是我。我当时在根据地的代名是牛天锡。

从此以后，我们开封情报站和总部的联系，除书报和物资等物仍用陆路及火车交通外，诸如通讯联络和敌情报告以及重要文件的传递，一律都用电波往来。尤其在一九四四年春日寇渡河西侵及其后来投降时的情况，我们都用电台汇报并及时得到了上级的指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第七篇 妓女检治所对 革命的贡献

妓女检治所的性质与开封当时的妓女情况

现在，人们只要一提起妓女二字，就认为那是最下流、最无耻、最肮脏、最悲惨的代名词。因此大家对于妓女检治所冠上了妓女两个字，也就对它十分鄙视，因而使当时亲身参加过这项工作的人，虽然在其中对革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为了怕别人揶揄自己有沾花惹柳之嫌，又想到古人“瓜田不纳履，梨下不整冠”之诫，也就对妓女检治所“讳莫如深”了。谈起它来总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致使后世之人，只知道开封有秦楼楚馆，红颜薄命，而不知我们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含辛茹苦，无所不到，见缝插针，竟从垃圾堆中拣到了几颗珍珠。

首先，读者要知道，妓女检治所与妓女院是两回事情。妓女院是妓女营业的地方；而妓女检治所呢？它是给妓女检验身体并治疗疾病的地方。它是卫生机关，隶属于日伪开封市公署的厚生科。妓女检治所专职人员有两名。原是一对夫妇。男的姓刘，是大夫；女的姓韩，是护士。他们都系开封本城人士。还有一位兼职所长，是朝鲜人，当时也算日本人。他的日本名字叫福田茂

光，华名张旭昌。个儿不高，三十多岁，在行宫角南面路西开有福田医院。主要为日、华要人看病。但每逢妓女检治时，他就到妓检所来了。在四十年代的日伪时期，全开封市的妓女，在册官娼五百来名。其中：一等书寓十五家，二等妓院十三家，都集中在第四巷。两项合计为三百二十名。三等下处也十几家，约有妓女一百八十来名。都开设在黄大王庙门街。至于散居在僻居陋巷的暗娼，俗称“半掩门”或曰雏妓、野妓等，串旅社，逛公园，“吊膀子”，倚门卖笑者，那就无法统计了。就拿这五百名官妓来说，每人每礼拜检查一次，也够妓检所忙的了。除星期日外，每礼拜六天时间，他们还是光下午检查。下午从两点到六点，分批检查，四小时内要检治八十多人。当然只能草率从事，无暇仔细检查。我曾多次遇上他们检治。每检治一个人平均只有三分钟时间。因此每逢检治时，一批八十多个妓女排拐弯大队依次站在院内。这所院宇坐落在黄大王庙门街路南五十号，迤西斜对过儿便是马道街南口，是一个有三十米长，十米宽的长方形院子。上房为南房，南房为三间，两明一暗；东屋一溜平房，临街北屋是一幢三间二层楼房，也是两明一暗；无西屋。检治室设在东屋北头两小间一通的平房内。当头一个妓女受检时，第二个妓女便解腰、提裤站在门外等候。等一个妓女检治完毕，第二个妓女就得应召慌忙而入，抹下裤腰往检治椅上一坐，两腿分开把两脚分放在检治椅的把手上露出阴部，站在跟前的大夫把手拈鹤嘴探阴器往阴户内一插，把其尾部张开一看，只要没有红肿溃烂和显明的鱼口、下疳、淋病、梅毒等就由助理大夫或护士在该妓女的营业许可证上盖章：“合格”或“有病”。合格者照常营业；有病者不能接客。不过据后来了解，百分之九十九的妓女都有花柳病，如果认真起来，妓院就得关门，日伪也就收不上税了。那还成什

么“世界”？所以受检治者行点贿，检治者拍拍手也就合格了。无怪乎那种社会里害花柳病的人也就忒多忒多了。那时就有种流言：“叫你学好不学好，杨梅大疮长上了！”光看看卖药的广告，专治淋病、下疳、鱼口、梅毒等的六〇六、九一四、拦淋丸、红黄色素等就够了。当世界上出现了矛时，同时就出现了盾。没有花柳病的发生，也就没有治花柳病的药的发明。

我们是如何打入妓女检治所的？

一九四二年的暮春，我从安阳到开封来看望我的同宗郭斌蘊（日伪河南省财政厅长），在他家小住，了解到敌军扫荡太行的动向，正欲第二天返回安阳向总部（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汇报，但当天夜间，忽然狂风大作，揭瓦击窗，势如万马奔腾，声似山崩海啸。一觉醒来，虽然晓色已苍，可是狂风犹劲。环顾屋内，窗暗几尘，启视户外，黄沙弥漫，铺地盖天。顿时使我想起来都南迁后，宋朝诗人范石湖重来汴京时所看到的凄其景色。

“梳行讹杂马行残，
药市萧骚土市寒。
惆怅软红佳丽地，
黄沙如雨扑征鞍。”

他所描写的金兵占领后的汴京惨景和当时日寇统治开封的残酷状况犹逊一筹。姑置不论。总之，那天因“风悲日曛”我起床晚了，没得走成。恰逢二姨太太偶染寒疾，卧病在床。当我到上房看她时，蓦地从外面进来一位缟衣素帽的大夫，后面紧跟着公馆听差刘增，一手提着一个鼓囊囊的黑皮包。

大夫进屋之后，经二姨太太介绍，我知道了他是名医福田先

生。他临床给二姨太太诊断，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使我一时难以断定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他给二姨太太看完病后，恰值刘增不在身边。大夫问：“谁去取药？”为了了解并拉拢他，我主动应声随他而去，并给他提上药械包。

请大夫是开的厅长的小卧车。在车中，我和福田攀谈之下，得知他是朝鲜人，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我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那么我们就算是同学了。彼此越拉越近。车行如飞，不久就驶到了福田医院门前。

在福田医院取完药后，福田又请我到里院去坐。我只怕二姨太太等着吃药，便婉言谢绝。可是他又约我下午五点来他家吃便饭，我虽然口头谢绝，而心中却很喜悦，想拉上这么一个在沦陷区吃得开的人，好利用他为地下工作服务，在他再三邀请之下，也就答应了下午来。乘原车返回公馆。

下午五时，狂风虽歇，而沙土仍然空濛，我如约前去。至时，福田已脱下工作衣，西装、丝袜，在家等我。他的房子是由中国旧式房屋改造成的日式住宅。屋门外围了一个榻榻和那时交通警的岗楼类似，作为他遮风避雨的哨所。经过哨所，再进屋门，就踏上了他的地板间。这地板间是一个三间一通的大房。室内陈列了一些中国式的方桌、条几、太师椅，墙上挂满了对他歌功颂德的匾额。这是一幢北屋。靠右边是用纸榻扇门隔成的卧室。纸门外雨是三级踏脱。登上踏脱后，在纸门外边脱掉鞋帽。鞋子摆在踏脱上，帽子则挂在墙壁钩上。然后在早已错开纸门而躬候在门口的福田扬手让进之下，我走进了他的榻榻米间。看来这是两大间一通改造成的。正中央摆了一张四方小炕桌。黑地红花油漆得明光耀眼。小桌周围摆了几个天蓝色的本色起花丝绒圆坐垫。一溜南窗下盆景扶疏，靠北墙壁则放了一张条桌。桌面上摆了一

些古玩，玉器、珊瑚树。四周墙壁上还张贴了一些“治安强化运动”的标语。

福田随手把纸门关上，笑容可掬地来陪我坐在炕桌边。

我从大门口进来时，看见有两位衣若悬鹑的穷人搀扶着一个频频呻吟，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走进了候诊室。我和福田抢先说了这个病人的情况，想叫他去急诊，可是他漠不关心地说：“死了死了吧！不能把我累死。”这对他外屋悬挂的“有求必应”，“救死扶伤”等匾额成了大大的讽刺。

我和福田坐在炕桌边稍事寒暄，忽然纸门一开，走进来一位和服、高髻的中年妇女，背着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孩。后边还跟着一位剪发头，着海军服，系黑短裙的上小学的少女。她们都给我行了弯腰礼。经福田介绍，我知道了背小孩的妇女，是福田夫人，那着海军服的少女，是他的侄女。接着又进来一位着偏衫，蓄仁丹胡的小老头儿，地地道道的朝鲜装束，福田介绍说：“这是家兄。”

大家围桌而坐，旋即开饭。后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洞口，平常屏有挡板。开饭时即敞开，小门洞那边就是膳房。凭着福田侄女的两条小腿，来回奔忙，一道道的饭菜，就通过小门洞摆到了炕桌上。

饭是火锅煎牛肉。朝鲜人用的火锅和中国式的火锅是不同的。中国式的火锅如铜罍，朝鲜人的火锅是平底带围沿，仿佛中国人旋粉皮用的铜锣。直径不到一尺。锅里盛了一些酱油，被火煎熬得白沫乱滚，吱啦乱叫。炕桌面上栉比鳞次地摆下了盛着层层叠叠的血红牛肉薄片以及各种佐料的小花磁碗等。每个就餐者面前的桌面边缘，都放了一双日本式的连头筷子和一个盛了一底生鸡蛋汁的蓝地黑花小磁碗。主人举筷说“请”，并用筷子挟起牛

肉片放在锅里煎时，其余大家也就援例而行。一见血红的牛肉片煎成了赭红色，便把它挟出放在自己面前的鸡蛋汁碗里，再随心所欲地加上些别的佐料和肉片一样，送入口内咀嚼，确实香甜可口，别有风味。美中不足的是最后上来的大米饭内掺了一些红小豆。福田看出我的脸色有些诧异，即腼腆地解释说：“配给米不够，搭配了一些红小豆”。据了解，日本人当时对其居留民每人每月配给十二公斤大米，不足时自己设法。

顷刻饭毕，各个散去。我也告辞，福田强留。说家兄忌酒，所以饭上没有备酒，要请我到花酒馆去畅饮。我婉言谢绝。他才说和我有话要说。我问：“有何吩咐？”

他噤嘴了一阵，然后才拐弯抹角地说：他的应酬大，收入少，入不敷出，托我和郭厅长说说，叫他把豫东盐专卖揽过来。我一听，急中生智，心想：“你求我，我也求你。我一个孤军深入敌区的八路军情报员，除了一个高高在上的郭斌蕴外，可以说是举目无亲，两眼漆黑。如果能拉拢上象他这样一位走公馆，串衙门，汽车接，汽车送，医道精湛，皇军信任的岐黄泰斗，不仅对情报来源有利，而且还有可能给我安插一些人在开封工作。这是我一九四〇年离开延安时，中央敌工委就对我提出来的要求。后来，前方总部也屡加催促。所以当他说出央我到厅长面前说情，有求于我时，我一边答应着他，替他说情，同时即向他提出反要求，我想要在开封安置人的问题。

我说：“我有几个朋友在彰德赋闲，生活无着。你能否在开封给他们找个事情干干？”

他问我：“人可靠吗？”

我说：“‘不知其人视其友’。你看我怎么样？”

他说：“你这当然没有说的。”一顿，他又说，“用人的地

方很多。医院也缺人，妓女检治所也缺人。”

我一听妓女检治所这个名词很污浊，便问他：“妓女检治所是干什么的？”

“是给妓女体检并治病的。”

“我的朋友不是大夫”。

“不是大夫可当事务员。在所内搞搞卫生，到妓院收收费总可以吧！只要不贪污。”

“我的朋友。我敢担保他‘廉洁奉公’，一清二白。”

“那就好。现在妓检所里本来有两个专职人员，是刘大夫家两口子。丈夫是大夫，妻子是护士。可是这个刘大夫是个大烟鬼，身体羸弱，贻误公事。我打算把他撵走，让你的朋友来补上。不用他看病，做些事务性的事情还可以吧？”

当时我为了安置人便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才明白他撵走人家的丈夫是为了霸占人家的妻子。

我们在妓检所做了一些什么？

从一九四二年五月起，“集总”情报处派出一位原民运干事张兰亭同志来到安阳城关，经过一番培训和乔装打扮，并取得合法身份后，由我亲自把他送至开封介绍给福田。骗福田说：“这是原在武安‘治安区’教小学的一位朋友，因那里与‘非治安区’接近，时虞‘不测风云与旦夕祸福’，所以他辞掉了那边职务，情愿来开封给福田先生‘效犬马之劳’”。福田先生非常高兴，把兰亭同志安排在妓检所当了事务员，驱逐走刘大夫。从此，偌大的一个妓检所，就被我们占据了。张兰亭住在上房，代理福田兼所长掌管所内事务，韩护士仍住临街楼的上层西里间，只管护理工作，兼充

福田的外室。

张兰亭进入妓女检治所后，除管理所内事务外，每日都要到妓女院收费（补贴即捐款和医疗费。关于妓女院的营业税，那是由伪市公署的有关部门按月向老板征收，妓女检治所不管）。从黄昏到次日中午一般都是妓女和嫖客缠绵时间。只有下午，还得她不检治。如果遇上妓女受检治、出条子、赴堂会、住医院，即使按时去也见不上。总之，妓检所是做妓女工作的，免不得就要天天下午去。由于这个原因，妓检所的事务员不仅对大多数妓女熟悉了，甚至对常来的嫖客也熟悉了。读者不要以为逛窑子就没有好人。实则，好人还是有的。在这里，我不妨把窑子的逛法稍加叙述。

妓女本身有清倌和混倌之分。嫖客的玩法也是各色各样的。混倌是什么都干，清倌只是卖盘子。但清倌只是妓女中的少数，而多数都是混倌。嫖客的玩法虽然很多，我们无需一一介绍，只谈最普通而且是牵连面较广泛的一种，即“打茶围”。从妓女方面说，叫“卖盘子”。这种玩法，人数不拘。两三人也行，四、五、六或再稍多几位也行。人一多就什么人都有，阔老、恶少、窑痞、流氓、花花公子，固然居多数，而少年老成、正人君子、白面书生等也是有的。有些人当然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无恶不作，有乐必享；但也有是偶然猎奇，闲荡散心，或被朋友强拉硬扯而来。

前已言之，嫖客中什么人都有。我们的张兰亭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冬季时间，就在妓女院遇上了两位好人。这两位好人，一名申鸿庆，一名吴理权。他俩都是开封高师毕业，在黄大王庙门街伪中国旅行社开封分社当火车售票员。虽在妓女院也看出此二人温文尔雅，举止不凡；接谈之下，更觉他们谈吐不俗。接着就邀他

们到妓检所来玩。从交朋友入手，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到有请必到，无话不谈。由痛恨日寇到反对日寇，逐渐进入到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评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孰优孰劣；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所有这些交谈，都不能不引起他们对自己前途、出路的考虑；是这样顺水推舟，得过且过，到头来不知“伊于胡底”？还是急起救国，团结同学朋友共同抗日呢？经过教育培养，循循善诱，终使他们提高觉悟，矢志不给日寇当奴隶，专为人民谋利益。兰亭同志看见发展他俩时间已到，适值我于一九四三年二月转来开封，建立情报站，经兰亭给我把这两个人情况汇报后，我和兰亭商议，便把此二人发展为候补党员。因申鸿庆毕业于开师高师部尚不及一年，校内同学熟人不少，其弟鸿林仍在开师初师部读书，故吩咐他以旅行社售票员为职业掩护去开辟以开师为核心的开封中等学校学生工作（日伪时，开封没大学）。后来他在党领导下，努力工作的结果，建立了一个开封中学生党支部。吴理权仍在旅行社专职卖票，搗了日伪的鬼，便利了革命工作。举例言之，一九四四年底，“集总”情报处一科（派遣科）林一科长到开封来检查工作，检查完毕后，林一同志要从开封赴北平公干，我托刘润梓（地下交通）同志去找吴理权买一张二等寝台（软卧）火车票，我们分文未拿，即获得一张开封至杨村的二等寝台票。只是吴理权出了一元多伪币，林一同志便乘上软卧舒舒服服到了北平。这里需要略加解释。否则读者疑窦丛生，会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当时从开封到北平的铁路线，不经郑州，而是从开封扑新乡北去。从开封开出后的第一站是大马庄，区间五十华里，三等车硬座票价不过几角伪币，软卧价加两三倍，也就是一、二元伪币。吴理权往外售这张票时，正票到站虽是杨村，而存根上到站则填大马庄，这段票价他非出不可，否则无法结帐。再就是正

票到站北平而填杨村的问题，这是因为杨村已接近天津，林一在北平出站时，可以不交票，说“我是到杨村去的，中途下车办点事”。她在北平出站后把票撕毁。此票回不到开封，路局无法和存根核对，也就万无一失了。这种福利，我们有很多同志都享受过，恕不一一枚举。二等寝台不仅豪华阔绰（一等车我们也用这个办法坐过），最主要的好处是，乘坐一、二等车没人查询，既安全，又静谧。但中国人乘坐一、二等车的人是不多的，一般是厅道以上的大员才有资格。

随我于四三年二月由安阳到开封建立情报站，便把原在安阳沦陷区搞铁路工人工作的刘润梓（他本人就是铁路工人，具体职务是伪彰德机务段机手即见习司炉），调来开封，担任我开封情报站由开封至安阳一段的地下交通。利用他乘火车方便，来往护送物资、书报、秘密文件等。如电台、七大党章等都是他从安阳运到开封的。并护送人员往来。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浑身是胆，一步一计，文静寡言，心里做事。装龙象龙，装虎象虎。为了便利工作，做到更好的掩护，他于一九四三年三月，通过其在浚县当警备大队长的本家爷爷刘存温的设法，改名刘殿卿，加入了日伪的一四八一部队（正式番号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华北通讯联络处）为联络员。有了这个身份后，他便穿上高质料的日本军官服，挂上少佐（少校）衔，腰悬银光闪亮的指挥刀，脚蹬黑漆明光的马靴，还带上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的马刺。俨然象一位日本太君，龙骧虎步，挺胸晃膀，好不威风。因此使很多人对他都另眼看待，十分钦敬。但情报站的建立，光有交通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个联络站。如果没有联络站，则交通通讯、人员联络和信件往来，都要直接往情报站冲。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有警探、特工盯梢，或者内部出了叛徒，风吹草动，就会

破坏情报站机关。情报站机关的安全无保证，便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所以，交通问题解决后，紧急的问题，便是建立联络站。联络站是情报站的门市部。一切信件和来人都先到联络站。利用妓检所接触面广并有福田及市公署的招牌掩护，便指定了妓检所为联络站。这样一来，润梓同志就和妓检所发生了密切关系。没多长时间，他在妓检所结识了一位常到妓检所来玩的孙良诚（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随从副官栗福德。也是从交朋友入手，逐渐谈到个人的前途和出路，终至把他发展为后补党员，弄清了孙良诚的兵力和装备及其部署和调动情况。直到一九四四年十月孙良诚部调往扬州后，我们和栗福德同志仍然保持着联系。

一九四三年后半年，“集总”情报处派我军某团一位组织股长曾洁光同志来汴工作，化名曹省三。我把原在妓检所工作的张兰亭同志调往归德豫东道开展豫东工作，把曹省三安排到妓检所接替了张兰亭的联络站工作。他在这里所管辖的妓女院内，结识了一位在孙良诚部任副官的张世瑞。经过考察和教育，他把张世瑞发展为候补党员。不久，张世瑞又发展了一位脱党分子裴晋三。裴和张原是西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同学。裴当时是从保定伪军中逃来在长垣县国民党冀南游击支队何冠三部任大队长。接着为了便利工作，裴把张调在何冠三部任上尉副官，搞后勤工作。张利用其职务之便，不断赶上汽马车，往返长垣开封并相机给根据地输送武器，弹药、西药及通讯器材等。关于裴晋三对革命的贡献，容专题叙述。

再说妓女院本身既然什么人都去，亲芳泽以调阴阳者固不必论，但谈国事以炫耀自己者也不乏人。梁山泊的好汉懂得利用李师师左右朝廷，我们共产党人独不知道利用妓女打探敌伪动态吗？我们从妓女院里也得到很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了避免文字冗繁，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第八篇 “达成大陆交通之使命”

“完遂大陆交通之使命”这个口号，原是日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社训的主要一条。这既然是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制订的，那么，它之所谓大陆，主要还是指华北而言。可是这时就不同了。这时已经到了一九四四年，美国在海上举行越岛进攻，日本在海上节节失败。日本在海上的交通不畅，补给难继，不得不扭回头来在中国大陆想办法，把平汉、粤汉线打通，妄想确保陆地南北运输，补救海上运输之困难。因此从一九四四年的早春二月起，潘杨湖水刚刚解冻，一日早上我到龙亭游春，尚未走到午朝门，朝北望去，就看见十分醒目的潘家湖面上，几十只三角机动橡皮艇，只只满载着日本皇军，在船头架着重机枪，一片隆隆声带着他们由南向北，由北向南一齐喊着“冲啊冲啊”向湖岸上濠沟里的假想敌进攻，而假想敌也是跃跃欲动，一齐朝着来敌“杀啊杀啊！”后来问了问别人，始知道这是日军练习敌前强渡，做过河的准备。

我已走到两湖之间，通过成行岸柳的空隙，又见到西湖鹅鸭缤纷，成群游泳，两相对照，真是：一边鹅鸭放彩，一边虎豹扬镰。

几天后，根据耳闻目睹，开封日军顿形增加，尤其是根据刘振举（即刘润梓，又名刘殿卿）以其一四八一部队特工身份，去查抄了伪开封市警察局的几段日记，给我汇报后，我觉着这是驻汴日军增加的可靠证据。他在抄件前面自叙一段，说：“原驻体育场尚志中学之皇军兵站大事扩充，一方面增加了很多服务人员，由一个小队增加为一个中队，而且物资也增加了很多。大部分是从北平和邯郸运来的弹药和罐头箱；马匹、车轮以及机动橡皮艇等也增加了很多。兵站站长是左藤三郎。”

以下为他摘抄的伪警察局日记：

二月六日下午七时余，南关区分局电话：皇军开来队伍甚多，陆续开入城内。二月七日下午九时余接南关区电话：新到皇军开入嵩阳中学住宿并在勤农街各商号分驻；同时又接西区分局电话：新到皇军驻入第五小学内，其官长则驻豫北旅社；万善街黎明中学附近各商号和民房也都有皇军驻扎。二月七日下午十一时，引地部队来电话要苦力二百四十名。八日上午十二时引地部队电话嘱雇苦力一千名，务于九日早七时送到纪念塔；当日下午六时又要雇木匠六十名。九日下午三时那须部队经理（军需）部小川先生来局要大车十五辆于明日下午六时送至明诚中学交该部队查收；同日森村部队要公事桌五张，椅子十六把，靠背椅四个，茶几三个，务于当日下午六时派督察员王长发送至安徽会馆。十日下午九时宪兵队电话传知十一日上午九时着伊野指导官同邓科长到宪兵队由柴田先生面嘱。十一日下午四时森村司令官莅汴。十一日下午七时半接井关部队宣抚指挥班金宣抚官建祯电话：嘱代觅楼房或平房一所约一、二十间在热闹地带，务须清洁、整齐、华丽，必须速办。因该宣抚指挥班日内即由新乡到汴，不

得贻误。二月十五日下午九时半接省公署金科长电话传知各单位于明日上午九时齐集省署礼堂听井关司令官讲话。……

刘振举的这份摘抄伪警察局的一些片段日记虽然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但还不够明确具体。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些，我想日军过河作战，虽然东起柘城西至济源黄河沿岸都有部署，但尉氏这个桥头堡它是非利用不可。因曹十一这股大土匪新投降过来，日本是非利用他不可。去年秋天我以替财政厅在新区开辟税源问题，曾持财政厅公文前往接洽，事虽未成，但我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对土匪的侦察与工作之间。虽说遇上南京派来的一名特务早已先入为强，可是我也多少有点收获，有幸遇上了我的大学同学王家骥的父亲，在曹十一部任参谋长职务。我一提家骥，他对我非常亲切，告诉我家骥在大后方作事，看见我就象看见家骥一样。我向他了解了曹十一部队的具体情况，他要我以后常来，再来时带些白糖来。我想我这次要想弄清日本过河准备情况，有必要再去找他一趟。但决不能空手去，他要白糖我得给他带上一些；他还抽大烟，带上一些烟土也是必要的。计划已定，事不宜迟，我先到兴亚土膏店弄来二斤烟土，又找福田茂光乞求了二斤白糖（当时烟土不缺，白糖甚缺，只有日本人家里能见到少量的。中国人对白糖是无份儿的。朝鲜当时属日本领土，福田又是“听诊器”，所以能有少量白糖）。还又买了两听炮台烟，一起包了一个小包袱。为了路上方便，仍到财政厅开了一纸到尉氏设局征税公文。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当天晚上，我才和情报站机关的人讲了。说：“我明日还要到尉氏去一趟。”他们听我口气坚决，也不敢劝阻，只是“做机关”的女同志瑞兰说：“日本要过河，河口还不封锁很严？”我说：“我正要去看看它严到什么程度。”

次日一早，我便着上棉袍，戴上礼帽，手掂一个包袱，怀揣一叠伪钞，几盒纸烟，走出街门。为了防止暴露机关重地，向南走了一段，才雇了一辆洋车，说是上车站，可是到了车站以后，我下了洋车付车资后却绕西边又往南走，越过西闸口，踏上赴朱仙镇的公路。正遇上一辆回头马车，便向它招手让它停下。它倒是停了下来。车伕是个年轻小伙儿，他跨坐在辕板上问我：“上哪儿？”

我答：“朱仙镇。”并问他：“多少钱？”

他答：“十五元。”

我犹豫不决，想起去秋去时，也是回脚，俩人才五元钱，仅隔半年，币值就跌落六倍。他看我不痛快，扬鞭而去。我后悔莫及，又喊又追，可是车已走远。幸亏从我身后又过来一辆马车，我主动向人招手自愿付十五元车资。这个赶车的是个老头儿，已哦住牲口，把车停下，请我上车。车上装满了酱油大木桶，我只得一蹦跨上辕板一角。车伕挥鞭而去，和我搭话，倒也不甚寂寞。沿途所见，农伕在地整地、施肥、准备春耕。提起农村生活，车夫十分伤感。深忧去年蝗旱肆虐，秋后颗粒不见，家家无米为炊，今年春荒可想而知。所以土匪四起，小偷大盗，遍地皆是。保长还在要伕要款，催粮征草，官逼民反，民不能不反。说到这里他睃了睃我搁在身边的包袱，忙问：“你包袱里包的啥？说不定前面就有截路的。”

我一听如梦初醒，不禁愁郁郁地说：“这可怎么办？这里边，”我拍了拍我的包袱说：“是我到尉氏去给人带的点礼物。”

“赶快装进草袋里，免得叫人抢走。”他说罢便哦住牲口，掂起我的包袱扒到酱油桶上解开那个装得不太饱的旧布袋口塞了进去，仍然把口撮住系好，又从表面上把它匀整了一下说：“这

就不要紧了。”

我又忙脱下布鞋，把怀中的一叠钞票一分为二，分别铺入鞋底，重新穿上。刚刚侍弄完毕，马车继续前进，就见路旁一丛柳扑梭后边窜出两个掂光臀匪枪的人。他们首先喝令马车停住，然后便站在我面前威吓我问：“你是哪里的？带私货没有？”

我坐在轱板上从容回答：“我是开封契税局的，到朱仙镇去查询契税问题。私货我没有。”并拿出身份证给他们看，他们把我叫下车来，浑身上下摸了个遍，也就是摸到几盒烟，便把几盒烟拿走了，我才又坐上车南行，并感谢了车伏的事先掩护。

马车又走了一程，就到了朱仙镇。马车是朱仙镇街里的，我们到了镇北口时，碰上了日军岗哨，我们都跳下马车，我掏出身份证用手擎着，车伏用透明化学夹子装着的良民证，照例就吊在胸前。我们两人跟着马车通过岗口时，按规矩给日哨敬了鞠躬礼，他们看我们证件齐全，又有本地人，也就没有检查让我们过去了。

我进镇以后，走不远便到了我们契税局南乡勘丈员王玉有的杂货铺。玉有的儿子王天才，一看郭主任来了，慌忙出来迎接，车伏已经哦住牲口，并把我的包袱从草袋中取出，天才便把包袱接过去，我付了车资，并向他道了谢，便跟随天才进了他的铺子。这铺子虽说是王玉有的，可是玉有不在这里，他是勘丈员，每日东奔西跑给人丈量地亩，成契过户，这里只是他儿子天才和天才妻共同经营。天才把我迎进去后，女主人也来热情招呼。我扭了扭四下无人，便和他们谈起路上遇贼之事。他们说这是近来常有的事。因为去年年景不好，捐税又重，最近又听说日军要过河作战，抓伏要丁，催粮要草，弄得家家不安，人人思乱，说到这里，天才又焦心地说：“常言道‘官不下乡，下乡遭殃’，不

知郭主任这次有啥要紧事，又来冒这份风险？”

我应付他说：“还不是为了财政厅想在尉氏设局征税。去年去没弄成，今年又叫我再去。”

他一听又说：“既然还是为公事，你不叫厅里另外派个人去。”

我说：“去年去，我还没遇到这样麻烦，谁知今年变成了这个样！”

“别说过河，就离水坡这几里路，路上也很麻烦。现在是兵匪不分。不过不要紧，主任一定要去，我找两个警备队把你送到水坡，到那里叫我父亲再想办法。”

我们说话之间，女主人已经把饭菜端来，不知她什么时候走开去准备的。

饭来之后，有酒有肉，我们边吃喝边谈话。提起日本驻军来，天才说：“这里原来只驻一个中队，现在驻了一个联队，联队长姓重光，通称它为重光部队。”

少顷饭毕，我起身要走，天才说：“不忙，我去找人。”说罢匆匆而去。一会儿，他带着两个带枪的警备队兵回来了。他给我们互相介绍过，又叮咛那二人说：“我把郭主任托给你们了。请保证他的安全。”

“请放心！”其中一人说。

“我们保证把郭主任安全送到。”另一个人说。

我向天才告辞而去。一路上，那两位警备兵，漫谈朱仙镇一带的治安情况。自疚他们身为警备队，也尽不了保卫地方的责。因为土匪都是有根柢的。不是和皇军勾结，便是和特务合伙。这是当地的一些情况。再加上曹十一部名义上受了日本的编制，实际还是以抢劫为生。尤其他们常常借故过河来到开封，“公干”，在路上就乘机做起案来了。可是他们说说着说着说露了。“他们和

我们两相照顾。我们不干涉人家的事，人家也就不惹我们。所以你和我们一起走，是保险的。”

我们说着走着，不觉已到了水坡。听了他们的“不打自招”，我才真正拿到了天才说的兵匪不分的真凭实据。

可巧玉有不在，据他的婆娘说：“今天横堤有人罄产（破产的意思，即欠债太多，把家产全部拍卖）把他请去了，恐怕回来就到了晚上，到屋坐吧！”他的婆娘是认得我的，看见契税局主任来了，还带有护兵，不敢怠慢，把我们让到屋内让烟让茶。可是那两位警备兵不愿久留，说是还有公干，告辞而去。女主人塞给他们一人一盒烟，他们口说不要，却带上走了。女主人又和我絮叨了一阵，便到厨房备饭去了。

王家住在水坡村西头南边，门前黄河滚滚东流，河边锚了一只不太小的破船。坐在屋里，通过敞着的屋门便可看见。我记得上次来时，玉有同我说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他未当勘丈员时就凭这只船到河中打鱼为生。如今暂时弃置不用。我一人闷坐屋里觉着无聊，便走出屋门到河边观光。直到女主人从厨房端着酒菜出来请我到屋吃饭，我才转回屋中。

饭后又和女主人闲话了一阵，直到月上柳梢头，玉有才带着满腔酒气急踉跄而归。一见我当然有一番激动。激动过后，我便问他干啥去来？他也是说到横堤给人罄产去来，并且烦躁地说：

“近来这号事很多。虽说这黄河沿岸去年没受多大旱灾，可是皇军正好利用这个条件强迫种大烟，植棉花，秋天照样颗粒不见。现在春荒已经开始，老百姓正愁无法过活，皇军又云集河岸，大量摊派，光这南乡一区就摊派下一百万斤稻草，三十万斤高粱，二十万斤大米，十万头猪，十万只羊，一万斤香油，一万个民伏，五千辆大车，就是倾干荡尽，把地皮挖上三尺，也难以应付皇军的勒

索。而且除保甲长，黑狗子挨门挨户催办，把人逼得悬梁、跳河，外逃或当土匪外，还常有皇军直接来催，这就不仅光是要粮要草，征伏抓丁了，而且还要花姑娘，……大家怕得要命，半夜保丁来敲门，白天皇军来勒索，大家不敢在家呆，都倾向‘入大伙，赶大会’（当土匪），主任读书明理，你看这还成什么世界？……”

王玉有酒醉话多，口若悬河地滔滔不绝，我也听得气冲斗牛。俩人竟夕未眠，女主人却早已爬上南柯。直到东方既白，我才向玉有说天明要到尉氏去还得赶路，他才把婆娘叫起来，吩咐她去准备早餐。

女主人遵嘱准备早餐去后，玉有又皱起眉头向我说：“怎么去法？现在不比去年，马庙桥头已经驻了皇军，此行东去沿途都有日军岗哨。”

“没关系，我仍带有财政厅公文。”

“那行，我送你到桥头。”

说话之间，女主人端来早餐，我们吃过早餐之后，玉有给我掂上包袱，我俩就迎着晨光沿河东去。沿途所见，沼泽芦苇地里，木板成垛、檩栋成垒，还有皇军守卫。玉有说：“这都是为皇军过河准备的。一方面要增加便桥，一方面也是为了铺垫河边沼泽或松软地带，好使坦克及重武器过河”。我们沿着无堤河岸，约摸走了五、六里路，遥望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色。玉有轻声告诉我说：“马庙到了。”他的话音未落，前方扬过来一声日语吆喝：“ナニビ”トカ。”（干什么的？）

我抬头一望，原来桥头站了两名日军岗哨。便掏出我的身份证高擎在空中以代回答，但仍和玉有继续前进。

“站住！”日军岗哨发出禁令的怒吼。

我们遵令站住。

“过来一个人。”

我即把玉有手里掂的我的包袱接过来，吩咐他就此回去。我独自一手掂着包袱，一手擎着身份证前往。

到日哨跟前后，我按规定给他们敬了弯腰礼，他们的其中一个夺过我的身份证一看，问我：“你的，契税局的事务主任到这里什么的干活？”

“我到尉氏去有公事。”我说着话已把财政厅的公事递给了他们。

他们接过去传阅了一下，只听他们一个个都说：“ソウテスネ。”“ソウテスセ。”（“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你的包袱里包的什么东西？”一个日哨问。

我说：“这里没有什么，就几件随身用品”。

“打开打开”。还是那个哨兵说。

我没法，只得把包袱放到地下打开。

他一翻检，发现了一个油纸包，抓起来捧到鼻端嗅了嗅，一股咸不咸，甜不甜的味道钻入了他的鼻腔；打开一看，原是又象黑酱，又象红糖似的年糕。他明白了这是一包大烟土。突然脸色一变，呵斥说：“バカ。你的这个的干活。”他伸出一个小指。

“不。”我摇了摇头，分辩说：“这是给别人带的药，治病的。”

“你狡辩什么？这是私货，我们要没收。”他说着已把那包大烟土重新包好，放在一旁。接着就把两听炮台烟拿上，说：

“心交心交（日语：シンテイ的变音。直译为进贡）也放在一旁。接着又拿起白糖包看了看，觉着这种东西他们不太缺，也就依旧放在包单上。又把我的身份证和伪公文还给我，才让我掂起几乎空了的包袱开路过桥了。

桥是木料搭的便桥，我过到桥南以后，就是曹十一部队守桥，我和他们说找王参谋长的，倒是没有刁难我。我从桥头向西去，走了二、三里路，便进了尉氏县城。联队部（牌子：授仁部队交易公会护路联队）仍然挂在东街路北的一所深宅大院，和哨兵说明来意后，一个哨兵跑进去报告，王参谋长的马弁便跑出来接我进去了。

他把我接到二进院子的西屋，这还是我去年来时住过的房子，两明一暗。他把我领在北里间，招呼我洗脸喝茶，说参谋长正和曹司令（联队司令）开会，让我先休息一会儿。

我先把那个几乎空了的包袱放在床头，然后盥洗了一下，坐在桌边喝茶休息。马弁还给我拿来烟卷让我，我不好意思动用。因我突然想起准备沿途应酬的烟卷被土匪抢走了。专诚往这里带的两听绿炮台和一包大烟土也叫皇军没收了。心中颇为歉疚不安，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可是马弁知道我和参谋长的关系，仍然招待我十分殷勤，并问我“一路顺风吧？”我越想越生气，不禁愤慨地给他说了路上被抢以及到马庙桥头被皇军把我给参谋长带的东西几乎掠夺了个精光。

马弁看见我很气忿，便把我温慰了一番。接着就问我：“你在开封没听说吗？皇军即将渡河，已在沿河彼岸部署。据说是西起济源的毛田，东至柘城一带，都屯了重兵，封了河口。马庙驻扎一个大队。”说罢用两只大眼睛盯着我。大概想说“这么乱你来干啥？”我不能说我一点也没听说，便说：

“我在开封也听说了些，以后这里和河东连成一片，所以财政厅又派我来接洽征税之事。这叫做‘卖啥的吆喝啥’。财政厅所悬念的是‘国库’收入。”

“现在恐怕顾不上这个，不过你来看看参谋长，他会很喜欢

的。”

我们谈得正热洽的时候，门帘一掀，走进来一位身体狼狽，银须飘飘，着长袍马褂的老人，伸出他的一只骨出老手冲我走来，我一看这个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伯王参谋长。我慌忙站起来喊了一声：“老伯！”就双手捧住了他的那只手。

“老伯好？”

“好好好。我见了你就和见了家驷一样。”

参谋长坐下后，马弁便走出去了。我走到床边打开包袱，拿出那一包白糖递给他。并抱歉地说：“太少了。”

他非常喜悦地接住，迭说：“不少不少。这东西是缺物。”

接着我就把我带的二斤大烟土和两听炮台烟都被马庙驻的守桥皇军没收了诉说给他。我还说：“他们还想没收这二斤白糖，拿起来又给放下了。”

气得参谋长脸沉腹胀出粗气，嘴唇嚅嗒了几下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喷了一声。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

我们正在里屋叙阔谈心之际，忽然隔壁传来餐具乒啷，又闻肉香袭人。马弁一撩门帘报告“开饭”。

于是我们来到外屋餐桌边，老伯上坐我打横。旨酒佳肴，民脂民膏，不必细表。席未及终，参谋长已经嘴打呵欠眼流泪，这和上次一样，我看出参谋长烟瘾发了。于是立即招筷辍食，以示酒足饭饱，并劝参谋长到后院休息。马弁把他搀扶而去，我也回到里屋休息。

我睡醒之后，也不知几点钟了。因为这次从开封来时，就知道沿途多难，不曾带表。又不见参谋长和马弁到来。一人闲坐无聊，遂出屋闲逛。走到前院忽然想起刘处长就在东屋，不免前去拜访一番，能多得一点消息就可多一份参考。

刘处长是在伪中央军委派在这里搞政训工作的。上次来和他交谈过，他说在南京和贵杰（伪财政厅长郭斌蕴的堂侄，也算我的同宗）熟悉，有这层关系就有必要拜访他一次。否则我走后他知道了会不满的。真会是“天子弗取，反受其咎”。

我迳至他屋访他，他正在和一部属谈话，一见我不速而来，遂把那人打发走，满脸堆笑来迎接我。

我和他分宾主坐定之后，先叙阔了一番，然后逐渐由叙阔转入了政治。谈到皇军渡河作战的消息以及尉氏所受到的影响时，刘处长说：

“自从去年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以来，东条首相和汪兆铭主席，一面提倡团结统一，贡献总力以期决战必胜；一面也派人在香港和重庆加紧联络，促其早日觉悟，加入和平阵营。不意极端狡猾的蒋该死（介石）竟玩了两面手法：一面嗾使其已被皇军逼迫得走投无路之残兵败将。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假惺惺地投入和平阵营，声称愿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而尽力，实则是投皇军灭共之机，来狐假虎威地灭共而扩充自己。实自欺而欺人，诚一举而两得。一面又亲自飞到开罗，去和英美巨头会晤。央英美早日移兵东来，反击日本。其用心之险恶，古今中外都少有。现在皇军已洞烛其奸，到了忍无可忍之地步，故采取断然措施，出兵河西，除已屯集重兵于河东、北岸并封锁各渡口，积极做渡河准备外，并已派来调查班和联络班两批人马驻扎县署。调查班是调查敌情；联络班是联系支前任务。”

“贵军如何配合？”

“我们也就是协助人家搞些调查工作和布置一些支前任务。”

“是否叫你们侦察重庆在豫西豫南的实力并支援一些粮草，

再抓上一些民伕，大车和骡马等。要不要你们去打头阵？”

“重庆在豫西豫南的驻军情况，皇军很清楚。豫西的刘茂恩部队是叫皇军从中条山赶回来的，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豫南的汤恩伯是重庆的嫡系部队，只会刮地皮，做买卖，也不会打仗。我们只能帮助人家调查蒋军内部矛盾，伺隙做策反工作。至于后勤支前任务，这里摊派的任务不小，可是‘芝麻不轧不出油’‘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紧紧裤腰带就都有了。”

刘处长讲到这里，参谋长的马弁就来把我叫走，说：“参谋长在客房等你。”

我不得不向刘处长告辞而去。

我跟随马弁回到客房见到参谋长，看他一脸怒气，让我坐下后，撇着山羊胡子问我说：“不要到处乱跑，你怎么和刘处长认识的？”

“上次来时在前院碰上的。他和我一个本家叔认得，所以到他房里坐过一会儿。”

“哼！”参谋长不赞成地嗤之以鼻。然后小声向我说：“他是南京派来卖膏药的。嘴甜心苦，你别上他的当。”

我表示不会上他的当后，参谋长就向我打听日军在开封及至尉氏沿途增加的情况，我罄其所知以对。

他听罢十分不悦地说：“‘豫有四荒、水旱蝗汤’，加上日本更遭殃。这尉氏小县，如何负担得起。‘兵马未行粮草先’，皇军尚未来到就派来调查班和联络班，叫准备二百万斤稻草，十万斤大米，三十万斤高粱，十万斤豆子，五万民伕，二万辆大车，……”因为他是当地绅士，他要把本县老百姓的负担垄断起来，不许他人染指。他们投降日本，本想得些好处，如今不但好处未得，反而大祸临头。他更为不满的是日本过河来时，叫尉氏组织三千名

年轻妇女慰劳队上阵前慰问皇军。他听说过日军有随营妓女，这三千女青年前途如何？当然使他忧心忡忡。

我们正谈得投契的时候，天色已暗，马弁掀帘招呼吃饭，我们便到外屋餐桌边来了。

在我们吃饭的当儿，我聒空还煽风点火，以扩大他们和日寇的矛盾。

饭后，我借口散步，乘着落日余辉，到街上闲荡，果然看见一些着便衣的日本人。从他们的眼睛、眉宇、嘴脸都可看出与华人不同。有的还蓄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更显得仪表奇特。尤其是他们的语言，有的叽哩呱啦，有的说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使我的思想突然又回到芦沟桥事变前夕的北平。那时我正在北平上学，北平的街上正如现在尉氏城里一样，到处都是日本人，而且盛气凌人。

在他们烧包着，喧闹着走过之后，老百姓则在后头指指划划，骂骂咧咧。有的责骂之声还不太小，我估计那些日本人会听见的，可是没见他们有所表示。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没听懂。

我转了一圈儿就回来了，马弁来安置我的休息。我问参谋长，他说正在后院过瘾，我不便去打搅他，便投身床上睡去了。

次日，早餐之后，春日融融，我向参谋长告辞，再未提设局征税之事，只索了一纸过河护照，便向桥头走去。中午到了水坡，沿途看见络绎不绝的皇军鞭打着民伕，车辆还在往河沿运输有关过河器材。中午在水坡用过午饭，当日下午即由玉有把我送至朱仙镇。次日一早，天才给我雇了马车，不到中午，我已进了开封城。我先到润梓家和他碰头，了解我走后开封城内的变化。据他说：我走后，他按照我那天给他布置的任务，即到一四八一部队驻汴联络处了解，已晓得新到开封准备过河的部队是：一个

森村师团，下辖引地、那须两个旅团，附：一个坦克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工兵联队和一个辎重联队共约四万来人，以开封至尉氏为中心点，担任中牟以东至柘城的渡河作战任务；另外还有一个旅团担任阳、原武、沁阳、孟县及济源一带的渡河攻击，详情不知。但开封一带为重点，目的是打通京汉路。现在还在潘家湖演习敌前强渡。

中午在润梓家进了午餐。下午我又到伪中华通讯社开封分社找张路平核对了敌情。当晚正赶上发报日期，即将所了解的敌情拟稿交报务员金克同志发往“集总”去了。

第九篇 开封情报站的尾声

许建邦的来去匆匆

日本刚一投降，为了保存自己而早已“逃之夭夭”的国民党军，对沦陷还真是“鞭长莫及”。只得由少数在日伪统治后期从后方派来策反的特务分子，串通伪军摇身一变，拿上蒋介石的任命状，打上国军旗号，暂时维持现状或混水摸鱼。开封情况，自不例外。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派第十战区，把一九四四年秋就派来开封一带活动而那时就任命为军委会华北少将策反专员的，这时又改任为十战区调统室驻开封特派员兼十战区先遣部队副指挥官的马步周，指挥驻开封一带的各部伪军，给他“把公产保护好，听候接收”（马步周在省府礼堂给伪厅长以上人员讲话语）。由伪和平救国军一变而为国军第一路军的庞炳勋部，为了报答和讨好马步周，还赠给马以该军总参议称号，从优待遇，互相利用。

而对我军则下令“原地待命，不许受降”。我军八年抗战，喋血疆场，毙伤，俘获并瓦解日伪军共一百七十一万余名，收复失地面积九十五万六千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一万万。其艰苦卓绝的壮烈史诗，真可惊天地而泣鬼神。岂能听此乱命？所以，

党中央以朱总司令的名义，连给蒋介石拍发两则通电：“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并严正声明：“我军有权派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本此主张，我中央军委指挥千军万马，向我解放区所包围的沦陷区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当时为河南省会的开封，就一度成为我军夺取的目标了。

日本刚一宣布投降，“集总”就来了人。此人身着便衣，乔装小商，操山东口音。年纪不大，个子不小。闯过了伪军的重重封锁，由开封北门进来，到了我家（马府坑街十九号后院）。我一眼认出了他是我们“集总”情报处情一科科员席一同志。我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便迎上去和他握手。他赶紧告诉我说：“为了避免暴露，我改名为许建邦了。”并掏出他的良民证给我看。

他进门伊始，未遑拂尘、盥洗，就向我匆忙地布置任务。说：中央命令冀鲁豫部队攻打开封，要我情报站在城里紧急部署，做里应外合的准备。我情报站接到这项任务欢天喜地，作速遵令而行。冀鲁豫的部队倒也真的一度逼近开封。可是这个好消息只是一传而过，就又“鱼沉雁杳”了。

许建邦同志在开封住了十多天，攻城的消息发生了蹊跷。他一等再等无音讯，忖度情况有变。这时我们的电台因缺电池不能继续使用。他只得亲身出城去探问。可是他一去也是不见回来。我心里着急，只得于九月二日，打着给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到原阳一带招兵的旗号，借张立富（报务员，真名金克）同志，着便衣，出了北门。

到冀鲁豫去寻找部队

九月二日，我们戴月披星吃完早餐，我把五十二师给我们的

一纸护照及一迭法币带到身上，辞别家属，偕张立富同志，冒着熹微的晨光，踏上了征尘。出北门冲破伪军的重重岗哨，向北迤迤走去。沿途所见，沙丘起伏连绵，沼泽时隐时现。虽然时序仲秋，应该禾黍离离，果实累累；但大兵之后，凶年频仍。草比禾高，饿殍载道。虽然秋高，气并不爽。中午在荆隆宫一个关系家打尖，问了问我军去向。得悉我军远在北边，又退入滑县境内。为了赶路，我俩于饭后继续北行。当红日衔山时，我们到达了封丘县城南关。这里是伪政权，我们投宿伪保长家，向他诈称我们是从开封出来侦探八路军的去向。他一看我俩也真是城市模样，自然不敢怠慢。虽未“杀鸡为黍而食之”，却也“急扫风轩炊麦饭”。

我们在这里度过一夜，次日早行，直奔滑县方向而去。当晚我们宿在牛市屯。这已是根据地边上了。

牛市屯是滑县南边一个不小的镇子。街长二里许。商贾辐辏，人烟稠密。我俩住在镇西头路南一家小店。在这里，我们得知我军正在攻打滑县城。次日一早，我俩便火速起身，扑沙店集向滑县城奔去。因为听说滑县正在打仗，我们当天没有赶到城关，在城南一个村庄找村长住下。到这里，我们才敢向村长说，到开封去有任务回来找部队的。打听了一下，知道滑县城已攻开。只剩城西北角一个小堡，伪军还在负隅顽抗。

次日早行，我们很快就到了滑县南门，向门岗说明来意后，经他们打量我们，并伸手摸了一下我们的腰间，没有武器，也就放我们进去了。

进了南城门，我们正往里去，忽然叭叭几响，子弹从我们头上啸叫飞过，我们心甚诧异，不知出了何事？可是环视街头，秩序如恒。行人安详憧憧，商家照常营业。打听了一下，始知这是城西北角的堡垒内伪军放出的。不过他们只是乱放枪壮胆，盲无

目标。

我们在城里打听军区所在，获悉冀鲁豫军区就在滑县境内，不过还在城东很远的地方。我俩便经过十字路口趑入东街，出东门而去。时而也还听见一两声枪响，但我们已不以为异了。

在东关，我们瞥见路旁停了一辆蓝韩骡拉轿车。一位身量不高、四方脸庞老叟，着一套整洁的八路军单衣，倚车辕而立。我甚感奇异。当时我们的首长都是骑马或跨骡，他怎么还特备了一辆轿车？我心倏地一亮，暗忖这大概是位参议员。便和立富同志交换了一下眼色，走上前去鞠躬仰问：

“这位老同志贵姓？”

“不敢，贱姓贾。”

“这是贾议长！”执鞭站在一旁的一位青年军人说。

“哦！贾议长。”我心中豁然明白了。这莫非就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贾心斋议长？攀谈之下，果然就是。经我们说明来历和来意后，贾议长说：

“请二位同志上车！”看了我和立富同志各一眼，正色说：“我正是要到军区去。”

在贾议长和车伕同志伸手相让之下，我和立富钻入车厢里面，贾议长和车伕各自跨了辕板一角。车伕把鞭一扬，一匹黑里泛红明光耀眼的大走骡，驮驮向东迎阳驰去。

车辚辚向前，贾议长和葛健谈。他偶尔提及大军区首长，我还只以为他谈的是冀鲁豫军区首长。后来才弄清楚了，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已经撤消，现改为晋冀鲁豫大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四个军区，首长是刘、邓、滕、薄……。大军区首长也在这里。

我聆听之下十分高兴，便向贾议长说：“我正是要找滕副司

令员的，到那儿就能见着吗？”

贾议长说：“他在那里。”

贾议长本人乡贯就是滑县，所以他在滑县很熟。中午我们在一个村子打尖就是在他的熟人家。打尖后，我们乘车继续东行。据说宿营地离滑县城要有七八十里路。在“残阳如血”的傍晚，我们来到了宿营地。村口就有岗哨，当然不会挡议长的大驾。村子很大，村名忘记了。不过，据议长告诉我们说，这村是他的丈人家。

滕副司令对我的指示

这是个方圆上一平方公里的大村。冀鲁豫军区情报处把我和立富安排在村东北角一所没有院墙而屋前却安了一盘石碾的三间破旧西屋内。

一进门，迎面是个未经油漆的大木床，南北两头都堆置着乱七杂八的农具。尘土味儿扑鼻而来，耗子吱吱乱叫。这显然不是谁家内眷住宅，或许是哪家地主的农具库，也有可能兼住觅汉（长工），临时腾出做了客房。床上平铺很厚的谷草和一领苇席，十分喧泛。苇席的里边漾到墙上一部分作了床褥。苇席上置有军用卧具。曹里怀（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兼情报处长）同志来看我们，当面交代随他而来的警卫员说：“把这两位同志好好优待一下。”寒暄几句即离去。凭他这句话，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每餐都是鸡、肉、白馍吃得嘴角流油，喉眼打嚏。

当天晚饭后，我只身摸到滕副司令驻的门口，门前有岗。我向岗哨道出来意后，哨兵说：“副司令不在。”我以为他不让我见，便说：“我等一等。”说罢，站在一旁。可是等了好大一会

儿，还是没有下文，我只得惆怅而去。没想到我回到我的寓所门口时，一抬头，看见门口站了一位戎服佩匣枪的青年，用敏锐的眼光打量我，问我“找谁？”我说“我就住这儿。”军士还想再问，不意屋内霍地跳出来一个人，我一看是张立富。他站在我跟前，用轻柔的低声向我说：“滕……”

他的滕字刚出口，我已恍然大悟。便箭步抢入房内，和一位矮胖首长撞了个满怀。因为他也正往外迎我。我顿时煞脚定神一看，虽在昏暗灯光中，我也看出了正是滕首长。

“滕首长好？”

“你好？”

我们互相问好后，他潇洒而亲热地执手把我拉到床边，叫我和他跨床沿并肩而坐。立富坐在副司令员的另一边。我俩都引颈向着副司令员，如饥似渴地想听听他的宏伟韬略。可是他阻着我，一开始就问了我个“怎么样？”

我懂得他这是要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便囁囁向他，把开封情况一一汇报。先谈了伪军易帜与特务扰攘的问题，继谈到日本投降给我开封情报站带来的影响。这里需稍费笔墨加一些解释。这时我们所赖以作掩护的伪机关、伪军队、伪企业、伪单位，一下子都由合法而变成了非法。我们远在敌区——白区，失掉了合法身份，变成了黑人黑户，无异成了“涸泽之鱼”。日本投降对国家、民族是一桩大喜事，等于拨开云雾见青天。可是对我们开封地下情报站来说，却给了我们一大难题。当我于一九四〇年离开延安到敌区来时，中央敌工委再三交代我，不叫和国民党情报和策反人员搅在一起，免得他们出了事牵连我们或和日伪勾结破坏我们。后来，由于蒋介石搞“曲线救国”的阴谋，日蒋合流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地下特工，真是畏如蛇蝎，远离为好。可是到这个时

候情况变了，对国民党成了近不能、远不得的状况。我军既未入城，这里就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我们倘若要继续在这里工作，也得摇身一变。可是我们不是孙悟空，除少数同志通过多变的伪军或稍有国民党人的关系外，其余大多数同志，都一时找不到国民党的关系，如何变法，不得不向首长请示。所以汇报完了之后，我先问滕首长：“我军为何不打开封？”又说：“我们一等两等没消息，只得出来打听。时间长了，我们在那儿会站不住脚。”

代远同志说：“原来是打算打开封来，并一度向那里逼近，但后来又有改变。中央决定：“对于那些可以一鼓攻克而不能牢固占领的大城市，暂缓夺取；以便我们集中力量先解决已在解放区包围中的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并进军东北。东北为苏联红军所攻克，但它只能占领主要城市、工矿、码头和铁路沿线。辽阔的农村和山林之间，它都无暇顾及。我们在东北原有抗日联军和游击队，再派遣一批干部和军队去，到东北的农村和山林活动，虽逼近城市，苏联红军也不干涉。不干涉就是庇护。有些地方，甚至如张家口这样的城市，红军也有意识的让给了我军。干部要成套成套的派去。

“我们趁此机会到那里创造解放区，岂非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一开口就谈了两小时，使我“茅塞顿开”。我问他：“我们开封情报站今后怎么办？”

他说：“开封情报站，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今后扩大为河南情报站，仍然由你负责。”

我说：“情况变了，我们在那里没有社会关系，无法谋得职业掩护。”

他说：“这你不要慌。国民党还未大批从后方过来。你是大

学毕业，在后方作过事，将来一定会有你的熟人过来。只要你在开封耐心等待。不过你现在倒是可以谈谈你们情报站的其他人的情况，谁能继续在那里谁不能。譬如立富，你们的电台暂不能使用，他就可以暂时不去。”

于是我把情报站的工作人员情况一个个和他商讨了一遍。决定了谁去谁留、谁转移的问题。我们一直谈到深夜，他才起身而去。

我和立富把他送出门外很远，他再三要我们留步，又和我们一一握了再一次告别的手，并用双手往回推我们，直到我们站住不动时，他那矮胖的身躯才向南走去。

我和立富并膀站在那里引颈目送，直到他们的影子消失在黑暗中。

回汴后的情况骤变

我回汴以后，睁眼一看，城外城内一片草绿，宛如一九四三年夏天河南过蝗虫一样。国民党军源源从河西开来，“劫收”（接收）大员满天飞，特工人员遍地跑。流亡的省政府也回来了。满城都是着草绿色军衣，戴大盘盘帽子的人。虽然他们都是日寇来时急屁连圆遁后方，并在那里作威作福、腐化堕落了几年，但此时却居然厚颜无耻地卷土重来，以胜利者自居。他们趾高气扬，如入战败国。想占哪所房子便指为逆产，没收入己；或者强挤进去，“喧宾夺主”。把房东及原房客撵出去或威逼至阴暗的角落。想侵吞哪些财物，也指为逆产，进行霸占或掳去。甚至强奸妇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胜于日寇。当时就荡出了一曲民谣：

想中央，
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甭说别的，就拿我住的马府坑街十九号后院来说，先是我这次回来的前夕，五十二师突然来人向李瑞兰（我当时的夫人）问罪。“郭成和（我当时在伪组织中的化名）到底上哪里去了？带上我师护照，领走数百元路费，一去二十天无信。他如果在外边闯下祸，办不成事，定要把你带去拷问。”来人怒冲冲地数落着，并从衣裾下拔出手枪亮了一亮。这一来，倒叫李瑞兰翻了脸。她小嘴一噘，眉头一皱，灵机一动，反向来人倒打一耙：“你来的正好。我的气正发愁没处出。兵荒马乱，四下里都是共军，你们为了扩充实力，把我男人派出招兵，万一他被八路军抓走，非叫你们赔我人不可。”

这个娘子军训得来人狗血喷头。他们想：“这是只母老虎，惹不得。”垂头而去。

我一进家门，就听李瑞兰向我诉说此事。话犹未了，又有一位着灰毛哗叽中山装，胸前佩有河南省政府圆牌证章的中年人来访。此人我认得，名叫魏善交，林县任村镇人，“七七”事变前后，担任过我们姚村区区长。我在区公所会过他，是个国民党员。这时我问了他的“贵干”，得知他在省政府办公厅当秘书。说是来看望我的，我以礼待之。坐了一会儿，寒暄过后，还简要互诉了这几年各自的经历（我当然只能谈我的公开职业）。最后他问我“这院有无闲房？”他想找几间房子安家。我即领他把西屋和南屋（我住北屋和东屋）看了一下，他带着一脸犹豫神色而去。大概是想搬来又嫌远。

接着是一对着草绿色中山装，也是胸前都挂有省府证章的人

前来叩门，声称他们是在附近机关工作，听说这里有空房特来看看。我站在门里通过敞开的门口打量，只见他们眼高气盛，态度傲慢，其中一位瘦小青年，肩上还挎了一只匣枪。我稍一犹豫，那青年已抢入门里把我排开；随他来的那位大胖官员就乘机昂然而入。我心中好不着恼，正欲劝阻，那青年早已看出我有点不服气，立即黑封脸色对我雷霆大作：“你不问问我们是哪一头儿的？”一顿，他又指着已经进了院宇的那官员的后身说：“省政府调统室姬组长”。并拔出手枪扳机对我。

这时我才看出两人的服装，质料不同。一位是布料，另一位是毛哔叽。虽然样式和颜色相同。我一想：这是东华门特务机关的人。俗语云：“光棍不吃眼前亏”。便强颜为笑地说：“实在对不起，你不早说你们是调查统计室的。不过省府魏秘书刚才来过，说要住这里的房。”

他们哪里肯听，径到西房来看。只见房屋高大，间隔宽敞，家具齐全，顶棚完好，两明一暗，方砖铺地，委实可人。加上他们的铺陈点缀，足可使成大雅之堂。他俩都显出了得意的神色。从上房（这院西房为上）出来，他们又到南夹道一看，厨房方便；返过来，他们又到北夹道一看，厕所也还整齐。然后他们又看了看南屋，觉着南屋可以住下人。而且六间大房分作二室，男女随员都可各得其所。

看完之后，他们便站在当院和我讲房租，我再次提出魏秘书要来住的问题。姬组长听了我的话，倒是看了看他的随从说：“要是魏秘书来住，我们犯不上和他争。”顺下眼皮就往门口走；可恨那随员尾随其后建议说：“咱们给魏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是否真要来住。”

我把他们送出二门后，关上门，急转身回来和瑞兰商议电台

转移事。因前些日子，我和立富同志往冀鲁豫根据地去时，为了安全，曾把电台连天线、耳机等一起包扎好，放在上房的苇席顶棚上。放的位置，选择在里外间的界墙头上，还有大梁驮着，掉不下来。谁料到这时候这房子要来别人住？而这个别人又非同小可，时间长了，万一被发现，定要穷追。到那时有口难辩，后果莫测。所以如何迅速把电台从顶棚上取下转移，就成了我俩的当务之急。不意措手不及，二门又被打响。而且响声迭起，震耳欲聋。我厌烦地走去把门开开，原来是刚才陪姬组长来看过房子的那青年又来了。张口就说：“姬组长搬来了。”他说着以目示我，往外扭头。我放开视线透过长巷向大门外望去，遥见大门外停下了一片满载行李的大车小辆，随来的丘八很多，还有穿红戴绿的妇女、小孩。

兵士们正在动手卸车，有的已经手提，肩扛，进了大门。想推宕也无法，只得听之任之。但我的心房内小鹿儿直撞。

他们住进来之后，居然喧宾夺主。趾高气扬，旁若无人。而最难对付的还是那个挎匣枪的勤务兵。做饭时缺了炊具来借，开饭时碗筷不够也来借，而且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每次见面都要挖苦几句：“汉奸”，“二鬼子”等等，连我的妇女、小孩也饶不过，见面也要骂一声“汉奸婆”，“汉奸崽”。这些个“隔鞋搔痒”的话，我当然并不在乎。但自己的事只有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几天之后，我从保长那里摸了姬组长的底。他姓姬，名文荪，是河南省调查统计室警卫组长。就在东华门特务机关办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一想：他住在这里和我同院，等于两个敌对情报站杂居。时间长了，即使电台不发现，也会出事。于是，我和瑞兰说明此情，并商议了一下，一致认定了此地不可久留。这样，我们连寄宿都成了问题，封给我的河南情报站长也就无所措手足了。商议的结果，我们就下了回根据地的决

心。接着我就和一些主要同志交换了意见，并部署了工作。然后即具体准备情报站机关撤离问题。

金蝉脱壳振翅而飞

在那种情况下，撤退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瑞兰商议的结果，只能光人走。所有家私、公物，一概不便携带；但需分别处理。有的弃如敝屣，有的忍痛割爱，有的转移，有的交祝融（火神）氏保管。决定之后，我俩便连夜清理，分门别类，分头去办，不必一一细表。次日黄昏，我们以烙油饼做幌子，把清理出来的一大堆密件及违禁报、刊，一把一把地塞入灶膛，炽燃了熊熊巨火与滚滚浓烟，经过两小时的爨弄，文件、报、刊化为灰烬，一叠油饼堆在筐里。既处理了家珍，又有了干粮。到了次日拂晓，当姬组长一家还在屋中高枕而眠的时候，我和瑞兰已经化装停当，把出生十个月名叫毛毛的小男孩穿好衣服，放在童车里，轻启二门、大门，把童车抬、推到街上。曳着童车，佯装绕早弯儿，溜溜达达到了水车胡同。因这里离北门近。

水车胡同五号是胡万杰同志的新家。房子只有西屋三间，两明一暗，还住了两户人家。共有十来口人，已经够挤的了。但一宵易过，我们一家便挤在老胡住的外间。他因房小人多，难于赡养老人，便向我提议，把他父亲带走。通过解放区使老人家返回河北省安次县原籍。我欣然同意，并把他父亲当成我父亲。这样，我们便成了四人一家，有老有少。次日早晨，我们把童车放在胡家，雇了一辆架子车，老胡一家把我们送至门外。我们把老父扶在架子车上，把毛毛递给他。小孩一见生人呱呱乱哭。老父抱着抚拍，摇晃，我和瑞兰护车哄劝，辞别了老胡一家，离开了

水车胡同，凑凑合合出了开封北门。

当天晚上，我们宿在封丘县属的荆隆宫那个关系家中。这个关系姓韩，是个小学教员。次日早上，由汴来的脚力返汴，由这里另雇了一辆独轮车（车身和车轮全系木制），把小孩拴缚其上，大人一律步行。韩老师亲身护送。豫北民谚：“空行的赶不上推车哩；推车哩赶不上挑担的”。我们一行离开荆隆宫向北走去，推车的果然吱吱扭扭行走很快，我和瑞兰紧紧跟随。可是苦坏了父亲。他开始勉为其难地跟了一阵，但“岁数不饶人”。他已年过花甲，逐渐地被拉在了后尘。幸有韩老师陪同。一路上，父亲看见瑞兰虽系女流之辈，却不让我这男子汉独美于前，和我始终齐头并进，因而欣赏之下，赞不绝口。说：她，和他平日所见的城市妇女，完全两样。后者都是“弱不胜衣”。走起路来，蹒跚蹒跚。父亲不知瑞兰的底细，我当然不能向他说明。但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一九四二年秋天，我把瑞兰由根据地带至沦陷区安阳车站。名义上她冒充是我表妹。左邻右舍的人们闻讯赶来，围观笑谑。大家也是不知底蕴（自然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只以为是车站税务分所添了一只花瓶（旧社会对女职员的蔑称）。那时我在心中即兴作诗，暗庆我们化装之成功。这时看来，此诗还很现实。诗曰：

谁知她是女共军，
来自太行红牙门。
军政大学学习好，
县妇会里工作能。
减租减息膺后盾，
反日反顽当先锋。
本是一员巾帼将，

宁能当作插花瓶！？

父亲春秋已高，对前队望尘莫及。没办法，我只得吩咐小车且慢。但车伙不听。声言“边界好出事，不如快走脱此险境”。我们说这话时，已经来到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问了问行人，说前面是枣林村，离根据地边界牛市屯也就十来里路。我即信车伙任意赶路。可是我们前队一进枣林村南寨门，便听见东边一条背街里，打骂、叱咤，震耳而来。忙寻声望去，只见东街上黑压压地过来一伙人，身着细布便衣，肩挎长枪、短枪，牵扯着一位五花大绑的农民模样的汉子。我们前队刚一越过这个街口，这伙作案的人就从我们身后向南去了。村民皆侧目而视，忿忿地说：“特务队尽是没事找事，又把一个村干带走了。”但也没说是哪里的村干。我们只怕后队出事，在街心停车等候。可是引颈而望，足有个把钟头，才见后队蹒跚而至。父亲垂头丧气，嘟嘴吊腮，韩老师伴行只管劝慰。我疾返几步，前去招护。碰头时才知道他们果然在后头出了事。据韩老师说，他们在南寨门外遇上特务队。对韩老师没啥，他们听出他是本地口音。对父亲可就不客气了。一听他是外地口音，他们就盘问，又搜查。结果，从父亲怀里搜出一块大烟土，怒冲冲地戳了他一捶，没收烟土而去。据韩老师说：“这次他们是抓住了人，忙得回去交差，否则，说不定在我们身上打啥主意。”他又埋怨父亲说：“你不该说给他们和前面的小车一事，幸亏我给解释了一下，他们又顾不上追查，才过去了。倘若追查，岂不都跑不掉？”他又说：“我向特务队解释说，我是陪老伯到前村求医看病的。他正在泻肚。大烟土是止泻用的，才没事了。”

我们在街心一起坐下休息喝水，日已薄山，我们又起身前去。摸黑到了冀鲁豫四分区，由司令员李静宜同志给我们安排住

下了。

迎着咚咚战鼓前进

我们住在四分区司令部客房，真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们对我们生活优待，热情温暖，言谈融洽。在这里，我听到了平汉战场的消息。时在十月下旬。据说：平汉战役刚刚开始。那时国民党军杂于日寇的残兵败将在全国各处向我军发起猛攻。平汉战役是我军胜利结束了上党战役，不顾战后疲劳，匆匆赶来。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为首的国民党军三个军加上安阳土顽王子全等部共约七万人。他们由安阳出发，浩浩荡荡越过漳河，向北推进。于二十三、四两日，连陷我磁县及该县所属之马头镇，并逼近邯郸近郊。他们阴谋一直打到北平。把安阳至北平的平汉路沿线各专员、县长经过一番争吵后都配备好了。可是，这只是他们在邯郸道上的黄粱梦。我刘邓大军于二十三日赶到，兵分两头。一头分兵把守漳河北岸，攻打磁县，断其后路；另一头则由邯郸东南出发兵分三路，向南迎头痛击，并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对敌作钳形包围。由于敌众我寡（我野战军加地方部队共约五万人），据说：刘邓下命令：“不惜牺牲，猛打猛冲。几个团，几个团的轮流上去攻击。如果一个团打的结果，还剩三分之一的人，首长在，就不许自动退下来。”因为这一仗非同小可。“攻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采取了毫无人性的烧杀政策。进至磁县的国民党军，以为‘华北的老百姓肚子里都装着八路军的心’。他们直言不讳地威吓当地居民：‘要华北的土地，不要华北的人民’。”（见齐武著《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我军是人民子弟兵，哪有子弟见父母身遭兵燹而不救呢？所以我军决心把顽

敌消灭，层层包围并准备长期鏖战。初步计划打两个月。但“师直为壮曲为老”。由于我军是被迫自卫，蒋军是无端侵略，再加上我军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战术，老谋深算和英勇果敢，不出十天，就出现了新八军高树勋军长率领全军起义，马法五部二万余人放下武器，伤亡其大军一万四、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包括美式武器）甚多，以及“剿匪手本”和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我军之作战命令等，胜利结束了战斗。胜利战果是我到大军区司令部见了司令部发表的《综合作战公报》才知道的。不过为了行文方便，在这里顺便谈及。

我们在四分区司令部住了一宿。荆隆宫的韩老师和送脚一并返回。由司令部给我们动员了两头老乡牲口向北运送。沿途都是解放区，我们一行晓行夜宿。没几日就来到了邯郸附近。远远看见，一些战士正在挥镐舞锹，破坏城墙。我们入城之后，在东街路北一所楼房门口找到兵站。门口有岗，我向岗哨说明来意后，岗哨之一即转身到里面传禀去啦。一会回来了，让我进去。我把家属暂留门外，只身入内，到西屋办公室接洽。原来那位兵站站长还是熟人。他原是冀鲁豫军区的一位干部，我和立富上次到军区去时见过他，听说过人们称他韩部长。因此我在这里也称他韩部长。韩部长有三十来岁，个儿不高，穿灰军衣，戴近视眼镜，举止彬彬，谈吐文雅，象个知识分子出身。他对我很热情。一听说我还有家眷在门口，立即站起身来，冲出和他打交道的人的重围，亲自陪我走出大门，把人和牲口都妥为安排。开饭时还给我们加了两个好菜。饭后，他来到我们房间看我们。嘘寒问暖，十分体贴。我向他说明我们的情况，胡伯伯是要回河北省安次县葛渔城镇，我和我的家属回大军区。他说：“既然如此，胡伯伯就不到大军区去了。可以从这里单独北上，一路都是根据地，路费

和路条都由我这里发给。剩下你们可以在这里玩玩再走。大军区司令部就驻在峰峰，离这里六十华里，我给你们派辆牛车，‘朝发夕至’。”

我感谢他的好意，同意他对胡伯伯的安排意见，但提出明日我们也走，因为急于向领导汇报。他又劝留一阵，但我去意甚坚，他只得首肯。由我陪同，他还到隔壁看了胡伯伯，向他说明了他对我们的安排打算。胡伯伯也同意。韩部长便告辞，具体安排去了。

一宿易过，次日早饭后，四分区送我们来的两头牲口，即行回去。韩部长过来先打发胡伯伯上路北去。把路费和路条都交他带好，我们共同把他送到大门口，祝他夜宿晓行，一路平安。然后韩部长把我们一家人安排在一辆牛车上。我们在车上向他举手告别。车仗跨鞍扬鞭，辚辚出了邯郸西门。

沿着一条坎坷不平，尘土纷扬的土路，迤迤西南行。沿途所见，丘陵起伏，道路蜿蜒。路旁森林与梯田间杂；途中肩伏和车载交错。所运货物，多系煤炭。“近墨者黑”，因此不仅把运输煤炭的人和车染得漆黑，甚至连路面上的尘土也变成了灰黑色。途中有很多段狭路，来往车辆不能交错而过，牛车本来就慢，又加上沿途错车候行，走到峰峰时，已是月上三竿了。可是一问司令部，人说“还在煤矿上”。我们此刻所到之地是峰峰镇，离矿还有几里路。我们只得继续赶路。不过掉转了一个方向，向西北而去。

向 首 长 汇 报

我们驱车前进，在月明星稀，银光弥漫的穹庐下，前面豁然出现了一片灯光。这是我们离开开封后迢迢数百里所罕见的奇景。（在邯郸也没有。许是战争破坏后未修复）。有光必有人。这是我们党的光辉，是司令部的灯光。它宛如钱塘江岸上的六和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一眨眼，灯光迎面而至。在矿区外沿遇上了岗哨，问我们口令。我吩咐车辆暂时停下，自己下车只身前往，向哨兵说明了情况。得到同意后，我便转身举手招车。车至，我跟车进入。经过两行矮房夹道的土路，来到了一座有口无门扇的去处。口上也有岗。他们把我们挡住盘问。经我说明之后，他们之中的一个遂进入壑口到一个小房内去了。估计是挂电话。旋即走出，让我们进去。

我们驱车进入院内，原来是一片洋房。在光辉灿烂的电灯照耀、明月掩映下，只见一幢幢的机制砖瓦所盖成的房屋，红光醒目，窗玻透亮。比上我们在延安时穴居野处的生活，相差了几个世纪。这是我们胜利的成果，使我心中雀跃不已。

我四下张望，不知滕副司令住在哪幢房内，正想找人问问，突然碰上了一位首长，个儿不高，身体浑实。他探头瞅我，我探头瞅他。凑到面前一看，原来是杨立三同志。他原是“集总”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以前，我到总部汇报时见过他。“一九四三年集总”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时所奉行的《滕杨方案》，滕是滕代远，杨就是他。我俩相互惊呼握手，经过几句寒暄问候，我说我要找滕副司令，他说“不忙。”瞅了一下我的牛车。“你们先住下再说。”

他立即找来一位管生活的同志，把我们一家人引进了一个新式房间。内有电灯照明，桌椅床铺俱全，衾茵也还洁净。这是多少年来，我在机关住宿，首次尝到的现代化滋味。使我不能不“刮目相看”。房子都是日本人在时盖下的。兵站来的牛车早已另行安排。我们在房内吃了饭，还分别到男女浴池洗了澡，这也是解放区的新鲜事。

第二天上午，我见到了申伯纯同志（情报处副处长），我把开封情况及回来的意图向他汇了报。中午饭后，滕代远同志来看我们。随便谈了一阵，便匆匆而去。不过他临去时通知我，晚上去给邓政委汇报。邓政委是我久仰而未能一睹尊颜的人。现在居然有这样的机会，当然使我心情很激动。

当天黄昏，一位同志来招呼我去汇报，我即随之而去。他把我让进一幢洋房内的一间小套间。我进去时，看见邓政委、张际春副政委、滕副司令员等三位首长环坐在沙发上等候。我一进去，滕副司令即从门边一只单人沙发上站起，把我介绍给邓政委和张际春同志，我慌忙和他们握了手，即去往横几前面的一把木靠背椅上坐，可是没容我走到跟前，滕副司令已经抢占上了。他指着他刚才腾出来的那只小沙发向我说：“你坐那儿，那里靠近邓政委。”这房间就这么小，就是摆了一套沙发、一条横几、一把靠背椅就占满了。我看了看再没别处可坐，“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腼腆地坐在那只小沙发上。

汇报内容，滕代远同志向我说：

“你的工作，上午已给申议长（即申伯纯同志。他是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兼大军区情报处副处长）汇报过了。这里只谈开封驻军及城市社会情况。”

于是，我就把开封驻军及城防情况，国军和伪军的矛盾，中

央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军统和C·C·的矛盾，“劫收”（接收）大员满天飞，特工、警探遍地跑，以及他们这些人的“三阳（洋）开泰和五子登科”^①的穷奢极欲和美货充斥、美人横行的恶劣现象等汇报了之后，还汇报了市民望眼欲穿地盼望我军攻城的心情。

在我汇报的当儿，刘伯承司令员进来一趟，忘记了他和邓政委说了个什么。邓政委向他说：“开封情况，你听不听？”他摇了摇头，表示没有时间，旋踵而去。

在我汇报的时候，不免偶尔分别偷觑一下三位首长的表情。只见张际春同志雍容自若，滕的面色潇洒、得意，邓政委是和蔼而刚毅。

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我告辞而去。

次日早晨，申议长来我们房间看我们。和我说：“前方就是打仗和处理俘虏。你既然回来了，这里没你的事，你回后方去吧！至于今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后再说。”

我看了一眼瑞兰，向申议长表示同意。早饭后，申议长给我们派了一头骡子，还有老乡赶脚。我们便向申议长告别，离开这里，把妇女、小孩安置在牲口上，西行入山而去。

^①三洋：洋钱、洋房、洋财。五子登科：房子、金子、女子、车子及查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

第十篇 弥天硝烟擎火炬

浊世哪来珠耀？

一九四六年的早春，当我以开封工委书记的身份奔忙于开封街头时，有一天早上，看到一伙不明事理的学生，在街上摇旗呐喊地举行反苏游行。他们的口号和旗帜，就是：“反对占领旅大！”“反对搬走机器！”等，这显然是国民党出于其政治需要组织的。

目击以上情形，我心中十分不安。回忆我在北平上学时的学生运动的进步性，抚今追昔，激发了我从事学运的责任心。但一时又不得其门而入。

一日上午，我从书店街向市中心走去，一位雅士的形象，突然跃入了我的眼帘。他西装革履，手杖皮包，两颧高耸的红瘦脸儿。使我又敬又惊，心想：浊世哪来珠耀？

这就是武剑西先生。他原是我在北平上学时的德文老师。我们不仅“七·七”事变前在北平有一段相处，而且抗战后又在西安相遇。今天又在这里邂逅相逢，真使我喜出望外。至于我的情况他大致也是了解的。

“我到处打听你。”这是他和这次见面时说的第一句话。这，表达了他对我渴望已久的焦灼心情。接着他就把我领到他家详谈。提到学生工作时，他说他在河大有课，可以为党出一把力。

烈火干柴

武老师奉我的指示，应河大学生自治会的邀请，一天下午到河大礼堂去做报告，题目是：“如何实施三民主义？”听众十分踊跃，后至者只得在门外旁听。

这个讲演题目，并不惊人。问题是武老师以其激越的情绪，委婉的措词，悲愤地揭露了实施三民主义之现状，隐喻地斥责了当局不能实施三民主义之背景，使莘莘学子，如春雷贯耳，心花怒放。所以会场掌声雷动，十分活跃。

举例来说，他讲民族主义时，用美国违背“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出兵干涉中国内政，来说明中华民族尚未独立。讲民权主义时，他把当局只实行训政，不实行宪政，因此，“还政于民”就成了一句空话。讲民生主义时，他说当局都是养尊处优的人，自己本身就都是大土地所有兼大工商业经营者，怎么能够凭他们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一句话，“他们太美了。”

这末一句话，十分含蓄，可以浅释，说他们过的生活太舒适；可以深解，说他们太美，就是：他们过于崇美、媚美、恐美，美、美、美，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美化了。武先生的意思是后者而非前者。只是由于当时所处环境，他不得不用此隐约的双关语。

那时学生思想已经有所准备。虽然重庆谈判，蒋介石所允诺的“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是假的，但接着而来的国共和谈，却造成了人民一时传递消息和书报的方便。当时在河大，如沈志远的《唯物辩证法》、薛慕桥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联共党史》、《社会发展史》、列宁著作以及苏联的一些革命小说、甚至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和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等书刊，都可看到。

党的书报和进步刊物成了学生的重要读本，只要能弄到手，就如饥似渴地读，甚至开夜车也要读。当时在河大，群众思想进步比较快的院系有：文史系、经济系、医学院和农林系等。那时学生们读了进步的和党的书刊后，往往兴奋得把心得体会，真知灼见转告知己，使真理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宿舍、教室、饭堂，以至波及社会。

学生们懂得了什么叫剥削，什么叫阶级斗争以及为什么民主主义革命要加上新字等。当时也能得到解放区的不少消息，所以促进了学生的思想觉悟，增强了进步学生和中间力量的团结。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科学和民主的获得，而是要推翻人吃人的剥削制度了。

和两个学生会晤

一九四六年的六月末，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布置就绪之后，便一把扯下它假和平的面具，发动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从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接连向晋南（太岳区）、苏北、鲁西南（冀鲁豫区）、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实行分区的全面攻击。同时又在白区制造校场口和下关打伤

民主人士的流血事件，在昆明枪杀李公仆和闻一多，造成了白区的阴森恐怖。但白区的革命青年并没有因此被吓倒，反而认清了蒋介石的狰狞面目，美国的狼子野心，决心起来战斗了。

就在这个时候，武先生把两名经济系的同学，先后约到他家（文庙街西头路北），要我谈话。一叫任勳丰，一名卢治国。

我向他们分别了解了他们各自的家庭身世，学习情况，学校的阶级阵势以及他们各自对政治的见解和要求等等。他们也各自汇报了他们的个人身世和简历，并陈述了他们学生界对国民党反动派投靠美国，在中国发动全面内战的愤慨。说大多数同学不赞成打内战，要求保障人权，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等。为了实现上述主张，就迫切要求共产党来领导学运。

当时的学校情况是：进步势力有新民主主义小组以及其他受了党的影响的进步师生约占一半。

在反动势力方面，有C.C.派、政学系、三青团、部分复员青年军、军统特务，加上受他们影响的落后群众及其他挂着学生牌子的职业特务，也占一半。

我先后听了他们的陈述以后，心情十分激动，虽然没有暴露我的姓名，但都分别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保证给他们支持，并进行领导。

我除了分别给他们俩讲述了我们自卫反击战的形势外，还指示他们去串联进步同学，大家联合起来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为了掌握合法工具，要掌握学生自治会，开辟民主栏等。

他俩回去分头鼓动，秋季始业后，学生会掌握在进步分子手里，文史系二年级张四德同学（不久后入党）担任了理事会主席，并建立了民主栏。

民主栏就是七号楼前面设立了两个木制布告栏。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周围的墙壁上也贴得五彩缤纷。

给新任校长的下马威

一九四六年秋，校长田培林（C.C.系朱家骅派的学阀）到南京任教育部次长去了。递补他校长遗缺的是姚从吾。后者原系北大历史系主任。打着学者的招牌，实际是朱家骅的走卒，在北大时就已臭名昭著了。姚到校的当天，民主栏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欢迎”他，标题是：

“君从北大来，应知北大事。”

具体内容是揭发他在北大拉拢“特殊”同学去参加反动活动，遭到民主力量击败等丑事。并警告他，如在河大不知悔改，将来的失败比在北大还要惨。

该姚心有余悸，于是他以新校长的身份请学生会理事们茶叙，想装潢一下他讲民主、尊重学生团体的门面。那时刚好有医学院一位姓黄的同学在家被逮捕。于是以张四德为首的理事们便在会上向姚提出要学校保证学术言论自由，改善教授待遇和学生生活福利等意见。姚对这些只是委婉地作了一番不着边际的搪塞。迨自治会的同学们一提到叫他营救那位被捕同学时，他立即沉下了脸，迭说：“不，不，不，学校不能管这事。这是政治问题。”

于是群情愤慨，会场哗然。理事们据理力争，说：“校内同学失踪，学校理应过问。”“秘密逮捕是非法的。被捕同学没有刑事犯罪。”把姚从吾说得无言可对，十分窘迫。而反动的教务长郝象吾竟怒气冲冲地呵斥理事们，姚受了支撑，这时才又振奋

起来说：“现在国共斗争复杂，这事学校不便出头。”正在这个时候，竟有来自法律系的一位颇有年岁的理事，用法律的观点给校长开脱：“学校不是法人，也不好出面。”姚从吾听了这话如获至宝，立即接过话茬说：“这位同学意见正确，说得对。”并以笑脸询问此人姓名，表示拉拢。

这个茶会不欢而散。经过激烈辩论，学生自治会理事主席张四德同学代表学生自治会向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忿忿地说：“要将此事真相向学生公布。”遂行退出。

理事们下来开会研究对策，出版股长周可任（地下党员）同志连夜整理出一份“公报”，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把校当局的反动立场和那位“律师理事”的阿谀逢迎的丑态都公布在民主栏上。

次日，同学们见了“公报”舆论大哗，群情愤怒。民主栏及其周围立即贴满了支持学生自治会要求校当局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大字报，对那位“律师理事”则一致声讨，斥责他向权贵送秋波，想做官，当走狗，出卖了同学的利益，并要求法律系罢免他的理事职务。

法律系同学果然罢免了他的理事职务，在群众运动压力下，他本人也不得不写大字报，贴在民主栏，向全校谢罪。

全校绝大多数同学同仇敌忾，声称不惜用罢课手段力争。

这种一触即发的形势，震动了校当局，也震动了省当局，他们不得不把秘密捕去的黄同学又悄悄放出。由此，同学们深深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

在这个时期，校园内的新文化也有一定的发展。学生自治会出版了由周可任主编的八开版的“会刊”，报导本校和全国的学运动态。学生的剧团演出了“升官图”、“裙带风”等讽刺剧。歌

咏队里可以听到“兄妹开荒”、“祖国进行曲”和“茫茫的西伯利亚”等红色歌曲。至于“团结就是力量”则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随时随地都可听到。

高 潮 的 到 来

反对“美蒋商约”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蒋介石政府和美国在南京所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比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和汪兆铭与阿部信行所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都更广泛，更无耻，把中国的全部领海和领土，兜售无遗。学生们正在愤怒指责之际，忽然绿衣人送来一卷由西安寄来的《西京日报》，封皮上写着交河大学生自治会收。理事们启封展阅，才知道里面包的是延安出的《解放日报》。后者当天的社论是：“评美蒋商约”。理事们高兴得跳起来了。定神一看，这篇社论一开始便指出：“……这是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

这个社论的要点，用同学的口气在民主栏上一公布，立刻就清醒了师生们的头脑，激起了河大校园内的反美、反蒋怒潮。

两位教授的入党

为了上下配合，学生运动就应取得教授的支持。已经经过了一段考验，我遂把武剑西和李俊甫（化学系主任）发展为党员。后来他们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经过李俊甫的推荐，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我担任了河大经济系副教授，因此，我得以合法身份驻进校内，指挥战斗。这时学生中已建立起一个党支部。任勛丰任支部书记。一支部党员共七人。计有经济系任勛丰、卢治国、朱长

慈，文史系张四德、周历农，教育系刘世昌，医学院张仲乾。

沈崇事件爆发

一九四六年的圣诞节前夕，北京发生了美兵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的事件。消息传来，把群众积压已久的反美反蒋情绪，如火上加油似地点燃起来了。抗议书贴满了七号楼前的民主栏及其周围的墙壁，女同学们的行动尤其积极，一致要求政府废除“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严惩凶手，并驱逐美军出中国，不惜以罢课手段力争。我们工委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要在全市范围内以河大为首组织学生联合反美游行大示威。我立即把工委决议传达给河大教授中的党员和学生中的党组织。

一九四七年元旦，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全校院系代表大会，作出了罢课、示威、游行的决定。会后几十个代表和联络员到开封市四十余所公私立中学去联系组织游行事宜，有的同学还在中学里做了鼓动性的讲演。

在准备进行示威游行上，学生自治会做了很多揭露美蒋反动派阴谋的工作。在小礼堂组织了一次有三百多人（也有进步教授）参加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用民主缔造统一，还是用统一缔造民主？”后者实际是日寇曾经在华所提倡过的全体主义。辩论会的形式是学术活动，而实际成了政治动员。教授们在发言中对在会上发言正确的同学进行了奖评，所以效果很好。更多的群众一致指出只有排除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才能使内战“釜底抽薪”。辩论的结果是我方获胜。

会后，校当局十分害怕学生联合起来反美反蒋，上街游行。于是唆使反动的总务长陈奇秀授意学生中三青团的几个头目和训导处的人员出来活动，妄图削弱并破坏此运动。但他们知道“众怒难犯”，只能在人前讪讪地说：对美军兽行，开个会发个通

就行了，不必上街”，不敢说不叫抗议；或者在一些幽静的场所贴一些黑帖子。上写“不要受共产党利用”、“离前线近，恐怕出了事，当局要干涉。”等昏话。姚从吾也期期艾艾地在背地里向人说：“这、这、这……，看看，又要借题大闹了。……一件男女间的丑事，也要宣扬罢课。这要影响和美国盟友的关系呀！”

三日黄昏，在党的各个组织控制和影响下的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核心，拟好了关于反美抗暴的告同胞书和口号，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美军在华种种暴行以及美国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由经济系一位助教李定中即时把这宣言（告同胞书）和口号带到《中国时报》社去印刷了好几大捆，又马上拿回学校。党的各组织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也连夜苦战，编快报、写标语、做旗帜、分传单等都做得十分迅速。几十名联络员也深夜分头把第二天罢课、示威的通知送到了全市各校。

后半夜，忽然来了一位警察局的官员，声称要见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同学们不让他见，把他领到一个冷清的办公室里，给他上起民族大义的爱国课来了。后来，他见不着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只好悻悻而去。

次日晨，学生队伍张旗列队，从四面八方涌进了河大，黑压压地集合在大礼堂前。而国民党的警备队则在校门外的马路两侧刀剑森横地布置了警戒，妄想以此吓住学生的行动。但示威总领队、河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四德同志在庞大的学生队伍面前，做了简短的鼓动演说，说明“实现祖国独立是我们的神圣责任，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我们坚决要求驱逐美军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不达目的决不终止”。群众一致振臂高呼，

“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军滚出中国去！”

顿时爆发了震天动地的吼声。一声令下，一支反美暴行大示威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出校门，浩浩荡荡地走向大街，门口的军警只好沿途监视，并未敢动手阻挡。途经西隔壁国民党省党部门前时，群众愤怒地挥动小旗，冲着那大门高呼口号，有些路远的学校学生队伍，在土街才赶上了大队。静宜女中是教会学校，严禁学生外出，但由于爱国热情的激愤，仍然有一批学生赶来加入。到了东司门，妇女工读学校的队伍，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后来还有一位身着长袍、白发苍苍的老校长带来一大批女生参加，大家看其门旗，原是北仓女中。

队伍越来越大，已经成了万人洪流。

当游行队伍穿过自由路，经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省分署门前时，群众知道这里住有美国人，就停下来一起向它高呼：

“不许干涉中国内政！”

“美军滚出中国去！”

平日常在街上驾吉普车兜风的美国佬，一个个怕得要死，慌忙躲藏在黑暗的角落不敢露面。而夹道观看示威的群众，则向示威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不久，延安《解放日报》，根据新华社一月二十日的电讯，以显著的地位登载了开封这次学生运动的消息。标题为“爱国学潮荡中州”。其中有这样一段：

“……游行队伍，蜿蜒二、三里，口号声震天。……群众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驱逐美军出境’。当局所派军警，只好在两侧随行，无所作为。事后，河南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要各报对游行一事‘勿过分渲染’。但是，《民权新闻》、《中国时报》仍发表社评，对游行表示同情。《时

报》以“民族自尊心的昂扬”为题，历述美军在华暴行，并指出“美人终必自食其果”。

这次游行大示威的胜利，对孤立反动派，推动学运起了很大的作用。各校进步学生受到鼓舞，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开高、开师和北仓女中等校的学生会和河大学生自治会的联系加强了。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河大学生自治会把原出的八开版《会刊》改为铅印的四开版《河大新闻》，仍由我们党直接领导下的同志所掌握。并与全国学运相呼应。

学生自治会的竞选

由于四届学生自治会起了出色的作用，向来轻视学生自治会的校当局反动派及其在学生中的喽罗们，这时也如梦初醒地想来攫取学生自治会这个机构了。所以一场激烈的学生自治会竞选运动，便在河大校园展开了。但反动的学生挖空心思以至打上灯笼遍游校园，也物色不到一个合格的竞选人物，因为他们的名声都很臭。在无可奈何中，他们便从各院系的高班同学中，挑选了一些年龄较大、老于世故的“老学长”。这些人也就是在中队力量之中有些旧人缘。如他们挑选的文史系四年级某某学生，已年过三十，当过保长，只是为人圆通，他们便以训导处为首动员所有“特殊”学生，到群众中去为他游说。说他“为人可靠，办事稳健”。并用欺骗、贿赂的手法给他拉选票，妄想把理事会主席的王冠给他“加冕”。

学校各党组织都在发动学生群众积极参加竞选活动，并使党得以领导和掌握这次竞选。对他们所拼凑起来的丑角竞选班子，学生群众在民主栏上一个个加以品评，把他们的肮脏灵魂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如哪些人是“部派”的；哪些人是有野心向上爬的。群众还气愤得把“校狗”、“国特”……等词儿，恰如其分地给他们分别注在名下。

那时的青年学生，除有政治背景的人以外，一般说来，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还是天真纯洁的。他们既反对内战，又反对贪污。男厕所的板壁上曾出现过这样一副钢笔写的对联：

“重庆有官皆墨吏，
延安无屎不黄金。”

当时我们以“反对内战”，“反对贪污”作为竞选口号，尤其是“反对校当局的贪污，改善学生生活福利待遇”的口号，在广大学生中间最有号召力。后来经过学校各个党组织的协同动作，共同努力，终于选出了任劭丰为学生自治会主席。

河大学运和全国一样，以反对“美蒋商约”为契机，经过沈崇事件，蓬蓬勃勃地展开了。针对这种形势，工委除及时给支部和党员教授介绍我军民自卫反击战的节节胜利的情况，以鼓舞他们外，并综合全国学运形势，结合河南情况，决定在学运中提出“要面包，不要炮弹；要民主，不要独裁；要自由，不要迫害”之口号。

这些口号，既符合全国反内战、反独裁、反迫害的政治号召，又符合学生及知识界的“要和平、要饭吃、要民主、要自由”的切身利益。正赶上四月份，蒋介石给河南人民摊派下沉重的征兵、征粮负担。这不仅给了我们上述口号以现实的直接生命，而且也激起了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很显然，如果油水都被蒋独裁捞走了，地方绅士岂不得饿肚皮？因此，反征兵、征粮的口号，我们通过统一战线，一直提到省参议会上去了。

学生支部本着党的指示，结合新的实际进行研究，决定和全

国配合，在开封搞红五月。于是，七号楼前的民主栏周围就热闹起来了。

有的写：“打内战不合中国传统道德，政府应说服共产党和平解决，……”

有的写：“不管内战责任属于哪一方，双方都应以政治方式谋求解决，……”

有的以军费支出过大，占国家开支60%；而教育费却为数寥寥，占国家预算5%。为了挽救教育危机而反对内战的。

有的以父老、兄病、家贫还得支差、出税、应征等为理由而反对内战的。

……

总之，多数同学都能用各种语言，从各个角度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饥饿、争取面包，反对迫害、争取自由了。其中也有激烈言词，如写：“总崩溃的前夕，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们不能再徘徊十字街头，要走上去，斗争的生活才有意义。”校当局也感觉到难免没有共产党操纵，但却无迹可查。

蒋管区的一切生活现象，都是在解放战争的大风暴中动荡着。由于将近一年的内战较量，我军歼灭了蒋介石的七八十万队伍，并使解放区大致恢复了战争开始前的局面，还略有进展，使蒋介石和美国的威信大大下降。加上他内战消耗过大，而筹款的方法主要依靠印钞机的功能，这就使蒋管区通货膨胀越演越烈。这样一来，便把公教人员的生活推到了饥饿线上。所以提高公教人员待遇，改善学生生活福利，很自然地便提到日程上来了。但这等于虎口拔牙。那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除了割肉疼，便数出钱疼”。叫国民党政府出钱，仅次于向它身上割肉。它是光取之

于民，不用之于民。剥夺者不愿受剥夺。在公教人员呼吁提高待遇无效后，五月三日，便由教师联谊会决定，全河大教师一致罢教。两星期后，学生们为了声援教师，也就由全校学生代表大会议决，一致罢了课。

可是，校内的反动势力也不示弱。他们当然不赞成罢教罢课。这时刚好蒋介石五月十八日颁布了一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酷令，即严禁人民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国民党政府，对于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可以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他们便如获至宝地以此作为处理对策。扬言：“开封地处前线，如果上街游行，便要用机枪扫射。”并追查前些日子在小礼堂讲演人的姓名。

党组织和进步师生没有被他们这些威胁手段所吓倒，而是团结和鼓励群众继续战斗。

可是罢教、罢课已达二十天之久，提高教师待遇和改善学生生活，毫无解决办法。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虽然节节失败，可是他们仍然一意孤行。我们为了扩大学运影响并和全国学运相呼应，决定派遣学生代表团以请愿为名赴京活动，并建议派教授二人从旁赞助。

欢送赴京请愿代表团

经过各个党组织的工作，并通过学生自治会的发动，同学中间按照院系系统，全校共选出以卢治国同志为首的赴京请愿代表团，共十二人。教授方面也推选出二人准备进京。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是代表团出发的日子。他们先在学生自治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十来人。由首席代表卢治国同

志向记者们说明了代表团赴京请愿的意图，博得了记者们的同情和支持。旋即宣布出发。

代表们由记者们围随，从七号楼下来，向东走去，老远就看见大操场上，黑压压地聚集了千数人。他们挥舞着彩色小旗，提着油漆筒，手执排笔和粉笔、红土等物，还扛着便梯，宣传车也升腾待发。队伍前面的红布门旗上，犄角贴着“欢送本校学生代表团进京请愿”十三个金纸墨字的四方块儿。场面十分雄壮。

代表们快走到操场边时，一阵欢呼声象雷鸣似地爆发了。接着就有些人出列给代表们每人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记者们立即过来给他们摄了影。

代表团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谢，接着即徒步出发，以门旗为前导的欢送大军紧紧跟随，并高呼口号。

这次因为行动迅速，出乎当局的意料，所以他们未曾来得及阻拦。我们名义上是欢送代表团，实际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大示威。队伍象一条长蛇阵一样，出校门，浩浩荡荡向南行去。所过之处，喊声震天，人民鼓掌，蒋陈胆寒。至于标语、口号之具体内容，除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之基本要求外，还书、喊了“打倒独裁蒋介石！”“打倒好战分子陈诚！”“坚决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打倒四大家族！”等等。

在鼓楼街，队伍中有人用红色大排笔，在中央银行河南省分行的大门上写上了“人民血库”四个斗大的字。到中山路中段，有几个参加游行的人，去把中央社开封分社的大木牌摘下，给它写上“造谣机关”四个大黑字，又给他挂上。在大南门外两边的城墙上，把他们原来刷的“朱毛不死，大乱不止”，给它把头两个字用“蒋陈”二字盖上。

游行队伍的前列是一辆有篷的大卡车，是学生说服司机开来

的校车。车顶当做讲演台，车厢内设了一个油印快报小组，编写着小型快报，边写边印。印出即散发到夹道欢迎的市民手里。大家都赞扬地说：“这是摩托化的”。

这次提的口号，有一部分，更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所以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队伍到车站后，同学们即向旅客和铁路员工展开了口头宣传。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组成的歌咏队，除唱“团结就是力量”外，还唱了自编的反内战歌曲。

唱得听众人人怒目，个个切齿，一致振臂高呼：“打倒独裁蒋该死（介石谐音）。”

东去的一列绿钢皮客车到站了。手中有写字工具的同学们一拥而上，刷刷的，写的写，一霎时，把一列绿钢皮车变成了花钢皮。代表们便乘着这列长长的“机动宣传车”，驶向了豫东平原。

反动派的报复

反动派认识到了这个“第二条战线”的厉害，和全国其他城市的反动派一样，在蒋介石的统一命令下，先发制人地抢在“六·二”学潮发动的前夕，便于五月二十八日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对手无寸铁的河大学生进行了武装袭击。

在此以前，早有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农学院的鲁延年同学和土木系青年军复员来的李修亭同学）向河大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透露：国防部二厅来人和青年军头子张策、白堃等密谋，策划破坏学生运动，有些青年军复员的进步同学和李修亭一起又联络了一批青年军中的中间同学，以集体名义公开声

明他们“和爱国同学一个立场”，并斥责青年军的少数头目的作为不符合人民利益。因而，那些反动青年军把这一批人视作“眼中钉”。他们也自豪地以“眼中钉”署名出大字报和反动的青年军学员辩论，不断揭露他们的反动阴谋，使得青年军的反动骨干在学校很难活动。他们不得不请求特务机关出钱，以青年军联谊会名义，在鼓楼街大金台旅社设立活动据点。这样一方面便利了他们和特务机关的密谋，同时又可出没无常地到学校活动。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有二、三百同学在学生自治会的主持下，坐在小礼堂听嵇文甫教授作“真理的具体性”的学术讲演时，忽然有一些同学气呼呼地从外面趋跑而来，找学生自治会主席不见，便拉着前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四德同志，要他出去看看。说外面有二十多个青年军学生在校本部内正以“护校团”的名义，大贴反动标语，污蔑爱国学生运动。不知他们是些什么人，究竟要干些什么事情。张四德同志立即和他们一起走到现场观看。谁知这伙青年军蓄意挑衅，反诬赖张四德同志撕了他们的标语。张四德同志质问贴标语的青年军们“代表谁？为什么不遵守学生自治会和教师联谊会的决议？”

他们蛮不讲理，还用下流话骂人。他们见张四德同志等来的人少，就恶狠狠地指着张说：“你就是共产党。——打！”竟动手行凶。张等忍无可忍，也就奋身还击自卫。

反动分子的野蛮行为传到了小礼堂以及各宿舍，于是同学们闻风赶来，高喊“打狗！打狗！”围攻他们。并以石子、砖头投击。他们一看势头不妙，拔腿便跑。路过七号楼前时，又被楼上飞下一痰盂，连打带浇，使得他们污水淋头，孟弹砸脑。打得虽然不重，却也被吓得不轻。他们一直跑到训导处，群众也追到训导处。训导处不敢窝藏他们，他们就又往校门跑。这时小礼堂的

讲演早已终止，群众把校门关上。他们走投无路，便一起钻入了校门内西边一个破厨房内，紧闭房门。

这时张四德同志已把训导长路葆清请来，向他说明特务行凶，要他保证人身安全，开除校狗。同时他又转向群众说明特务行凶肇事经过，请群众作证向法院控诉。群众听罢十分气恼，便蜂拥向前去砸那间破厨房的门。凶手们知道也不便在那里久呆，便从厨房的天窗拼命挤出去，正好跌到墙外的污水垃圾堆上，个个碰得鼻青脸肿，泥污满身。群众又赶来围攻，他们便窜入隔壁国民党省党部内。逼他们的群众也一拥而入，声称要捉拿凶手，并把路葆清扯去，一起向省党部要犯人。后来，同学们捉住了一个叫刘一农的行凶分子。为了防止国民党以后寻事，廖玉和等学生，非要省党部书记长武文立个字据不可。叫他写上：学生群众除扭走刘一农外，别无其他不合理行为。他不立，后经学生群众和他力争，并呵斥他，最后由同学起草，让他签了字。然后才把刘一农带着离开省党部，回到学校大礼堂，进行公审。

这时党支部书记兼学生自治会主席任勛丰已被其家兄软禁在家。我抓不住他，没法指挥运动。在极端困难而紧急的情况下，张四德同志和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程运宇、戎配九等商量决定，趁此机会在大礼堂当众揭发“护校团”破坏罢课决议，无理挑衅的卑鄙行径。并叫刘一农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以后抓住有利时机再和反动分子斗争。

大礼堂内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争先恐后地揭露“护校团”的罪行。质问他们“领了谁的特别津贴？”“为什么行凶打人破坏运动？”

这时有人做了一顶纸制高帽子，拿去要刘一农戴，他不戴，说：“我不是领头的。”不过他终于向群众道了歉，保证以后不

再搞破坏活动。

大会散后，已是下午一时。这时同学们发现学校东墙和北墙外的城头上，军警在布防设岗。接着就知道了敌人已从四面八方把校园包围了起来。经济系和医学院出动了二十多个同学去防守大门，和正要夺门而入的警务处的歹徒们隔大门对峙着。可恨的是校内的青年军来了一伙，抄了守门同学的后路，立即把守门同学刘继武等打晕，并扭住王光燕和刘继武等同学的胳膊，开门揖盗。这时大批武装军警和打手们才蜂拥而入。他们首先分兵把守校园内的道路和宿舍，接着就按照预先制定的黑名单逐屋对照学生证，进行搜捕。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午夜，共捕去校本部同学七十余人。

在搜捕时，一部分积极分子隐蔽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得免于难。张四德同志和学生自治会的一些负责同学把一些机密书报作了处理后也被捕了。

张四德同志岁数小（二十二），个子小，特务们好象觉着他的名声不相称。带点怀疑的口气问他：“你就是张四德？”

当两个光着膀子的彪形大汉架着张四德同志下楼时，他问他们：“我犯的什么罪？”他们说：“你的事情你知道。”

他们把张四德同志连抓带打地扭绑着出校门时，正遇上校长和教务长一伙反动学阀从大门外而来。他厉声质问他们：“今天的事你们可知道？”他们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鼻腔内低声哼了两哼，又象点头，又象摇头似地走开了。

六月一日，大逮捕又继续进行了一天。这次范围更大，波及全市。除河大的二、三两院、附属护士学校、先修班、附属高职等校外，还有静宜女中、北仓女中、中国时报、邮电局以及其他一些行业，共捕去一百多人。计前后两次共捕二百多人，而报上只

披露了河大被捕四十三人，其中有一名职员云云。

被捕后的斗争与营救工作

成批的被捕学生，用黑带蒙眼押上大卡车，腰悬匣枪的人在车厢内的四周押解。汽车开到包府坑，把捕捉到的学生们押在省会警察局的看守所。第二天，经过简短的审讯，说学生们打伤了人，“护校团”告了他们。学生们声言辩驳，并要求上法庭和“护校团”打官司。反动派哪里肯听。当天下午就把他们押送至大南门外，省训团（河南省地方干部训练团）一个大仓房内，由一排警宪看守起来。这时在开封的各个党组织都通过各种方式发动社会名流和学校师生声援和营救被捕同学。

五月二十九日，我们工委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应付敌人的对策。在找不到任勛丰的情况下，武剑西又因银行（他原系银行专员）业务到上海去了。事情紧迫，我便仍以副教授名义直接跑到河大西一斋二楼上，在化学系主任办公室找见李俊甫同志，（原来学生支部单独编，教授只是单线联系）向他传达了工委意见，要他串连教授募捐去向被捕同学进行慰问并探视情况。他当即找人串联、酝酿。为了应急，他先到会计上借支五十万元，又找了陈仲凡教授、王凤岗教授，还有熊荣轩同学代表学生自治会。他们四人买了一些日用品及吃食等物，前去省训团慰问。他们回来后，李俊甫同志向我汇报说：“这七十来个被捕学生都关押在那个仓房内，男女同学之间，隔了一层土墙，监视虽严，但大家还可偷偷交换意见。”并说：“反动当局在搜捕时没抓到任何证据，在警察局审讯时也没得到口供。只有一位女同学随身带有一本民盟手册，这原是和五万元在一个口袋内装着，被捕前她本来去往一

块石头下押这民盟手册，心一慌，押错了。没有押掉民盟手册，却把五万元押掉了。到看守所上厕所时发现后，立即把它撕碎毁掉了。”

我得到这个汇报后，即指示他去串联师生、同乡、同学等利用各种关系去保释。

就那天（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国民党还以又抓到两名“被捕同学”的名义安插进省训团大仓房内两个人，这两人是一男一女。那男的鼠眼兔腮，一副苍白脸，象个流氓。女的抹胭脂粉象野妓。奇怪的是既是被捕难友，学生们却都和他们素昧平生。

敌人使用各种手段来审讯学生们。但学生们以张四德、胡汝涛同志等为核心，又联合了程运宇、朱伯福和牛维鼎等进步分子，分头向群众秘密串联（如利用上厕所同路和睡觉时的贴近）一致约定：“关于示威游行中的具体组织工作坚决不讲，不利于同学的话坚决不说，公开合法的事谁干的谁讲，但不低头，不认错，不悔过。”

敌人在联合（由省党部、警务处和调统室等单位参加）谈话，疲劳审讯（即他们几个人轮流来审讯一个或几个学生，一次延长至几天几夜，用疲劳的办法折磨学生，使他们身体承受不了而招供）等办法都归失败后，又别开生面玩出了新的花招。对被捕学生进行“思想测验”，出了一大堆旁敲侧击的题目，想借此以打开缺口。但也一无所获。

在拘留期间，学生们对于解放战争消息仍然是十分关心的。有一次，张四德同志从看守那里得到两张从上海印行的黄色刊物上撕下的破页子，偶然一看，竟有一条特大新闻映入眼帘：“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在济南隆重追悼祭奠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说“张灵甫如何忠勇作战，共匪死了四、五万人，但这个师也终于

弹尽援绝，全部壮烈牺牲在孟良崗”云云。

在拘留期间，国民党的官方报纸是允许看的。虽然它的报纸谎话连篇，可是学生们也逐渐地摸到一点门路。从它的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中，看出一些名堂。如：当它报导“刘伯承部向大别山逃窜”、“中原剿匪新形势”，便知道这是我军大反攻开始了。当它报道“两军对峙”，就知道是国民党军被包围了。如果过几天再不提这件事，就知道这股国民党军已被消灭。

在党的发动下，保状如雪片一样，纷纷落到了省警务处长杨蔚的办公桌上。有的是用父母名义来保；有的是以同乡情谊具结；有的是用朋友关系说情。有的学生家庭有势；有的亲朋有钱。就这样，连压带贿加麻烦，组织上除了出钱外，还写通讯在上海《大公报》上报导这次开封搜捕经过并披露了被捕同学的名单。经过两三个月的折腾，敌人又没弄到任何证据，所以到八月中旬，就陆续保出了五十余人。在此期间，学校还给被捕学生中的二十几个积极分子送来了开除学籍的通知书，其内容是：“查此次学潮事态严重……为防止意外，维持社会治安，对该生除名。”但这些人谁又在乎它那顶方块帽子呢？

最后，只剩下张四德同志等十三名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转押到杨家湖西岸的地方法院看守所，把十二个男同学押在两间小房内，朱伯福同学住了女监。

狭小的囚房又脏又臭，一只尿满尿而已经发了酵的便桶放在那里，张四德同志等用力把那只便桶扔出去，把囚室打扫干净。普通犯人一天放风一次，经过斗争，他们被允许一天放风三次。他们在室内唱歌，在铺上“翻筋斗”、“竖直溜”，尽量扩大活动空间，充满革命的乐观情绪。原来不熟悉的同学，因为患难与共，也熟悉了起来。困苦的环境，增强了大家的团结。

九月间在法庭上过了几堂，穿紫红袄的法官，除重复问他们“思想测验”中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外，再就是同学中的斗殴与口角等事，没什么重要情节，没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最后终于不得不叫他们取保释放。但留了个“随传随到”的尾巴。

学运的影响与收获

河大学运的影响是用不着我来赘述的。除前述新华社、《解放日报》都发表消息、通讯外，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蒋介石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的注解中，又明确说明：“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上海各校学生……这一爱国运动，立即扩大到南京、北平、杭州、沈阳、青岛、开封等许多城市……。”所以它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仅影响到开封市及河南全省的学校，而且也闻名全国。派到南京请愿的代表团，一路乘着“机动宣传车”东去，国民党当局是十分害怕的。所以他们所乘的列车一到徐州，便有一伙打着河南旅徐同乡会的旗号，以老虎戴念珠——假充善人的伪装，登车劝他们回转。他们严词拒绝，继续东行，到南京后，与教授代表王毅斋、马戡吾等二人同去找伪教育部，但田培林次长竟以老校长的身份出来倚老卖老，训斥学生，想威吓他们一顿叫他们乖乖回去，代表团和他据理力争。

代表团一看请愿不成，便和京沪苏浙等四个地区来的代表一起成立了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后又到上海参加了全国学联会议。

一九四八年秋，河大迁往苏州，进步学生又在那里组织地下学联，并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大军渡江前，他们还进行了保护校产与防止破坏的斗争。当然这与整个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

分不开，但和前一段河大学运也是一脉相承。

当然河大学运，还有党的别个系统在里面工作，我这篇著作，只限于我所掌握的情况，不周到处，尚希原谅！

第十一篇 缅怀胡万杰烈士

“谈笑有鸿儒”

一九四三年的新春，当我们开封情报站建立之时，我的职业掩护，是在伪开封市契税经理局任事务股主任。因为我是伪财政厅长郭斌董的网宗，伪局长王允武对我特别上看。为了拉拢我，便把南乡（那时市县统一）契税交我兼管。如果按当时局内正常分工，会计股管征收，事务股只管总务。而具体在下边办理征收的是勘丈员。当时南乡有两位勘丈员。即刘玉清和王玉有。他俩便成了我的直属下级。

在这两名勘丈员中，刘玉清是一个刁钻商人。他除当勘丈员外，还在开封城内开设土膏店（大烟馆）一座。为了适应当时的“协和”气氛，刘玉清把土膏店名为兴亚土膏店。这座土膏店坐落在北兴街路东，只有一间铺面房。进门往里去，掀开后墙上挂的门帘，豁然还有三间通房。在这通房里面，沿着一壁盘了一溜大炕。大炕上，除了衾茵俱备外，还等距离地摆了几方油漆光亮的木制画盘。盘中置有烟具，这土膏店兼充刘玉清的勘丈员办公室。因此，我常到这里来找他。如果他不在外屋，免不了我就进

入里屋。每逢我到里屋，都会碰上一些黄脸黑牙的瘾君子，侧卧在烟灯旁吞云吐雾。时或还有“红袖添香”伴吸膏之事。可是，这一次我来找他时，一撩门帘，却见有一只大烟灯旁，侧卧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他，一边手拈钎子烧烤烟棒，一边与在地下走动着的刘玉清闲磕牙。我心甚为奇异，觉着鸡群中怎么发现凤凰？便一把抓住刘玉清的袍袖，拉到外屋来悄声问话：“那位绅士是谁？”他和我附耳一阵，我才晓得了此人姓胡，名万杰，字俊三。系河北省安次县葛渔城镇人氏。事变前几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学院，授法学士学位，在北平古城挂过律师牌。不幸芦沟桥炮声一响，北平沦陷。他不应当亡国奴，遂携家带口逃来开封，投奔其在静宜女中当校长的高永昌舅父。安顿好后，又在开封挂起律师牌，为民伸冤。孰意翌年夏，开封亦告沦陷。他深慨“我能往，寇亦能往”。遂作速摘掉律师牌，在南薰街家中蛰伏三年，杜门不出。后因生活所迫，才请人说合，在开封市伪统税局当了一名科员，勉为糊口等情。我闻悉之下，颇为器重，便请刘玉清介绍。一回生，二回熟，日就月将，变为契友。经过大半年的互相往来，观察考验，至同年年底，我终于把他发展成为候补党员，并呈报上级批准。

由是，我每逢想起好事者为了挪掇烟馆，仿照刘禹锡《陋室铭》之格律所作之《烟馆铭》，铭曰：

“灯不在高，有油则明。枪不在长，有土则馨。斯是陋室，惟吾烟熏。烟痕上指黑，土色入口青。谈笑有烟鬼，往来无白丁。……”

就要把它的“谈笑有烟鬼”之句，改写为“谈笑有鸿儒”，用《陋室铭》之原句，以歌颂胡万杰同志。

中华社的打入与豫东伪军工作的开辟

胡万杰同志，学识渊博，口舌如簧。他，雅善以说风凉话的口气，反对日寇。如说：“日本人一面剿共，一面造共。”他对这两句，曾具体解释说：“日本侵略中国，打的防共旗号。所以，它将对蒋汪采取诱降政策，对共军则采用‘三光政策’。这是它剿共的一面。可是它性情残暴，手段毒辣，行为野蛮。见女则奸，见财则夺。抓丁强迫奴役，逢矿疯狂采掘。而且曠使浪人，走私、贩毒；强迫农民种棉、种罌粟。夤夜入人家捉人，白昼拦路抢劫。特务如毛，杀人盈城；哀鸿遍野，饿殍载道。慢说‘非治安区’和‘准治安区’，就连诡称为王道乐土的‘治安区’，也是家家鸡犬不宁，人人朝不保夕。所以人们常说：‘此处不留爷，还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人们只见共产党越杀越多，八路军越扫荡越强；揆其原因，实由日本行事强暴所致。……”

后来，胡万杰同志已经受到了一些党的教育。因我常给他讲《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他总是把这些经典著作的基本原理，变成进步群众的语言，用发牢骚、说风凉话的口气把它宣传出去。“酒吃滋味话听音”。人都是聪明的。虽不明传，却已意会。久而久之，便在他周围团结了一些进步人士。经过考察教育，他先后，除介绍了他的侄子及两个配偶（两个配偶是姐儿俩，因大姐不育，续了小妹）入党外，还介绍了两位重要人员入党。这两位重要人员，一位是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驻汴办事处电台报务员董国英（孙良诚队伍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开往苏北扬州后，董又升为办事处电台台长）。经常利用其职居要害之便，给我们输送

敌伪军情报；另一位是中华社驻开封分社新闻记者张以诚（又名张路平）。正是此人，利用他新闻界的身份，到处以采访为名，而奔走。给我们开辟了民权和兰封（兰考）的伪军工作，后来组成了我们的《一支地下军》（载《燎原》第四期）。在解放战争中，以诚到郑州工作，也起了卓越的作用。

胡万杰同志的侄儿名叫胡伯虞，当时在伪河南省绥靖委员会执法队当兵，守大南门，便利了我们自己人的出入城门和城内城外传书递筒及运输违禁物品等工作。两个老婆也为我们站岗放哨，跑腿送信等做了不少工作。

在日本投降前后

从一九四四年的五月起，美国的B29型重轰炸机，便经常远航来开封“下蛋”；在这以前老早，日寇就强迫“日华臣民”按系统，按保甲组织起防护团。每天天不亮，就把全城防护团的人马分别集合起来，操练演习。弄得家家不安，人人慌乱。尤其是到了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兵营、车站被炸，仓库、民房起火，美机编队常来，日军败绩频传，中华社开封分社门口突然热闹了起来。冠盖云集，门庭若市；出出进进，憧憧不息。我心急如焚，便到胡万杰家叫他去找张以诚来。一问，始知美军已攻克硫磺岛，正在以雄厚的兵力大战冲绳，有四个美国师已在冲绳岛登陆；日军虽拼死抵抗，但众寡悬殊，估计已难确保。此岛一失，日本的南大门敞开，美军便可直奔日本的九州、四国，而且九州、四国等地早已被美国空军袭击，日本本土进入了防空和决战体制阶段，笼罩在严重的恐怖氤氲之中了。虽然这些消息，日伪报纸尽量掩盖，但中华社的消息是灵通的。我们自从有了张以诚同志，我们的耳

朵就不聒了。尤其到了八·一五前，我们从张以诚处得到的消息更多。如波茨坦宣言以及日本无条件投降等。有时我也到中华社开封分社直接找张以诚去，碰到日本人时，总见他们每一个人的面部都刻画上了一种极度茫然和疑惑的神情。真是“入门休问荣枯事，察看容颜便得知”。

在解放战争时期

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过去蒋介石号召“曲线救国”并通敌，一九四五年的八·一五以后，很多伪军、伪官，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国官。你变我也尽量变。我们原来以支伪差作掩护的一些同志，在党的指示下，有条件的，也都摇身一变，或做国民党开封城防司令部的谍报员，如曾洁光同志；或当河南省调统室粮秣科的管理员，如崔士学同志；或把伪军改编成国军，如张绍儒和朱广仁同志；或由伪税吏变为国家律师，如胡万杰同志。我们许许多多的同志都由沦陷区的抗日地下战士，一变而成了蒋管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的民主运动的地下工作者，恕不一一枚举。本文只讲胡万杰同志。以下，我们再从日本投降以后说起。日本投降后，他蜷居在水车胡同，躲过了劫（接）收的灾难，即到豫中中学教书（国文）。一九四六年春天，他又重操旧业，在开封市河南大旅社租房间开设了“胡万杰大律师事务所”，家也搬了。由水车胡同搬到了平等门（曹门）大街三十三号后院，住了宽敞而高大的五间东屋。由于他法学渊博，办事公道，为民伸冤，不计报酬。一时誉声大振，门庭若市。不仅办公时间律师事务所挤破门，连其私宅在业余时间也是讼者如云。那时我们开封工委已经正式成立，便利用他的人事来往复杂，把他的住

宅作为临时联络点。为了我的工作方便，他又和房东联系，在第三进院子（即他的住宅本院所在地）的西跨院，给我租了三间西屋，作为我临时谈话和办公用。那时虽然国共又在和谈，但陈诚（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公然宣称：“停战就是备战，整军就是扩军，复员就是动员”。蒋管区与解放区的边界封锁森严。偏偏在这时候（一九四七年四月初），工委常委方敬之同志和我说：

“有信阳国立六中符鸣岐等四个学生要求到解放区去学习。”我再三劝阻，他再四申辩：说什么往解放区输送干部也是一个任务。我说：“党并没有给我们这个任务。”他又说：“他们在这边已很困难，不能继续读书。”我说：“在这一边，谁不困难？正因为困难，才要起来斗争。现在各校学生不正以反征兵反征粮为口号而酝酿反内战、反饥饿吗？”可是他再四申辩，我也没再坚持。遂同意了他们到解放区去学习的要求。但是，方敬之得寸进尺，又提出要找人护送他们。我为难良久，突然想到地下交通马怀模要到太行去。马系安阳西乡马家蒋村人，那里和太行区壤地相接，边界封锁再严，他是本地人，还是可以过去。不过，我立即又想到在边界运用“鸡鸣狗盗”的技巧过关，不宜人数过多，使目标过大，遂明确告诉方敬之，叫他们四个人分成两批走。每批二人。一批走新乡，一批走安阳。走安阳的两个人可以叫马怀模带走。新乡的二人须自己走。而且从新乡上到辉县就是太行五分区机关所在地，到那里找谁也交待了。不意方敬之和马怀模商议的结果，四个人都由马怀模带上走安阳，临时不同我商量还又搭配上了两个女的。这两个女的是：一名郭学廉，一叫孙雁青（真名孙成范）。就这样共七个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大摇大摆挤在火车上向安阳去了。只是在他们走后，方敬之才告诉我说又添了两个女的。他也说这两个女的不好。我说：

“不好，你还叫去？”

他们一行七人到了安阳后，徒步向西，因边界封锁严过不去，又找安阳情报组长周同乐想办法（这纯系私人胡搅。因开封是工委，归党的系统领导。安阳情报组虽然在抗日时期我搞情报工作时归我领导，但这时已分开。情报仍归属司令部管。不能再发生横的关系。因周是马的入党介绍人，故马又找的周），还是过不去。周又利用他在农村教书的一些关系，如贾好书，曲鸣庭等，使这七个人这村到那村，历时月余仍然过不去。郭学廉和孙成范遂跑到国民党安阳专员公署，因郭学廉系专员赵芝庭的干女儿，她和孙成范便到专员面前告密，说：马怀模是共产党员，要拐骗他们到“匪区”去。马即被捕，并把所有他知道的党的关系，连安阳带开封的，供了个遍。致使安阳和开封两地立即就有十一个人被捕。这十一个人的名字是：周同乐、马怀模、曲鸣庭、贾好书、马恒清、胡万杰、郭向新、郭志新、权会礼、查录鑫和杨怀仲。本文专讲胡万杰，并附带讲一讲郭向新和郭志新。

胡万杰同志的被捕

五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从中山路（这时我住在中山路中段）到河大去，路过胡家看看，看那里有什么事没有？胡正在他家甬里间傍桌而坐，埋首看一纸状子。他一见我来，便抬头让我坐在桌头旁的一把椅子上。尚未等我坐稳，他便急急促促地告诉我：“昨日傍晚有个鬼头鬼脑、刁钻奸猾的人，着一件灰绸大衫，头戴礼帽，黄脸猴腮，手拿一封信，突然闯来，说：‘王希焜住在哪里？这是他的一封信’。我说：‘不知此人’。”

我听罢心中一怔，立即又镇静地说：“你答得很对。”

这里是我们的工委的联络点，以前的通信代名总要向老胡交代，惟这一次和马怀模约定的“王锡嘏”代名没向老胡交代，所以老胡说“不知此人。”王希嘏显然是“王锡嘏”之误。这个代名，只是叫老马有把握过去时发信免念。但这信既非绿衣人递来，而是由穿灰绸大衫的人持送，显然蹊跷。我立即意识到老马在安阳出了事。遂急告老胡说：

“坏了。这是我和马怀模约定的通信代名，嘱他临过去以前来封信，邮到这里交王锡嘏收。此信既然非邮局送来，而是一个便衣送来，可以想象出是马怀模在安阳出了事。送信人不是特工便系警探化装。”

“老马这人怎么这样糟糕？他到静宜女中教书是我介绍的。该不会牵连我吧？”

我说：“最好你停几天律师业务到别处躲躲。”

“这上哪儿躲去？”他挠了挠头。

“上五团！那是咱们的‘遁逃藪’。”

他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眉头突然一扬说：

“不必吧！我看主要是你，信既然是找你的，我看你应该去躲躲。”稍一停顿，他又用坚毅的口气说：“只要你躲开，抓不住你，我就不怕。”

我还想说服他去躲躲，可是尚未启齿，忽然步履纷纷，闯进来几个贼眉鼠眼的恶煞，诈称找胡律师商谈打官司的事。胡一看来者不善，一边给我递眼色，我便把讲义夹子挟在胳肢窝，说：“我上课去。”悻悻而去。胡转脸板起面孔向那几个恶煞冷冰冰地说：“家里不办公，有事到事务所去！”说罢便戴上礼帽，抓起公事包往外走，那几个恶煞象影子一样尾随之。

万杰同志 摇摇摆摆走出大门，平日总有熟洋车伏在门口等

候，可是今天使他很失望，一个熟洋车伙也没有；而却有个素昧平生的洋车伙，坐在一辆装饰楚楚的轿车的脚踏板上，二目炯炯，一见他出来，忙不迭站起来，向他客气地说：“先生，坐车吧！”

他打量一下周围再没别的车，而这辆车装饰整洁，车伙也还年轻，遂迈腿上去，说了个“南关”，洋车伙便抄起手把唧唧呀呀向南走去，那几尊恶煞也紧跟在后头。老胡内心很不平静。他叫洋车伙往南关拉他，本是想甩掉这几尊恶煞；转一圈，然后再回来到事务所去。不意那辆洋车把他拉到马道街后，便窺入铁佛寺街，他质问洋车伙“为什么往这里拐？”洋车伙回答说：“拐个弯不耽误，我一定把你拉到。”可是话犹未了，车已在一座戒备森严的大门前停下，万杰抬头一看，门旁挂有白牌黑字，上书“河南省会警察局刑事警察队”。他才知道坏了，自己做了“楚囚”。没容他多假思索，后边那几尊恶煞已经气喘吁吁地踪迹而至。哨子“日日”一响，门里又冲出一伙凶神。凶神恶煞一齐动手，连抓带拥把胡万杰同志弄在刑警队的后院，关进了一座又小又黑、又潮湿的屋子里，还把屋门倒锁上。他的两手空空，皮包不知被谁夺去，用手在身上上下一摸，帽子丢了，衣服也撕烂了。

当天下午，刑警队行动股对胡万杰同志进行了审讯，问了他和王希娥的关系，他还是一口咬定不知此人。僵持了很久，审讯人无法，当夜即把他转解到保安司令部看守所。

次日傍晚，又有几个行动队（这次他们一例着制服，佩带俱全）来到胡家，声言要郭向新和郭志新到刑警队问话，姐俩面面相觑，默无一言。在一伙武装行动队逼迫下，姐俩只得把家交给三个小孩（最大的十三，最小的六岁），志新把吃奶小孩抱上，一起被捉到刑警队。在黑房里过了一夜，次日白天也解到了保安司令部。

狱 中 生 活

向新和怀抱小孩的志新由刑警队押解到保安司令部前院军事法庭上，经过警卫森严、侍从环列的军事法官问明了她们的姓名、年龄、乡贯和职业等等法庭上的“验明正身”的一老套的话语外，就喝令她们实说王希嘏是谁？她们也是说不知道这个人。又问她们“你丈夫都和谁来往？”她们答：“谁找他打官司他就同谁来往，因为他是律师。”又问“胡万杰是不是共产党？”她俩都摇了摇头，表示否定。志新抱的小孩不满周岁，被吓得呱呱乱哭。她忙不迭只顾哄他，法官还是在追问，向新就把丈夫的历史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最后反问法官“你看沾上共产党的边沾不上？”

法官理屈词穷，只得宣布把她们押进看守所。

这座看守所，坐落在保安司令部前院的西跨院。正前院为特务营和军事法庭所在地。特务营的武装，一律是美式装备，不是匣枪便是汤姆生。他们除了分出少数兵力警卫省政府及各厅外，主要任务就是看守看守所。进入保安司令部的铁栅栏大门，沿南墙根向西去有一条胡同绕到特务营营房背后，在胡同里面靠右边有一堵围墙，把营房的南山墙和看守所的南山墙连接起来，在墙的中间，开了一道门。门扇也是木制的。独门扇的上半截还特留下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小门洞，也有小门扇挡着。这个小门洞只是在传递东西或犯人家属探监时才打开。进入这道门以内，是一个象一条大胡同似的狭长的院子。长院西边是一排二十来间的木笼房。每间有七平方米大。但木笼的形式与大小，又是各色各样。有的是就门栅木，栅栏下部有小门洞，犯人需蛇行而入。向新和志

新，是一人先爬进去，后一个人把小孩递进去才能自己再进去。不进出人时，小洞也是铁门、铁索、铁锁，牢不可破。栅木由榆木制成，每根榆木条都有三平方寸粗。门里有一条窄溜溜的横道。跨过横道就是满间大炕。有的是三间一通，两头用粗榆木条扎两个木笼，中间为通道。木笼内有大炕，挤着住可容纳八至十人。大炕和木栅之间还有一条窄窄的走道，供犯人上下炕及放便桶之用，但也可以容纳一、二人来回踱步。大木笼间是押高级政治犯的，向新、志新被关在小木笼间。这间小木笼共挤了十个人，还放一只便桶。粪污浊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她们被逼着爬进来时，一眼就瞥见马怀模老婆愁眉苦脸地垂头坐在炕的一角。但在这种场合，谁能和谁说什么？她俩带小孩刚刚挤坐在炕沿上，就听见女犯们噉噉喳喳说：

“昨天抓来一个胡律师，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

“可是人家坚不承认，只说为给人打官司得罪了人。”

也有一间小房放三只单人小木笼的。我们暂不多说。

就这样，向新和志新知道了丈夫也押在这里。但“咫尺间，天样阔”。怎能看他一眼呢？

每日三餐，都是陈谷子、烂小米和上鼠粪、草芥、沙石等煮成的稀饭，每人可喝一至二碗。中午和晚饭，各有一块带蛆咸菜，算是大餐。每个犯人都是饥肠辘辘，面黄肌瘦。每日早晚各放风一次。男女厕所都在大长院的北头。向新、志新到所三、四天后的一个早晨，在放风时间，在金刚怒目的看守们的监督吆喝下，相随上厕所时，忽然在男犯的人群中瞥见了老胡。老胡同时也看见了她们，便凑过来和她俩并肩行走。悄悄嘱咐她们：“你们一口咬定是家庭妇女，只知搞家务，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天大的事由我对付他。”

她俩只是点头，不敢多说。因为除地面看守们监督吆喝外，在一溜木笼长房的顶脊两端都筑有两米多高的瞭望楼。它那明幌幌的窗玻璃，黑黝黝的壁枪口，都在给犯人心理上以威慑的恫吓。使犯人们不得不随时小心。

审 讯

胡万杰同志带家属共四口分别关在国民党的黑监狱内，时常分别受审。对老胡主要是追问他王希峨是什么人，到哪里去了？对向新、志新则是追问她们“胡万杰是否共产党？”

胡万杰的对答是“不知此人”；志新和向新则都是矢口否认胡万杰是共产党。对胡万杰同志反复审讯，胡竭力辩解说：“找我打官司的人实在太多了，张三、李四、王老五，当面通姓名，过后即忘却，委实难记下。”

虽然胡万杰同志多才善辩，岂知法官早已根据安阳专员公署转过来的马怀模的口供，把他和王希峨的关系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法官不慌不忙地狞笑了一声，问：“你知道郭惠民不知道？”这是我在他家西跨院住时用的代名。他听了心头一惊，但立即又镇静起来，仰脸佯装忘了，陷入冥思。想了一会儿，仿佛有了点印象，便故作游移地反问法官说：“你是否问的是在我家西跨院住过的那个姓郭的？”

“你装什么糊涂！”法官勃然大怒，“你把他介绍到那里住，你能不摸他的底？郭惠民就是王希峨。时而姓郭，时而姓王，时而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忽焉为人，忽焉为鬼；变幻莫测，行踪诡秘，这正是共匪潜伏的鬼把戏。‘不知其人视其友’。你还假装糊涂，为他隐讳？‘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你不

吐露真情，我便要叫刑罚来和你说话。”

胡嘬嘴吊腮跌足长叹，知道了法官的问话有根有据，只得用一句老话来搪塞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山知水不知深’。我和他认得，给他介绍住房，但他的底细我不摸。他要是‘奸匪’，他能告诉我说？他脸上又没有刺下字，我……”

“住嘴！”

法官打断了胡的辩解，几个带匣枪的人已经把他包围起来。接着就一阵挥拳扬脚，在他浑身上下动武，踢打得他鼻青脸肿，顺口流血，腰痛腿疼，无法自立。使他的赳赳雄姿一下子瘫软在地。法官还想“趁热打铁”，只在撕破喉咙、发狂似的高喊：“你说实话不说，你说实话不说？”

“我说的都是实话。”胡呻吟着轻声回答。

法庭在苛酷的气氛中寂静了一会儿，胡万杰只听见说：“把他押下去！叫他想想。”

于是，几个带匣枪的人把他拖起来，又押回了木笼。

时日匆匆，春去夏来。一晃就是两个多月过去了。由于狱中的卫生条件恶劣，饮食不佳，把志新的襁褓之子弄得每天只是呱呱乱哭。肌皮黄瘦，骨骼嶙嶙。大人吃不上饱饭，小孩哪有奶吃。干吮乳穗，“望梅焉能止渴”；空口哄恣，“画饼何以充饥”。加上屋内潮湿、闷热，入狱不久，大人、小孩都浑身长了疥疮，把人痒得钻心、刺骨。这时小孩又并发了猩红热，发高烧，昏昏迷迷，不睁眼睛。有些好心的看守都过意不去，便去外面给请医生，而岗哨警卫又不准医生进来，真是“见死不救”。所以国民党的监狱犯人是很难当的。而且特务头子还异想天开，玩了一个诱降花招。有一天下午竟把留在家中无依无靠的三个小孩领进监狱，说是叫他们来见见爸爸妈妈。实际他们是想使胡、郭怜悯

小孩的处境而成招。看守把他们先领至向新、志新处。小孩们站在木栅外边，通过木栅缝隙看见母亲们象浑身长癞而羸瘦的家畜一样困圈在栏木之内。哇的一声三人都是泪流满面，怔怔地说不出一句话来。向新、志新也是通过木栅缝看见三个小孩，衣服褴褛，头上在丛丛毛发上爬满了虱子和虻子。脚上穿的鞋都是蛤蟆大张嘴，脚趾头露出在外边。六岁的女孩脸上长满了疮疤。真是惨不忍睹。连同笼内的其他女犯也掉了泪。但一闪三个小孩就被看守带走了。

到了老胡处，三个小孩又是哭。老胡很沉着地告诫他们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嘛！你们别着急，爸爸、妈妈不是都很好吗？

“小平！你是大孩子（十三岁），我们不在，你就把家管起来。要有志气，在家带好妹妹；在校好好学习。要学点本领，长大了才好在社会上立足，为国家民族争光。……”

老胡的“义方”未完，三个孩子又被看守胁迫而去。

坏事变成好事，他们本是用此招而意在软化胡、郭，岂知胡、郭等人是钢铁铸成的，致使他们枉费心机。而我们倒是因为小孩们去过以后，了解到严密封锁，滴水难渗的监狱里的情况，才托万杰同志的好学友汤律师到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找曲星耀处长说项，使志新同志得抱小孩在监外就医。找到两个铺保，保证随传随到。

志新同志出来后，我们又得知了万杰和向新在狱的情况，掌握到他俩都未暴露政治面貌，便托地下军保五团副团长朱广仁同志去找曲星耀商议，由朋友（组织的代号）出钱往外赎他们。言定十两黄金就要成交，可是情况突然变了。

叛徒对质

还要从马怀模身上说起。马怀模于一九四四年秋后到静宜女中任体育教员，本是胡万杰同志的介绍。马到静宜女中后，同年冬天，在那里吸收了三个女生为党员。其中有个名叫高玉温的，是高校长的孙女，称胡万杰为表叔。她本是伪庞炳勋部副官牛斐文的朋友，伪装进步混入党内。日本投降后，我军因改变战略未进开封，高玉温眼光如豆，一看在开封，共产党敌不过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厉害，因而就一头栽到牛斐文的怀里，和他卿卿我我，弄得火热。牛本是个军统特务。开封工委为了防止破坏，获悉高、牛关系后，早已采取措施，停止了高玉温的党籍，不和她往来。骗她说：“上边一直没来人。”但已经晚了。凭她已经所掌握到的组织情况，也足可破坏一气。她既然和牛副官是那样一种关系，不消说，他们是无话不谈的了。高玉温早把她所知道的党的地下党员及后者所常往来的人泄露给牛斐文，牛再加油添醋地转报调统室。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期反复审胡不招的情况下，调统室就派使牛斐文把高玉温假逮捕，押解她至司令部看守所，把她塞进向新所住的那间木笼内。向新对高的情况知之甚稔，所以她一进来，向新就存了戒心。可是高受了特务的委托和教唆，假惺惺地向向新接近并献殷勤。经常大婶长、大婶短的，叫着说着，总想从向新嘴里掏些有分量的话出来。可是向新本着胡的教导，只说自己平日在家整日昏昏搞家务，别的什么也不知。使高玉温光着急摸不着底细。牛斐文常给高玉温送些好饭好菜，每次她都要分向新一杯羹，可是每次都被向新婉言拒绝。高玉温真是心劳日拙，无计可施。而保安司令部则一计不成，又来

一计。有一次夜间审问，审不下来，就叫高玉温来当庭作证。

两人站在相邻的被告席上。法官问高：“胡万杰是不是共产党？”

高先掩面大哭一场，然后就哽哽咽咽地说她自己年幼无知，上了马怀模这个大坏蛋的当。……”

法官吼了她一声，打断了她的自我检查。吩咐她：“你的事情先不说！问你什么说什么。先把胡万杰的事情弄清楚。”

于是她从旗袍的钮扣上抽出一方花手绢，把眼泪一擦，转向胡万杰。正色说：“表叔！实说吧！弄到这一步，还有啥可隐瞒的。你是聪明人，还不比我懂事。你自己说，就用不着我揭露了。咱们是至亲，我还不知道给你保存面子。”

高玉温的劝降话未完，法官和陪审员们早已厉声呵斥老胡：“你说不说？不说，你表侄女可就要兜你的底了！”

老胡这时反而非常镇静，淡淡地说：“应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法官一看他的态度仍然如此顽抗，便怂恿高说。高便如“竹筒倒豆”，罄其所有，一股脑儿说出了有关表叔的一联串的要害问题。她说：

“马怀模和你非亲非友，你怎么认识他的？还把他介绍到我们学校来教书。这个问题你必须交待清楚。郭惠民是你的什么人？你怎么于日本投降后从水车胡同把他送走，不知道他上哪里转了一圈，于去年春天重返开封后，你不仅把他留宿你家，还介绍他和你一起到豫中中学教了一段书。他在你的新宅西跨院住，还不也是你安排的。王希霞的的确确就是郭惠民的代号。他和你如此密切，你能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表叔！你怎么聪明人尽做糊涂事？郭惠民是用什么迷魂阵把你迷住的？我是你的表侄女，不愿意叫你为别人受连累，你拖家

带口在这里，不考虑你自己。

高玉温说到这里竟两泪涟涟，哽咽

得泣不成声了。

万杰同志早已怒目圆睁，咬牙切齿，立即
的谆谆教导：“党内就怕出叛徒和混入奸细。现在
叫我遇上了。”但他没有悲观，没有气馁，立即又想到党
另一番教导：“法庭上，刑场上，和敌人搏斗的关键时刻，才
考验一个党员的试金石。现在问题是暴露了，满身是嘴也说不
清，只有硬着头皮顶。”

“胡万杰！”法官把胡的沉思打断说：“高玉温是你的表侄
女，她还止不住替你心酸。事情已经摆明了。你是否共产党我们
先不问，你就把郭惠民搬到什么地方了，供出来，我们只要因你
供出而找到郭惠民，就没有你的事了。你实说吧！不说我们也会
查出来，不过那你就失去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是明白人，愿
不愿意立这个功？”

“我真不知道他搬什么地方去了。”

“你不知道我们告诉你，这可就不算是你交待的了。”

胡不语。

法官又说：“玉隍庙街二号，对不对？”

胡万杰一怔。心想：“他们知道得这样清。”但默不作声。

高玉温竟破涕为笑了。

接着法官勃然大怒，叫胡交待他自己的问题，问他何时加入
共产党？在里面担任什么职务？

胡一口咬定：“我是当律师的，不问政治。”

法官再问，他只是不吭。把法官气得无法，厉声喊“拿皮鞭
问他！”

于是看守们把皮鞭抡起在万杰同志身上一阵乱打，万杰同志的脸和手上，立即画上了道道鞭痕。万杰同志还是只怒不言。法官只得宣布退庭，“叫他下去好好想想”。

万杰同志回到木笼之后，考虑到自己难免一死，但死也得死个明白，不能默默不响，引颈就戮。遂撒谎向看守提出，他要交待问题，需要纸墨笔砚。看守信以为真，便禀明所长，给胡拿来“文房四宝”。胡一一接住，即开始磨墨膏笔，蹲在炕前，以炕为桌，给刘茂恩写起《万言书》来了。

他写的题目是《辩冤与进言》。内容大略如下：

第一点，他申述自己并非共产党，他和郭惠民是朋友，是在日伪时期因同在伪财政界糊口而认识的。日本投降以后，因郭要回林县原籍是从他那里走的。翌年返汴，他把他介绍到豫中中学教书，住在他家西跨院，这都是事实；但他是否共产党他不知道。他从他那里搬到玉皇庙街去，法官说了他也想起来了。但是否现在还在那里，委实不知。

第二点，他写道：“法庭和警察总想给我戴上红帽子，我自惭名不副实。不过，人非木石，孰能无情。蒿目时艰，遍地干戈。谁是谁非，自有公论。我觉着共产党的主张，很符合总理的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国民党反把他们忘光了。……”

第三点，他写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并说各种社会现在有的正在繁盛，有的崭露头角，有的踪迹可寻……

第四点，他写道：“螳臂不能当车，愚人何必枉费心机。……”

第五点，他沉痛地回顾了二十年来的“剿共”历史。当局所用心机，所花气力，所耗国币，所使手段，真可谓毒、辣、多、

巧，但共产党反而越“剿”越多，越战越强。……他在这段最后说：“当局宜猛醒！”

第六点，他激昂地指出：“河南为四战之地。民国以来，所有大战，差不多都经过这里。出兵出粮最多，民不聊生。又经八年抗战，疮痍满目。现又大举征兵征粮，以应同室操戈之需。中央不顾地方，引起参议会之争吵，你为豫人，作何感想？”……

第七点，他痛心指出：“保安司令部在押犯人，有军官，有学者，有教授，有公务员，甚至株连亲友，有的还全家入狱。我考察这些人，也不过是说了一些公道话。不偏不倚则谓之左。岂非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第八点，根据上述，他请求省主席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使他们获得自由，贡献力量，振兴中华……

洋洋万言，一挥而就。遂递交看守呈上。上款写：刘茂恩主席明鉴；下款写：某号木笼犯人胡万杰谨上。这就是有名的《万言书》（胡律师狱中上书）

宁死不屈

刘茂恩接到万言书后，还只以为是政治犯的悔过书，喜孜孜急忙展阅。书未卒读，肝火早已上升，只见他怒目圆睁，嘴唇高噘，啪的一声把书扔在案上，抄起朱笔颤颤抖抖地在卷首批示：“该犯斗胆包天，公然为匪张目，只有格杀，方可明正典刑。但为扩大战果，在行刑前，需先挖材料。切切，此批。”

再说，军法处把胡万杰同志的《万言书》呈给刘茂恩后，即本着马怀模的供述，派人到玉隍庙街二号去探迹郭惠民。他们派人去找见房东，查询郭惠民的情况。房东据实以告：“是有这么一

户在这里住过”。并把我的特征、相貌、年龄，家有几口人等情况，做了详细的供述。但最后告诉他们说：“他只是四月份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到五月就搬走了。”

“搬哪儿去了？”

“不知道。”

这时来人（刑警队的便衣）蓦地想起他们过去破案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总是从附近的洋车伕口里找线索，而且屡试不爽。便问房东“郭惠民搬家是怎样走的？使用的什么交通工具？”

房东仰脸想了一会儿，突然惊讶地说：“他是汽车搬走的。”

“汽车？——大汽车、小汽车？”

“是一辆大卡车，驾驶室的外壳上，漆的‘联合国救济总署河南省分署’的白字。”

“车的牌号？”

“哦！那可没注意。”

刑警队的人傻眼了。他们离开这里又慌慌张张跑到自由路西口救济分署车队去问，人家说：“三、四百辆汽车，不知道牌号叫我们去问谁？”

他们只得快快而返。

曲处长接到刘茂恩的批示后，还寄希望于刑警队到玉隆庙街对郭惠民的侦察。可是好容易“望眼欲穿”地等他们回来了，才知道等到空地了。正在夜间，曲处长一急，便连夜提审胡万杰。

曲处长本着刘茂恩的批示，高居庭上，陪审员们左右坐定，书记官们分坐两旁，傍桌执笔准备记录，法庭内刀光剑影在电灯照耀下闪闪发亮。万杰同志从容不迫地站在被告席上。这是

曲星耀对胡案的第一次亲自出马，所以阵容整齐，威仪森严。

曲星耀照例询问了胡万杰同志“验明正身”的一类套话后，接着就厉声问：

“胡万杰！你愿死愿活？”

胡不吭。

“如果你愿意活，你就放老实一点。你说你给刘主席上的那封书，除了说明你是共产党外，还能说明什么？”他稍停，又说：“刘主席本来批示立即正法，不过，我觉得你是误入歧途；只要能老实交待，便可立功赎罪；否则，‘军中无戏言’，我只有照命令行事。何去何从，任你选择。”

万杰同志想：“对牛不能弹琴，我一片赤忱为国家民族，忠心耿耿想消弭战祸，竟凭空把我说成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你并未抓住我的证据。可是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宁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的。我承认也是死，不承认也是死。‘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想到这里，他便下了决心，“与其不明不暗的死，倒不如仗义直言地死。”他眼睛一瞪，眉头一扬，当场纵声演说起来了。他首先声称：“我就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这是光荣，不是耻辱。……”这一开门见山，直言不讳，审判长们精神准备不够，突然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老胡一看如此情景，便破口大骂国民党引狼入室，先是勾引日本侵略中国，现在又请来美国帮凶内乱。光顾自己少数巨头作威作福，不管灾民嗷嗷，死亡遍野，而共……”

老胡的话未说完，曲星耀已经清醒过来，便大喝一声，打断了胡的演说。命令特务营的兵士“将该犯拉下去装麻袋送西南城坡。”环列的武装警卫人员便一拥而上，把老胡揪住往外拖。曲星耀又补充一句，叱给警卫人员“连他老婆一起！”

老胡大喊“共产党万岁！”

当夜，从看守所的后门拉出去一辆特制的架子车，车上摆着两条鼓囊囊的撮口麻袋。武装警卫前导后拥，向西，向南，迤迤而行。北风呼啸，繁星在天，麻袋里频频交替发出一男一女高亢傲岸的叫骂声。这就是我们开封工委领导下的胡万杰和郭向新同志的最后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抗，生命不息，战斗不已。

他俩就这样被拉到西南城坡掘坑活埋了。

全国解放后，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原组织负责人之申请，颁发给其遗属第六号《革命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文（原为竖排）如下：

“优抚

查胡万杰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其光荣事迹永为世人所敬，其家属永为社会上尊敬。除依《华北区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条例》发给家属恤金外，另发此证，以资证明。

主席 董必武

薄一波

蓝公武

杨秀峰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

（骑年压月盖有‘关防’）”

烈士原籍安次县人民政府亦于同时给家属发了烈士证。现今开封市民政局为了纪念胡万杰和郭向新两烈士，已将他们的英雄遗像和光荣事迹展现在烈士陵园陈列馆。开封党史上将胡万杰同志的烈士大书一笔。我为原开封工委领导人，对此二同志的悲壮牺牲，感激涕零，对他们的不畏强暴，舍己为革命的精神，钦佩之至。特撰此文，以旌英烈。

第十二篇 一支地下军

地下军的来历及其组成部分

这支地下军，主要活动的历史阶段，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要想知道它的来历，就不得不翻一下抗日战争的历史。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东南重镇徐州，经过台儿庄的激战，于五月二十日陷入敌手。日军乘胜西侵，席卷豫东陇海路沿线。虽有国民党放黄上阵，波浪滔天，一漫无际，使下游二十二县变为“泽国”，淹没了八十九万同胞的生命财产，也没有阻住日军的西进。到六月六日，离徐州陷落仅十余日，日寇的铁蹄便踏入了我国六大文化古城之一、当时是河南省会的开封。

不过，日寇侵华规律，一般是先占领铁路沿线，然后再祸及偏僻乡村。这在豫东也不例外。何况那时它的主要兵力是进攻武汉，所以豫东的乡村，这时就陷入了群雄并起，萑苻遍地，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各县民众纷起自卫，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些保家卫国的民众武装团体。在兰封（现名兰考），有张公安砦一带的张绍儒一股，由一、二十人发展至一千多人；有以戴庄为中心的戴瑞华一股，由四、五十人发展至八、九十人；在民

权，有在野鸡岗车站附近一带活动的元惠卿（元洪恩）一股，约二、三十人；有以朱庄砦为中心的朱广仁一股，约六、七十人。他们的枪支来源有三：一、地方上原来就有些枪；二、收缴的国军溃退时散兵游勇的枪；三、打日本缴获的枪。所以每人都有枪，少数人还是双枪（一长一短），还有少数轻重机枪。后来，经过日本的威逼、利诱，我自卫团乘机打入。日人不知，即以这些自卫武装力量为基础，组成了兰封、民权两县的伪警备队。从一九四三年起，通过我们在伪中华通讯社开封分社的地下关系和民权的朱广仁挂上了钩，因而使这些伪军逐渐变成了我地下军。象耍魔术一样，使他们由黑变白，又由白变红，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庞炳勋以伪和平救国军第五方面军的番号，摇身一变而成了国军的第一路军，便招兵买马，大肆扩充。命令以张绍儒（兰封县伪警备队长）和朱广仁（民权县伪警备队长）为首，集合兰封、考城、民权、陈留和开封等五县的伪警备队，成立隶属于第一路军四十八军的十六师。但陈留和考城的没有来，开封出了一个营。主要是兰封和民权两县。兰封县和开封县合组了两个团，民权县一个团。这样，一个师的架子就起来了。三个团共有三千余人，枪支齐全。张绍儒被任命为少将师长，朱广仁为上校副师长。这三个团分驻在兰封、民权两县。还有骑兵连百余人、手枪连百余人，都直属师部。师部驻在兰封城内。

同年十一月，国民党从河西过来已站住了脚，队伍也逐渐增多，于是就正式着手整编伪军。十六师明令改归地方，番号是河南省保安司令部第三旅，命令他们一起集中到民权整编。旅部驻到了民权东北吕园村。张绍儒等不服，遂和我地下关系密议，想起义，成立豫东铁道游击队，还在这一带活动，但归我军指挥。议

论未定，我已到达。

一九四六年元月，我被晋冀鲁豫中央局国军工作部（后改为城市工作部）任命为中共陇海线特派员，到白区整顿组织，准备建立工委。我元月二十日来到开封，不久，便由张以诚同志来领我去和张绍儒等见面。

那天一早，我由张以诚同志陪同，从开封乘火车到了民权车站，张绍儒、朱广仁、曾洁光等同志，早在车站候迎。我们乘马到达吕园，这是一座大地主庄园。在庄园的主宅客厅内，我们稍事休息、盥洗、茶叙。午餐后，我问他们：“环境如何？”他们说：“没事，这里都是自己的势力。”借着茗烟助兴，我给他们谈了政治形势，说明了我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要他们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接受严峻考验。他们向我汇报了部队的编制、人数、装备、士兵素质、训练和干部状况等，最后讨论了他们今后的出路问题。经分析研究，这一带国军很多，有驻陇海线（开封——徐州间）的交通警备一纵队和邱清泉的新编第五军。共合四、五万人，一律美式装备，再加上刘汝明和张岚峰部以及刘茂恩的保安旅团和地方团队不下三十万人。针对这种情况，如果起义之后仍然在这一带活动，以我们三千之众对敌之三十万大军，以我之窳劣武器对敌之美式装备，估计立脚困难。纵然北面有冀鲁豫军区的五分区，南面有第六军分区（在豫皖苏军区成立以前，后来的豫皖苏一分区，这时为冀鲁豫的第六军分区），但这两个分区和保三旅防地之间，都属于白区或游击区，因此不能存依赖心理。如果讨上“国军”封号，隐藏在它内部作我地下军较为有利。议定之后，我便于次日离开这里。不久，我回到邯郸向中央局城工部作了汇报，城工部采纳了我对三旅的安排意见，并正式决定建立开封工委（中共开封市工

作委员会)，指定我为书记。开封工委兼管其他河南蒋管区工作（原来打算命名为陇海工委）。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工作和战斗的考验，我们先后批准和呈请城工部批准了张绍儒、朱广仁、亓惠卿、朱广祺、毛秀峰、戴瑞华（戴兆民）和李志（常义成）等同志入党，并在那里建立了党支部，指定曹培慧（曾洁光）同志任支部书记。随后又派原在伪绥靖委员会当过执法兵的胡伯虞进去当机要员。

在我离开吕园不久，刘茂恩便借国共谈判喊出裁军口号，把保三旅改编为第五总队（从一九四六年六月起，总队的名称均改团），开到兰封城外整编。整编结果，因人数过多，遂把徐守真的第一团改编为兰封县保安团，其余共缩编为一个团。这就是保五团的由来。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即三个营：第一营营长为张腾骧，第二营营长为朱广祺，第三营营长为高鹏云。戴瑞华在一营当了第一连连长。亓惠卿在二营当了第六连连长。团为“三三制”，其武器装备是：一、四、七连，装备较好，除步枪外都配有轻机枪，每连六挺；二、五、八连是除步枪外都配有掷弹筒；三、六、九连全系步枪。此外，团部有一特务连，除配六挺轻机枪外，余均为匣枪。故亦名手枪连。

可是，五团在兰封编好后，即奉命开到铁路南、杞（县）北黑木集和附烟镇一带。刘茂恩司令派了一名中校团副，一名中校指导员，一名上尉指导员，来开辟五团的政训工作。确定张绍儒为上校团长，朱广仁为少校团副。很显然，刘茂恩抓住五团是为了叫它在这里对付第六军分区。他除了在团里配备党、政、军领导外，凡王东斗（团副）和杨继宽（中校指导员）等能掌握的营、连，都重新配备。以一营三连为例，光这一个连就配了四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人称机炮连。当时我们军队中有一首流行歌

谣。

“运输队长蒋介石，
工作热情又积极。
一天到晚出主意，
送给咱们好武器。
排成队伍一二一，
一齐送到解放区。
陈诚负责办手续，
实报实情白崇禧。
你有美国大老板，
给你枪炮和金钱。
甘作儿子不要脸，
出卖民族罪滔天。
送来收下不客气，
咱们还缺好武器。
只要老蒋你愿意，
再送多少也可以。”

地下军的主要功绩

要公允地评价“五团”功绩，必须清楚认识它所处的环境。

“豫皖苏边区与各解放区均不连属，敌我斗争又甚为剧烈。从抗日战争时起，到解放战争的反攻阶段止，全区没有任何一块中心地区是敌人所不能到的，完全没有后方的依托。……

“豫皖苏边区在优势敌人的长期包围下，斗争非常尖锐，干

部、积极分子经常遭到敌人残酷的屠杀。……边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人民用自己的鲜血灌溉出来的！”

（引自人民出版社出版齐武编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八页）

五团一到杞北，绍儒同志便和几个心腹“约法三章”。即：“对新四军远打近不打（两军发生遭遇时，远在射程以外者，打；近在射程以内者，不打）；不穷追；不抓俘虏。”

这时，我们开封工委已经正式建立，曹培慧和张以诚两同志到第六军分区去了一趟，和分区首长接谈了一下，由他们介绍，又和驻在通许的新四军三十团（原“水东独立团”）接上了关系。接着，他们回到五团防地后，和五团所在地附近的我解放区克威县负责同志及有关区长等也取得了联系。尔后，三十团和军分区还派干部（如张均和李树楷等）安插在五团一连和六连当兵做地下工作，并指定三十团组织股长袁立荣同志专管和五团联系。从此开辟了我军在第六军分区地上和地下“里应外合”的对敌斗争局面。

五团驻扎杞北不久，便遇到全副美式装备的新编第五军邱清泉部挟其优势兵力，沿开封以东的陇海线向南推进。坦克成群，汽车载的榴弹炮也不少，还有飞机编队、侦察、助战，在我第六军分区反复骚扰。五团总是通过我地下人员，随时把国军的战略部署、行动计划，及时地报告给我军和军分区。有一次，还把第五军的密电码（朱广仁同志在开封弄到的）弄到手，送给第六军分区。因此，我军每次都能不失时机地避实就虚，并相机、伺隙打击敌人。

一九四六年秋后，守备陇海路开徐段的国军交警一纵队，其装备和人数都和第五军差不多。由其纵队司令张绩武亲自率领，

从陈留出动，配合第五军对豫皖苏进行围剿，把我军区直属队（豫皖苏军区正式成立是一九四七年元月，但这时已有了工作班子）和独立旅（由三十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合编而成）一起堵在杞县西北一带，张均同志星夜到军区秘密送信说，要他们一起从五团防地逃走。五团当时被指定守黑木至白丘一线，刘茂恩命令他们绝对不许放走一个“敌人”，违者斩。我军得信后，一夜间便通过五团防地，转至外线。天将亮时，五团才一面报告保安司令部及“友军”，一面拉开战线朝我军去的方向，空鸣了一阵激烈的枪炮。省府得悉，问罪五团。张团长说：“人家是大部队，我团拼全力阻击，伤亡惨重，抵抗不住。”无奈何，交警一纵和第五军只得动员他们的所有力量，使用他们的最新装备，加上几架飞机侦察和轰炸，整整追赶了一天，把杞县至通许县一带弄得象火药库爆炸了一样，炮声震天，尘烟弥漫，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

五团对此役“失败”，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请求上峰予以补充兵员和弹药的损失。刘茂恩无法，只得忍痛照办。

在这以后不久，刘汝明部一八一旅刘明德团，又从开封开到“水东”去送死，被五团事先得知密告军分区，我军便把队伍埋伏在陈留境内刘团必经的路侧，于是刘团中伏被歼。

一九四六年冬，五团奉令开往陈留，在陈留担任城防。到年底奉令攻通许。当时通许县城为我新四军所占。五团派一营导前，从陈留向通许进发。当五团开到范村时，即命令一营前进至万龙岗。企图先占领通许的公路，然后再和新四军联系。驻在通许的三十团不知来的是哪一部分，当一营摸黑进村后，三十团便把他们包围，并猛烈攻击。一营也不知是被哪一部分队伍包围了，于是双方整整打了一夜。天亮后派人喊话并联系，才知道都是自

己人误会了。互相商议的结果，决定叫五团向东去绕弯儿，给新四军以时间。新四军撤出后，五团再拐回来进城。

事情就照这样办了。但五团进入通许城没几天，刘茂恩就派保二团来接防，命令五团仍回陈留。回到陈留不久，刘茂恩又派保一团来接防，五团则奉令进驻杞县城。

五团一到杞县城内，已经有“谣言”说他们和新四军有勾结。为了攻破这种“谣言”，五团便与三十团定下一计。由五团给军分区送子弹，每一汽马车可装四千发，即四十箱，每箱一百发。子弹来源，有的是从一八一旅买的由军分区出钱，五团经手，有的是五团自己节约的。然后由三十团向五团围攻；每晚在杞县城周围，用五团送来的子弹，拿一些向杞县城打枪。五团也在城头往外放空枪，以欺骗刘茂恩及地方绅士；并向刘茂恩告急，请他补充弹药。然后又把补充来的弹药，再送给新四军。如此反复送、“打”，还动员了伪县长向上告急，使“谣言”暂告平息。

但是，过了一个时期，谣言又出来了。说五团被新四军打得不敢出城。“这样，四下不来给养，光靠城里供给，供应不起。”于是绍儒同志便征求绅士们意见，绅士们建议去攻段庄（杞县城东南五里地一个村庄，是新四军根据地）。绍儒同志佯装“从谏如流”，也来不及和新四军打招呼，当夜出发，派一连出击，迫击炮掩护。但命令迫击炮少装药包（“八二”迫击炮最多可装六个药包），往近处打，只让段庄听见炮响即可（听见了，他们好逃跑）。可是迫击炮斜度不够，打得太近了，一连刚出城，炮弹就落在了他们部队的前面，差点把带队领头的连长戴瑞华同志炸死，幸而那颗炮弹没有炸。士兵们都说，“连长命大”。

队伍继续向段庄前进，但离村老远，戴连长就命令号兵吹起

冲锋号。于是“达达达迪”急促而宏亮的冲锋号一响，段庄的新四军早“备战”了。一连进村转了一圈，连人影也没看见，又到村外放了一阵空枪，便回营缴令，说把新四军打跑了。张绍儒同志表扬了一连，并给刘茂恩报了捷。绅士们都说：“五团敢出城打新四军了。”过了一段时间，绅士们又有了意见，说五团出发太少。张绍儒同志便又心生一计，派一连出发，到北乡胡乱抓来一些保、甲长，说他们通共，和新四军有勾结。这一来，绅士们慌了，纷纷到团部来保，正中张绍儒的计。张虽然把人放了，可是他反过来又倒打了他们一把，说：“看！你们又叫放了。”外面形势依然紧张。新四军连续进攻乡、镇保安队，县团不敢出去，五团坐镇城内也坐视不救，乡、镇保安队都惶恐不安，便纷纷撤来城里。一个镇（包括乡）有三百多条枪。六个镇的保安队加上县团，不下两千支枪。这两千口子人加五团一千多人统统住在城内，城内如何受得了？少不得就要四出催粮要草，抓丁抓伕，使民众备受骚扰，家破人亡。我军为了除暴安良，就决心攻下杞县“聚而歼之”。消灭地方团队，但要保存五团。计议已定，事不宜迟。这时，已经担任了一分区（原冀鲁豫第六分区，现改为豫皖苏一分区）情报处副主任的袁立荣同志，星夜来城传达军区打杞县的指示，张绍儒同志和我地下工作人员一致表示拥护。即派亓惠卿同志陪袁一起，出北门和我独立旅旅长金少山同志接头并汇报城内情况。金指示里应外合，立即行动。亓、袁回到城里，当晚独立旅便把杞县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起来。绍儒同志按军区计划指示：一连、二连都在东门里向空激烈鸣枪，表示抵抗并制造紧张空气；同时就命令副官主任毛秀峰同志站在电话机旁不停地向刘茂恩告急。绍儒同志还亲自吓唬伪县长说：

“‘敌军’厉害，守不住呀！怎么办？”当时和独立旅约定以炮为

号。第一声炮，一连、二连都从东门里往北门撤，新四军便乘虚进东门。张团长听见第一炮响后，便把事先封好准备送给新四军的一部分武器弹药撤下，拉上伪县长（好叫他给省府为五团说些好话），领上团部及二营（四连、五连）就出北门走了。新四军以为应该走的都走了，所以当一营营长领着一连、二连出北门时，新四军已经从北门攻上来了。营长一见路堵了，便叫二连冲。二连冲了一阵冲不出去，伤亡了一些人，于是退了回来。戴瑞华认为这是假冲突，因为他知道事先联系过，便自告奋勇拉上营长领着一连冲，没想到新四军是真打不是假打，火力很强，致使尾随戴连长的二排长挂了彩。因为双方联系只有少数人清楚，下级军官和士兵是不能告知的。幸而戴瑞华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无意中遇上新四军主攻北门的一个班长，是早日由一连起义过去的，遂给他们“开了绿灯”。二连如果衔尾而过，也可以过去，可是他们没有。因第一次冲而未过，赌人折兵，终于泄了气。一动摇，新四军攻了上来，把路已经堵死。他们在无可奈何中才又突围，可是已经晚了。结果一连人伤亡殆尽，连长也挂了彩。三连机炮连是刘茂恩的嫡系，原计划就是牺牲它，它就牺牲在南门里。三营也是刘茂恩的嫡系，所以它和三连在南门里的命运一样，全营牺牲在西门里。惟高营长死里逃生，但受伤很重。

为了掩盖县保安团队和刘茂恩派在五团的“心腹”的耳目，绍儒同志按计划命令六连殿后，袁立荣同志也在六连。直到新四军进城之后，混战厮杀，元和袁才率领六连全体指战员，由西北城角的隧道钻出城外。

团部领兵马退到黑木集一带，向保安司令部谎报事情经过及损失情况，县团及镇、乡保安团队两千人枪全部覆没等情。

刘茂恩获悉大怒，立即把王东斗叫去训斥并免职，派李立明

接替他的团副职务。把已经身负重伤，成了残废的高鹏云也撤换，派韩天庆来接了他的工作。重新拨人枪把三营和三连恢复，一律美式装备。补充配备完毕后，刘茂恩即命令五团收复杞县。于是五团通过我地下同志和新四军联系，新四军退出，五团便又开进了杞县城。

一九四六年冬，蒋介石唆使王敬久部，向鲁西南集中大量军队，有整编七十师、八十八师、六十八师、五十五师及伪第四纵队张岚峰部，还拼调了一些保安部队，其中就有保五团二营到单县去增援张岚峰。共约十万余众，大部系美式装备，企图强行通过我冀鲁豫区向北推进。配合从林县出发的王仲廉部，迂回打到邢台，和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会师。绍儒同志惊悉后，除密令二营到单县相机行事，伺隙逃回外，又急派随从副官张万一同志（原系冀鲁豫派在五团做联络工作的）急速到冀鲁豫去报告。走到考城，在北门外被张盛泰（县保安团长）的人抓住，认定是“共匪探子”，禀报张盛泰，遂将万一同志活埋了。

万一同志走后一天多没信儿，绍儒同志放心不下，便派人到考城了解，始知前情。绍儒同志十分气愤，即派人去向张盛泰交涉，说：“我派人到‘匪区’侦察情况，怎么误会为‘共匪’？”非向张盛泰要万一同志的尸体不可，还要张盛泰偿命。结果，张盛泰只得把尸体挖出交还并赔情道歉。绍儒同志抚尸大哭，在场者都落了眼泪。绍儒同志命令买棺厚葬，还开了追悼会。

一九四七年六月，武器精良（五团看了人人羡慕。如人家的重机枪是风冷却，五团的重机枪是水冷却）的保六团路过杞县五团防地，向我根据地睢县进犯，五团便暗地急告分区，我军在睢县布置了伏兵，致使六团到即中伏，全团覆没，团长杨英凯被俘。

同年八月，我刘邓大军越陇海路南下，刘茂恩命令五团配合

“国军”到陈留东面的韩岗集截击大军。绍儒同志留下早已从单县逃回的二营守杞县，由曾洁光和朱广祺同志负责。团部带领一、三两营去应付差使。命令一营先行，到韩岗集去做工事。绍儒同志秘密嘱咐几个心腹干部说：“工事不妨尽量做好点，但不守。刘邓大军在远处时，可激烈打枪；一俟他们来到近边，则停止射击，立即撤退。”

刘邓大军是从韩岗集的东北方来的。一营依令而行，一阵空枪放过之后，营长留一连殿后，便率领二、三两连撤回寨里。刘邓大军立即占领了五团前沿工事，并从东、北、南三面包围了韩岗。

张绍儒按预定计划即欲撤退，已经整装待发。正在这时，突然接到刘茂恩电话，命令五团死守阵地，不得退后一步，违者就地枪决。绍儒同志无法，只得佯装遵命，扬言死守并准备牺牲。可是李立明和杨继宽等对我大军怕得要死，早已闻风丧胆，遂不顾刘茂恩的命令，强拉硬扯把绍儒同志架上，不管他如何表示拒绝（当然他只是假拒绝），除留下三营当殿军外，团部和一营的二、三连（这时他们刚好撤退回来）便从西门溜走了。他们刚走，一连也撤了回来。三营长韩天庆正在害怕当俘虏，一眼看见戴瑞华领着一连来到，便佯装大怒，用手枪对准戴的脑袋，说：“司令部命令死守，你自动放弃阵地，该当何罪？吃我一枪！”戴说：“报告营长！我是奉命转移，不是自动放弃阵地。”于是韩天庆尴尬地收回手枪说：“好。既然是奉命转移，恕你无罪。那你连后卫，我营先走。”说罢便领着三营仓皇而去。

这时团部已撤至开封县老虎庄。戴瑞华领一连来到团部见了张绍儒大哭一场，气恼地说：“我要及时起义，再不受这两面夹攻了。”并埋怨绍儒同志情况变化时没通知他。绍儒同志给予好

言抚慰；并说派魏玉琨去通知他时，到北门就被大军打了回来，还伤了腿，因而未去成。

刘邓大军行动神速，不久便打到杞县城。守在杞县城的二营，连曾洁光同志在内，都没来得及和大军联系。虽然他们在城内大开西门，迎接大军，而大军并不管这些，因为这是到了敌区。大军猛烈地打了进来，二营官兵牺牲殆尽。广祺挂了彩，洁光同志也差点被打死。真是“大雨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

刘邓大军到了通许，驻在通许的保二团和县保安团队即全被消灭。唯有二团团长江本林躲藏起来，一时没抓住。后被袁立荣和亓惠卿两同志骑马进城找见，交给刘邓大军十四师枪毙了。

刘邓大军过后，五团正在老虎庄补充、训练，刘茂恩命令它抽出一营去陈留增援保一团。一营奉命前往，一团却不让他们进城，叫他们驻南关作外围。一营只好驻南关，叫一连去驻在小土砦村（南关外向东一里多路），作外围的外围。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这样巧妙：“何祸非福，何吉非凶。谁达此观？丧马之翁。”（白居易《无可奈何歌》）一团想害一营，它哪里晓得这是一支地下军的组成部分。驻在城外，更便利了它和“地上”的联系。于是我们便和军区合谋消灭一团和县团。

已是秋末冬初时节，我和张绍儒、亓惠卿等同志到陈留。我的具体任务是说服侯殿卿（县保安团长）守中立。我们三人一起先到一营，然后绍儒同志领我进城，约好和侯殿卿在澡堂见面。我们到澡堂时，侯殿卿已先一步在那里等我。我们来到澡堂密室坐定后，我给他谈了解放战争形势，劝他勿与新四军对抗，不可杀害共产党。他向我作了保证，但要求以后给他一个出路。末了，我仍由高楼（村名，在老虎庄附近，这里设有五团秘密招待所）

回到了开封。

绍儒和惠卿两同志留在那里，先找见吴茂亭(一团团长)，诈称关心他的城防，提出想看看他的城防工事。他为了显示他的城防坚固，表示十分欢迎，当即领他俩登上城头绕城一周，处处给他俩指点城防工事并汇报城防情况。侦察结果，张、亓明白了，其重点工事筑在南门，南门里两边的钢筋水泥工事，十分坚牢。其突破口则在城的西北角，还挖有地下道，城外出口处有一小炮楼掩护。

侦察完毕，他俩还把吴茂亭表扬了一番，才回到一营。袁立荣、曾洁光等同志都在，遂和他们一起(一营一些“心腹”也参加)研究。计议已定，曾洁光便和袁立荣同志分别到军区和一分区去汇报，张和亓回到了老虎庄。

举事的那天晚上，曾洁光和袁立荣同志从解放区回来，先找见戴瑞华，叫他到城西南的公路上和新四军联络员马占山等接上头。根据联络员传达新四军的具体指示，要戴把外围岗哨一律撤至南关，新四军便衔尾而至。戴照办了。一霎时，密迹开封的陈留城，便被新四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了起来。一团在城内得知，吴茂亭“好心”电话命令五团一营迅速由西门撤回城里。一营不能干，但又不能公然违抗。正在作难之际，南关镇公所的二、九十名保安队从外围溃退下来，一营便抓住这个机会命令他们去替一营进西门。可是吴茂亭还在用电话催一营。一营无法，便一面激烈放空枪，一面给吴电话说：“接火了。”吴茂亭不知是计，一听“接火了”，只怕因一营进城把新四军引进来，这才“收回成命”，叫一营在南关死守。一营用电话答应了他，并谎他说还要冲出去。于是，由马占山领着一营全营，穿过新四军千军万马的阵地撤至外线转回五团去了。

这时南关阵地成了真空。城头上的一团岗哨还真以为是一营冲出去了，一会儿，又看见他们卷回来了。其实，回来的不是一营，而是新四军打着一营的旗号，用着一团（一团一营的口令是统一的）的口令攻上来了。新四军知道重点工事在南门，所以派来最勇敢善战的突击队攻南门。突击队前头，有四、五个人用头顶上蒙了几层湿被子的方桌，抱上炸药包，一直跑到南门，在城楼底下挖了坑，埋好炸药包，往旁边一闪，只听“轰”的一声，城楼腾空而起，尘烟弥漫四周。突击队不顾被打烟呛，便乘机袭入城内。接着大队人马涌入，子弹曳光呼啸，刺刀见敌就挑。宛如瓮中捉鳖。直杀得城内三千名（连县、镇、乡）保安团队呼爹叫爷，跪求饶命。吴茂亭赤臂督战抵抗了一阵，一颗炮弹飞来差点要了他的狗命。他一看大势已去，忙集合残部，从西北角地下道往城外爬，没想到刚爬到出口处，一颗炮弹飞来，把出口的炮楼掩体给炸塌了。勉强钻出来一些人又往前跑，没几步又中了伏兵。所以吴茂亭和几十名突围队都未幸免。侯殿卿这次没抵抗，因而保全了性命。

这样一来，告张绍儒的人更多了。引起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刘茂恩的怀疑。试想：驻在豫东专门对付豫皖苏的，除中央军和“杂牌军”以外，在地方团队中的四个省保安团，以张绍儒的保五团装备最差，“作战能力也不强”，然而事情真蹊跷，虽然他的团也多少受了一些创伤，可是竟能保存下来，而其他装备精良的三个团却都被新四军吃掉，岂非咄咄怪事？所以到了一九四八年初，春节未过，刘茂恩便命令保五团把团部移入城内。张绍儒预感问题严重，于是临离老虎庄以前，把能够转移的东西（子弹、手榴弹、步枪、机枪等）满登登地装了一汽马车派人送往豫皖苏一分区去了。路上虽经多次盘查，他们随机应变，

还是送到了目的地。

绍儒同志把团部迁到城里和平剧院（现名相国寺剧场），刘茂恩立即任命陆成宣为五团团长，给绍儒同志来了个明升暗降。叫他把经营了近十年的保五团全部人枪交出，换来一个参议兼杞兰两县联防指挥官的空头衔。陆成宣在全团交接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的人。”

地下军所做的其他革命工作

这里，我首先提出朱广仁同志。他以少校团副的身份长期驻在开封，为党搜集情报及时向我报告；并以五团名义为豫皖苏军区和一分区的干部作掩护，到商邱、上海等地多次购买医药和电讯器材等；还有上面已经提过的运给我们第五军密电码及多次从一八一旅给豫皖苏一分区购买子弹等。关于子弹一项，经多数人共同回忆，从一九四六年起两年多时间，连购买带五团自己节约下来的共送到豫皖苏一分区子弹二十万发、迫击炮弹七、八百发和五次重大情报（小情报不计其数），都是由豫皖苏一分区情报处副主任袁立荣同志亲手收到的。（有一九八〇年九月五日来信为证）

“家贼难防”。译电员胡伯虞同志把五团的密电码盗出，连紧要情况下的加码数字共三本，照抄后一起把抄件用布带包好箍在腰里，由常义成同志护卫，送往豫皖苏一分区情报处。沿途虽经国军岗哨多次盘查，他们只答上前面侦察敌情，终于送到了目的地。

在交通运输方面，另有专论，兹不赘。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我工委在郑州出了事，一九四七年年底

影响到了省保安五团的张以诚副官。李寒秋被捕后叛变了，供了所有他知道的地下党员，也供了张副官。因此刘茂恩得悉后，密电五团逮捕张副官送省（因李寒秋不知道张以诚的名字。只知道五团张副官）。朱广仁同志得悉后，把刘茂恩叫逮捕张副官的密令告诉我；我当机立断，吩咐朱广仁先把张以诚放走再报刘茂恩，就说此人已闻风潜逃，捕而未获。但后来获悉：胡伯虞接到此密电后已急报张绍儒，绍儒正是把以诚先放走，才向刘茂恩报告的。

营救胡万杰同志，朱广仁同志也出了不少的力。只是因为叛徒高玉温到监狱对质，咬着胡不放，胡及其大妻郭向新才被活埋。

地下军的起义

张绍儒当了杞兰两县联防指挥官后，他先把指挥部设在开封城内后保定巷七十八号（原五团驻汴办事处）凑合了几天，然后才正式迁到兰封城内办公。但到一九四八年一开春，兰封又获解放。他和兰封县长王徽五一起被我陈粟大军俘获，把他俩送到豫皖苏。绍儒同志到那里见了军区首长，据说陈毅同志也接见了。绍儒同志也乘机做王徽五的工作。一个多月后，俩人一起回到开封。绍儒同志暂住后保定巷七十八号，本着军区首长的指示，秘密策划做解放开封的内应。王徽五改任为开封县长。

其实，刘茂恩虽然没有免除张绍儒的职务，而实际暗中已监视了他。而他照常积极做地下工作。他把戴瑞华（仍为五团一连连长驻高楼）找来，叫他准备二十名可靠人员发给手枪，一俟大军攻城，便潜伏在曹门里做内应突击班，并叫戴筹备子弹给豫皖苏，说那里子弹缺。戴依令而行。回去后，急筹子弹一千发，借

营长马骑上，分三次往城里送（戴建议由城外往豫皖苏好转，免得进城绕这一圈。张不听，非叫送城内不可）。每次戴都是摊在马褥里三百多发，直送后保定巷七十八号。进城门时，总是欺骗哨兵说“有紧急公事”。所以都未下马。子弹倒是都转到豫皖苏了。又过了几天，戴把二十名突击班的人准备好后，来向张汇报并研究手枪问题时，见后保定巷七十八号成了禁地，门口有便衣徘徊，虎视眈眈。戴小心翼翼地到斜对面一家小杂货铺（是绍儒同志的丈人家开设的）一问，始知张已被刘茂恩骗走。说是请他有事，一到就把他关进省府西院保安司令部的木笼中了。这一排西房内的几十只大小木笼，原是日寇统治开封的虐政，如今刘茂恩又用它们来禁锢自己的同胞了。

经过三十多天的笼锁和刑讯，刘茂恩没得到任何的确凿证据。曾洁光同志还派常义成同志利用张绍儒堂弟，（原在五团当号兵，因陆成宜把他辞退，他又到保安司令部特务营机枪连当兵）在木笼房站岗之机，到木笼边看了绍儒同志。嘱咐他叫他坚持，告诉他外面正在营救。绍儒同志点头会意，意志更坚定了。

不久，陈粟大军在刘邓大军配合下，经过五天的激战，终于打进了开封。当开封城南飞机场、火车站、邮电局等处要害已被我军占领，开封城已处于岌岌可危之际，刘茂恩叫张绍儒取保释放。但他一出笼就又积极配合战斗了。

六月二十七日（二十二日入城），华野就撤走了。大军撤走的头一天晚上，豫皖苏区党委城工部曹志真副部长在草市街路西一座深宅大院（伪省府秘书长齐真如的房子）召集工委领导下在开封的一些有关同志开会，决定了谁留谁走的问题。

绍儒同志被决定留下。叫他去动员伪开封县长王徽五起义。王不敢，因其特务老婆监视着。但他动员了他的县保安大队起了

义。绍儒同志把这一大队人马带过去，在豫皖苏军区成立了第一支队。军区任命张绍儒同志任支队长，刘岗同志为政委，戴瑞华同志任军械参谋。

一九四八年春，朱广仁同志因长期为党工作，被省保安司令部诱捕，关押在兰封城内第十二专员公署隔离审查，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开封第一次解放时，他才从兰封逃出到豫皖苏军区。军区首长命令他回民权收集旧部起义，他回到民权收集了四、五百人，到军区编为一分区独立大队。由广仁同志任大队长，袁立荣同志任政委。

解放以后，这支地下军的骨干却受了很大的跌顿。只有少数安排得可以，而很多干部，却被不了解内情的地方人士扣上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帽子，或者诬蔑为“三开人物”，轻则受冲击，重则受枪毙或含冤死在狱中。子女受株连者不少。有的虽已分配工作在异地，也要千方百计去追回来。有的有错误的判决，有的连判决也没有就处死了。我对此十分痛心。我相信，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认识的提高，应该解决的问题总会解决。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让我用少奇同志这句名言来结束我这篇追忆吧！

第十三篇 张绍儒如何进入 兰封沦陷城？

义愤填膺 揭竿而起

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日寇从新占领的徐州出发，仅十余日，便于六月六日到达开封。兰封^①在开封之东，又位于铁路沿线，当然日军于占领开封之前，就顺路占了兰封。

张绍儒同志当年三十一岁，目睹日寇铁蹄所到，妇女被强奸，壮丁被抓走，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而地痞流氓、伪军警探，又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致使严然村舍，变为废墟；离离禾黍，成为焦土。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窃窃私议；咬牙切齿，誓报此仇。绍儒爱国，更不后人。他自幼受过良好教育，一贯矢志救国救民。为此他曾于十八岁那年，背井离乡外出参加了国民二军的骑兵。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省督办胡景翼还进步，所作所为，皆得民心。但他不久病故，由岳维俊继任。此人昏聩糊涂，十分反动，绍儒看出在国民二军不能久留，所以乘他被赶离豫之际，便于荒乱中逃回家乡。不过，经过这一番磨练，将近二年的工夫，

^① 即现今之兰考县，当时是兰封、考城两县。

他学会了马术，娴熟了枪法，奠定了后来习武的基础。他父亲是中医，因此他学了点中医给人看病，而且是有请必到，不论忙闲，不论阴雨或夜晚。所以他在左近方圆，很有人缘，深受爱戴。针对当时情况，所以他一提抗日，便有很多人拥护。有凑枪的，有出人的。开始只是几个人，但很快就发展成几十人，几百人。不过这时国民党也还在抗日。正规军虽然逃跑了，可是在敌后，它为了与八路军抢占地盘，便想起了利用土匪和土豪劣绅。对他们只要有三、五支枪十来个人的，都封个抗日头衔。这些人也都愿意有个封号，他们就更便利扩充实力，鱼肉乡民，并对日寇讨价还价。他们大都是《沙家浜》上的胡传魁式的人物。“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也不过十几个人儿七八条枪”。他们也很懂得强盗逻辑。“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一时弄得真假难分，人妖莫辨。

虽然如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的假不的，瘸子走不的”。绍儒这支抗日队伍，纯粹是民众自发的。当时在日伪逼迫下，各区乡，群众自发抗日的队伍也很不少。有的还受到日寇统治不到的区乡支持。三区是兰封县的一个最边远地区，东邻曹县，已是山东地函，北接着城，隔一溜大堤。张绍儒的根据地张公安寨，正处在这个三不管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所以，他遇上小股日寇来袭，便采取灵活战术与之周旋，奔袭或伏击。常常使日寇损失，败北而归。日寇因在三区吃到了苦头，知道了张绍儒厉害，遂不敢小股来了。变成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股来袭，绍儒闻讯便及早撤往考城或曹县，使日军每次都是扑了空。为了扩大和联合抗日势力，为了便利来往，绍儒又用拜朋友方式联络了一些人和友军。举其大者言之，其中有兰封四区鬲头集的张伯英和民权县内黄集的张万一。他俩各自都有一股

势力，和张绍儒联合起来，就成立了一个联防组织。

张伯英原是个进步青年，和日伪斗争非常勇敢，一次在斗争中不幸被日本俘获，把他吊在电线杆上毒打，使他悬在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复连折磨了几天几夜，因无啥口供，最后放了。他便跑到张绍儒处避难，后来才又回去。张万一是我党地下党员。在内黄集开一膏药店，自然也是为了联络人。他会武术，还办了一个武术训练班，集合了一些人每日习武练拳，当然是为了准备抗日力量。

这个抗日联防阵线形成了犄角之势，有事相互支援，平常互通情报。不仅小股日军不敢入侵，就是周围一些土匪或打着抗日旗号的土豪劣绅，也是常来联系，不敢进犯。

一九三九年，张绍儒由于抗日积极，人多势众，常打胜仗，并消灭了少数股匪，遂由兰封县三区区公所聘请，担任了该区民众自卫团团长。

至诚格天 招来天使

兰封县当时的三区区公所驻扎在程庄砦。张绍儒的民众自卫团，驻在北门里路西。由于张绍儒同志，保家卫国，绥靖地方，消灭土匪，打击日寇，又和张万一同志联合；张万一同志是我军鲁西南办事处领导的地下党员，他自然要向鲁西南办事处反映张绍儒的情况。这是党内问题，张绍儒不得而知。因为他和张万一的关系只是朋友关系。他不知道张万一是共产党员，张万一也不能向他说。但是在一九三九年的隆冬的一日，有一不速之客到程庄砦民众自卫团部门口，向门岗声称有要事要向张团长报告。门岗即转身到里面向张绍儒报告。绍儒大致问了一下来人情况，门岗说是

象庄户农民。绍儒便吩咐门岗让他进来。那人进来之后，就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绍儒。绍儒将信拆阅之后，才知道这是八路军的代表。信的内容是请他到曹县去开军事联席会议，邀请单位是：冀鲁豫支队鲁西南办事处。还盖有红艳艳的印章，负责人的大名是办事处主任于子元。他立即给来人让座，并吩咐护兵递烟倒茶。可是这是大事，他自己不敢做主，一面把来人安顿坐下，吃烟喝茶，他便把信带到身上，走出自卫团，到区公所去找到正副区长向他们一说，并请他们看信。他俩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绍儒向他们说：“人还在团部等着哩，去不去得给人一个回信。”后经三人会商：如果不去，得罪了八路军这条路就断了；去吧？是祸是福，很难预卜？会商结果，决定得去。但叫谁去又成了问题。因为区长、副区长都是地主、老财，害怕去了挨斗再扣住不叫回来。这是他们的真实思想状况，虽不明言，从表情和态度上即可看出。所以他们提出很多遁词，只是推荐绍儒去参加。有好处，他们也可分享些；有坏处，叫绍儒一人顶上。“露头椽子先烂。”绍儒呢？抗日是积极的，个人英雄主义也很严重。去吧！心中也无底，但素仰八路军的威名，也想去开开眼界。就在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支配下，他离开区公所回到团部之后陪来人吃了饭，便带上护兵，骑马和来人一同而去。

他骑在马上，一路上想得很多。他想：清朝腐败，列强侵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国以来，兵连祸结，军阀混战，萑苻遍地，黄河冲决，全国大地，民不聊生；中原要冲，灾祸尤甚。自幼即想救国救民，但左右碰壁，不得一逞。多少年来，国民党总是“挂羊头，卖狗肉。”“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赖事做完。”共产党又怎么样呢？西安事变后，芦沟桥炮声一响，大家都起来抗战了。国民党始终是打打跑

跑，现在更是消极抗战，积极防共了。如果由于国民党搞磨擦，致使内战重起，共产党将来自顾不暇，还谈什么抗日？或者这一次就是为的收拾我的人枪？……他胡思乱想着，不觉已来到了山东曹县某村。在一个高门楼前下了马，被来人把他和护兵带入院内。于子元同志即出来把他迎入屋内。护兵另外有人照料不题。

绍儒进入于主任办公室后，刚刚坐下，未经寒暄，他便直冲冲地向于主任说：“这次开会，如果是想收缴我的人枪，可早说清楚。把话说到头里，别到会后再搞突然袭击。这个圈套我可不吃。来者就不怕，怕者就不来。”这几句话说得于主任哈哈大笑。当即把他好言抚慰，热情款待。席间，于主任一方面肯定并表扬了绍儒的抗战成绩，接着就向他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张绍儒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当他听到于子元同志最后说到：“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时，他的一切疑虑顿时打消了。为了巩固张绍儒的抗日信心，于子元同志又给他讲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使张绍儒懂得了共产党的真诚抗日理论以及一整套的抗日方针、办法和充满信心的抗日胜利前途，宛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使他茅塞顿开，眼明心亮。他在这里晚餐后，便向于主任诚挚地表示了联合作战的决心，并要求于子元同志多多指教，大力支持。于主任一一答应并对他勉励了一番。他便及时告辞，携带护兵，跨上大马，披星戴月，得得而归。

声威远播 河西加委

张绍儒从曹县回来后，懂了很多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懂了联

合阵线的重要性，也领会了一些毛主席《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的分析，并懂得了当时已进入了相持阶段。他的信心更足了，劲头更大了。他向区领导以及有关人员作了传达、宣传，使三区的干部和兵士以及地方部分群众都在政治上提高了一步。他们的抗日行动，由此也就更积极了。白天，日寇一出城，张绍儒就率领自卫团并发动群众，和日寇周旋。夜间日寇不敢出城，他便派自卫团去割日本沿公路或沿铁路架的电线。有一天白天，侦察到敌人一个大队来到宋庄。这里离程庄砦仅八华里，显然是来威逼或消灭自卫团的。张绍儒便派少数便衣监视，侦察敌人动静，迅速率领全团人马撤往大堤去了。后来侦察到敌人正在宋庄村外午休，便率领全团从大堤奔袭回来。到了目的地，一下子就把一大队日寇团团包围，人喊杀，枪乱响，使敌人措手不及，只好突围而去。结果是敌死伤数十名，遗弃数十支枪，还有几匹洋马，两辆炮车。张绍儒命令士兵掳掠战利品迅速撤退。但敌人蒙此损失，岂肯甘休？便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把宋庄周围几个村庄的几百名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一起集中在村外沙地里，周围架上机枪，兵士团团围住，逼着老百姓供出张绍儒隐藏在什么地方，把皇军的武器和马匹又藏在哪里？复连数日不叫回家。张绍儒不忍无辜群众受此折磨，遂请示于子元。经于指示把武器、马匹可以交还日本，换取群众回家，但今后抗日方式方法，需要改变一下。要张绍儒采用游击战术，改为夜聚明散，声东击西。“日寇小小的来，我们大大的上；日寇大大的来，我们就溜走。”

于是绍儒遵照指示，把武器、马匹托人交还敌人，敌人虽然还是追查他，但已把百姓放回，自从他采取了游击战术后，越战越强，人马也越聚越多。由几百人到了上千人。因此，他的名声大噪，一直传到了大后方。到一九三九年年底，远遁在河西的国民党

省政府，还派人给他送来一纸委任状。委他为河南省第十二行政区独立支队长。他一笑置之。

并肩作战 深受感染

时日匆匆，一九四〇年春节过后五、六天，鲁西南突然开到兰封县三区一个团，番号二十，团长名徐茂礼。骁勇善战，生活艰苦。在过年期间，也是以杂粮充饥，不住民房，不派捐款。老百姓看见他们专门抗日，爱民保民，深受感动，遂将年关剩余馍、肉、大米、白面，车推、人挑、肩背、手提，送去慰问军队，军队一概婉言谢绝，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听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人东西当面归还，不许调戏妇女，买卖价钱公平……”等，莫不感激涕零。尤其是抱负着救国救民的宏愿而崛起抗日的张绍儒，其心灵的触动，更非他人所能比拟。他参加过国民二军，见过无数的旧军队，所到之处，抓伏抓丁，打人骂人，派捐派款，掳掠财物，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那时乡下人就不敢晃丘八的面，只要一晃见披老虎皮的影子，早已逃跑得无影无踪了。如今这个军队，百姓敲锣打鼓抬着猪羊送去，他们还坚决不收，真是古今少有。张绍儒只是在舞台上，鼓词中，史书上，才听到、看到过“某某军队，仁义之师，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而眼前来到三区的八路军二十团，竟能亲身做到，这真该成为一切抗日军队的典范。可是二十团来得很突然，绍儒事前毫无所闻，他不能不心存芥蒂。所以当徐茂礼团长派人来请他去会面时，他存着刘邦赴项羽的鸿门宴的心情，随带亲信数十名，一律全副武装，乘马而去。他们一行来到二十团团部。下得马来，张绍儒被徐团长请至屋内。分宾主坐定，经过几语寒暄后，张绍

儒便问徐团长：“贵军突然蒞临敝区，不知有何见教？”徐答：

“只是为了联合抗战，加强你的防务。”张绍儒到底是受过一些抗日教育的人，经徐团长这么一说，他满心欢喜，心中疑团，焕然冰释。双方当即共同研讨了当地敌伪形势与敌我军力对比，制订了联合作战计划，部署了情报网点。会议之后，不满一个月的时间就和日寇作战两次，并对附近土匪以及假抗日之名而为害地方的一些土豪劣绅、地方武装，展开了一系列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攻击与收拾。他们越战越强，敌伪皆惊慌失措。并且二十团和绍儒的自卫团都用缴获敌伪和土匪的武器弹药和物资给养武装补充了自己。至此，张绍儒才初步体会到二十团经常歌唱的《游击队歌》中之歌词：“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涵义。尤其是此歌之收尾几句：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拚到底！”张绍儒听罢感到特别亲切，因为他和他的队伍，都是三区土生土长的人。

张绍儒读过古书，稔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道理。他目睹二十团深受群众拥护，如鱼活跃于水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得条条到家。联想起于子元同志对他的开导和各方面的人对二十团及八路军的赞扬，他看见了中国的前途曙光，认定了八路军、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遂使他下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但是，抗日势力越大，日寇就越认真对待。他们出动驻兰封、考城、民权的三股日寇，整整一个联队，又纠合了几股伪军，对三区采用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反复扫荡，所到之处，实行三光^①政策。妄想把二十团和三区民众自卫团消灭干净。可是二十团早

^①三光：烧光、杀光、抢光。

已奉命转移，冲到敌人外线。而张绍儒的军队是三区的子弟兵，“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所以他们舍不得家，转移慢了一些；棋输一着，在一天夜间，他们在翟庄宿营时，被敌人的重兵包围了。经过一天一夜激战，一千二百人伤亡殆尽，张绍儒只率领少数几人利用黄军衣和黄土路一样颜色，利用夜间，蛇行突围而出。而且敌人还穷追不放。无奈何，张绍儒只得化装潜逃。敌人没有抓住张绍儒死不甘心，又下了一道通缉令，悬赏缉拿。他在兰封不能存身，便改换名字逃来汴京。

汴京避难 巧遇良缘

绍儒改名张友宾，乔装打扮成商人模样，混入汴京城内，寄居在南书店街大梁旅社。伴随他一同到汴的，有冯鹤林等四人。但除冯鹤林伙同他一起住大梁旅社外，其余三人分住别处。冯是绍儒青少年时期的同学，祖籍魏县，是绍儒的近同乡，薄有家产，与绍儒堪称莫逆。友宾在旅社闲居，静中思动，忽然想起物色“窈窕淑女”，作成“君子好逑”。于是多方托人，最后托到前保定巷住家的一位崔嫂。崔嫂是个精明强干之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她苦思冥想，忽然想到后保定巷董家有一少女，小字素琴。年方二八，俊俏可人。高小毕业，粗通文理。在日寇统治的年月，浪荡成性的日本兵，为了发泄兽欲，到处寻找花姑娘。因此，“女大不中留”，已成了当时人人传诵的警句。为了逃躲日寇的糟蹋，有的深居简出，有的躲躲藏藏，有的女扮男装，有的女扮婆娘，有的自毁花容，有的提前完婚。董家自不例外。也想把姑娘早点嫁出去，免得家中多操这份心。可是姑娘是父母身上的一块肉，好容易长了这么大，谁不想找个家道小康，年龄相

当，才华出众，温文尔雅的如意郎君？而张友宾，一听岁数就把人吓煞了。年过而立，比姑娘的年龄大一倍还多。这怎么能行？所以母亲自然不能答应。但崔嫂只说他好。说这年头急当找个合适的也不易。张掌柜为人忠厚，过门后，姑娘准不吃亏。说得董母已经有些动摇。偏偏又遇上街坊有个李姥姥爱管闲事，听说张友宾正在崔家，便慌忙跑去张望。她一见友宾仪表堂堂，应对彬彬，满心欢喜。回来便怂恿董母，劝她许婚。说得董母慨然同意。意见传给友宾后，友宾便要求见面。那时见面还不大盛兴，经过疏通，才约定一日上午在崔家见面。崔家在前保定巷的住处是西屋三间，两头里间，中为一明。是日，张友宾偕冯鹤林先去了。他们也不知带些什么好。恰值在路上碰见一个樱桃挑子，友宾便买了一手巾兜樱桃提去，作贽见礼。好事的李姥姥也早去了。然后才由董家同院一位邻居名叫云霞嫂的把素琴领去。素琴和云霞往屋一进，素琴脸薄，一晃有这么多的人在场，连头也没抬，慌忙钻进了挂有门帘的北里间，云霞嫂也跟了进去。素琴不知友宾看清了她没有，反正她是没看见张友宾是什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相，怎么谈呢？后来素琴在里屋接到友宾从外屋传进来一个条子。素琴展阅纸条，只见条上写着：“问素琴婚后是否可以陪我回家看看？”素琴不知如何答复。后来还是云霞出的主意，叫素琴答复可以。素琴照说了，云霞传出去，就这样算是定了亲。当时正是旧历春三月。结婚日期定在四月十六日。筹备结婚事宜，友宾委托崔嫂全权代办。

乔投案 只身入虎穴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友宾虽在开封享受着“新婚燕

尔”，但蜂蜜怎能粘住鲲鹏翅？六尺之躯，志在救国，宁能蛰伏在石榴裙下？一心还想回到兰封，东山再起。时间长了，有些昔日旧友，如胡廷起、刘梦麟等，也千方百计探听他的消息，来汴会他，共议再起。但再起需有立脚之地。三区正在悬赏缉拿，不敢傍边。其余各区都是匪伪盘踞，谁能让他插足？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然听说国民党军纷纷投日，高唱“曲线救国”。使他心中豁然一亮。自忖：“我能不能‘曲线救国’？”但这个问题，只在他心中一闪而过。因为“曲线救国”，首先要蒙当汉奸的耻辱；再说，国民党的“曲线救国”，只是“曲线”反共的代名词。“我能反共吗？”他扪心自问。经他想来想去，他明白了：

“在日伪区域救国，只好走“曲线”，但不能反共，而必须认真救国。适在此时，敌人因为对长期悬赏缉拿不获，又改变主意，派出人到三区找与张绍儒有关系的人活动，想使绍儒幡然来归。

“人托人托到天上。”一日，忽然有人找到胡廷起和刘梦麟，烦他们转达给张绍儒，县领导希望他回到“和平阵营”，对过去事，可以既往不咎。他们把这话传给绍儒后，他想：《西游记》上有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腹内捣乱，使她疼痛难禁，我何不将计就计，钻入敌人内部，使它不得安宁？想到这里，他和几个心腹密谋之后，便于一日只身跑到兰封县城，及时去到伪县署，找到孙伪县长，一见面就说：“我就是张绍儒。”一听名字就把孙吓了一跳。他定神之后，才说：“久仰，久仰！”便慌忙给绍儒让座。绍儒不坐，直截了当地说：“不是悬赏缉拿我吗？现在我自己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孙县长笑咪咪地近前一步，凑到绍儒身边，执着张绍儒的手说：“子范回来好，子范回来好。只要你能回来，过去的事可以一概不咎。”

子范是张绍儒的字。

孙县长陪绍儒坐下后，绍儒问他：“皇军态度怎么样？”

孙县长说：“你在三区人马多，势力大，对皇军威胁太大，所以不能不反复扫荡，悬赏缉拿，目的还是想叫你归顺。”说到这里，他把口气放温柔了问子范说：“你愿不愿意来城里任职？”

“任什么职？我听听能不能干得了。”

“我是警备队长，你担任警备队副怎么样？”

子范一听，心中盘算：这个不错。既可重握虎符，又可搜集旧部，再寻觅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是真正的“曲线救国”。想到这里，他便站起身来，和孙县长告别，握着他的手说：“一言为定。”

孙县长把他送出门外，他便又回到开封。一边告诉素琴，要回县任职；一边就召集那几个在汴心腹，如冯鹤林等聚议了一番。取得这些心腹同意后，伪省警备司令部任命张绍儒为兰封县警备队副的任命状也下达了。张绍儒便偕同几个心腹由开封乘火车到兰封车站下车，大摇大摆地到城里上任去了。

兰封县警备队当时只有一百多人，对绍儒来说，都是脸生面不熟的。当时日伪规定：县警备队长是伪县长的当然兼职。另配专职警备队副。就在绍儒进兰封县城任警备队副职的那一天，姓孙的伪县长即滚蛋去了，来了一位新任的伪县长张松涛。此人精明强干，对绍儒也还友好和支持。

日本人对绍儒的看法是：认为经过大扫荡，绍儒一败涂地，现已走投无路，所以前来投诚。把他圈在城里，东乡也就太平无事了。他做梦也想不到招来一名孙行者。

绍儒进城之后，他的第一件要做的大事就是找于子元。但“天地转，光阴迫。”事情不能等待，多事待理。在未找到于子元同志以前，绍儒与心腹们商议，暂定几条，作为行动纲领。这

几条纲领是：一、不论过境的八路军与新四军有多少人马，一律放行，不许阻拦；二、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过往队伍，过后向日军报告时，要以少报多，以近报远；三、假日寇把沦陷区称为“王道乐土”之高调，清剿县境内之大小股匪，以绥靖地方；四、三区扎根，搜集旧部进城掌握部队或留乡掌握三区。五、搞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以迷惑敌人。如提“是亲三分相”。以张君墓为幌子号称兰封考城之张家世族为清代名臣清恪公张伯行之后裔以资炫耀，即其一例。

三区扎根 与党重会

三区是绍儒生长的家乡，又是他揭竿而起的发祥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袍泽遍地。所以他对三区是“眷眷在心目”的。他对原任区长杨文甲、副区长胡廷起原封不动，委任随他到开封避过难的冯鹤林为张公安砦联保的联保主任。即由冯鹤林负责，杨汉民和王广田参加，在张公安砦建立地下联络站，派人到曹县一带寻找于子元。

一九四一年的春节前夕，终于在曹县境内找到了于子元同志，并和他约好春节利用拜年作掩护在魏砦见面。

素琴因学校放寒假早已回到兰封。新婚伊始，绍儒便向兰封城内日伪当局请假，说：“新婚之后需同新娘回乡拜祖。”经允许，他便与素琴乘上一辆马车回东乡去了。

县城离张公安砦六十华里，车行较快，不过三个小时便到了。张公安砦村边有一座关帝庙，联保办公室就设在这座庙里，他们的马车停在山门前。他们在这里下车到庙内小憩，便离开这里，偕行向西，穿过一片苍翠柏树便到了绍儒的出生之地油房砦

村。他们先到大堂兄家拜了祖宗牌位，然后又到村外扫了祖先坟墓，回来又串了几家近门本家。所到之处，都是男女老少，簇拥围观，说说笑笑，一片狂欢。因为这是绍儒被逼逃走后的第一次回家，不仅自己戎服佩刀，马鞍叮当，呢帽遮顶，军衔辉煌；而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携带的这位女洋学生。剪发头，红花旗袍，外罩一件天蓝色的毛线外套。年华正芳，花容月貌。在大堤旁的荒村僻径的人们看来，真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定向瑶台月下逢。”

当地当时生活很苦，招待新娘的饭食，据董莹（素琴）同志回忆是一碗粉面汤，一碗红薯面炒面。

接着他们就又坐马车到了离张公安砦仅三里的魏砦。这里有绍儒的姐家。姐的婆母是一位忠厚慈祥的老太太，热情健谈。和素琴家长里短说个没完。就在她们喁喁交谈中，绍儒同志便潜然离此到约定的地方和于子元同志会面去了。绍儒给于子元同志汇报了这大半年的曲折经过，于子元同志对他好言抚慰并布置了工作。叫他如此如此。

之后，绍儒便又和素琴乘马车回到县城。回到县城之后，绍儒立即在自己最亲信的护兵家中建立起联络点，令其与张公安砦的联络站相互联系与八路军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并护送八路军、新四军南北过路。还要护送愿到解放区去的学生。

接着就有一批骨干，如徐守真、毛秀峰、刘梦麟、温子由、王金鳌等陆续来到了城内，安置在警备队，掌握了队部科室和几个大队的大权。

伪县长象走马灯一样又易了人，由张松涛换成了刘一山。此人爱占小便宜，绍儒只好对他迁就些。以冀不妨碍我们的抗日大计。

第十四篇 地下军的主力是如何成长壮大的？

稳定局面 网罗人才

张绍儒以一败兵之将，于一九四〇年春末，赤手空拳进入兰封城内，以警备队副的身份，带领素昧平生的一百多伪军，经过两年的经营，由一百多人的一个大队发展成为每个大队有三百多人的六个大队，加上骑兵连、手枪队、学兵队、军官教导队、修械所等足有两千多人。真是象耍魔术一样，“撒豆成兵”。于是张绍儒被提升为联队长，县长不再兼任警备队职务。其实这期间并没有什么魔术。让我把实情分析一下，即可了如指掌。

他的做法是第一步先把三区，尤其是他的发祥之地张公安营稳住。他才能够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第二步便谋求发展。关于发展方面，又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说，即充实机关与发展队伍。当然这两方面不能截然分开，但毕竟各有其特点。在充实机关方面，主要物色智囊、专家和文武骨干等。因而，他采取了礼贤下士之态度。对于地方上有用之才，总要设法安排，尽量使他发挥其长。如县城西街之侯梅村，本是个

小有名气的文人。虽然他在日寇进攻时伤残其腿，扶杖走路，张绍儒也把他请来安在书记室。又如戴际良，原在国民党县党部做一般工作，他家各色人物都有，在县里有一派势力。但本人胆小怕事，无大作为。不过他善书法，有口才，绍儒也请他到队部，编在学兵队里的教官队，还任过一段教官主任。又如温子由，年纪略大，但有文化，能写作，绍儒把他请来安排在书记室当了主任。他就职后便舞文弄墨，所有文牍，多出其手。还有刘梦麟，三区人，与绍儒亲戚，家中颇有田产。他和胡廷起、石鸣珂是一个派系，能左右三区局势，绍儒把他安在军需室理财，后来任军需室主任。还有黄冠儒，也是文笔有名，绍儒也把他安在书记室。最难能而可贵的，是庞炳勋部的教育长张梦麟来归顺。他是庞任了绥靖委员会主任后，曾衔庞命以到兰封视察为名来接洽过对张绍儒的部队收编问题。那次和张相谈甚洽。后因他刚正不阿，不善逢迎，被庞免职来投绍儒，绍儒甚喜。因他原系保定讲武堂毕业，籍贯也是保定的，故绍儒把他仍任为教育长。从此，军事训练，学兵队和教导队的军事课程，都由他传授。使张绍儒的部队训练，由游击习气转上了正规。其中，也有个别人是张绍儒为了统战关系而拉进来的。没有起了好作用。譬如王甫臣，本是个花花公子，绍儒因他父亲在外面做事，把他招来当个随从副官，但他不识抬举，尽说风凉话，说什么“人家骑马我骑马，人家下马我牵马”。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王铺衬，与其姓名谐音。

另一方面，在发展人、枪方面，绍儒是采取了两种办法的。第一是招安，第二是吞并。地方上有很多有枪有势的，却没个名义。“名不正则言不顺”，故在绍儒号召和活动下，飘扬来归者不少，分庭抗礼的也有，专门作对的也有，来而复去者也有。这

又可分作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拥有地盘的，如各区区长；另一方面是流寇。让作者分别言之。先说各区。

一区区长为胡庆三，是个久游宦海的老官僚。世故圆通，但无实力，他只有依靠绍儒。本非同道人，暂作一路行。

二区区长郭伯理，本地人，郭氏为当地旺族，有钱有势，独霸一方。当他听到绍儒号召团结统一，安定地方时，也来接洽表示愿意合作。但他毫无诚意。他和绍儒合作，是想取得个合法身份，好在外边做坏事。绍儒洞烛其奸，因此落落难合。郭伯理还和国民党挂钩，委他为游击司令，因此，他更神气了。完全不听绍儒指挥，并处处采取对抗态度。没办法，绍儒只得把二区一分为二。以雷集为核心划出一部分地面成立了一个五区，委梁化之为区长。这也是五区的一个旺族。没想到梁和郭后来又互相勾结起来了。张绍儒一怒之下，便把郭伯理撤了职，派县城一中校长徐鸣春去接替了他。

四区开始是张伯英，继之是刘文奇。刘文奇思想进步，对张绍儒言听计从。但离四区区公所所在地的圈头集北边，有个红庙集，属考城地面。那地方有个戴秋阳，事变前在南京上过大学，是个国民党特务。其七叔是个恶霸地主，有钱、有势、有枪。在那一带称王称霸，戴秋阳就凭借他七叔的势力，经常来骚扰兰封四区的地面，掳掠民财，强奸妇女。打的旗号是抗日游击司令，喊的口号是反对汉奸政府，反对日伪军队，实际纯粹是为自己发财致富。只要他领人马来，刘文奇便派人马和他打，所以经常和他发生冲突。有一次，张绍儒听说后，即派驻圈头集的五大队协助前去围剿，戴匪不支，即逃往红庙。刘文奇领人马一直追击到红庙，把戴秋阳的家宅团团围住，进行猛攻。直至攀垣而入，空无一人。因为他室内挖有地洞，直通旷野，他们一看大兵压境，便

纷纷钻地道潜逃。从此以后，戴和绍儒及文奇仇更深了。戴扬言说：“不抓住刘文奇不刮胡”；刘文奇则说：“不抓住戴秋阳不剃头”。不得已，绍儒只得把刘文奇调离四区，派谢崇武接充。因此，戴秋阳也就更恨绍儒。到解放战争时期，戴秋阳当了国大代，一直把张绍儒告得住了保安司令部的监狱。此是后话，这里暂不多表。

提到流寇，前已略言，因为其中很复杂，绍儒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凡属自动来归或经过劝说而来的，绍儒都按其人，枪多少，干部才能等条件，分别给予编制、安排。这类事情属多数，毋庸细表。这里只举对屡劝不听和来而复去的两类人的处置和结果为例，梗概言之。

一类就是北乡的绿五这一小股，人数、枪支不多，总共不满二十个人。但行为极坏，民愤很大，强奸妇女，绑架肉票，掳掠民财，屡劝不改。尤其骇人听闻的是：一日，绿五兽性大发，不顾乡人议论，不顾慈母痛骂，强拉他的亲姨母要拜堂成亲，并唆使他的十几个喽罗每人各抢一个少女，来集体拜堂成亲。岂料早有人报知张绍儒，绍儒大怒，即派杨汉民带领骑兵连，由报告人当向导，对绿五老巢来了个突然奔袭。杨汉民带领骑兵连奔到这时，他们正在左抱右拥，饮酒作乐，骑兵连当即把他们一群团团包围，把他们吓得狂呼乱叫。杨汉民为了威慑他们，立即指挥骑兵连鸣枪示警，同时趁他们来不及还枪之际，就唆使一部分骑兵下马持绳赶到他们跟前，把他们一个个都绑了，喝令民女快快逃跑。及至清点俘虏时，惟独不见绿五。经审讯，才由一个俘虏供出，绿五从后门出去钻红薯窖去了。杨汉民当即领人到后院红薯洞口探看，刚一伸头，下面“啪、啪！”打上来两枪，幸未伤人。杨汉民眉头一皱，心想：这只能智取，不可硬攻。一看旁边

就是柴禾垛，便带头去搬柴禾。“众人拾柴火焰高”。顷刻间，柴火堆满了洞口，擦洋火一点，轰然一声，滚滚浓烟，熊熊巨火，入地腾空，炙人呛眼，杨汉民还是大骂绿五不止。这时忽见从浓烟烈火笼罩的红薯窖口爬出一个人来，头发眉毛荡然无存，浑身焦黑，就地打滚，涕泪横流，只喊饶命。杨汉民喊使骑兵连的人给他往身上泼水灭火，火一灭仔细一看，正是绿五。立即也把他绑了。把他们总共十九个人，象练骆驼一样，一绳练起，还有二十来支枪及其他物资分别带在马上，收兵回营，牵着他们，一路上，行人，耕夫驻足围观，骂骂纷纷，拍手称快。

杨汉民把这十九个衣冠禽兽带回城里向张绍儒报告，张绍儒出来把他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当场枪毙了绿五。其余十八人叫他们每人都低头认罪，表示悔改，然后才命令把他们的绳索解掉，吩咐他们愿回家者必须安分守己，愿留下者即可下连当兵。他们考虑到回去之后怕村中不谅解，遂一致表示：“请联队长收容。”张绍儒便吩咐把他们分散开编入连队，以观后效。

二类是赵彦忠。本是县西乡人，在县活动，因其人枪不多，为了自保，遂自动来城向张绍儒投诚。张绍儒把他的人枪收下，任命他担任了一名中队长。但联队纪律严明，生活艰苦，干了几个月，他觉得没有当土匪痛快，遂于一日夜间，乘其值星之际，率领其中队人马出西门，越过兰封西鄙，奔往开封县大田庄投了大土匪田树恩。从此边境多事矣！

“王道乐土”岂容土匪横行

田树恩，开封市（那时市县合一，未设开封县）境东北边大田庄人。这个大田庄，毗邻兰封、考城、封丘三县边陲，是个“四

不管”的地方。这县吃紧他往那县窜，实际成了不倒翁。而且他禀性狡猾，稔知“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他决不骚扰大田庄周围。总是远出他乡，为害四方。可是自从赵彦忠投奔他以后，有了兰封的内线，他就经常发动人马，由赵彦忠领上来兰封西边和北边一带骚扰掳掠，郭伯理和梁化之坐视不管，使驻在这一带的联队六大队也陷于力不能敌。一九四二年的夏日一天傍晚，张绍儒和伪县长张松涛，刚刚从东乡灭蝗回城，正在联队长办公室和有关人员商讨联队士兵比武及全县禁烟戒毒等事，忽见一位大队长匆匆而来，绍儒定神一看，原是驻雷集一带的第六大队的毕自贵大队长。张绍儒忙问他：“什么事？你这样慌张？”毕答：“昨晚韩相坡村惨遭田树恩的匪徒血洗。计：劫走耕牛五头，百姓口粮五十石，两名妇女被强奸，其中一名被强奸后又枪毙了。还架走两家富户主人，扬言每人要出三千元现洋来赎。这次韩相坡浩劫是田树恩派赵彦忠带领二百多匪徒干的。赵彦忠现任他的副大队长。”

绍儒一听，眉立发指，立即招集智囊团到内室密议，张松涛自去不提。可是绍儒一时性急，竟忘记了内室有个大腹便便将近产期的掌印夫人，使她躲避不及，与会不便，只好默默负隅而坐。顷刻会毕，决定派副官主任毛秀峰同志持公函前去与伪开封市协商会剿，同时吩咐联队副徐守真立刻协助毕自贵准备出发事宜。

田树恩年近五旬，头已光顶，所以外号又叫田秃子。他豢养三百多兵士，在大田庄村西边关帝庙里扎营。这座关帝庙建筑在村西的一座二十余丈高、数百平方米宽的土山上。山顶四围筑有寨墙。雉堞朵朵都留有枪眼。寨的四角都有机枪阵地，可以横扫。寨内除宏伟的关帝庙外，四周都建有平房。匪兵住在平房之内，共有三百来人，编为三个中队。田树恩和其姨太太住在关帝

庙前的三间北屋内。室内挖有地洞直达寨墙之外。洞道内还挖一方室，为他和其姨太太出储藏金银财宝的密室。

毛秀峰衔命去后，次日即归，和伪开封市约好七月五日晚上，趁匪徒得胜而归，麻痹松懈进行围剿。西北两面由伪开封市担任佯攻，东南两方，则由兰封县警备队主攻。

约定围攻之日，绍儒于当日下午由护兵、马弁和手枪队长王金鳌率领其全连队员跟随，骑着枣红色的大洋马。此马名驷峰，日行千里。加上随从副官和作战、侦察参谋等共七骑，又有长列卫队前呼后拥，真是威风凛凛，耀武扬鞭，马蹄得得，出西门，在扬起的一溜尘烟中来到了雷集。六大队三百多人早已在村外荷枪实弹列队等候。张绍儒他们到来，并未下马，毕自贵戎服佩刀趋前立正敬礼报告：“准备就绪，等候出发，请联队长检阅！”报告毕，张绍儒即由毕自贵陪同从三百人的二路横队面前，骑马注目过去，兵士一律行了目迎目送礼。检阅完毕，张绍儒命令出发，六大队的三百多个士兵，便由营长命令按行军次序出发，毕自贵也翻身上马插在大队中间，浩浩荡荡向西前进。张绍儒等勒马缓辔续在后头。皓月东升时，他们的队伍已经靠近了田庄，及时在东南两面展开扇形阵势，并与预先到达西北两面的伪开封市警备队取得联系，约定统一口令。对大田庄及田匪所在之关帝庙土山寨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树恩在寨内闻报大惊，即令副大队长赵彦忠登城巡视并严防。赵彦忠当即登城四下瞭望，在月光照耀下，看见果然兵临城下，陷入重围。一霎时枪声四起，弹如雨石，他即命令还击，一时乒乒乱响，弹火如梭。赵彦忠认得张绍儒的大洋马，月光下，他看得清，张绍儒快马加鞭驱众攻城甚急，他的坐骑已跃至距南门五百米处，霍地一闪，隐在一堆矮的沙丘后面，冒出头来，窥伺地形和城头工事。赵瞄准一枪打来，张绍

儒立即坠马不见，他的部队也纷纷后退，赵彦忠便命令匪徒拼命狠打。眼看张绍儒部队越退越远，他在城头上高兴得拍手称快。一看形势好转，便下城头去向田秃子汇报。田秃子一听张绍儒中弹落马，劲旅溃败，当即与赵彦忠额手相庆。又命姨太太拿出好酒，炒了几碟好菜和赵彦忠饮酒作乐，一时间都喝得酩酊大醉。因为这两人都深怕绍儒。一个是投而复叛的叛徒；一个是绍儒的仇人。在绍儒初起事的一九三八年冬，田树恩曾派几个匪徒到油房砦来捉绍儒，不过他们对绍儒并不相识。一进绍儒家的门，便大喊：“张绍儒在家吗？”绍儒一看来者不善，便眼皮一眨，向他们说：“俺绍儒哥在里面，我去叫他。诸位稍候！”于是他边往里走边喊：“绍儒哥！外面有人找。”他来到后面，逾垣而去。

再说，魏化德本是兰封县第四区菜园村人。因一九四〇年以前日寇抓丁抓夫，在家不能存身。他常年东逃西躲。自绍儒一九四〇年进城后，县内秩序逐渐安定，魏化德的父母看出绍儒是个好人，便叫儿子进城投绍儒当兵。迨赵彦忠于一九四一年投来后，绍儒又把他编在赵彦忠中队。他在县城看得清楚，张绍儒部队纪律严明，他本人又礼贤下士，关心民瘼，早就对绍儒心悦诚服，对赵彦忠并不喜欢。自从随赵叛离之后，早想返回联队，摘掉这顶土匪帽子，所以他趁此负责守城之机，便以出去侦察为名，缒绳而出。私自跑向张营想探听绍儒的生死存亡，伤势轻重。但离张营尚远，就被游动哨擒住，有人说他是奸细，有人说他是叛徒——认得他的人。他自己也一言难辩，只是声称要见领导。游动哨派人把他送至绍儒处，绍儒还正在担架上蜷曲着呻吟。因为绍儒刚才的闻枪坠马本是一计，想以此松懈田营斗志，故听说敌营来人，便呻吟不已。但他一看被抓来的是魏化德，“心有灵犀一点通”，

他知道此人对他忠诚，正要起来迎接，可是魏化德一看绍儒蜷曲呻吟，以为真是受了重创，扑通往前一跪如丧考妣地嚎啕痛哭了起来。绍儒更感其诚，便霍地往起一坐，劝他止哀，请他坐下，坦率地告诉他这是一计。魏化德一听立即收泪起立，面对精神奕奕的绍儒，倾吐被赵彦忠裹挟走的经过以及他个人对联队的怀念。他诚挚地说：“我无时无刻不想寻机报效。这次我在城头上看见联队长被赵彦忠打得落了马，他高兴得去和田秃子庆祝胜利，委我代理守城指挥，可是我放心不下联队长的吉凶祸福，特来探视。”

绍儒一听大喜，立即请他坐下，茶水招待并细问了田营详情，化德一一以对。并说：“城头上只有一个中队，我回去开南门接应，你们速攻，当夜即可解决。”并把赵彦忠和田秃子的住址也报告了一番。说罢，讨到张营口令，便匆匆而去。

魏化德回至城头，诈称：“侦察结果，听说张绍儒伤势很重，奄奄一息，士无斗志，纷纷准备收兵回营，因此我们守城重点主要是防止开封方面，应急速把城头队伍调至西、北两面。”守城士兵依令而行，他却偷偷下去走到南门里面，对守门军士也说了张营的假情况，嘱咐守门军士去睡觉休息，不必在这里株守。守门军士纷纷自去。化德为了掩护自己，他尾随守门军士走了几步，又向已经走开的守门军士的背后说：“我再检查一下大门锁好没有？”“锁好了，中队长别管了！”守门军士说着早已远去。魏化德却钻入门洞底下掏出钥匙去开城门。化德才刚刚摘下锁子取下串杆，山门已经哗啦一声被推开。如狼似虎的张营军队多如钱塘江的潮水，一股一股地涌了进来。一部分已经顺路登上了城头，一部分在院里包围各个住室，枪声和手榴弹声劈驳轰响，火网交织成一片。魏化德领张绍儒等一伙向田秃子房子走去，门

口的哨兵向他们开了火，魏化德把门岗一枪击倒，便领着张绍儒等闯进了田宅。田秃子早已知道金汤已破，被擒在即，便命令赵彦忠和他的护兵说：“你们给我顶住！”说罢即挽住姨太太回里屋入了地洞。

赵彦忠和田秃子的护兵都只好握枪在手准备迎击，一看为首进来的原是魏化德，他俩肯定这是自己人，遂没有放枪，还问：

“怎么样？”可是三个字未说完，早被魏化德叭叭两响都给撂倒了。绍儒他们也跟着进来，找田秃子不见，钻进屋里找也不见。恰好魏化德已跟着进来往床下一点，绍儒弯腰往床下探看，发现有一坑口，盖有铁盖。二尺见方，砖甃井然。这时绍儒的队伍已经进来很多，绍儒便命令把床抬到一边，从坑口下去“瓮中捉鳖”。士兵们一拥而上，竟立头功。谁料田秃子下去之后从里边把门锁了。大家无法，恰好魏化德已拿来洋镐、铁锹。大家夺过来将坑口破开，一人已经持枪下去，立即中弹身亡；又一人继续持枪下去，结果还是一样。士兵非常勇敢，接着就有第三人又要下去。被绍儒拦住急嚷：“慢着！”那人才站在井口，听候吩咐。只见绍儒眨眼皱眉，忽地计上心来。他命令跟他来的手枪队长王金鳌带上两个手枪队员集合好听候使用，转身即吩咐魏化德去找三套棉衣棉裤并三条棉被，还要找人挑几桶凉水进来。人多手快，顷刻间所需一切都已备齐。绍儒命令手枪队三人，一例将棉衣棉裤穿好，头顶棉被，留缝看路。又命令其他人们掂起水桶给这棉装了的三个手枪队员往身上从头至脚泼得水淋湿透，即由王金鳌带队，三个神枪手从坑口鱼贯而下。他们三人落级下到底层，洞内蜡烛高烧做了田匪的照明弹。子弹啾啾射来，只听扑扑发响并未伤人。透过一支蜡烛亮光，王金鳌已经看见田秃子隐在洞旁边一根粗木圆柱后边。他们三个神枪手射出的弹头可以说是弹弹不离

田秃子左右。要不是圆柱当了他的“挡箭牌”，他的狗命早已呜呼了。反正三个神枪手都着了“避弹衣”，遂径直向前奔去。王金鳌想捉活的，将到跟前时，他一个箭步跳到圆柱跟前，和田匪面对面中间仅隔一柱。王金鳌伸手擦过圆柱，想一把抓住田匪，田匪同样也想抓住金鳌。刹那间两人扭作一团徒手搏斗。不料田匪会拳术，他一手抓住王金鳌的领口，一个扫腿就把他撂倒在地。这王金鳌本是个大烟鬼，面黄肌瘦，个对个不是田树恩的对手。亏着另外两个手枪队员急忙赶到。田树恩自忖身非吕布，怎能以一当三，遂一枪击毙已经瘫在方室一角的姨太太，急转身又发弹打灭蜡烛。洞内顿时成了一片黑暗。王金鳌挣扎起来用手电筒一照，田匪已无影无踪，只剩下一口坐柜和桌上堆的一些珠宝玉器以及僵卧在屋角血泊中的一位粉头。王金鳌顾不得欣赏这些，说了声“追！”带领两个手枪队员在手电筒照耀下顺洞往里追去，一直追到洞外，还往土山下凭月光看了一下也不见人。三人便转身回返，来到方室，把桌上的珠宝玉器打了个乱七八糟。又打开坐柜一看，尽是白花花的现洋，还有部分黄灿灿的金条。他们三人便动手往外抬，没想到金银实物很重，坐柜动也没动，无奈何，王金鳌才打发一个人出洞报告。绍儒听报尚未开口，魏化德已去拿来绑绳和抬杠。张绍儒便吩咐魏化德领了十人下去。不一会儿，几个人便吭哧吭哧把一口长一米五，宽六十公分、高八十公分的红漆柜抬了上来。张绍儒一看大喜，正愁如何往回运的时候，魏化德进前一步敬礼报告：“联队长！我已把人都串通好了。我们这里的三百人、枪，全部都随联队长前去听候编制。还有十辆大车、五匹坐骑一起带走。这个箱子和其他军用物品及军需物资一律放在大车上。”

张绍儒说：“好！”即令回营，仍派毛秀峰去知会伪开封市

表示感谢并请他们注意田树恩的下落，无需多说。两张“肉票”早已乘机逃走，不必管他。

张绍儒虽然牺牲两名弟兄却换来三百人枪及军需现金和用品无算。他们回到兰封县城已经是次日中午。绍儒一进卧室正赶上夫人生产，婴儿呱呱坠地是个男孩，取名全胜，以纪念这次征西凯旋。

严格训练 整顿纪律

绍儒的兵员，既然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土匪，自然成分复杂，军纪涣散。绍儒禀性刚正，自幼爱国爱民，又受过西北军的严格训练，自己不抽烟，不饮酒，不贪色，不爱财。粗茶淡饭，衣着朴素，而且事必躬亲，与士兵共甘苦。举例言之：

一、练兵。按张教育长根据《步兵操典》所编的计划进行。除军训外，还聘请了武术教官教武术。每天操练时，绍儒以身作则，只要他在县城，一定出操。不管事情多忙，不管隆冬和炎夏，不管刮风和下雨，也不管深夜在灯下熬到何时，他每日都是五点起床，比吹起床号时间早半小时。他对军队训练象刻板似的，每日都是三操场（早晨、上午、下午），两讲堂（午饭前，午饭后），一体操（或武术），两点名（早、晚），两个饱（上午饭，下午饭），一个倒（夜眠）。时间分配因季节而稍异。每顿饭前都以中队或小队为单位站队，集体唱歌后才能进餐室。歌曰：“这个饮食，民众所给；保卫民众，是吾天职。”

二、整纪。联队规定：所有在县城有家的官兵，不逢星期六晚上不许回家。就是不在值勤期间的士官也不例外。如果张绍儒用电话找谁不在，一定要叫人去把他找回来接电话，还要在电话中训

斥几句；如果时间稍长，张绍儒在电话机旁等得不耐烦了，还要把他找来罚跪，浑称穿半截马褂。如三大队长李长岭在三区驻防，随便出去转悠了，张用电话找他不在，使人去找他又等的时间长，张一怒就把他叫来罚跪。完了后，李长岭对别人说：“又穿了一回半截马褂，谁知他那个时候还打电话呢？”对大队长都不宽容，别人谁还敢违误。

在处理事情上，绍儒鉴于历代官场中“官不威风衙威风”，侍从人员擅自作主，弊端百出。他对他的护兵、马弁约束很严，不许他们过问外事。

所有服饰，都得发啥穿啥，一律从俭。护兵常义成一次偷偷从开封买回来一双皮底冲服呢鞋，始终不敢公开穿出来。

所有官兵，仿照当时日军习惯，一律光头。魏玉琨系绍儒亲戚，跟随绍儒多年，因作特种工作（打入特务队）留一小平头，一日脱帽在房，被绍儒闯来看见，骂得他狗血喷头，马上去剃光了。书记室有个青年口袋里装了一瓶雪花膏，发现后也被没收了。并训斥了一顿。

绍儒有些地方也管得太严。譬如纸烟也不许抽，碰上谁抽烟，非叫他连火吞入口中，咽到肚里不结。这期间出了很多笑话，不必细表。后经党组织向他建议，对纸烟规定几种严肃场合，如上课、出操、阅兵及官长训话时不抽就可以了，其余时间可放宽。他照办了。

对大烟、老海绍儒更是不能容忍。不许联队里有一个人有此嗜好。偏偏他的卫队长王金鳌有此嗜好，而且居功骄傲，屡教不改，无奈何绍儒只得以“孔明挥泪斩马谡”的心情将他处决。

对禁烟毒，张绍儒治军之后，立将禁令扩及于社会。当时日寇的统治是高唱禁烟、禁毒，而实则公开贩毒、运毒并推广罂粟

种植。绍儒就打着他禁烟、禁毒的旗号，一九四二年成立了一个戒烟所，把有烟、毒瘾的人集中在内强制受戒，戒后写个悔过书即行放出。再犯再抓。如果重犯两次，即行枪毙。后来感觉到光这办法还不行。因为日鲜浪人即以贩毒售毒为生。有人卖就有人吸。为了斩草除根，于一九四二年冬季的一天晚上，张绍儒召集智囊团研究后，立即发动驻城关的大队及手枪连，全城戒严挨户搜查，不管日鲜浪人，还是中国人的住宅或商店，只要听说他藏有大烟、毒品便进去搜查。结果查出几十箱海洛因，数千斤大烟土，都集中到兰封城内十字街口付之一炬，真可谓林则徐第二。兰封县禁烟禁毒如火如荼。不料，一天从省城来了一位中年女人，打扮得妖里妖气，自称是伪省长陈静斋的表妹，用皮包携来几斤海洛因想乘兰封断烟之机卖个好价钱。可是她一下火车就被绍儒派驻车站的小队查住了。把她连人带货一起送到联队部。一路上她有恃无恐、谩骂不服。见了绍儒她还卖她表兄的牌子。绍儒命令把她人枪毙，货物没收焚毁。

联队对她这样办了之后，没想到伪省公署还来函给伪县署叫查明具报，可是伪县长哪敢惹绍儒。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在车站查禁私货及匪人中，士兵也出过一些事情，绍儒也都从严、从重处理。他常引用古人的话说：“治乱世，用重典”。并用煌煌大字把这条古训写在一条白纸横幅上张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令人望而生畏。他说：“我的兵有些匪性未改，非严办不可。”恰遇驻车站的小队中有个兵，每逢他值勤时，对旅客不是公事公办，往往是“向钱看”。连一无长物只带良民证的人，在验良民证时，也得在良民证下附上钞票，他把钞票抽去，良民证也不看就叫人开路了。否则百般刁难，给人把行李或货物弄个乱七八糟，如果人有行李和货物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九四三

年的春季一天被人告发了，张绍儒立即命令手枪连去把他逮捕来，召集了一个士兵和民众联合大会，把他牵到会场，张绍儒扑通一声对大家跪下，悲枪地说：“诸位父老兄弟姐妹及联队弟兄们！我张绍儒不才，没有把兵带好，他竟在车站胡作非为，为了整顿军纪，明正典刑，除我自己检查外，应把他立即枪毙，以儆效尤。”说罢，张绍儒起立，命令手枪连立即把他拉出枪毙。手枪队员把他拉出只听啪的一声，毙兵已死。人人赞不绝口。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整顿，到一九四四年我们派人进去时，张的队伍已经成为一支有文化、有武术、有纪律、无嗜好、能吃苦耐劳、有政治方向、懂军事学科的劲旅了。

第十五篇 轻民赋广开财路

远者不提，让我从张绍儒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到兰封县任警备队副说起，那时警备队才一百多人。由于张绍儒在当地威望高，由一百多人竟发展至两千多人。由一个大队的名义，扩编到六个大队的实有人数。由警备队扩充为警备联队。在联队部直属之下，除前述学兵队、教导队、骑兵连、手枪队、修械所外，还有被服厂、医院、学校（中学三所，小学八十所），并安装了环境电话。各区都驻扎一个中队，大村镇及重要关卡驻有小队。铁路沿线也驻有一个中队，名为护路，实系掩护我军南北过往。兵多将广是好事，但开支也跟着就大了。兰封是个风、沙、盐碱，地瘠民贫的地方，加上日寇杀人放火，东罗西掘，早已哀鸿遍野，饿殍载道，民不聊生。而且地方负担已经很重，在这么个贫穷小县，光民间漕银负担已有折合粮食二百多万斤的币值，这也只能仅够联队基本口粮，顶多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四十；还不算伪县、区、乡政权及土匪或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等部的苛捐杂税以至肆无忌惮的抢劫或偷盗。绍儒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联队再困难，也不能再向民间索取。可是联队不是光吃碗饭就能维持的，他如被服、鞋袜、皮带、马干、医药、文教以及制造枪弹等所需

经费，至少也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却借贷无门，罗掘不忍。所以一九四二年一开始，张绍儒便先和军需室的人反复研究，后即召集智囊团正式讨论，便决定了以下几项办法。

仪 封 开 荒

现在的黄河，泻流到兰考县三义砦一带，便由东西流改为东北向，这是人工强迫而成，这是经过了几千年的顽强斗争的。几万年来，黄河流至兰考，一漫平原，总是奔腾无羁，忽南忽北，黄水横流，淹没了多少村庄，淤积了多少沙丘。一说，大禹治水，鉴于乃父鲧治水多年，无功获罪，身受殛刑，乃“改弦更张”，因势利导，使黄河之水，顺流而东，以至造成了今天这种局势。如果按鲧的计划，他是设想叫黄河从呼和浩特往东，沿阴山南麓从长城外入海，那当然比禹的办法费劲。究竟孰是孰非，传说真伪，很难考证，姑置勿论。再说，相传清朝有个管水的巡按，来仪封视察河防。仪封当时是县名。当县知事向巡按大人汇报了河防防务之后，巡按问县知事：“县名仪封何也？”知事答：“仪封者用祭仪封堵黄汛也。每年到黄汛时期，都要举行仪式，膜拜黄龙。”其实，知事所说黄龙，也不过只是一条黄色水长虫。据说，每年黄河到了汛期，黄蛇就要出现在河边，如果你不沽酒割肉祭享它，必然使它龙颜大怒，发动大水，使桑田变为沧海。在当初可能是偶然凑巧，但后来就成了定规。历届县知事只要到了汛期，不管有无黄蛇出现，都要杀猪宰羊，祭享黄龙。谁知这个巡按是个西门豹式的人物，不信神鬼，听了知县汇报大发雷霆。喝令知县发动民众修堤筑坝，管束黄河，并把仪封县名改为兰封。兰者拦也。自是之后，

县知事便发动民众修堤打坝，使黄河东北流，初步受到约束。又经数百年的人工防范，尤其是解放后，毛主席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亲临视察，登上坝头，高瞻远瞩，面对着波涛汹涌，卷起万千黄色峰峦的河流，指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从此以后，当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把黄河的大堤加固、增高，在黄河拐弯处，打了六道坝并建立了一座通商丘的分流闸。因此，把早已留下的夹河滩村，撤下的夹河滩迤东的仪封大沙漠，就可以不怕水患而更加牢固了。这块沙漠很大，东西有数百里长，南北有十余里宽。从河南直达山东。一九四二年，经张绍儒多次派人勘探，历数月，把屏界考城和兰封两县的黄河废堤查清了。风口共有七十二处。在废堤迤南，从旧仪封废墟往东比较大的沙滩共有三十八块。经智囊团研究，最后确定在旧仪封城这一块（现今之国营兰考仪封园艺场，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为农垦地。因这里风口较小较少。由全联队每百人中抽五个，共计：一百六十一人。再加上联队部派出的管理屯田人员六人，共计一百六十七人。经张绍儒指定由刚从爪营换防回到城关的第二大队长高鹏云负责，拨给一批资金购置农具、肥料，还拨给了一批战马和畜力车等。出发前，张绍儒给动了员，说明“这和打仗一样，甚至比打仗还难。我们的弟兄都是来自民众，为了民众。黄土沙漠为兰封县之一大害。弟兄们要下决心为民除害，必须硬干、苦干、死干。使沙漠变为良田，改造自然”云云。

在一九四三年年初，高鹏云便率领这一百几十个人的农垦队，有一部分人还跨上战马，或坐上畜力车，载着农具、种子、帐篷和肥料、灶具及行李等，浩浩荡荡，由兰封城出发，迤迤向仪封前去。

高鹏云率领农垦队到了仪封，卸行李，支帐篷，一眼望去，沙丘累累，黄沙茫茫，北风凄厉，飞沙蔽空。诚如李华《吊古战

场文》所云：“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虽然如此，却吓不倒农垦队的指战员们。“强将手下无弱兵”。他们只要一想起临来时联队长动员时所讲的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便浑身是劲了。

高鹏云首先把带来的这一百多人，编了一个中队。按四四制编制，中队下设四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四个班，每班十人。班为垦植单位。每班配备三匹战马，充作耕马和运输工具。每块沙地划定三十亩，约合每人三亩。十六个班共四八十亩，加上指挥部六个人的二十亩，恰为五百亩。

他们初来时是元月，天寒地冻。首先是支帐篷，防风御寒，掘水井，解决水源。至二月天气渐暖，他们便平沙丘，盖住室，按每三十亩为一块，东西向，长方形，划分土地。地之北边，密植防风林，林林相连，形成了一条长五里，宽十米的防风林带。在防风林南边和垦地中间，还挖了比较适宜的埋沙沟和防沙坑。在每块垦地的周边，每隔十米栽一棵柳树；在地的里面，又每隔二十米栽一棵泡桐。整个这块五百亩大的沙滩周围，还“夹板以栽”地打了一转一人多高的土围子，在土围子里面遍植了一转柳扑梭。

转眼到了惊蛰季节，“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清吴锡麒《七十二候诗·惊蛰》）。用兰考民谣说：“二月二，龙抬头，万物逢春柳先绿；柳先绿，春耕急，错过时机无粟稷”。农垦队的队员，全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当然会做到“不违农时”。在高队长的指挥下，一片春耕图画，在仪封的沙滩上展开了。撒粪的，扶犁的，修埂的，耩地的，铁锨挥舞，鞭响耒摇，或一马独奔，或二马齐驱，真是龙飞虎跃，一片欢腾。

经过数月的操劳，这五百亩垦地，到了秋季，竟收获了花生

二万余斤，高粱五千来斤，黑豆二、三千斤。共计三万来斤，亩产六十斤左右。还收割了几大垛柳条子，冬闲时可编织箩筐。读者不要小看这个，不要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那时在兰封县东乡一带，上好土地，丰年亩产仅百斤。中等土地亩产约四、五十斤。大部农田，只能保本略余。这个产量算是中等以上。常言说：“头三脚难踢”。以后亩产逐年递增，毋庸赘述。

其实，张绍儒办农场不是单纯的为了收获一些粮食和柳条，而是有其宏伟的打算。紧接着这个农场的开辟，他又拨一个中队来开辟工厂。即紧挨这农场向南扩展，又拓出了五百亩土地，照样用一转土围子围起来，并建了两座厂房，盖了上百间宿舍，开拓了一个练兵及试验场。把手榴弹车间全部搬到这里，在这里连制造带试验，既机密又安全。此外，还在这里另建了一个锻工车间，置了十几窖烘炉，派了几十名锻工。他们的任务是：把联队派兵夜间去挖来的铁轨，在这里变形，然后再偷偷运到城内修械所当原料。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增加了农业生产减轻了民赋，又掩护了军需工业。

在警备联队的带动和影响下，附近老百姓也有自动来这一带开荒种地的。可笑可气的是郭伯理，二区的土匪区长，一见联队在沙滩上开荒，便骑马在北沙滩圈地。他在马尾巴上拴上一把扫帚，在瓜营北边沙滩乱跑一气。凡他的坐骑尾巴上所吊的扫把在沙滩上扫上了帚印便成了他的私有沙滩。

海 州 贩 盐

海盐是一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当时由于交通困难和日寇的控制，内地海盐成了奇缺物资。一般百姓多以硝盐作饮食的调

料。尤其是我根据地 and 河西国民党统治区，海盐更缺。兰封至海州有直达的陇海铁路，只要能打通层层关卡，把海盐从连云港运过来，既能解决人民生活之急需，又能增加军费开支，宁非一举两得？可惜当时这种宝物，成了日本人的专卖事业，中国人只能通过冒险犯难，小量走私。经智囊团反复研究，运盐好，运不了。只能望盐兴叹，垂涎三尺，无法动手染指。恰在此时，身任伪河南省绥靖委员会主任的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派员蒞兰，向张绍儒接洽收编他的部队问题。张遂乘机向来人提出：“部队开支浩繁，兰封风、沙、蝗、旱，灾情严重，军需匮乏，请予接济！否则请孙总司令帮忙设法代办一个盐业营运许可证。”经来人回汴向孙反映后，孙一想：只能打猎济贫，宁能剜肉医疮？遂允张绍儒的所求，给他代办盐业营运许可证。当时盐务归伪建设厅管，厅下有盐务局。适逢那一日陈伪省长在伪官邸设宴招待“友邦”人士，并邀伪厅长以上千员作陪。孙良诚和岳迹樵（伪建设厅长）在宴会厅见了面。孙顺便把张绍儒想办一个盐业营运许可证讲了一下。孙良诚的话，岳迹樵是不敢怠慢的。所以他回厅后的第二天就和盐务局长讲了。可是盐务局却一直迟迟不办。后来，张绍儒才打听到原是因为此事无先例，其中牵连到一道税收问题。按当时日寇对中国分而治之的决策，东北、华北和华中南实为三个势力范围，说清楚一点就是三个伪国。东北公然名为“满洲国”，华北虽然名义上还是和汪伪的中华民国没有分开，而实则在王揖唐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辖治下的四省三市是独树一帜，各自为政的。打的旗帜不一样（华北为五色旗，华中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上边挂一条三角形的小黄旗，缀有“反共、和平、建国”六字），用的货币不一样（华北为准备券，华中南为储备票），党派领导也不一样

（华北为伪新民会，华中南为汪记国民党）。因而，在华中南纳过税的货物到华北来了还得纳一次税。反之亦然。当时按规定，日本人的货物不纳税，只有中国人的营业才纳税。前已言之，海盐这项营业，只许日商专卖，中国人只能与盐务局或盐场勾结起来实行走私。走私当然是不纳税的，只要贿赂了有关人员。象张绍儒联队这样想公开合法的与日商并驾齐驱搞盐务，实属中国人之创举。真使盐务局的干员不知所措。他们既不敢得罪孙良诚，又害怕夺了日本人的生意使他们发火；想叫张绍儒在连云港购盐时出了税，来到河南后再报一次税；这样他们对日本人好说话；但又怕张绍儒不干。翻来覆去没个主意，这就是这次张绍儒联队要办的盐业营运许可证迟迟不能下达的原因。张绍儒知道了这个原因后，便亲自出马来到了开封，径到盐务局长家里送了一份厚礼，说明自己为了苏民困，实军需，情愿出两道税金。这样，他的盐业营运许可证才被发下。张绍儒把这张许可证带回兰封后，即派段其祥副官主任的胞弟段其光负责，又抽调了一班人协助，携重金搭火车前往连云港贩盐。第一批运出三千吨，但中途被人武装抢去不少。他们自己也佩带有枪，岂奈寡不敌众，有些人还为护盐受了伤。剩一部分运到兰封后，在销售上又经宪兵队和商会种种阻扰，说盐中有假，掺了硝盐什么的。张绍儒明白这都是为了“要税”，即层层打关节，给商会、宪兵队都送了礼，还给孙良诚和张岚峰每人都定了一些干股，请他们命令他们各自驻防在陇海沿线的军队费神保护兰封警备联队的盐运，之后才得以顺利进行。

从连云港几分钱一斤买到的大批食盐，运到兰封一带推销，能卖十倍以上的价钱。后来张绍儒联队军需开支，百分之五十以上就靠贩盐。

打入合作社

日寇在县城里办起了合作社。实际是为了以少量的工业品换取大量的中国民间土特产。但其中门道也很多。如果和合作社挂了钩，不仅可以得到大宗货物，而且能够按批发价购货。批发价比市价约便宜三分之一。经张绍儒和其智囊团研究，瞅准了这是个招财进宝的门路，便选派张绍儒表弟胡彦儒打入，归联队军需室领导。不消说，打进去这么一个人，也是给合作社的日本人行了贿的。当然联队长的面子也有点关系。自从胡彦儒进了合作社之后，每见合作社进了货，就以各种名义批发给军需室所经营的有关商号或军需室所组织的商队。它们按市价在当地出售，或运往外县去卖，或按原价通过各地下交通联络线路，转让给根据地。如食盐、火柴、西药、手电池等，当时都是我根据地最缺乏的物资。自从胡彦儒进了合作社之后，兰封县合作社每年所经营的各种货物，大约有百分之七十落在了张绍儒联队所经营的商号和商队手里。一方面补充了军需开支，一方面支援了根据地。

修械所的建立

军火没有来源，军队越来越多。经智囊团和张绍儒研究结果，从一九四一年年初开始，在西大街城隍庙里，先从试制手榴弹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试制结果，旋告成功。次年即正式在城隍庙成立修械所，任命张伯英当所长。由鲁西南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赵玉泉管生产。修械所实际是联队的兵工厂。非有能工巧匠不可。开始时，在技工方面，只有来自张公安碧的杨玉格父子

二人。其子杨汉臣尤具匠才。当绍儒还在三区打游击时，他父子俩除修理枪支外，还能制造“独眼铳”，又名“抛把子”。即枪膛里只能装一颗子弹。装时须抛枪而填。光这两人是不行的，而且杨玉格原为木工。所以绍儒才到开封又物色来一些金属技工，然后又从联队的士兵中挑选了一批青年来当学徒，又配备了一些管理人员进来。人手齐备了，就得有设备。所以一九四二年年年初，由绍儒亲自出马，携带上几名行家和巨额资金，火速动身到天津购买机器。去的结果，购回各种车床共二十五台。现在能够记得起来的有：十二呎元车一台，十呎元车四台，小型旋床三台，立铣一台，卧铣一台，大刨床一台，小刨床一台，大牛头刨一台，小牛头刨一台，大、小柴油机各一台。工种上：车、钳、铆、锻、铸、焊、木，应有尽有。除千方百计购买了一部分需要的稀有金属外，在钢材方面，则全靠夜间去刨铁轨。

修械所在城隍庙里是以大殿为车间，两厢配房作其他工种用。此外，还在空地上又建造了一些房子，供办公和宿舍用。

修械所从试制手榴弹开始，继之就修理损坏枪支。后来就正式生产：仿三八大盖板步枪、马枪、轻重机枪、掷弹筒、枪榴弹等。在修理枪支中，赵玉泉还巧妙地换了日军的一挺马克欣重机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日军驻兰部队的一个兵，拿一支坏了的重机枪来修械所请求修理。赵玉泉接下后，便和张伯英合计做一支类似的假枪给他，昧了他这支原枪。修好后自用。张同意后，赵就这样办了。日军一看不是他的原枪，便来追查。赵玉泉给了他一个不见面。他就找张绍儒，叫联队长代要。联队长今天说查，明天说问，同时即把赵玉泉调往别处，给他个永不见面。一拖再拖，拖了一年半载，日本投降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修械所，不仅为警备联队造福，同时也支援了我根据地一批枪支和手榴弹。

赵玉泉在修械所负责生产，只是个职业掩护。他本是我冀鲁豫鲁西南办事处把他派到张绍儒部队的地下党员。自从万一同志被考城县伪警备队长张盛泰杀害后，剩他一人在这里工作。但张绍儒和张伯英都很支持他。只要地下工作有事，说一声就可潜然而去。张伯英还和赵说过这样的话：“最后还不都归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修械所被国民党河南省第十二专员公署胡长怡专员接收了。兰封解放后，归了河南省军区。

以上所举，不过是兰封警备联队开辟财源的几项举举大者。此外还在南关开设煤厂，城内开设被服厂（除给军队制作被服外，也对外营业），还有其他商店及数十辆大车组织的商队长短途贩运，买贱卖贵，获利不小。主要支援军需，也暗中支援根据地。

第十六篇 张绍儒被关进了 日本宪兵队

突 然 袭 击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黄昏，张绍儒正在兰封县南门里警备联队部后院西屋他的寝室内患着重感冒，头疼、高烧、奄息在床，其妻素琴陪伴在侧。警卫员常义成进屋报告，有三位日人求见。可是未等传请，那三位日人已经贸然进来，素琴和义成都转身而出。张绍儒刚挣扎着坐了起来，还未来得及下床招呼，那三位日本人已经摆好阵势。他们一人站在病榻正前面，其余二人则分守两边，而且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你的，”站在床前的那个日本人指着张绍儒说，“有人告你通共。”

“没有的事，”绍儒坐在床上回答，“可能有人和我有仇，挟嫌误告。”

“这是上级来的命令，”那日人又说，“有没有，都请你到开封宪兵队去说清楚。”

绍儒一看这种形势，自忖难以逃脱，只得跟去看势行事。于是他挣扎着穿上军衣军帽；下得床来，又暗带手枪，明挂佩刀；

脚蹬马靴，肩披斗篷，威风凛凛地被那三位日人前导后拥龙骧虎步地走出了屋门，朝前院大门走去。后面呼的一声跟来了四位挎匣枪的护兵，因为他们以为联队长要公出，这是向来的老习惯。只要联队长出门，总有四个护兵跟随。但张绍儒心如明镜，暗忖此去凶多吉少，以少搭进去人为好，便回头喝退三人，指定光杨汉民一人随同。护兵们只得遵命而行。

他们一行走出联队部大门之后，张绍儒环顾街上，日军林立，警宪夹道，北起宪兵队，南至南门外，都是岗哨夹道，武器森森。张绍儒不管这些，他用检阅队伍的神气，潇潇洒洒在三日一华的围随中穿过了这些行列。出了南门向车站望去，道路两旁的布置完全和城内一样。他们一行到了车站，在站长室稍候，西去的火车一到，张绍儒和杨汉民被那三位日本人在武卫森严戒备中请上了火车。

兰封至开封区间四十五公里，火车很快就到了。他们把张绍儒及其护兵围随着，在灯火辉煌的开封车站下了车。出站后，早有一辆中型吉普在站口等候，绍儒及其护兵被日本人打开车门让进车厢里，原来车上已经坐有三个宪兵。他们刚一坐好，汽车便隆隆向城内驶去。在寺后街东口路北戛然停下，便嚷着叫下车。下车后，绍儒举目一看，原来这里是河南省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口，护卫胁迫，门禁森严。他情知不妙，便以肘杵汉民，眼里传神地向他说：“你到大梁旅社开好房间，我在这里谈完话就去了。”

杨汉民半信半疑地离开了这里，绍儒便被带进了宪兵司令部。在宪兵司令部门内，宪兵们叫绍儒在靠近大门的东边一间小房内坐了一小会儿，就又请他走。他被那几个宪兵围随着，出了司令部大门，乘原车向东驶去。

审问者被审问

原车把绍儒载到学院门街西口路北停下，这里是开封日本宪兵队本部，绍儒一下车，就瞥见宪兵队的朱门口，除门岗外，门旁东侧，还有一座钢骨水泥地堡，他被宪兵们围随着，登上朱门台阶，跨过一尺多高的门槛，又看见门里横着一条盆口粗的狼牙棒，有四条短木腿支撑着，是一根浑身栽满长钉的大木梁。他们进时，有人把它错开一条可以过人的缝隙，人一进，就听咣咣一响又挡上了。

张绍儒被带到灯火辉煌的拷问室。拷问室是一座五间大房，宪兵罗列，刑具累累。他们把绍儒推在大厅正中间的公案前。他抬头一看，公案后边坐了一位戴中佐军衔的日本宪兵官员，他明白这就是森木队长，否则，宪兵队再没有这么大的官。

张绍儒刚在公案前站好，森木中佐问过了他的“验明正身”那一套之后，接着就问：“张绍儒！八路军常常通过你的防地，你为什么总不截击？河西国民党抗日政府还给你加委，说明你是既容共又通国。”一顿，他看见绍儒不吭，又补充说：“你给我回答！”

绍儒一听，森木中佐问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莫须有”，而未触及到地下工作关系。他不是不回答，而是正在考虑如何回答。一听森木叫他回答，便侃侃而谈。他说：“我的地区并不与八路军根据地壤地相接，等到他们到了我的防区，还不知闯过了多少关口，周围地区的驻军都挡不住或不敢拦挡。我的队伍是民团组成，而且驻地分散，一旦发现‘匪情’，又一时集合不起来。等到集合起来时，‘匪军’早已过去了。这个经验何止一次？再说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谁不晓得那是满天飞。他们想拉拢我，我

给它办过什么事？”

森木中佐一听，寇颜大怒，斥责张绍儒这是狡辩。喝令他跪下回话。他不理睬，便有几个宪兵一哄而上，用手拧他的胳膊，用脚踹他的膝盖窝。他依然屹立不动，并反问森木：“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侮辱我？”森木气得摇头晃脑，怒眼圆睁，只是喊打。于是两个彪形大汉各抡一只改心棒便来打他，被张绍儒两手一伸把两只改心棒架住？大喝一声“慢着！”便抓住日本侵华的骗人的高调痛骂起日本人来了。

“你们高唱‘中日亲善，睦邻友好’，却占领东北，又侵华北，直抵中原，遍及沿海东南各地。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庐舍为墟，妇女被强奸，土地被强占。

“高喊禁烟禁毒，却公然贩毒卖毒，广植罂粟，遍设烟馆。毒害民众，不事生产，这能使‘东亚共存共荣’吗？

“抓壮丁，拉伕子，送到日本下煤窑，腾出你们的人来参战，这叫‘东亚和平’吗？

“南京的大屠杀以及各地的万人坑，千人塘，这叫‘王道乐土’吗？

“你们一方面喊‘中日经济提携’，另一方面又说‘工业日本，农业中国’，不觉自相矛盾吗？

“你们不仅侵略中国，还要击灭英美，这叫‘万邦协和’吗？”

“住嘴！”

张绍儒怒斥日寇的话未容说完，即被森木中佐喝住。并喊使喽罗们上去把张绍儒的衣服剥光，给他照了裸体相，又把他推搡到屋外的西夹道一个大水缸前，由几个彪形大汉把他揪进这个冷水缸内洗了冷水浴，又把他揪出来，仍然由这几个彪形大汉把他

连牵带推，到后院操场跑了三圈，然后返回前院，把他的斗篷扔给他，便把他送入地牢的铁笼之中。锵然一声落了锁。威威武武的联队长仿佛变成了一头畜牲。

这座地牢就在宪兵队的拷问室下头，原是二十年代初期，军阀赵惕在河南当督办时给他母亲修的住室。中间是她的客厅，一头是卧室，一头为起居室，大小与上层相等，约有百平米。因事隔多年，到日寇入侵开封后，早已破烂不堪。促织满地，蛛网蔽空，阴暗潮湿，无法收拾。森木中佐眉头一皱，便从北平动物园把装狼槛虎的铁丝笼运来四十只，分两行摆在这地下室，作为囚犯人的樊笼。每只樊笼的大小，高不能直腰而立，长不能伸腿而卧。把一个身躯魁梧的张绍儒就装在这样的樊笼内，使其佝偻而立，蜷腿而眠。虽骨节痠疼，也无可奈何。而且四十只铁笼，每只都装有犯人，透过铁丝空隙左右张望，则见：有的瘦骨嶙峋，有的蓬头垢面，有的遍体鳞伤，有的断股残肢，有的呻吟不已，有的嚎啕痛哭，有的饥肠辘辘，有的满脸癣疥，有的高烧发汗，有的浑身打颤，有的……。而且如狼似虎的宪兵，手执改心棒，在两行铁笼中间的电灯照耀下，瞪这个，吓那个，仿佛谁挖了他家的祖坟，但见他怒火千丈，仇恨满腔。

这种改心棒，可能是日寇专为中国的“罪犯”制造的刑具。它的形状是五尺多长的大木棒，上圆下扁，上绿下红。在下头红宽板子上面，大书“改心棒”三墨字。

三月下旬的开封，常常是狂风阵阵，黄沙飞扬，天气还比较寒冷。张绍儒本来就是带病来的，又加上这半个夜晚的折腾，他的病更重了。他在铁笼中，赤身裹了一件绿呢斗篷，冻得他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哆嗦得象筛糠似的，上下牙直打架。铁笼内还放一个便盆，臭气扑鼻。

每日生活是三个馊子团充饥，三碗瓦突水解渴。每天早晨放一次风。

事 件 起 因

前面已概略提过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的统制，是军管制。所谓军管，并不是专以军队来管，而是包括一整套由军队、顾问、警察、宪兵、便衣、特务、法院、监狱所组成的天罗地网，把中国沦陷区的黎民百姓牢牢地禁锢起来。尤其是从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起，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以来，加强保甲，组训民众，扩编伪军，防谍防共。“只许官家沿山放火，不许百姓袖筒内点灯”。日鲜浪人可以公开贩毒、卖毒，老百姓只要家里有包食盐或一箱火柴，便说你有意转往“匪区”，犯了通共嫌疑。尤其是为虎作伥的汉奸、特务，对百姓更是百般敲榨，巧取豪夺，强奸妇女，绑架肉票。乱扣通共反日帽子，加罪危害社会治安。行了贿的恕你无罪，不出“血”的则假案真办。无辜民众，恨之入骨。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张绍儒暗中组织了一个锄奸队，对其中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害人虫，往往把他诱至荒郊野外，将其处死埋于沙丘之中，或者瞅准这些坏蛋出城作恶时，于中途僻径中伏击，将他们撂倒，埋于旷野无人处。使宪兵队难于破案。这样整治了几次，使宪兵和特务都大受震惊。他们为了保命，多匿迹城关不敢外出。日寇派未死的特务再去侦察时，他们总是不敢远走，到城外附近什么地方抽会儿烟或闲玩一会儿，便胡编上一套回来向日寇报告，日寇照他们的谎报行动，十有九错。无奈何，日寇只好求救于张绍儒。一日，兰封县的日本宪兵队派人来警备联队部找见张绍儒说：“你的联队分驻在全县各区，士兵多系本地

人。我们原来的特工人员是满洲人多，人生地不熟，动辄制肘，很难活动。最好你给我们抽调一些亲日分子，来给我们搞特工，以加强防谍防共战线，皇军要大大的嘉奖你。”并高翘拇指作表扬状。绍儒知道这个工作，政治敏感性强，未敢遽允。怎奈他们三番五次来提，不得已才将其亲信魏玉琨等一班情报人员派给他们。但暗中吩咐他们如此行事。

魏玉琨等加入了日本宪兵队的谍报队，任其驱使，一呼百应，东奔西跑，南来北往，风尘仆仆，不惮烦劳。夜派夜行，昼遣昼去，风雨无阻，炎凉不避。但所报情况，则谨遵绍儒所嘱，对八路军过境以近报远，以少报多，而且总是过后才报，成了“马后炮”。对土匪的行踪，则具体如实以报，使日寇稳捉稳拿。总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马逢乐部之消灭，即其一例。

经过日寇长期观察，全县军政大权都握在一人手中。（军权不必说，张绍儒任联队长。他如政权方面，各区区长，也都陆续换成了他的人，其余连县长在内也都是惟张绍儒的“马首是瞻”。）再加上这股情报势力，日寇深恐张绍儒成了“尾大不掉”，使它处于“强龙不压地头蛇”之势。早欲下手，苦无良机。恰在此时，日寇为了打通并确保纵贯大陆南北的京汉铁路，连接粤汉路，以补救其海上运输之困难。遂渡河西侵，在国民党部队的溃退中，他们在拾得国民党军遗弃的文件中，从其中发现一份一战区的通令。通令上有任命张绍儒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纵队司令等文件，遂认为抓住了张绍儒与重庆关系的真凭实据。即电告驻开封皇军将张绍儒逮捕。

营 救 经 过

再说，杨汉民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口与绍儒分别后，遵嘱到大梁旅社开好房间，扫榻以待。虽说旅社是个公共场所，什么人都来投宿。有的以赌会友，牌声历录；有的倩妓取乐，笑声朗朗；有的邀优清唱，曼声度曲；有的聚众饮酒，枚声聒耳；小卖满院叫卖，茶房抗抗攘攘，可是杨汉民心中有事，对这些乱哄哄闹嚷嚷的声势，只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心盼着那威武雄壮、气宇轩昂的联队长翩然到来。可是，“事与愿违”。一等再等，三等四等，通宵达旦，也不见联队长的影子。天亮后，杨汉民即到门口张望几次，也不见联队长到来。径走到宪兵司令部门口去找，同样无影无踪，无奈何，他只得回兰封去向联队报告。

杨汉民乘火车回到兰封后，向代理联队长徐守真报告，守真听后，即召集联队部智囊团的成员戴际良、石鸣珂和刘梦麟等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讨论之后，决议如下：

第一，以石鸣珂为主，带领杨汉民、常义成等去开封进行营救。

第二，密令联队机关和附属兵种（如骑兵连、手枪队、修械所等）以及各大队人马，一律暗中加紧备战，随时待命，不得擅离职守。

自此，以徐守真为首坐镇联队部，白昼一切照常行事，使日寇无懈可击；入夜，则兵不解甲，抱枪而卧，马不下鞍，草料尽吃。一旦张绍儒身遭不测，徐守真则立即率领人马撤至外线和日寇对抗。必要时，退到鲁西南游击区。惟戴际良胆小怕事，害怕招到他头上，灰心丧气地说：“头道箝箍已经抹走了，二道箝箍

也快了，再就该我这三道笞籠了。”他以学兵队教官主任的资格自称三道笞籠，虽然参加了智囊会议，但镇日躲在房中，不出一谋，不划一策。只怕日本逮捕他。

再说，石鸣珂等到开封后，寄宿大梁旅社。茫茫人海，机关林立，骑宪耀武扬威，警探虎视眈眈，张绍儒究竟关在哪里，真象石沉大海，深幽莫测。忽一日，他们闷坐在后保定巷七十八号董素琴家里，蓦地来了一个人，自称和张绍儒一起在学院门日本宪兵队关押过，他被释放了，特来送个信儿。此人说罢匆匆而去。得到这个消息后，石鸣珂等疑信参半，但这总算一个线索，便千方百计活动到在学院门宪兵队作苦力的一个中国人，给了他一些财物，才由这个苦力嘴里知道了张绍儒确实押在宪兵队本部地牢中的铁笼里。接着董素琴也来到了开封，在大梁旅社和这个苦力见了面，又给了他一些钱，央他活动一下给张绍儒送饭。苦力说，他自己也不能任意接近张绍儒，不过他可以买通翻译给想办法。于是董素琴又给了他一些钱托他去活动翻译；活动的结果，终于能给张绍儒送饭了。但每次都得送很多，因为层层克扣的结果，送的如果刚好够绍儒吃，绍儒就一口也吃不上了。

营救工作，不只是送饭，而最主要的还是找人递保状。石鸣珂把在开封往宪兵队送饭之事委托常义成和董素琴办理，他自己和杨汉民则奔跑于伪军政上层，求他们设法保释。“世路难行钱作马，关节欲打贿为军”。经他们活动的结果，首先是伪民权县县长李岩，东北人，操一口流利的日语，亲自到开封宪兵队去替绍儒说话，并递了保状。接着，兰封和考城两县伪县长也递了保状。但日寇对于犯人总是有错捉，没错放。曾经一度还企图把张绍儒解至南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处进行军法审判的森木中佐，岂肯轻易把张绍儒放出？在无可奈何中，石鸣珂等就想到了孙良诚

和张岚峰。这两名大伪军头子，张绍儒在海州贩盐的买卖中都和他们有协作关系，而且孙良诚还一度派人到兰封和绍儒接洽过收编问题。现在张绍儒身遭不幸，他们宁能袖手旁观？可是当求到他们时，他们只是哼哼哈哈，很不爽快。直到他们探听到绍儒并无口供，他们才出面说项。这时森木中佐正在为难，往南京解张绍儒，烟俊六不接，长期监押又无罪状。于是森木趁孙张二大员来说情，便答应把张绍儒释放，交他二位监管。

荣 归 原 职

从一九四四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起至同年五月二日止，绍儒在宪兵队的铁笼中整整关了四十三天。一无口供，二无人证物证，三是全县安定如恒，四是部队没有捣乱，送南京不收，长期羁押，又怕他的部队哗变。于是趁孙张二伪将军说情，顺水推舟，把他放出。五月二日早晨，森木中佐下了手谕，宪兵把张绍儒从地牢的铁笼中放出，还叫他在宪兵队沐浴、理发，换上他原来的服饰佩带，惟天气热了，斗篷已用不着，只好搭在胳膊上，还由森木中佐在其办公室接见，陪情道歉，伸拇表扬：“好样儿的，好样儿的！”当即把释放证给他，他拿上释放证转身离开森木办公室，昂昂然走出宪兵队大门。

在宪兵队门口，早有石鸣珂、杨汉民等焦急地等着他，一见他出来，便一起趋踉上前，接住他的斗篷，把他扶到早已叫好但虚位以待的洋车上，围护着把他拉到大梁旅社，在房间内换上他们给带来的单军装，佩带整齐，然后即走出旅馆，叫来三辆洋车，分别坐上，径奔车站，搭火车回兰封。

再说，这天早晨，张绍儒回兰封的消息在兰封传开后，一时

奔走相告，传遍了全县。军政会民，绝大多数都是欢天喜地，买爆竹，扎彩旗，攒锣鼓，动军乐，准备迎接。一霎时，只见那从城里到车站的大路两旁，黄橙橙刀枪耀眼，花簇簇彩旗飞舞。黑压压人山人海，挤挤拥拥，十分热闹。徐守真率领联队部各负责同志并手枪连到站迎接。命令手枪连列队站口之外，他和一伙负责同志进站迎接。西来的客车在扬旗外啸叫了一声，便徐徐来到车站。车放汽停轮，只见绍儒由鸣珂、汉民等陪同走下火车，依然神采奕奕，戎服佩刀，肩章耀眼，马靴锃亮，其凛凛威风，不减从前。欢迎人群给他敬礼，并高喊：“欢迎联队长归来！”他向他们还礼，并以笑代答。旋即被欢迎人群簇拥出站，军乐悠扬，手枪连气势雄壮。绍儒穿过时，手枪连一律敬了举手礼。接踵而来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彩旗挥舞，口号声、歌唱声、鼓掌声，形成了一片赏心悦耳的交响乐。张绍儒笑容满面，边走边鼓掌，以回敬大家的热情欢迎。这种欢乐的场面，一直把张绍儒从车站迎进了联队部。

念念不忘共产党

张绍儒出狱后，他想：要革命，只和鲁西南作一般联系是不够的，还得托鲁西南给自己培养骨干。可是，他这次出狱回来，适值于子元同志因工作调动不能再到这边来了。另派徐锡朋同志来这一带活动。他于是把徐安插在张公安寨小学当教员以资掩护。因这个小学，董素琴是校长，冯鹤林当张公安寨的联保主任，政治环境比较安全。当即把毛秀峰等三个心腹，派到张公安寨去，一边协助徐工作，一边问他学习革命经验。

开封宪兵队森木队长，所说张绍儒出狱后由孙张二人监管，

实际成了一句空话。张岚峰驻商丘，已是“鞭长莫及”。孙良诚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又由开封调往扬州，出了省，更谈不到什么了。兰封依然还是由张绍儒为所欲为，一直到日本投降。

第十七篇 张绍儒第二次入狱

民谣：

君子失势头不低，
凤凰落架犹胜鸡。
狮子脱毛惹猴笑，
虎离深山犬可欺。

从联合指挥部说起

张绍儒于一九四八年初，被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免去其保安第五团团长的职务，给了他一个司令部上校参议头衔，等于闲员一名。只因为这样不能为党多做地下工作，便竭力活动刘茂恩给他另行安排。刘茂恩考虑再三，封了他一个河南省杞兰两县民众自卫团联合指挥官，这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民众自卫团的兵都是不脱产的，各县、区、乡、村又都有负责的，谁听他这联合指挥部指挥？不过有这名义好做地下工作，于是他就在开封城内后保定巷七十八号，他的私邸就职了。他是指挥官，素琴为掌印夫人。兵就是原来就驻在私邸服务的两名警卫员。经过几天的准

备，张绍儒由开封出发到兰封走马上任时，随从人马，也不过十来个人，赶着两辆骡马曳着的大车和跨了三匹乘马。到兰封城内暂驻北街老盐店旧址。不久，又有原五团被接收后的遣散人员数人来归。后来，人员最多时也没超过三十人。

当时兰封县的政治环境很复杂，除驻有国军刘汝珍部的六十八师和曹福林的五十五师以及邱清泉的第五军一部外，还有地方团队、还乡团、红枪会和本县、附近各县的大土匪。尤其是还乡团中的戴秋阳当了“国大代”和大土匪中余烬复燃的田树恩当了开封县大田庄的联保主任。由于历史的渊源，这些人都和张绍儒结下了血海深仇。如今都在看他的“好看”，觉得他吃不开了。过去赫赫扬扬，而今灰不溜秋。“黑白布衫轮着穿”，现在该他们整他了。诬蔑他是伪军、汉奸队，先造了很多不好的舆论。他这个指挥部无待遇、无供给，只是就地派饭吃。因此他不能光住在城内，而且他还要做工作。工委给他的任务是担任地下交通站。为了完成工委给他的任务，他就得出城活动，不能死呆在一个地方。可是他的活动能力，不比他当联队长的时候。虽然如此，张绍儒是从大江大海、大风大浪、虎洞狼穴、枪林弹雨中搏斗过来的英雄好汉，尽管环境这样险恶，他一分钟也没有停止为党工作。他在兰封和县长王徽五搞统战，使他得以在三义砦、西谢庄和三区一带活动。杞县方面，他不曾亲自去。但经常派人去，并和陈留侯殿卿（陈留县保安团长）约好，彼此互相支持，互通情报。以后就经常派人联系。经过不长的时间，他不仅把杞兰两县的军事、政治情况掌握了，同样也掌握了陈留的情况。工委派去的曾洁光同志始终在联合指挥部运筹，因此，张绍儒搜集到的国军情报，随时都通过曾洁光报告到了根据地。并千方百计护送我军我党地下和地上人员南北过路。胡万杰同志牺牲后，他的家属

六口，逃出敌人的搜捕，也是由张绍儒同志把他们送往根据地的。他们现在都在北京为党工作，对张绍儒不无缅怀之忱。

转眼到了春四月，我大军云集陇海线两侧，刘汝珍和邱清泉部被打得狼狼狽狽，溃不成军。兰封县获得再一次解放（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张绍儒和王徽五一起被我军俘掳，带到了豫皖苏。

他们被俘虏到豫皖苏，不消说，他们是受到了分别处理，不同待遇的。但组织上为了掩护张绍儒，经过二十多天的分别学习，又把张绍儒和王徽五一起放回来了。王徽五回来后任开封县长，而张绍儒回来却当了寓公。当然地下工作，他照常做着。

“主席找你有事”

一九四八年五月的开封，城内已经十分混乱，物价腾贵，特务横行，暗杀失踪之凶信，时有所闻。但张绍儒对此环境早在意料，并不惶惧。照样从事地下工作，有时夜半始归。旧的僚属，已经都不怎么来往。还有跟随多年的人，也另找投奔。家里只剩素琴母子和两个护兵（常义成、刘长顺）。一日黄昏，石鸣珂从兰封来正在家和绍儒商量购买枪支之事，素琴一看来了人，这是近来少有的事，便提了一把茶壶走出家门到对面她娘家提开水，迨她提水回来，已经不见绍儒。据鸣珂说：绍儒是主席派人来把他叫走，说是有事。他们在家一等两等却不见绍儒回来。等到半夜，听见有人叫门，大家就想：定是绍儒回来了。可是义成去把门开开，进来一名司令部的勤务兵，直奔上房见到素琴，说是刘副司令（艺舟）派他来送个条子。素琴接过来一看，原是绍儒亲笔。上写：“因有通共嫌疑，暂留司令部。不日，问题弄清，即

回”。使素琴顿时皱眉苦脸，又气又恨。心想：这哪里是找他有事？分明是诬言逮捕。过了一会儿，她冷静了一些，便简单问了来人几句，来人也只是支支吾吾，不肯实说，便打发他走了。石鸣珂一看事已至此，也就告别而去。

石鸣珂去后，义成和长顺都来慰问素琴，素琴便把团长被扣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他俩听罢也唏嘘叹息不止。素琴说幸亏方敬之（工委常委）和曾洁光（工委负责五团工作的同志）等不在这里，明天一早需要通知阎慎予（地下党员）转告方、曾最近不要到这里来。并设法打听团长的消息。大家又围坐了一会儿，便分别睡去。

次日一早，素琴派义成出去给阎慎予送信，可是尚未走到门口，便挡了回来。因为在门洞里遇到一位着西装的特务，声称他奉命把守此门，所有院内人员，一概不许外出。素琴一听心焦如焚，立即又生一计，把挎上书包的六岁小孩全胜，携手偕行至大门里，声称送小孩上学，可是又被那人挡上，只把小孩放走。

过了一天，明岗撤了。家里人可以出去了。素琴即抓紧时间 and 外界联系，幸而见着了曾洁光同志。她给他汇报了绍儒同志被捕的情况后，曾告诉素琴说：“我们大家设法营救绍儒，你抓紧时间把家里的机密东西和违禁书刊清理焚毁或埋掉。”

素琴回到家中，等到夜阑人静、全胜酣睡之际，便伙同义成、长顺，借着灯光，翻箱倒柜，结果清理出一大堆文件、书刊。现在能够记得的，有：《中国共产党章程》、《虞初近志》（四大家族书皮伪装）、《大众哲学》、《华北文化》、《青年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社会科学概论》等等，这一大堆违禁书刊，堆在屋内，素琴看着它们发愁。挖坑埋了吧？搜出来会加倍处理；烧掉吧？搞得浓烟滚滚，四下弥漫，岂非等于

自己告自己的密。三个人商议了一阵，也没商量出一个好办法。后来素琴忽然想到街上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有眼苦水井，不如把这些东西扔到井里去。就看门口有没有人。想到这里，她便说出她的主意，并吩咐义成出去看看门外有人没有？素琴即和长顺把这一堆书分包成两包。义成回来说：“门外静悄悄不见人影。”素琴便吩咐义成和长顺各提一包出去往井里扔。他俩慌忙掂上包袱出门去走到井边。各自把包袱解开慌忙往井口里倒，只听扑通通响了几声。他俩一阵高兴回来向素琴报告，并递上空包袱皮两方。他们以为素琴一定高兴他们胜利完成任务。岂意素琴柳眉一耸，痛苦地说：“坏了。你们不连包袱皮捆着好好地扔下去，脱离了包袱皮的纸，不就轻飘飘沉不了底？”他俩一听傻眼了。第二天一早邻居去打水，果然有些书纸随着水桶又来到了地面。不过邻居们没吐出去，虽然他们会怀疑到这是谁家干下的活。因为那个年月，老百姓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探 监

在绍儒被捕后的不久，有一天早上，原来被刘茂恩派来接替了高鹏云的三营（保五团）营长的韩天庆来到了后保定巷七十八号找见素琴，说“团长押在司令部看守所，我和特务营王营长友好，我写个条子你去找王营长，就可见到团长。”至此，素琴才知道了绍儒被押的确切地点。

原来刘茂恩那天晚上派人来叫绍儒说是“有事”。实际是个骗局。张绍儒去后并未见到刘茂恩，而是一进门就把他揪入了监狱。

素琴平日本来知道韩天庆的来历，和他并不接近。今日他既然来送信又想办法叫去看绍儒，也只好强颜为笑地接待。

韩天庆坐下后，即索纸墨笔砚给王占同写了一个条子，掷笔而去。

素琴持条去找，果然在保安司令部前院找见了特务营的驻地。在一排西房的南头一间找见了王营长。王占同接着条子一看，一面给素琴让座，一面就去把绍儒叫来。绍儒坐在窗下桌旁的椅子上，素琴坐在靠里墙根的床沿上。王占同也坐在一旁。素琴只怕说错什么给绍儒增加麻烦，因此，只是粉颈低垂，默默不语。俩人脉脉含情地对看了一会儿，还是绍儒先说了。他说：“你不必心焦！不怕。过几天我的问题弄清了，就可回去的。你放心吧！”素琴不知怎样回答好，只是点点头，泪往肚里流。

就这样，俩人对坐不到十分钟，王占同便把绍儒带走了。素琴只得快快自去。

素琴带着满面愁惨回到家中。两位随从看见女主人皱眉不展，突然想起了绍杰。便向素琴建议：“团长既然押在司令部看守所，看管看守所的部队是特务营。那里有个号兵张绍杰，是团长的堂弟，原来就是五团的号兵，我们去找找他看。哪有堂兄遭难堂弟不管呢？”

素琴听了十分欣喜，便吩咐他俩快去。

义成和长顺即时去到特务营找见绍杰和他一说，绍杰大惊，他原来根本不知道绍儒已经押在这里。不过他说：“看管看守所是三连的任务，我是个普通一兵。你们要想见团长，我还得托人。”说罢用两眼瞪着义成和长顺。

义成看出绍杰面有难色，便主动问他说：“是不是得准备些人情礼物？”“准备上些好”。绍杰答。

义成和长顺去了。一会儿回来，掂了一个小包袱，给绍杰掰开包袱皮的缝隙一瞅，绿色炮台听和黄色白兰地酒瓶新鲜显眼，芳香扑鼻。他夺过去便转身去找当天的值星排长。一见面就把那包袱递给排长。排长老远就嗅到香味，双手接着包袱笑得合不拢嘴。忙问绍杰“你什么事？”绍杰倾身来咬他的耳朵。如此，如此。那排长一听满心欢喜，便问：“人呢？”

绍杰转身就去把义成和长顺领来。排长见了义成和长顺，吩咐他俩稍候，他出去和看守所长说了一声。回来后即带领绍杰、义成和长顺等三人走到监狱门口，伸手敲了几下门，门扇上的小洞口一开，从里面映出一张人脸。排长向那张脸交代了几句，只听哗啦一声门开了。排长即令绍杰领义成和长顺进去，他自己仍然值勤去了。

绍杰等三人进去之后，问明了张绍儒住的房间，看守叫他们自去，他们便自己去了。

他们找到了张绍儒住的房间号数。屋门敞着，往里一看，原来里边都是粗木直栅的木笼。他们尚在门外，便看见张绍儒坐在木笼之中。两只大眼圆瞪瞪地往外看，但默不吱声。他们三人进到屋里，向绍儒的木笼边走去，顺便看了一下，原来这间屋子内是三个小木笼。除张绍儒住的里墙根一座小木笼外，靠左右两边墙根也各有一座木笼。都是只住一个人的。

他们三人来到张绍儒的木笼边，尚未站定，张绍儒便安慰他们说：“你们不必害怕，弄清了就可出去。”他们三人同情地点点头。接着，义成俯首弯腰向绍儒透露：外面在托人说情，并问团长需要什么？绍儒说需要两个大铁钉。

义成和长顺回来给素琴汇报后，素琴心中纳闷，不知绍儒要这两个铁钉干什么用？素琴决定亲自去探监，便走去找绍杰。绍

杰把素琴领到监狱，吩咐素琴在院等着，他自己去把绍儒从木笼中放出。绍儒随着绍杰来到院里，一见素琴情致楚楚站在东墙根，便向绍杰说：“给你嫂子找个凳子”。可是监狱里上哪儿去找凳子，于是素琴迭说：“不、不、不。”俩人只好面对面蹲下促膝谈。素琴问绍儒“要铁钉干什么？”绍儒说：“我有用处。”后来，才知道绍儒要铁钉，是为了准备在后墙上钻窟窿做越狱用。墙后就是一条街。但后来又想到监狱砖墙很厚，钻透非同小可；而且那条街的对面有一警察派出所，也不易逃走。自己身份没暴露，何必“铤而走险”？也就再未提它。不过，自从素琴这次来后，已和绍杰约好，每顿饭都由家里送来，绍杰给转进去。从此，绍儒就再不吃牢饭了。

素琴回到家里和全胜说了绍儒住监狱的事。说了很多犯人住监狱的情况，全胜也闹着要去看爸爸。正好绍杰那天来了，素琴就叫绍杰把全胜带去看了绍儒。结果全胜回来向妈妈说：“我看见爸爸来，他在木架房子里坐着哩！没被大石头压着。”弄得素琴啼笑皆非。

过了几天，素琴又来看绍儒时情况变了。她找谁也不行，既不允许她进去，也不允许把绍儒叫出。她只好按规定登了记，排在监狱门外一般探监家属的长队尾梢依次前挨。后来总算挨到门边了。“张绍儒的家属接见”的通知由狱门里喊出后，也就是和绍儒隔着嵌在狱门上栅了几根铁条的小窗口影影绰绰地对看了几眼。什么也没说时间就到了。因为这时绍儒已经过了堂，法庭认为他态度顽抗。

三 堂 会 审

司令部的军事法庭，对张绍儒的审讯，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审讯是由军法处长曲星耀在司令部法庭内进行的。审讯开始也是照例行事地讯问了张绍儒“验明正身”一类的客套。张绍儒只恨他明知故问，故默而不答。迨曲星耀转入正题，问他从“豫皖苏匪区”是怎样回来时，这本是他早已料到要问到的问题，便按预定口供侃侃地回答说：“释放俘虏回来的。”

“带来什么任务？”

“你问王徽五，我和他一起被俘，一起回来的。他带来什么任务？怎么回来又当了开封县长。我是伪军改编为省保安团，人家能相信我？”

张绍儒回答到这里不吭气了。法庭陷入了一片寂静。稍停，曲星耀又问：“不错，你俩是一起被俘一起回来的。我问你，你们在‘匪区’是否也押在一起？”

“可不是一直在一起，不信可把他找来对质。”因为这一点，张绍儒有恃无恐，他和王徽五在往回走的路上，俩人就捏戳好了。王徽五这次被释，得力于绍儒说项。他感激绍儒的挽救，故约定誓死保密并相互支持。他看曲星耀没有下文，便又佯为惊讶地感叹说：“我说怎么我回来后没有安排反而把我逛来住木笼，原来是对我有怀疑。‘路遥知马力，久后见人心’。我张绍儒无愧于党国，天人共鉴。”

他说得曲星耀闭口无言，只得宣布“还押”。

过了几天，又把张绍儒提到法庭。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灯光下，他看见刘艺舟副司令着将军服昂昂然坐在公案后边中间。

左右两侧陪审官，一边坐着着警官服的杨蔚处长，一边坐着着军官服的曲星耀处长，公案前的两侧各摆了一套桌椅，椅子上都坐了人。桌上纸笔俱全，显然这是两位书记官准备记录口供。其余则警卫罗列于门内，刑具累累于一旁。阵势威严，张绍儒所站的身边，还站了两个怒目而视、跃跃欲打的人。张绍儒不知今天审问什么？但他心中十分宁静，宪兵队的狱中之狱他都闯过来了，因此他坦然地站在那里等候审问。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没有口供你杀了我算是虐政。他正在脑中思索如何应付，刘艺舟副司令已经开口了。他说：

“张绍儒！你知不知道这次为什么把你扣起来？”

“不知道。”

“跟你实说吧，告你的人太多了状纸有几尺厚。”他说到这里，杨蔚便从公案下头掂出二尺高的一捆状纸往公案上一放。接着刘艺舟指着那摞状纸向张绍儒说：“这些状纸上都确凿有据地写满了你的罪状，你还有啥说的？”

张绍儒看着刘艺舟说：“副司令？这可能是别人和我有仇，挟嫌诬告。是否可以叫我略闻一、二。”

“废话！”刘艺舟说，“你的事你最清楚。咱们的法律是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是明白人，还是自白好。”

“我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这家伙顽固，”杨蔚说，“叫我给他点一点。”

张绍儒态度雍容，静候他点。只听杨蔚满有信心地说：“第一，你老婆董素琴在张公安砦小学当校长，那里早已成了匪区，这不是给共产党办事是什么？第二，你的大堂兄张绍仁给八路军购买子弹，你能不知道？第三，兰封东乡老早就是匪区，你在保安司令部当团长，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他们不但不烧你的房

子，还容你从家往外拉东西？你说说这是什么缘故？第四，全省共有六个保安团，三个团长阵亡，两个团长被俘。他们的团队不是溃散便是被消灭。而你所率领的第五团，在杞县、陈留、通许作战，不单没被消灭，连你自己也安然无事。这又是什么原因？第五，嗯！我不说了，留下让你自己交待吧！你先把上述四个问题说清楚。”

张绍儒一听都是些扯淡的事，没有一条触及到地下工作的。遂正色回答说：

“我老婆在兰封张公安营当过小学校长，不假。可那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事。那时那里没有八路军。随着日本投降，五团奉命离开兰封，到杞县、陈留一带驻防，我老婆作为随军家属也就离开那里，以后并未回家。连八路军的面都没见过，怎么谈到为八路军办事？第二条，大堂兄张绍仁已经去世，即以他在世时说，我多年不回家，他干什么我怎么知道？第三条，我多年从事戎马生活，效忠党国，未曾回过家。家中房子都是乡邻住着，‘奸匪’烧不烧我的房子，我怎么知道？至于说从家往外拿东西是拉出一些老父种的柏木材料，可拉材料时，八路军还没到我们家乡去哩！第四条，全省六个保安团，团长中惟我幸存这是事实。但我带领五团，前年冬，奉命去收复通许，进至万龙岗时，即被新四军包围，激战一夜，敌不支，溃退，我团遂收复通许。旋由二团驻入。后来我团驻防杞县城内，曾有很长时间，陷入新四军的重围，当时曾几度向省上来电乞援，并率所部坚守待援，但援兵迄未莅临，卒被‘匪军’攻入城内，我军顽强巷战，和敌逐屋争夺，无奈‘敌’众我寡，我军二、三两营牺牲殆尽，两名营长都挂了彩，伤势严重，无法再战，我奉命率残部突围，撤退至白丘时，刘主席亲临抚慰，勉励有嘉。再说，陈留战役，守城军队共三个

团。除我团外，还有吴茂亭的保一团和侯殿卿的县保安团。而且保一团主守，他们把我团派去支援的客军不叫进城，放在南关。新四军是先从我团防地进攻的，遭到我军激烈抵抗。那两个团不战而逃，他们在城外遭到新四军伏击，一团被歼灭，团长被击毙；侯殿卿的保安团受了重创，因其地理熟，逃走一部。我团也受了重创，急电省上报告孤军难支，才奉命退至老虎庄（村名，在大堤外，属开封县），点检人马，只剩三百来人。我从兰封出来时是一千六百人，几年来，还给我补充了几次，现在只剩三百人，难道说，连我张绍儒也死在疆场，你们才高兴？”

张绍儒的这一席供词，凿凿有据，说得他们抓耳挠腮，嗫嗫嚅嚅，无词以对。三位法官盛气凌人的态度变成了软绵绵的气息。他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儿，由刘艺舟宣布“还押”。

这场三堂会审，真是来的极紧，散的极松。从这以后，再没过堂。

奔 走 营 救

为了营救绍儒，素琴先去宋门里找过王东斗，这是刘茂恩派到五团监督绍儒的副团长。后又调走去上河大。他老婆在调统室工作。素琴找到他，向他说了绍儒被扣的情况，他答应给问问。但和素琴说，不叫她以后直接找他，不方便。可派长子纯朴来，可是纯朴这时已经躲开了。素琴又去找到省府秘书长齐真如。齐说：“没啥，主席不会怀疑绍儒。我去说说吧！”可是过了几天又去找他时，他已改变了口气，说，“杨蔚已经插了手，三天两头亲自来过问，看来宁押死狱中也不放。”这条路，从此就不再去了。

无奈何，素琴又去寻找第十二专署警备副司令赵彦初，这时他已兼任了兰封县长，他家住开封城里西小阁街。找见他时，没想到他态度冷漠，语言搪塞。其妻穿着豪华，臂带金钏，大模大样，远非昔日在兰封相会时那样亲热。真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赵只是匆忙地说：“关于绍儒的事，县里已递了保状。现在又在发动民众递联名保状。”

素琴看他们夫妇对她不热情，便动身要走。赵彦初又把她捺在椅子上坐下向她说：“绍儒不是有支德制八音手枪，他现时在狱中不能带，拿来叫我带几天。”

“人到矮檐下，怎肯不低头”。素琴想：给就给吧，枪没人重要。回家后，便派义成把这支手枪送给了他。

家乡常来的人也不多来了。都躲得远远的。连石鸣珂这些人也不例外。有次他来时还向素琴哭穷，说：“我们也没钱，一切开支都得由你自己筹措。”素琴并未向他张口，他却先发制人。使素琴深慨世态炎凉，人情如纸。

可是，张绍儒在监狱没有口供，捏造的诬蔑不实之词又摆不到桌面上，也没人敢来对质。因此，在他坐牢三十四天之后，适逢我大军攻打开封，飞机场和邮电大楼已被我军占领，小南门已经起火，在万分紧急情况下，刘茂恩便下令叫张绍儒取保释放。

他一出狱，就卷入了我工委对攻城部队的内应工作中。

第十八篇 开封解放前夕

城防鸟瞰

内战形势与小小酒家

一九四七年的六月三十日夜间，刘邓大军从鲁西南地区南渡黄河；从此，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是全国战略反攻的序幕。继之而来的是陈粟、陈谢大军南下。这三路合计共六十万野战大军，同蒋家的美式武装混战于江淮河汉之间。开封就处在了战火包围之中，城内炮声隐隐。“自古谁得中原，谁可得天下。”

但开封是中原的核心，河南省会，历史名城，国民党和美国顾问团，岂能等闲视之。所以陈毅同志说：“逐鹿自古在中原”。他们调兵遣将，构筑工事；加强特务活动，实行白色恐怖。妄想使开封城防铁桶相似，负隅顽抗。

针对以上情况，我地下开封工委一面发动学生、市民、工人以及爱好和平民主的上层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的群众运动，同时又发动我地下军窃取敌人作战计划，兵力调动、集结、部署等情报，随时报告我军，并根

据我军的需要，随时配合行动。国民党军在河南省活动的枢纽和中心，是省会开封。因此，我地下军的同志们，为了“樽前诱得猩猩血”，就在中山路北段路东大陆电影院（现为工人电影院）北隔壁第二个门，开设了一个小小酒家。说它小，可真不大。只有一间门面房，门面房里面是一间“倒座”，倒座和门面房上面是一间小楼。它们的用场是：门面房营业，倒座是灶房，楼上为卧室兼瞭望哨。楼梯就在倒座房内。营业品种比较简单，就是酒和几样下酒小菜，如变蛋、卤肉等；也炒几样荤、素菜。为了招徕顾客，在酒馆门外挑有一竿酒旆。门框上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闻香请歇脚”；下联是：“入馆赛归家”。那时人们精神空虚，故一开张，生意就很兴隆。但楼上是安静的，没生人上去。小楼兼作了我们的地下联络站和临时谈话、住人之所。

酒馆资金是由毛秀峰（地下党员、地下军副官主任）等同志私人拼凑的。保安团长张绍儒（地下党员）也要拿钱，因不需要，未让他拿。他在名义上、政治上支持。

酒馆内的正式职工共计三人。他们是：沈文礼（地下党员，保安五团副官）负责，李奉军（进步青年，党的发展对象，保安五团一营军需上士）管帐，黄金明（群众，原为省城某饭馆厨师）掌灶，技术不错。毛秀峰同志则奉张绍儒之命，经常在酒馆具体指导，也帮助操劳。

酒馆内的人员，接受党的指示，经常看形势，分对象，用群众语言，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以此来团结进步青年并瓦解敌军。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考验，发展了大纸坊街第三分署一名户籍警叫王正伦的为党员。他管理午朝门一带的户籍，酒馆正座落在他的职责范围内。因此，我地下工作人员来往住宿或临时避难，从未有人来查问过。可惜他在第一次解放开封战役中为去侦察北

城外拨沙情况被国民党城防军枪毙于龙亭西侧。

通过王正伦又结交了午朝门街的保长，我们就利用后者打掩护。例如军警宪常于夜半突然查户口，总免不了保长陪同。只要查到酒馆时，保长说：“这酒馆是我的朋友开的，我敢担保无问题。”因而每次都免了惊扰。还发展了一个学生党员叫金鸿文，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不过，既然是在大街上开的酒馆，那就什么人也来。阔老恶少，络绎不绝。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上了国民党军开封城防司令部一位少校作战、教育参谋（主管作战和士兵训练计划的）。大部分城防情况，都是由他嘴里说出来的。那么，他又是怎样和我们认识的呢？溯本追源，原来是毛秀峰同志曾在兰封城内和豫东师管区一位姓路的上尉副官合资开过饭馆。现在他们调来守开封，“熟人见面情谊厚”，一见就联络上了。经路副官介绍，就认识了那个少校参谋。高个儿，南方口音，可惜因年代久远，名字已记不起来。一天下午，路副官请这位少校参谋和毛秀峰同志一起在大陆影院看电影。散场后，毛遂邀他们一起到酒馆喝酒。在觥筹交错之中，彼此先谈了一下政治形势，接着就闲聊城防情况。一提到城防情况，这位参谋就来劲了。为了显示他在司令部掌权大，知的多，遂把城防的兵力、部署、工事，有条不紊地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他常来常往，积少成多，“积腋成裘”，又加上其他方面的来源，这开封城防图，就“了若指掌”了。其他方面的来源有三：一是毛秀峰同志通过他在六十八师三百五十五团的一个当文书的本家弟弟毛秀生搞到了三百五十五团的主要情况；二是沈文礼同志通过王正伦搞到了城防司令部指挥系统核心所在地，龙亭的防御工事及北门外抓伕拨沙的情况；三是酒馆门前的挑伕、小贩，也都是我们的义务情报员。因为国民党压迫他们，他

们恨国民党。因此常在门口闲话国民党及国民党军的情形，拣其中有用的我们记起来，就丰富了我们的调查。

国民党在开封的黑暗统治

国民党在开封的黑暗统治，是“罄竹难书”的。有关开封史料都有记载，四十岁以上的开封老居民也都还记得，所以我在这里不愿多费笔墨。且举当时两种流言为代表，以见一斑。

第一，社会的支柱是十大赖。这十大赖已由当时市民编成了“顺口溜”。即：

“军官总，青年从，党团干，中军统，省县参，荣誉军，国大代，军宪警，新闻记，特务工。”

军官总是由整编下来的军官所编成的军官总队；青年从是青年从军的“截”后语，通称青年军。其余则顾名思义，一目了然，毋庸诠释。

当然这十大赖中也不尽是坏人，但其中坏人居多数。

第二，人民中间存在着十大怕之谣。它们是：

“一怕官，二怕捐，三怕黄河水来淹；四怕蒋兵凶如狼，五怕特务满街窜；六怕抓丁七怕打；八怕中央票子不值钱。九怕保长来派款，十怕没吃又没穿！”

城防的兵力状况

全城守军（包括正规军、杂牌军和地方团队）共计三万八千余人。臚列如下：

一、整编六十六师十三旅加师直属队有一万余人。这是城防

的主力。该师编制充实，武器精良，一律为美式装备，属半机械化部队。曾被称为三厚部队。一是装备精良，得天独厚；二是兵员充足，实力雄厚；三是粮饷不缺，照顾优厚。其他杂牌队伍，则常有粮饷不继，饭不充肠之忧，人们称之为后娘部队。他们看到六十六师这种厚实情况，真是羡慕交织。但六十六师也有它的缺陷。它原有三个整编旅，可惜一个旅留守川中，一个旅又临时划归某部指挥，未归回建制。所以当时镇守在开封城内的，仅十三旅及师直属队。该师为甲种编制，四四制。即：每旅四团，每团四营，每营四连，每连四排。这四个排是：三个步兵排，一个小炮排。每排三个班，每班两个组。这两个组是：一为轻机枪组，一为步枪组。除此之外，各团直属部队都配有重机枪连，师部直属队配有重型武器。这种重型武器是：一个“122”毫米的榴弹炮营（当时一营二连应为八门炮，缺一门，只有七门），还有山炮、野炮和重型曲射炮。至于“八二”迫击炮、加农炮，各团都有。

可是，兵家有云：“骄兵必败”。该师师长李仲辛，就是一个骄傲自满、刚愎自用、飞扬跋扈，眼高于顶的人。常觉着自己了不起，有“不可一世”之“慨”。考其原由，这也是由各种因缘造成的。首先，李本人系黄埔军校毕业，“天子门生”，早已自觉高人一等。加上该师在内战中，并未正式和我军打过大仗。也曾有过几次小接触，遇到我军佯攻部队，打了几个回合，我军完成任务即行转移。“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便误认为我军非其对手，常自诩为“常胜将军”。这样，他翘的尾巴就更高了。总想找机会和我军一决雌雄。适遇蒋介石命他主守开封，他认定了：这是他立功受奖的好机会。

二、六十八师三百五十五团，团长刘铁军是军长刘汝明的儿

子。该团在鲁西一带曾多次被我军重创，几至全团覆没。虽经在兰封补充，大部都是新兵。士气沮丧，毫无斗志。加上军纪松弛，管教不严。以致贩毒、吸毒，跑行商者比比皆是。该团博得了三多之称。一是官长吃空名的多，二是随军官太太多，三是跑生意的多。该团按编制应有官兵一千八百人。而实际仅有八百余人。所以基本上不能作战。

三、河南省保安第三旅，是省主席刘茂恩赖以起家的队伍。原准备改编为正式国军十五师，另配两个师编为一个军，由刘茂恩兼任军长。据说由于国民党中央和刘茂恩之间，还有些具体条件未商妥，所以一时没弄成。这个旅的底子原是不错的。但由于其兼并过一些杂七杂八的地方团队，素质就起了变化。又未参加过大的战役，在作战上是没经验的。“师克在和”，他们内部偏偏闹不团结。该旅长田镇南自恃为刘茂恩的嫡系，所以和保安副司令刘艺舟，“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各怀鬼胎。谁都害怕亏损谁的实力，所以到了作战的关键时刻，该旅只是摆摆样子，虚张声势，不是一个作战部队。

四、军管区和豫东师管区的两个团，虽则人、枪俱全，但它们的平时任务是抓送壮丁和训练壮丁，是补充新兵的运输队；没有经过作战，所以没有战斗力。

五、新五军的留守部队和整十一师的留守部队，共计二、三百人，约有两个连的兵力。不但数量少，而且居于客军地位，不是一个系统。虽然名义上划归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实际上是“各自为政”。

六、省保二团、保五团（团长已易人。张绍儒易为陆成宣）、保六团及开封县的保安队，都是我军“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早已闻风丧胆；况且有的被我军歼灭过，有的被我军重创过，而

又重新补充起来的“乌合之众”，可以说是不堪一击。

七、省直属部队，如特务营等，纯系卫队性质，并非作战部队。

以上就是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开封的全部守备兵力。工事虽牢，武器也好，战术又新，而却一击即垮；盖人的因素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以这样一些乱七八糟的队伍来守开封，怎挡得住我军数万貔貅！

城防的兵力部署

城防的兵力部署，大体上为纵深三道防线。梗概如下：

第一道为城外关厢及其外围工事。防御重点是火车站及飞机场。战地指挥部设在南关邮电大楼（现今为百货公司），使用的兵力为保二、五、六团和军管区、豫东师管区两个团以及开封县保安队等地方武装。

此外，还配有钢甲列车，从郑州驻地沿铁路开来开封，一日数至，使用机枪和小型重武器助战。

第二道防线是以开封城墙和护城河为基础。防御重点是大、小南门加宋门。战地指挥部，设在卧龙街（小南门内）中心。配备的兵力，十三旅一部守大南门至小南门之间的城墙和护城河（含小南门）；六十八师三百五十五团守小南门至宋门（包括宋门）；保三旅一部守宋门以北经曹门至北门；六十六师另一部守北门（包括北门）至西门（含西门）；保三旅主力守西门至大南门（包括大南门）。新五军留守部队和整十一师留守部队也协助守大南门。

大、小南门是关键性的地方，工事虽坚，武器也好，但配备

的兵力不当，故我军攻城时首先突破小南门，宋门亦随之告捷。

北门、西门等地，均限于地形、地势、地物等多方面的条件，不利于攻城部队的突破、展开；因为在临解放开封一个月前，北门至西门之间高于城齐的飞来沙，已被国民党部队每日强抓数千民伏，把堆积得高于城头平的黄沙围屏拔得离城三十余米，使攻城部队难于接近城边。

第三道防线是指挥系统核心——龙亭。李仲辛（六十六师师长）把龙亭当成他的威虎山，周围都做了坚固的工事，来保护他的城防司令部。名义上省主席刘茂恩兼城防司令，李仲辛是副司令，但守城防的责任实际是李仲辛说了算。龙亭的兵力部署是他首先分出两股兵力在龙亭东西两侧——豆腐营和法院街构筑支撑点把守两翼；其余六十六师所有在汴主力都控制在龙亭附近作为预备队，以便随时向吃紧处增援并固守龙亭。

城防的设施与配备

第一，在护城河周围。距离城墙一百二十米至一百六十米处，有一条环城的护城河。那时河面宽度约二十米左右。河槽内黄流滚滚，深可没顶。

沿护城河外岸，六门城关附近，都是间阎夹道，商店比比，失掉了人性的国民党军为了扫清视线，强迫商民一律把房屋拆除，动作迟缓者，则被蒋军泼上汽油，引火点燃；因此，烧死了不少老弱妇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炙燃毛臭。在南关，我们开封工委曹洁光和阎延龄同志曾于一九四八年四月间，发动保长带领商民共同在自己的屋门前静坐抗议，并到省府请愿，终于迟滞了国民党军的毒计，同时商民也就更恨国民党了。

靠护城河里岸设有绕城一转的杈木鹿砦和铁蒺藜网。网上夜间挂有照明弹。过铁蒺藜网和鹿砦再往里去，距城墙十八米处，在四个城角之外，都筑有梅花形的钢筋水泥明暗子母碉。在伏地碉的入口处，掘有隧道通城内，以便补充弹药和增援。

第二，各城门外边两侧，都筑有现代化的碉堡群。从城门上到地平面，构筑有上中下三层火力点，和外面的碉堡群联系起来，形成了立体式的纵横交叉火力网。而这些火力点，又是构筑在地平面和死角上，不易为我军炮弹击中、摧毁。

第三，大、小南门以内的主要街道上（如中山路和卧龙街等），在冲衢路口和马路两边的高大建筑物上，都构筑有巷战工事并分兵把守，达到层层设防，步步为营的“壁垒森严”，准备和我军巷战并逐屋争夺。为此目的，他们在包府坑和卧龙街附近隐蔽集结了强大的机动兵力，随时可迅速出动，增援反攻。据城防司令部作战参谋讲：李仲辛打算在我军突破城门之后，他首先使用这些机动兵力封闭我军突破口，截断我军攻入城内部队之后路，使我军后续部队不得一拥而来，并迅速将我攻入城内之部队消灭。当我军攻入小南门时，虽未被消灭，可是吃了它这个亏。

第四，包府坑和龙亭左侧设有国民党中央炮十团的“122”毫米的榴弹炮和重型曲射炮群，为守城敌军火力支援。

龙亭的设防

龙亭是开封的名胜古迹之一，除铁塔外又是全城的制高点。从龙亭门前向前延伸，有一条煤渣土路，长约八百余米至午朝门。这条路的中段，筑有钢筋水泥碉堡。还有很多沙袋垛。碉堡

和几丘沙袋上，除步枪兵力外又配有六、七挺轻、重机枪的兵力。土路两侧有潘杨二湖，共宽有五、六百米，水深一至二米。

龙亭红围墙之外，在两湖北岸，沿湖都挖有散兵坑。

龙亭大门被囊沙叠垒屯住，只留下一条窄缝，可容二人侧身交错而过。大门外顺路望南是正面阵地。这阵地前沿与午朝门往北的煤渣路中段工事紧紧衔接。

在龙亭大门口沙袋堆的背后，挖有轻重机枪掩体。在门内左右两侧，设有重机枪五挺，轻机枪七挺。还有重型“122”迫击炮阵地两处。在两米多高的红围墙的上下，处处都挖有枪眼。围墙下边掘有隧道，每隔十米左右，就筑有一个钢骨水泥伏地碉。

龙亭大殿左中右三侧都有多层回廊。在回廊的各个平台上，相互交叉构成了立体的火力网。真有“一夫当关，万将难闯”之概。

龙亭东侧约有二十米之处，有一条小河，名惠济河，水流潺潺。在河东岸有个东阁庙，庙里构筑了防御工事，派兵把守，当作保卫龙亭的东面屏障。龙亭西边有一大片沼泽地，在沼泽地西边，有西阁庙。在西阁庙内，也构筑了防御工事，分兵把守，当作龙亭的西面屏障。把指挥系统中枢，笼在了铜墙铁壁之内。

这还不算，在龙亭后边，体育场北边靠城墙一溜又都埋了地雷，使攻城部队难于逾越。

龙亭周围设有照明林，高空还有飞机频投照明弹，所以纵然金乌西坠，也和白天一样，光照四方，妄想使人难越雷池一步。

站在龙亭制高点上，可以环顾全城内外的兵力运动。指挥系统中心，设在这个高大建筑物上，再加有现代化武器装备，无怪乎李仲辛自诩为“固若金汤”。

以上的国民党军守开封的城防情况，当时由毛秀峰同志汇总

报给张绍儒和曾洁光同志，并由曾洁光同志及时转报了豫皖苏军区。

当时我党我军在开封做地下工作的很多。我的这篇追记，只限于我开封工委所了解到的情况。

第十九篇 地下军的地下交通 及其联络站

地下交通和地下联络站等于作战部队的补给运输线及其兵站，关系到作战部队的后方依托与前线作战消耗的补给问题，关系到作战胜否，至深且巨，切莫等闲视之。关于我在地下工作中其他部分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已大致都附带叙述过。这篇文章专讲一下地下军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我于一九四六年初，在吕园村和张绍儒见面谈工作时，就着重提醒他要及时建立这方面工作，没想到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上早已历有年所并卓有成效了。从一九三九年冬，张绍儒从鲁西南办事处回来以后，即吩咐冯鹤林（张公安碧联保主任）和杨汉民（绍儒护兵）等以张公安碧联保办公室为联络点，建立了一条与我冀鲁豫的鲁西南办事处的地下交通线。一九四〇年春张绍儒进了兰封县城，任了警备队副，又指示杨汉民以其城内家里为联络点，建立了一条通往张公安碧转曹县（鲁西南办事处所在地）的交通线，由王广田任交通。

自从刘茂恩借国共谈判诈喊“裁军”之机，把保三旅缩编为保五团后，张绍儒又派张本烈（地下党员，绍儒同宗）领了一些

本钱在兰封城南街开一酒店为地下联络站，由汤汉民和王广田任交通，经三义砦刘文奇（曾任兰封四区区长）家，再过张公安砦通往根据地。后来由于解放区逐渐扩大，考城大部地区解放，则由兰封南街酒店出发，经三义砦走考城到达根据地。

在抗日时期，张绍儒和朱广仁分别在兰封、民权任警备联队长时，他们都利用给日本人看铁路的机会，各在兰封的张良坟和民权的野鸡岗车站派了一连的兵力。驻张良坟的连长戴瑞华，驻野鸡岗的连长亓惠卿，都是地下党员，尽一切可能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南北过路以方便。

从保三旅时期开始，曾洁光和张以诚同志通过朱广仁等民权同志的介绍在民权地面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一条由开封经民权小陈庄陈应三（当时是国民党民权县二区区长）或经距小陈庄不远的五桥镇（此二地均在民权北边，迈步即到根据地）王家声（当时是国民党民权县三区区长）家到达解放区。他二人都有小股武装保护我们的安全。

但与此同时，旅部驻在道北吕园时，而徐守真的第一团驻在道南阳堙集，因这里和我克威县壤地相接，还误打了一次。其实，从一九四二年起，绍儒就通过随从副官张万一（地下党员）同志和克威县有了联系，不断给克威县送情报和输送物资。到一九四五年底，因陇海线上国民党军大军云集，枪口北指，欲进攻我冀鲁豫。绍儒急派张万一从道南冒险过路到冀鲁豫去送情报，不幸走到考城北门外被土顽张盛泰的队伍活埋。之后，直至保三旅缩编为保五团开到阳堙集，而把徐守真团调回兰封后，才又派原修械所长赵玉泉去和克威县取上了联系。

接着工委即派曹培慧（即曹省三，真名曾洁光）和张以诚两同志到六分区（水东地区在一九四五年年初称冀鲁豫十二军分区，

日本投降后改为六分区，到一九四七年元旦豫皖苏军区正式成立，又改为豫皖苏一分区）去联系，由分区负责同志和工委代表商定，采取以下两种联系办法。

其一，军分区指定新四军三十团（原水东独立团）组织股长袁立荣同志（豫皖苏军区成立后，他任一分区情报处副主任。仍负和五团联系之责）和保五团及驻保五团的工委代表联系，并派出三位干部，即张均、李树楷和李守德等常驻五团以便随时取送情报。他们三人来到五团后，为了掩护他们，工委代表和五团团团长商定，把他们都安排在二营六连（因这里，营、连长都是党员，其他营、连无此条件）当兵或文书上士。其生活待遇都和同职人员一样。只是有了地下工作任务时，如送情报，护送人或购买转移物资等，才派他们以谍报员名义出去活动。在保五团跟随或“配合”敌人“围剿”和进攻豫皖苏时，总是把他们放在队伍前面当便衣侦探，好和我军接头并随时把情报送过去。如一九四六年五月间，敌人对水东地区大举“围剿”前，我保五团的地工人员对六分区有如下之报告。据三十团团团长王广文同志的回忆：

“……又两天，省保安五团我敌工人员从兰封也转来一份敌人‘围剿’水东区的计划。这为我们反‘围剿’胜利首先带来了福音。敌计划上说，打算调集六十八军之八十一、一八一两个师，暂一师一团，暂三师一个团，张岚峰的两个纵队六个团，交警一、二总队，省保安团六个团和豫东二十六个县的县保安团，总兵力号称十万，实有六万人。省、县保安团担任驻剿，正规军和张岚峰部担任追剿，采取梅花战术。在计划上，敌部队‘围剿’开始日期和部队分别进驻水东各地的时间均有注明。”这是因为保五团是国民党军内部的一个团，而且还“参与”在这次“围剿”队伍之列。所以只要国民党军上峰下达这次“围剿”的密令，都少不了

五团的一份。而当时我军在水东的兵力主力，只有三十团，独立团和分区警卫营，约两千余人。再加上县、区武装两千人，满打满算四千余人，不足敌“围剿”部队的十分之一。武器装备的悬殊就更不消说了。可是经过两个月的周旋、较量，我军以六、七百人伤亡的代价，换得了歼敌三千余众的胜利。这固然是党领导的英明，冀鲁豫及水东军民英勇奋战的结果，但我地下工作中的情报工作的准确及时，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其二，在五团方面，除上述工作外，还靠电台的搜集与提供。五团一成立，工委即派原在伪庞炳勋部执法队当过兵的胡佩玖（即胡伯虞，地下党员）到五团机要室任译电员。这样五团的密码就落到了我们手里，再如一周换（有特殊情况随时更换）的口令，灯语、旗语和对空联络信号等，保安司令部下达时也要先下达到机要室。所有这些绝密东西，每次都由胡佩玖汇集起来，写在纸上箍在腰里经张绍儒即派警卫员常义成护送胡佩玖到六分区交给袁立荣同志。

地下交通线的终点是以陇海路为界的豫皖苏和冀鲁豫直至晋冀鲁豫。但起点都是由开封开始的。因为从开封情报站到开封工委，这一支地下机关都设在开封。以五团为核心的开封地下联络站主要以五团驻开封的办事处为依托。本来，张绍儒在兰封任警备联队长的日伪时期就在开封市后保定巷七十八号设有办事处，是一座独门独院，为我地下工作来往人员和转移物资给了不少方便。可是到了日本投降后的十六师和保三旅时期，趁着时代的变化，人物的更替，势力的消长，财产的变动，他又在寺后街路南找到一所壮丽轩昂的深宅大院。前门一开，是闹市熙攘，交通方便，百货任选的市中心；后门一启，是金碧辉煌，钟韵虚徐，院宇深幽，花木散香的相国寺。而且前后三进大院，楼台亭榭，挑

角飞檐，曲廊回环，五彩缤纷。“真个天上神仙府，原是人间富贵家”。可惜好景不常，胜地难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国民党统治的世界是一个“强凌弱，众暴寡”的世界。通俗一点说，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世界。国民党的“抗战八年有功”的军队，哪把这个由伪军改编来的保三旅放在眼里！有一天下午，突然闯进来几伙戴大盘盘帽子，着黄呢军装的军官，各自随带一簇穿红戴绿的妇女、小孩以及气势汹汹的马弁、护兵等。武装门卫阻拦不住；办事人员也只是干瞪眼，束手无策。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那些人个个立眉瞪眼，人人张牙舞爪，立逼办事处人员叫腾房子，搬出去！稍一迟缓，他们已经把人分布在三个院内，竟而闯入屋内，把所有东西，除家具外，往外乱扔。只听得扑扑通通、叮叮咣咣一阵乱响，三个院内成了乱七八糟的狼藉场。连甬道也堵塞了。

张绍儒当时正在兰封整编军队，他的驻汴办事处只有董素琴（张绍儒妻）带一小孩。还有少数后勤人员及一个组的卫兵。办事处的人员遭此横祸，犹如泰山压顶，势不可当。董素琴便自己溜出到别处去给张绍儒叫长途电话，汇报这种情况并请示办法。张绍儒一听就跌足长叹地想：“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沉吟着想了一会儿，只好嘱咐他们暂时收拾行李撤回兰封。因后保定巷的房子，他们好久不占已被别人住满了，一时不易腾出。有势力的人可以这样对待他们，他们可不忍这样对待老百姓。

董素琴及办事处人员只好遵令暂时撤回兰封，在商务会长家里借住了一程。不久，才又在开封城内馆驿街路南三道胡同一号找了一所房子作为办事处的驻所。

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国民党军准备沿陇海、平汉、同蒲三条

铁路线进犯我晋冀鲁豫边区，光集结在陇海线郑州至徐州段的兵力就有三十万。等于当时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一。据了解，当时开封至商丘一带的敌军，有邱清泉的新编第五军，张绩武的交警一、二总队，全系美式装备。此外，还有刘汝明弟兄的六十八师，张岚峰的两个纵队，吴绍周的暂一师，李仲辛的六十六师十三旅和曹福林的五十五师以及一部分省县团队等共约十多万人，在空军配合下，从徐州至商丘一带猛向我冀鲁豫区推进，妄图一举歼灭我在当地的解放军主力，夺取济宁、菏泽等城市，控制鲁西南平原，以策应鲁南的进犯军并迅速打通津浦路。军情重大而紧急，工委得悉后，急派在五团工作的曹培慧同志到根据地去汇报。有鉴于张万一同志的牺牲和教训，嘱咐他对敌情资料只能熟记烂背，不许带片纸只字，不带我军路条，只带敌军证件。

培慧同志接到重任后，便以保五团上尉副官的身份，由开封馆驿街出发，乘火车到民权车站下车，径至城内五团团副朱广仁同志家里。在这里，他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怀揣五团谍报证。当天晚上抵达民权北边小陈庄。在这里用过晚餐后，听陈应三同志说：六十八师的一一九旅已越过这里驻在北面，有进攻曹县之意图，需绕道避开。于是陈应三同志给曹找了一个可靠的向导，俩人趁着夜幕掩护，便匆匆上道了。说是上道，却不上道，只是踏着庄稼从地里走。星繁月无，银汉横亘，俩人慌忙前进，把庄稼拂打着瑟瑟作响。走了一段忽见前面一片漆黑，害怕走近村庄，偏偏遇到村庄。正要回避，黑暗中已传来厉声吆喝：“干什么的？口令？”他们知道这里驻有敌军，便胡乱答应了一声“老百姓”，就避往他处去了。绕了几个弯钻入了一片高庄稼的青纱帐内。这时向导已被吓昏了。问他到了什么地方，他已茫然不知。

亏着曹是行伍出身，夜行军惯了，天空他晓得辨斗柄，地上他晓得识南枝。他们找了几棵野树来分辨了一下南北（树的树叶一般是南面向阳旺，北面背荫弱），又仰望天空斗柄在未，现在是阴历六月，他们向曹县去应逆着斗柄走。决定后，他拉着向导向东北走上一条小路，向导也明白过来了。他们顺小路走了一段，碰上一个拉架子车的老乡，问了情况，晓得了这已到了曹县境内，前去不远就有八路军驻地。曹培慧便把向导打发回去，自己单独前往。拂晓前到达曹县某村，村边已有八路军岗哨，经他向岗哨说明来意后，就被领到司令部。在晓鸡乱啼声中，他终于见到了部队首长。这是陈（锡联）彭（涛）纵队。首长们对他到来十分惊讶。由陈锡联同志亲自接待了他。他向陈司令员详细汇报了开封至商丘段的敌情。在他汇报时，陈司令员一边听，一边手拈红蓝铅笔，站在墙上挂的军用地图前面，频频在地图上画标志。有时也向曹提出询问，核对。汇报完了后，首长给他叫来一些简单饭食吃了吃，立即下逐客令，要他快去。说：“马上就要接火，把你夹在中间不好。”纵队即派人把他送出警戒线。亏他带有五团谍报证，回程中，虽经敌人一再盘查，但终于回到了开封。

这次深入我冀鲁豫解放区的蒋家军，不计地方团队，即有二十二个旅和一个暂编纵队。一开始，他们挟其优势兵力与美式武器，向我猛打猛冲，气焰十分嚣张，在几天时间内，就侵占了我陇海路北的单县、城武、虞城、丰县、沛县、鱼台及曹县等七座县城。我边区解放军谨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有生力量之消长”，因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辗转寻找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特别是蒋军的嫡系和骨干”。

在这样的作战方针指引下，我军很快转劣为优，在同年八月

十日至十二日，我冀鲁豫边区野战军向开封至徐州段敌人展开了反击。自八月十日午夜开始战斗，我军先后解放了兰封、砀山、杞县、通许、虞城等五座县城及罗王、内黄、兰封、野鸡岗等十二个车站，控制铁路三百八十里，歼灭敌整编第五十五师一个旅，一个团又一个营，共一万二千六百人。我军首战告捷后，打断了徐州至开封间的敌人联系，减轻了中原解放军的负担。在边区内首次挫败了敌人进攻的锋芒。通称为第一次陇海战役。

这一来，开封城内热闹了。所有被解放了的县城及车站的地主、豪绅、流亡党部和流亡县政府以及幸存下来的保安团队长等，都纷纷携家带口逃来开封。这些刮地皮的活阎王一到开封，便使开封的住房紧张和物价腾贵起来。因而到处引起群众的不满，致使国民党的统治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馆驿街的五团办事处也骤增了不少“逃难”者，使我们以办事处为联络站的活动就很不便当了。幸有后保定巷七十八号的房子已逐渐腾出，因此办事处和联络站也就乘机迁往后保定巷。但这里还是乱，王东斗和王徽五（国民党兰封县长，其妻姚若兰就是开封大特务头子杨蔚的姘头）先后都来这里住过，所以这里做联络站也就不妥了。到了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们就在中山路北段大陆电影院北隔（中间隔一个门）壁开了一家酒店当我们的交通联络站并搜集情报。

设在开封的联络站，几经搬迁，也不免有牺牲和损失，但总还可以继续工作；而交通线的情形就变化更大。因反内战的结果，我军再接再厉，敌军屡战屡败，以致他地盘逐渐缩小，吓得“草木皆兵”，使我们原有的交通线，就不解放也成堵塞不通。最后我们只得在民权内黄集王锡海家另辟联络点，由田之川同志（之川原名连耕，和五团团副朱广仁的儿子朱自宽是同学，和王锡海也

是同学)任交通。一次,之川同志到豫皖苏区送情报正是走的这条路。回来时怀揣金锭和银元,还是从这里回来。傍晚,回到了内黄集南门外,碰上土顽头子,区自卫队分队长商明德在这里检查行人,挨到之川跟前时,他正害怕收走身上的金锭和银元,商明德已经抬起手来要搜他,不意耳畔响起了一串熟悉而亲昵的声音“连耕叔!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之川同志扭头一看,原是王锡海的侄子扛着锄下地回来,忙说:“是。我就要回家。”

这一来,商明德松劲了。一看是本地人,又身无长物,无啥油水可捞,便放他过去了。

王锡海同志过去就给党做过一些工作,为了建立这条交通线,首先叫他大堂兄王锡岐去担任联保主任掌握政权;其次就是掌握武装。除王锡岐在联保内的六名保丁荷有六条枪可资利用外;他还不惜牺牲,又从自己耕种的三十六亩祖业中,卖掉最好的六亩,用此卖价买下最新式的加拿大长短枪各一支。他还不惜破费通过其内弟的内兄争取了一股地方武装。计有二十余条枪。在这些条件具备下,成了一个稳妥可靠的联络站。自从这个联络站建立后,它给我们往解放区送过学生,接送过由解放区外出到蒋管区去的不少同志,还有相当负责的同志,并往豫皖苏多次转送情报及物资,等等。在白色恐怖严密封锁下,它给我们起了桥梁与掩护作用。

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还有很多社会关系,党员或同情者都在地下交通线上给我们出过力、流过汗,甚至牺牲家业和性命,借此一并致谢,恕不一一枚举。

第二十篇 党在刘茂恩部 队中的工作

将计就计 投笔从戎

芦沟桥事变的炮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在我党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号召下，全国军民奋起，对悍然入侵我国的日寇，喋血苦战。但蒋介石是被迫走上抗战道路的，而且抗战以后还有很长时间和日寇首脑暗中勾勾搭搭。当时日军的武器装备精良，优于我国军队；而且训练有素，武士道精神很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又有很多在日本留过学。这些人只看见日军武器优于我国，作战能力又强，因此，在这些人的心理上，恐日病害得最重。所以日寇一来，他们闻风丧胆，纷纷不战而逃，只恨爹娘给他们少生了两只脚。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忽然听见我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歼灭日寇精锐三千余众，毁汽车百余辆，大车二百余辆，缴获九二式野炮一门，机枪二十多挺，步枪千余支，掷弹筒二十多个，战马五十三匹及其他军用品无算。这是中国抗战开始后的首次大捷，轰动了全国，慑于日寇淫威，被吓得晕头转向的各条战线上的国民

党军队，这时仿佛服了一颗定心丸，顿时对我军起了羡慕与敬佩之心。抱着各种动机，纷纷想和我们合作，或者效法我们的办法，在各地招收青年学生，加紧训练，想利用青年学生当干部，或开展游击战。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布防在山西前线中条山的国民党十五军军长刘茂恩就于同年十一月在巩县焦湾村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陆续招收了五百多个流亡或祖居豫西的青年学生。其中有一位偃师中学的三年级学生名叫段广兴者，是地下党员，受地下党的派遣考入了训练班。他在训练班内，历任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后来又渡河作战，受了千辛万苦，给党贡献很大，因而受国民党军怀疑也大，几次差点被枪决，终至被捕入狱。这篇回忆录，主要叙述以他为核心的党支部（这是党在刘茂恩部队中的唯一的党组织机构）在刘茂恩部队的地下斗争。他的这番地下斗争经历是从训练班开始的，让我就从训练班说起吧！

这个训练班是刘茂恩兼班主任，杨章武任教育长。教员有郭晓棠、林孟平等。所设课程开始只是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民族解放问题》，《唯物辩证法》和《游击战》等。

在焦湾村有两个来月，一九三八年春节过后，因学员增多，训练班便由焦湾村迁至孝义兵工厂旧址。但这里离河近，在一个山头上，隔河就是日寇盘踞，经常受到炮轰。到一九三八年三月，训练班便又迁至陕西虢镇西北的高家陵。杨章武的教育长免了职，调到军部任参议，郭晓棠的政治教员也走了。新任教育长名王和璞，是刘茂恩的亲信，也是留日学生。新添了一批军事教官和军事管理人员。增加了一些军事课程。如：《步兵操典》和《射击教范》等。但去掉了《唯物辩证法》。

学员组织也军事化了，把原来的班组等改成了大队和分队，分队后来又叫区队。当时五百多学生组成了四个大队，每个大队

又分三个分队。党的地下组织在训练班内开始是个总支。到高家陵后归陕西省委领导。党员人数最多时上百个，每个大队都设有支部。

训练班的政治环境是全国政治形势的缩影。由于全国政治形势逐渐由好变坏，刘茂恩也就从与共产党合作逐渐走上对立。经过一年的演变，学员人数和党员人数都逐渐减少。因为有些党员的身份早已暴露，环境一变不得不离开；有些人虽然是群众，他们一看这里气候骤变，前途茫茫，也就自动设法溜走；也有的是前方需要调走的；也有的是潜往延安的；总之，到一九三九年初，训练班的学员人数，已不到一半。由四个大队改成了两个大队，大队下的分队改成了区队。党员人数只剩三十人，由总支变成了一个支部。由原总支委员段广兴同志担任了支部书记。

到一九三九年三月，训练班结束时，学员只有百余人，合编了一个大队。由澠池过河，开赴到中条山前线。支书段广兴及其所属党员，随队前往。临行前，经陕西省委指示，过河后，党组织仍由段负责，仍归陕西省委领导，但不过支部生活，变成单线联系，以适应新的环境。

冒险犯难 一心为党

段广兴同志及其支部的党员跟随训练班大队过河后，来到驻在垣曲涧底村的十五军军部。由于一名名叫孙作斌的党员，在军部补充担任营长的说项，把段分配在军队参谋处任中尉附员（即额外参谋）。

十五军的兵力当时分布在垣曲、曲沃和绛县一带。涧底村正位于三县的中心。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山沟里的住户松散的村庄。

背靠中条山的主峰，海拔数千米，峰回峦嶂，草木葱笼，是一堵天然屏障。刘茂恩又把其所属六十四、六十五两师布置在山头上，也可谓百里金汤了。党支部在这里工作不过半年光景，只是熟悉人，熟悉环境，熟悉情况。到了一九三九年冬季，刘茂恩由十五军军长，提升为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十四、十五、九三、九八等四个军。驻防地点，沿中条山南北两侧，西起曲沃以西，东至阳城以东，凭险守土。为了指挥方便，总司令部由涧底向东北沿山麓移动了四十多里路，驻在了大石崖。也是个山窝里的松散村子。段广兴也跟着搬家来到了总部参谋处。他的支部所属的党员留在十五军的还不少。这一来，他和他们联系就不方便了。正在为难之中，没想到总部高参兼参谋处长侯连瀛就是党的同情分子，经机要室主任林孟平（党员）同志的介绍，段和侯便取得了联系。段去拜访处长，一进门，侯便屏退左右，拿出一封墨笔书信示段，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你看看，这是叶剑英给我的信。”接着就请他坐下，和他密谈。谈的结果，俩人约定，只要段有事出去，侯即派他公差。从这时起，段便得以假借出去传递文件或绘地图的名义去和党员接头。

在大石崖迤南二里许有一镇名横河镇，镇虽不大，有个书店。段常闲时去转，总要到书店一顾。后来和书店的人熟了，从那里买过《军事杂志》，还通过书店订了《新华日报》及《解放杂志》等和其他进步书刊。这些报刊在党员及进步人士中传播，起了不小的宣传鼓动作用。由于机要室党员林孟平、韦广学和崔士学等同志的努力，支部还出了一个油印的《学行周刊》。发表进步言论，学术探讨以及关于游击战争等问题的文章。出了七、八期后，因被查禁停刊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起，国共磨擦加剧了。十四集团军对于和

其交错而处的八路军很多兵站有意“围剿”。段广兴同志知道大石崖迤南只有几里地的一个村庄就是我军兵站。他便请示侯处长出去侦察。得到允许后，段便换上便衣，假侦察之名，跑到我兵站去送口信。到那里见了兵站领导，他首先向站领导说明个人的政治身份和隶属关系，然后就把十四集团军对我兵站蠢蠢欲动的企图如实反映了。兵站领导对他表示了谢忱，并答应以后多联系。他便返回。

两天以后，兵站来了一位同志回访，他是当地人，在大石崖有亲戚。大石崖是包括几个小村的一个大村。这位同志的亲戚恰好就在参谋处所驻的小村。他是这村一位妇女的娘家侄子。他也是着便衣来的，把段叫到僻静处说：“你的组织关系已由陕西省委转来，以后归我们领导。我们是垣曲县委机关，兵站是个掩护名义。我们这里有电台，随时可用电台和陕西省委及咱们的其他单位联系。从此，段和县委有了组织关系，自然联系就更密切了。一次，有紧急情报，晚饭后段着便衣去送，回来时已深夜。兵站要派人护送，段说不用，他是熟路，闭上双眼，也可摸到。可是走了不远，山中起了浓雾，伸手不见五指，路径更难辨认，一下子岔了道，走入了绝路；前进是峭壁矗立，后退成夜不归营，左去是巉岩怪石，右行是荆榛草莽。而且狼嗥虎啸，令人惶恐。正在愁得无法之际，他一下子摸到一棵大树，已经听见风吹草动，瑟瑟有声。他心中蓦地一惊，忖度是狼、虎袭来，便攀树升木，上到两米高的老树杈上跨坐其间，暂避“噬脐”。那只大猛兽真地踏着草石窜了过来，大概是嗅到生人气息，绕树盘桓，缘树趴蹶。但广兴同志心中有底，他知道它爬不上来。正在困境之中，忽然浓雾被风吹过。他回头看见了从他过来的方向出现了一点飞动的火星，直向他的困境处扑来。他心中惊喜交织，忖度可能是兵站来人了。一会儿那火星已经飞到跟前，一搭问，果然是

县委派人来护送他的，狼见火跑掉了。他被县委派来的两位同志，拿手电筒，挎盒子炮，把他从树上叫下来，送至参谋处驻村不远的地方，才让他自去。

到了一九四〇年的春天一日下午，忽见机要室主任林孟平同志，仓皇地跑来参谋处找段广兴，把他叫到无人处悄悄告诉他说：“一战区卫长官下了密令，叫克日剿除十四集团军辖区和国军交错而处的八路军所有兵站。”要段派人通风报信。林主任说罢匆匆而去。

孟平同志去后，紧接着又来了一位原先在训练班和段同过学，现在在总司令部侍从室工作的李玉栋，到参谋处找见段广兴同志说，他看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剿“奸匪”兵站密令，林主任已经呈总司令批去了。段听了这两起传说后，心急如焚，便急到机要室找见韦广学同志，这也是在偃师中学就入了党的地下党员，派他连夜去通知以兵站为掩护的垣曲县委迅速转移。他去后，当天晚上刘茂恩就给十四集团军所辖各军下了总攻击令，命令他们西自曲沃以西，东至阳城迤东，沿中条山南北两侧，纵横数百里对八路军所有兵站进行拂晓攻击，连夜行动务期全歼。段打听到派去剿除我垣曲县委机关的是总部补充团一个营，已在秣马厉兵，准备出发。恰值派去剿县委的这个营的副营长潘协五，段认得。他原是十五军的一名下级军官，跑到延安上过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晋东南八路军部队工作，因吃不消苦，兼犯了男女关系问题的错误挨了批斗，在那边呆不下去了，又回到刘茂恩部来了。但他毕竟受过共产党的一些教育，懂点道理。段便大胆去找他，问他去打算怎么办？他叫段说。段知道该营有个名叫甄义钦的排长是党员，便建议叫甄排当尖兵。说甄如何勇敢、机灵，定能胜任。潘从之。段又去嘱咐甄如此如此。于是军队五鼓出发，甄打头阵，

高兵站老远便开了枪。兵站听见枪响，因事前就育韦广学的报告，早已准备就绪，立即转移，使国民党军来扑了空。兵站并根据韦的报告把密电报告了中央。从此以后，县委转入了地下活动，刘茂恩部队党支部的领导关系又转回了陕西省委。

后来在文革中，广兴从外调人员口中得知：据朱总司令说：从垣曲得到国民党军要进攻沿中条山一带的兵站消息后，即急电通知下去，垣曲一带的机关转移得快没受损失，晋城一带的转移迟吃了亏。

事情如钱塘江的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兵站问题尚未完全结束，又遇到阳城县政府破坏了我党在该县的地下组织，逮捕了数十名同志解到十四集团军总部。关押起来，准备严刑拷问。孟平得悉后，急向段报告，段即去拜托总部高参韩桂三和龚毓众，前去说情，这都是刘茂恩的亲信。措词很巧妙：段怂恿他俩去向刘茂恩建议，不必把这些人就地正法，送到洛阳去邀功，叫上面知道一下我们防共的成绩。

那两位高参不知是计，本着段的意见去向刘茂恩献计。刘认为十分得计，即派特务营长王德带兵往洛阳解这数十名“奸匪”。哪知王德是段支书领导下的一名地下党员。临行前段嘱其如此这般。王德牢记段的指示，带队伍把数十名五花大绑的“奸匪”押解着上了赴洛阳之路。一日他们一行行至澠池山中，天色已晚，便在一个山村住下。王德特意去买来一些酒肉，向兵士们说：“弟兄们一路行来十分辛苦，今晚我特意买了一些酒肉慰劳大家。”他们的宿营地原是村旁一座古刹，把数十名“奸匪”圈在后院大殿内，倒锁殿门，认为万无一失，便在前殿白烛高烧围了几摊儿，席地而坐，饮酒吃肉，含哺鼓腹；除王德外个个酩酊大醉，众皆东倒西歪。王德同志一看此情，便佯装出去查监，走到后殿

门口，掏出钥匙，把锁开开，摘掉锁子，推开殿门，轻声而有力地向里急嚷：“快跑！”他便拔腿急返前殿，身后扬起了一片脚步声。他知道“奸匪”们已经走了。他回到前殿时一看见自己的弟兄们都在鼾鼾大睡，沉醉如泥，深喜目的已达。便也躺在地下睡觉。直到次日天明，连长出去查监，回来报告说犯人已悉数逃跑，王德佯为大惊，速令连长领兵去追。大家不敢怠慢，一齐出动分几路追赶了一阵，皆败兴而归。王德只得领人马回去向刘茂恩复命，说：“在澠池古庙宿营，没看好，犯人半夜潜逃了。”挨了一顿训斥。

经过以上这两场斗争，政治特派员陈袁湘和参谋长符昭寰对广兴起了怀疑，暗中把段广兴、林孟平、杨章武和侯连瀛等四人电告蒋介石，说他们是共产党。蒋即来电给刘茂恩，叫将这四人解往重庆。孟平在机要室接到此电，一面呈刘报告，一面就和段等密谋对策。经他们四人商谈的结果，利用中央军和地方军的矛盾，定下了一个反间计。因刘茂恩所辖四个军，十四和九十三为蒋嫡系，十五和九十八为杂牌。段等一致造谣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说这几个人是共产党，实际是想加给刘茂恩一个容共、左倾的罪名，撤销其总司令职，提拔九十三军军长刘勳来接充”。这些耸人听闻的谣言，连韩桂三和龚毓众等人也信以为真，都去向刘茂恩陈述。刘闻之勃然大怒。急向蒋复电喊冤，说这四人对党国都是忠心耿耿，防共有功之人，请委员长亲自来查。刘电去后，蒋介石火速来电，斥责陈、符等造谣生事，表示他决不相信他们的话并电汇十万元法币，以宽刘心。虽然如此，刘茂恩还是觉着段广兴等给他惹下了麻烦，私下和其亲信参谋刘成汉说：“我不能因为几个虱子掉了脑袋。”不久这话便由刘成汉传到段广兴耳朵里。接着刘茂恩就劝杨章武离开这里到重庆去受训，免去侯连瀛

的兼参谋处长职。对林孟平由机要室主任改为高级秘书，把韦广学和崔士学都逐出了机要室，理由是他俩都不是训练班来的。

陈袁湘和符昭骞也不甘心失败，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从这时起，党在刘彦恩部队中的组织，便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动荡不宁了。

一边挣扎 一边奋战

转眼已到了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总部由大石崖又迁至阳城的苇园坪。杨章武已经离开，到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去了。侯连瀛戴着高参的头衔，去洛阳西乡付家屯当隐士。刘茂恩和陈袁湘、符昭骞等派了四个人监视段。其中有两名特务。这两名特务中有一位叫王春甫的，原系国民党中央政府军令部参谋班毕业，和段关系不错。一日他瞅着没人在侧和段说：“参谋长叫我监视你……。”

段打断他的话，笑问：“叫你监视，你还告诉我？”

“我看你不是。”王春甫说。

刘茂恩觉着光监视还不行，又把段交给陈袁湘到附近东山一个小村去办保甲长训练班，叫段担任一个分队长以资考验。段在此期间，虽然也注意检点，但在一个星期天，因休假无事，便集合了一群村民小孩教唱歌。歌曰：

教、教、教中国，

军民要合作。

誓死不当亡国奴，

拚命的反侵略！

……

“抗日有罪”。就这也引起了陈袁湘的注意。他听到了左右报告了这件事后，说：“果然是共产党，连小孩都在鼓动。”

两个星期的保甲训练班结业了，段等又回到总部。刘茂恩问陈袁湘说：“考察的怎么样？”

陈说：“发现三点形迹可疑。一是他鼓动小孩唱抗日救亡歌曲；二是他好上山看书，不知都看些什么？三是发现他的桌上放过一本《丁玲选集》。”

这番对话是段听刘派的监督他的人刘成汉参谋说的。

紧接着就由新来的参谋处长华克格找段谈话。问他：“你常上山看书都看些什么书？”

段答：“《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唐诗、宋词，等等。”

“你在训练班时桌上还放过《丁玲选集》？”华问。

“哦！”段仿佛突然想起，便说：“那是在那里任教的一位军校毕业的学员放在那里的，后来他又拿走了。”

谈的结果，处长让他先回去了。然而事情并没算完。苇园坪是四面环山的。又一天下午华处长瞅着段上了山，便绕道踪迹，蹑脚转到广兴身后，他正席石而坐，执卷阅读，猛不防被一只手从肩后伸过来把书一把抓走，段猛回头观察究系何人开此玩笑，发现他身后站的不是别人，正是华处长，正在翻着那本杂志看。他越看越起劲，眉头由皱而展，面色由沉而朗。他看明白了：这是大后方官方出版的一本《军事杂志》。因为段早有提防，有些禁书和密件，预先藏在草丛、石磊中了。

经过多方面、长时期对段的考察，虽然没抓住什么，但刘茂恩总觉着段广兴在这儿不妥。一九四一年春天，他便假惺惺地向段说：“你在这里一直当附员，只是因为你不是军校毕业。我想趁暑假中央军校招生，保送你去投考，不知你意下如何？”

段知道这是变相的逐客令，遂捋挡行李准备就道。孟平不叫他走，恐怕他一走没人领导。段说不走不行，便挎上背包过河了。但他并没有到成都去（那时中央军校在成都），而是先到偃师，面会了已从重庆受训回来而在偃师教叙天伦的杨章武，章武也不主张他到成都去。他又跑到洛阳村家屯找到侯高参。侯高参也不主张他去成都。他便住在这里给总部参谋处写了一封信，说他行至洛阳，身染沉痾，不得不在侯家小住数日，病愈即赴成都，决不辜负总司令对他栽培的厚意。并附上医生证明，投邮寄走。一直拖了几个月，等到考期已过，他便返回总部。

一日傍晚，段在村外饭后散步，恰好刘茂恩也前呼后拥地出来了。远远地晃见了段的影子，和其随从们指着广兴说：“那不是段某某。怎么走了又回来了？非赖在这里不可。”

这话也是刘成汉告诉段广兴的。

外患内忧 重迭而至

一九四一年麦收时，日寇大军进了中条山。国军的老规矩，总是躲着日军走。刘茂恩为了缩小自己的目标，把总部一分为二。令参谋长带领补充团，他自己带领特务营，机关处室也各分一半。参谋处偏偏把段广兴同志分给了参谋长。有些同志不叫段去，只怕参谋长给他为难。段考虑到一来军令难违，二来补充团有一位营长叫孙作斌的是党员还有个依靠，便毅然而去。去了之后，参谋长果然尽给他出难题。如：一日下午临下班时，命令他连夜去找失掉了联系的九十八军一个团。而且只把这个团被围困的大致方向给他胡乱说了一气，指不出具体地点。而且中间还要通过一段战场。好在当夜月朗如镜，段即背上背包，腰悬两颗手榴弹，

踏着月光向指定的方向入山而去。一路上披荆斩棘，攀藤援葛，怪石夹道，流水漫路，步步登高，难过蜀道“难于上青天”。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好容易翻过一架大山，步下山涧，又见死伤枕藉，呻吟盈耳，狼群噬脐，饕餮虎咽。踽踽凉凉，不寒而栗。如过“奈河桥”，如过鬼门关。“事到万难须放胆”，段只得斗胆放开，手握手榴弹，加快步伐，躲着死尸和猛兽，迅速涉过深涧又爬上了一架大山。大山背后是黑黝黝一沟望不到头的大森林，他想：这真是白居易诗中所说“松排山面千层翠”的景象，可惜没有“月点湖心一颗珠”的衬托。他整整走了一夜，东方的天边已经抹上了鱼肚白，他又累又渴，饥肠辘辘，一时找不到队伍，正想在此山头小憩，忽然耳边响起了一声哗噪，几个军人从森林中窜了出来，不由分说把段广兴同志捉住了。立即把他抓到森林深处，此时天色已亮，他从服装上胸符上辨别，已经认明白这些人正是他要找到的团，遂和他们通了姓名和来意，他们也看见了他的胸符和肩章，确系总部段参谋，遂领他去见了团长。团长向他愁眉苦脸地说：“我们已经被围困三天三夜了，没有吃的，把牲口都宰完了。你怎么闯过来的？四面都是敌人。”

段说：“我是从死人堆和野兽群里摸索过来的，可能因为是夜间没被敌人发现，也许是敌人撤了。我看现在是个空隙，你们迅速和我回总部去吧！”

他们便迅速集合起来，准备随段撤出。段一看：人已只剩一半，狼狈跛跛的，断股残肢的还不少。团长还问段吃过饭没有？段只得撒谎说在路上从死人身上搜索了一些干馍，喝了几口凉水充了饥、解了渴。

团长不吱声了。段带领他们顺原路回到了总部。一到总部，参谋长把这个团自有安置，不必细表。可是段回到参谋处后，突

然听说：总司令所率领的总部已经返回河南新安，电令十四集团军在中条山挣扎的人马一律撤回河南，另有部署。但因刘茂恩率领人马，浩浩荡荡，舳舻一片，过河之后，被敌发觉；敌遂沿河滨北岸山岭布置重兵，封闭渡口，致使以参谋长为首的滞留在河北的人马一时无隙可乘，他们又不能在一地死呆，只得以退为进，向北回旋。但段广兴同志早想脱离符昭骞的领导，想抓住刘茂恩的这道命令，即时南渡。忖度一个人目标不火，瞅空一闪就过去了。恰好这时有个日本宣抚班的中国人反正过来。急欲过河，害怕日军扫荡时再把他抓回。段想有个人作伴更好，便下了提前南渡的决心。于是段与孙作斌会商，想叫他护送至河或乘机同渡。孙说：补充团不走，他的营也不能走，除非把符昭骞干掉。段不同意把符干掉，说：“那样不便利长期埋伏。”话谈到这里，段便和孙作斌分手，约了那个宣抚班的人偕行，向王屋山钻去，寻找通河口之路。行至天黑，人乏肚饿，他们看见山村中有所楼院，想是个富有之家，便进去借宿。没想到经过日寇扫荡，已经人穷财尽，招待的饭食是老香椿叶拌粗糠。吃饭付了钱，没让老乡吃亏。饭后，他俩便在老家乡一间空房内并排和衣而卧，刚刚爬上南柯，忽然耳畔响起了一阵枪声，老乡又急嚷日本来了。他俩便迅速跳下炕来，循着枪声响的方向，前去侦察，趁着月色，遥见山头有一簇黑影，扰扰攘攘。此时枪声已经停止。经过喊话，段听出了答话的声音很熟，他忽然想起这是补充团一个连长的声音。他俩登山去和他们接洽，才知道是补充团转移了，留下他们做殿后掩护。刚才的枪声就是他们阻击敌人，掩护补充团撤退。他们要求段等和他们一起转移。段说总司令电令叫他带宣抚班的人过河，遂互道“珍重”而别。

段又和宣抚班的人继续南行。两天之后的黄昏，他俩来到了黄

河之滨。这一带黄河沿岸是一溜高山峻岭。关山险阻，构成了几座天然要塞。他们刚刚穿过一个牙壑，落路向河滨走去，突然从牙壑两边的山头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子弹啾啾地尖叫着交错而至，他们老早就打听到日本封锁了河口，这枪声正是两边山头的日本驻军射来，成了交叉火力网，使人插翅难渡。他们煞脚踌躇，一扭脸瞅见了山脚一个岩洞内有灯火，想系一户人家，便走去探询。及至走到跟前，岩洞内果然灯火辉煌，人影幢幢，男女老少，相聚一堂。他俩便进去施礼，人家一看进来的这两个人，一个穿的协和服，一个穿的国民党军装，便对他们没有好感。一个老头把两个妇女往岩洞后头一推，便领着两个年轻小伙，揎拳掳臂，怒冲冲迎了上来，没好气地向他俩说：“你们想干什么？日本人抢我们的东西，欺负我们的人，我们惹不起，你们这些狗杂种我们可不怕。”说罢就把拳头抡到小段的头上。把那个宣抚班的人吓得只鞠躬。段想：他们原来是怕我们抢他们的东西，这好办。便急中生智把身上的三百元法币拿出亮给他三位主人，说：“我们不是土匪，不是日本人。我们是抗日的国军，因到河南有任务，被日本追剿得紧，刚才枪响就是打我们的。我们被逼得无法，来此投宿，住店出店钱，吃饭付饭钱。这不三百元，请老伯和两位长兄收下，权借宿一时，送我们过河为是。”段的几句彬彬有礼的话，还有这三百元法币亮在他们面前。他们早已心平气和，拳头放下，转嗔为喜。立即给客人让座摆饭，并说他们有只筏子，就在门前岸边水中系着，管保送他们过去。但钱不收。

席间宾主融融泄泄，亲如一家。饭后，段等要走。主人说：“不忙，到该走时我们叫你们。先休息一下。”主人说着给他们指点了一个地方，他们也真乏了，便到那里一躺便着。

到了夜半，东道把他们二人叫起来，他们看见两个年轻小伙，

一例光着脊梁，赤足短裤，每人腰间各系两只大葫芦，手拄长篙，墙根立一块大案板，老掌柜吩咐他们主客四人顶到头上，各自一角，又给他们捂到案板上两条湿淋淋的大棉被，段在案板下向老主人道了谢，便和别人共同顶着蒙了湿棉被的大案板离开岩洞，下到河滨。山头子弹还不断射来，但他们没有受伤害。

他们很快下到了河边，一个能坐五、六个人的竹筏系在河滨。段等二人顶着捂了湿被子的案板登上了筏子，便共同坐在筏子上，湿被子边把他俩遮盖得很严实。两名水手，解缆推筏，在水手们推动下，筏子向南岸驶去。水涨筏高，黄汤滚滚，忽高忽低，随水浮沉。北岸的枪声未落，南岸的枪声又起，段等的筏子处在了南北夹攻的困境之中。后来段向南岸喊话，说明自己的部队番号，官居何职，南岸枪声即哑，北岸枪声也成了“强弩之末”，他们才得以安全靠岸。他们舍筏登岸，谢别水手，给了一百元酬金，水手自去。河口有军队把守，原来是十五军的人，军人们给他们指点，说南行十里路有文公村，属新安县，那里有总部，叫他们去找。他们便寻路找总部去了。

次日参谋长也领兵回到了文公村，听说段广兴头一天就回来了，临回时不告而别，叫他在河北好找。非常恼怒，早就对他有怀疑，趁此机会，立即把段找来。段一进参谋长办公室的门，给他敬礼。参谋长立眉瞪眼，拔出手枪对准段的脑袋“你临阵脱逃，我枪毙你！”段脸不红，心不跳，从容回答说：“报告参谋长！我是奉命撤退，不是临阵脱逃。”但参谋长不容分说，竟喊使警卫，把段用大绳一绑，吊在门头上。参谋长便急遽出了门。符昭鸾刚走，教育长王和璞来了。一看小段被吊在门头上，大吃一惊，知道这是参谋长诚心谋害段广兴，便亲自解绳卸下。略问情形，段以实告。这时又来了几个参谋都是刘茂恩的老人儿，素知参谋

长忌恨他们，一见此情，都忿忿不平地说：“参谋有啥干头，连生命都没有保障。”王和璞也是刘茂恩的人，在一旁听得清楚，便急欲找符昭骞，听说符昭骞把段吊在这里就慌慌张张地走了。王和璞忖度符昭骞是找总司令请示去了。便急速离开这里向总部奔跑而去。王和璞气喘吁吁来到刘茂恩办公室，果然看见符昭骞正在和刘茂恩谈论段广兴的事情。符说：“段是临阵脱逃，应该枪毙。”

刘茂恩一见王和璞如此慌急奔来，而且嘴唇频喁欲言，眼里有话。便撇开符昭骞，转向王和璞，问：“教育长有什么急事，如此遑遑？”

王只得直筒筒地说：“段广兴不能枪毙，他是奉总司令的命令而回，虽然没有和参谋长一起回来，只是由于日寇扫荡失去了联络。总司令南撤的命令在先，他回来的日期在后，这不能叫临阵脱逃。……”

在这时候，一伙抱不平的参谋也拥了进来，打断王和璞的话说：“段广兴要枪毙，我们都该枪毙。坚决而果断地执行命令的要枪毙，而……”

他们说到这里，刘茂恩举手阻止，说：“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了。你们先回去，我保证段广兴没事。”

一伙参谋听到这里同声说“是。”敬礼而去。刘茂恩又转脸看王和符两人，一个微笑，一个撇嘴。问他们还有什么意见？王和璞说：“没意见。”眉开眼笑而去。符昭骞虽然嗫嚅了几下，但没有说出什么，只得徐徐站起，扫兴走出。

段受此屈辱，岂肯甘心？遂和孙作斌商议，说符昭骞不接受总司令命令。总司令叫往南撤，他偏偏向北绕去。要枪毙段，实是想灭口毁证。于是俩人共同具名，给总司令上书，说符昭骞有

投敌之嫌，所以才下毒手想杀段，实系为了杀人灭证。请总司令明察！刘茂恩见状大怒，早想换符，苦无借口，接到此状，如获至宝。便持此状到洛阳去见卫立煌，卫睹状大惊，遂面允将符调回，另派妥人。刘茂恩回到总部便把段广兴由中尉附员提成了上尉参谋升了一级，且由额外补为正式。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走了一个符昭霁，来了一个崔寓言。新的参谋长比旧的参谋长更毒更恶。除段广兴因新提拔而暂时没动外。林孟平经刘茂恩关照也算保住了高级秘书的头衔。但韦广学和崔士学却连秘书处的司书也免了职，被驱逐出队。一个暂回老家，一个流离失所。

从这时起，段广兴同志感到势单力孤，工作难以开展，切盼组织来人。直到一九四二年春，才由陕西省委派来一位名叫李本善的同志，他原系训练班地下党员。后又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派到陕西省委工作。他向段指示：“因环境关系，你们只能善用合法。以后组织也很难再派人来。如果你们在这里站不住脚，可利用社会关系向别处转移，到延安去也不易。路上有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段把他们支部的情况给李汇报后，李便潜然而去。接着段把上级指示精神传达给所有党员，都表示，坚决照办。

一九四二年夏天的一日，几个好玩的参谋，正在屋里打牌，一下子崔寓言来了，一脚给他们蹬翻了牌桌，怒斥他们耽误了公事，而且公然白昼聚赌，目无军纪，嗾使警卫员去叫特务营派人来把他们统统带走枪毙。恰好在座的参谋之中有崔寓言的内弟，他在崔未来时也打过一圈，而段是手里拿有钱，但没挨牌桌儿。他理

直气壮地站起来和崔说：“要枪毙把我们都枪毙，一个也不能留。”

崔寓言看见他的内弟掉了眼泪，才心一软，但这时警卫员已把特务营的兵叫来一个排，森严地站在门外候命。警卫员进屋来朝参谋长立正报告，说：“人来了。”

崔寓言摆了摆头说：“叫他们去。”

警卫员啪的立正，说：“是。”转身出去传令后，特务排纷纷地去了。崔寓言给在座的参谋们说：“我命令你们都到临汝师管区，给我抓一个时期壮丁，考验考验再说。”

早已俯首站立在那里听训的参谋们，这时如获大赦，一起立正答了个“是。”崔寓言又补充说：“你们给我立刻就走。”大家也答应了“是。”崔寓言才转身而出。

临汝师管区在县西一、二十里地的樊古城寨，这里驻有一个团，专门管抓送壮丁。他们到这里住了两个多月，也没人过问，于是国舅有恃无恐，自动先走，往洛阳长官司令部去了。其余几个人也不告而别投往别处去了。剩下段广兴一个人，又呆了一个时期，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到了一九四三年年初，借拜年之机，回到观音堂给华处长拜年，乘机请他缓颊，却碰了一鼻子灰。无奈何，他只得又到付家屯去找侯连瀛。

道路曲折 曲而不挠

广兴同志跑到付家屯见了侯高参面诉衷曲，并请求帮助寻找出路。侯高参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和段说：“别动军新成立。那里的指挥官杨蔚是我在黄埔军校教书时的学生，他请求我从十五军给他介绍一批干部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给介绍去。”

段正愁无法，立即表示同意。侯便拂笺挥毫，“龙蛇竞走”，“倚马而就”。段即告别高参，离开这里。持信到镇平找见杨蔚。杨蔚接信一看，原是老师推荐。立即把段分配到参谋处原职原级使用。紧接着十五军又来了一批人，都是被排挤出来的。段也把韦广学和崔士学找来。这些人都会被编入潘协武部队。

一九四三年夏天，广兴由参谋处调到书记处管人事和军法，恰巧碰上别动军武器库一批枪支被盗了。查的结果，原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刘茂恩军法官的人干的，他领了一部分人盗走这些武器去投降日寇，到那里并未达到升官的目的，又离开日寇去投八路，八路不要他。无奈何他只得又回来。杨蔚把此人交段审查。审查结果，情况如上述。段如实报告给杨蔚，杨蔚枪毙了他。

这个工作干了不久，又遇到刘茂恩担任了洛阳警备司令。原训练班队长王士俊由别动军副指挥官调任了警备司令部的军警宪联合督察处长，把段由别动军书记处调督察处任了少校副官主任。王是个吃喝嫖赌抽，样样称能手的人，所以他不理公事。由于段和他是训练班的校友关系，督察处的一切事务，便一任段全权处理。甚至连王的家也交给段代管。段是共产党员的支部书记，因而毫不推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对政治嫌疑犯一问便放；对贩毒、杀人、抢劫、强奸等犯，经过拷问，便一律送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依法惩处。把没收的烟土、海洛因及其他钱财赃物等一律送至王士俊家中，自己则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由此王对段更加信任。他有两个老婆，还有地下室，专门储藏金银财宝和毒品等物。除他自己挥霍不计外，主要的处理办法是钱财留下，毒品出卖。有些狡猾的商人，把他的真土拿去，换成假土退回，说烟土货色不好，他也没法分辨。

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军过河侵占了洛阳。段和王士俊一家都逃

到西安避难。一个多月后，又都返回河南。这时刘茂恩已改任豫西警备司令驻内乡。别动军仍在镇平。段同王都来到镇平。由王士俊安排，段用别动军联络员名义去内乡，驻在刘茂恩的参谋处搞联络工作，当时参谋处长为王和璞。军队只剩十五军，其余各军都划出去了。王和璞笑着和段说：“你的任务好完成，每天叫他们把情报表交你一份，你寄给别动军就行了。”段就照这样办。这样，实际上是又回到了刘茂恩部。参谋处送给刘茂恩的情报没有绘图，段就据情绘图，刘茂恩一见情报日报文图并茂十分欢喜，听说是段绘的图，于是又把段正式调回警备司令部参谋处。

日军于一九四四年秋天又向西侵。刘茂恩的警备司令部由内乡的丹水移至桑平。这时我军进入伏牛山的不少。洛宁地方团队王希仲部被我军包围。王希仲急电刘茂恩速派兵救援，但电报上也提到日军的威胁。因此参谋处情报科长批给段广兴、李振涛会办。段接到电报后，一看是这，因当时李振涛回原籍接着不在，他便把电报偷偷塞在李振涛的抽屉里。五天后，李振涛回来了，一拉抽屉发现此电报，报的种类是十十十——十万万火急，便持电找段，段一见电报，佯装惊讶，便说：“你的你办我的我办，咱们速办。”按照他俩分工，是段管搜集“奸匪”情报，李管搜集日寇情报。但李看见已过五天，不敢负责，便层层上报。刘茂恩一见大为恼火，心想如此急电，为何压了五天？李说他回家接着刚刚回来。刘便立即把段叫来，破口大骂：“你是赤匪，你是汉奸！为何如此急电，给我压了五天？！”同着在坐的几位师长，刘茂恩把电报朝段广兴劈脸打来，电报啪哒落到地下，段广兴毫无畏惧，弯腰从地上把电报拾起，展阅之下，又佯装惊讶。旋即申辩：“这电报是从李振涛抽屉取出的，我真不知道。如果我压了一分钟就把我枪毙。”

刘茂恩用白眼瞪了他一会儿，一时也反驳不上来，只得说：“你先去，我叫处长再查。”广兴拿上电报就去找处长。一见处长，他就说：“压急电是要掉头的。我段广兴只长一个头，没长两个头。请处长明察！”

处长皱了皱眉头说：“吴科长是个细心人，怎么办了一件粗心事？你把电报放下先回去，我找科长再问。”

段把电报放在处长办公桌上转身而去。

科长被叫去了。处长问他时，他的确忘了是叫谁送下去的，更难查是交给谁办来。支支吾吾说不清，被处长大训一顿。他立即回来找段，斥责他说：“你这人太粗鲁，不管是你不是你，你都不应发誓赌咒。”

这件事情不了了之，王希仲部已被我军消灭。从此，段被逐出了参谋处，把他分到军管区，军管区又分到师管区，给了一个少校科员名义，但没有职务，一直到日本投降。

正在“剿匪” 祸从天降

日本投降后，王和璞当了洛阳专员。段去拜访，一脚踏进专员办公室的门，王专员指着段广兴说：“你是共产党！”

“我是你也是。”

“怎么能这样说？”

“我跟随你多少年，成了共产党。你不是我怎能是？”

王和璞说这话本来是没根据的，只是为了诈唬一下段广兴。他见段从容不迫，便笑了笑说：“开玩笑的。你坐下，咱俩商量个事儿。”

段坐在专员办公桌旁一只椅子上。王和璞问他：“你是想到

开封还是留洛阳？”

“哪里需要人？”

“这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需要人，我想把你留下。”

“请专员栽培！”

就这样，段就留在了洛阳专区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段到任不久，王和璞部队便在嵩县被我军包围。王和璞带段领兵去增援，我军便迅速转移。转移中有五十多个掉队的，被王部抓住，王主张一律杀掉。段向他进言：“王专员既懂军事，又懂政治。这些人掉队是不愿和皮定均一起走，说明这都是一些动摇分子，何必杀他们？”王然其说，便叫段把这些人集中在嵩县城内办训练班，管教他们。并吩咐留一个团在这里防卫。王便班师回洛。在段和团长在城里打麻将的当儿，故意疏于防范，我军便顺利地沿老君山南麓西去。但王和璞回到洛阳后，向刘茂恩报捷并提到办俘虏训练班事。刘茂恩复电不准，命令把五十多个俘虏一起解往郑州集中营。王只得照办。把训练班的俘虏一起解往郑州集中营。把段调回洛阳警备司令部。

段回到洛阳后，恰值侯连瀛从西安逃难回来。段去访他，一见面，侯便问段：“接上党的关系没有？”段说：“没有。”侯说：“有办法，我侄子在通许当区长，那里全县都解放了，我回家一趟准能接上。”侯本通许人，说罢即回通许去了。

段在洛阳一等再等不见组织来人。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光景，一日夜间，他正在家里床上躺着发高烧，“东方未晞”，就听见有人敲门。勉强挣扎起来，开开电灯，走去开门一看，原来是专员的勤务兵来了。他向段说：“有急事，专员请你去一趟。”段便转身回到床边穿戴整齐与之俱去。到专署门口时，天麻麻亮，门岗还给他敬了礼。可是到了专员会客室，并未见到专员，而是

参谋处主任坐在那里。

“你的病怎样了？”主任问段。

“高烧四十度。”段答。

“你请坐！弄饭吃。”说到最后三个字时他把目光落到了勤务兵的脸上。

可是段坐下后，饭尚未来，一阵金属铿锵，步履纷纭，闯进来一伙武装警察，为首的一个径至广兴面前递给他一张公安局长的名片，说：“局长请段参谋。”参谋处主任也怂恿。段已知“在劫难逃”，便霍地往起一站，迈步便走。那伙武装警察前导后拥，把他胁迫至公安局。进了局长室，昂昂然坐在那里的局长，向段说：“刘主席请段参谋到开封去一趟。”

“什么事？”段问。

“可能是高升吧！”说着话还虚伪地向段拱了拱手，“恭禧恭禧！”

“好吧！”段强颜为笑地说：“我去收拾一下行李，再和专员告别一下。”

“段参谋请不要走吧！”

接着就有一位警察说：“请段参谋到下头屋里坐！”

段只好转身向外走。由那伙武装警察围随着，把他胁迫到一座厢房内，一进门就看见一位缟衣素帽，嘴上捂着大口罩的大夫，手执注射针管，由警察们硬把他按下伏在一条板凳上，解开腰带，抹下裤腰，在臀部的肌肉上注射了一针。他想：这可能是镇静剂，防止他死去，无法交代。

旋即送来早饭。其余人员都出去了。他正独坐桌旁吃早饭，忽见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一个人。他定神一看，原是司令部一位参谋（党员），名叫郭阳松的。向他附耳：“无论跌落到哪一步，

你千万不能乱说！”

段明白他的用意，便毅然向他说：“你放心！牺牲也就我一个。”

他在这个房子里呆了一天。当天晚饭后，闯进来一伙军警宪联合督察处的武装人员，把他从公安局的临时拘留所拉出，揪扯到大门以外，把他推搡到一辆洋车上，周围有几十个挎枪的人前呼后拥地带领着洋车，一直把他拉到火车站警察分局门口。车一停，便把他掬进了分局办公室。他刚坐下，便有人拿来脚镣手铐，往地下哐啷一扔。随来的局督察长近前一步向段说：“对不起，请把军衣脱下，换上便服。这是上级命令。”

段只得站起来把军衣脱掉，换上他们给拿来的便服。督察长说了一声“扎镣”，立即有几个人走上前来，给段扎上脚镣，并戴上手铐。火车一到，便由督察长带领两名警察把段拉扯到车上，在车厢内的旅客众目睽睽下，把他象一件不值钱的物品一样，捆在了行李架上。

在黑暗的豫西原野，火车隆隆向东驶去。

第二十一篇 段广兴在狱中

一九四六年的早春，戴着脚镣手铐的段广兴由洛阳专员公署警察局督察长带两名警察，在夜色沉沉的洛阳车站把他押上火车。给摺在了行李架上。车行至中牟，天尚未亮，不意竟在这里出了轨。车不能继续前进了，把督察长急得团团转。因为开封要段很急，限天亮以前一定解到。他便下车去和站长交涉，请派巡道车运送。站长不敢怠慢，便派巡道车应急。于是督察长便重新登上火车命令两警察把段押到巡道车上。总共三十多公里，巡道车辘辘开出，一霎时便到了开封车站。他们押着段广兴出了车站，叫来一辆洋车，把他扶到车上，前护后拥地押到保安司令部，连刘茂恩的影子也没见，就把他关进了木笼中。

看守所的木笼房是各式各样的。段广兴被关进了大木笼间。这是西屋的三间通房，两头各用粗大的方榆木条扎成了一个木笼，中间为道。广兴同志是第一次住监，而且是木笼。这时天已大亮，他看见十分惊奇，仿佛自己成了野牲。他长于古诗，便即兴抒怀。诗曰：

室似虎牢门栅橛，
便盆悬在当头顶。

熏天臭气怎堪闻，
血雨腥风“酆都冥”。

整整押了一天，无人过问。好在这间木笼中押了七、八个人，文人学士也有几位。广兴在十五军多年，而且整个抗日时期几乎都在刘茂恩的总部工作，保安司令部的人认识很多，看管看守所的特务营三连连长李东方，就是他在军事政治训练班的同学。所以段在监狱，别的犯人只是一日三餐五碗粥（早餐一碗，午晚各二碗），而且是陈谷子、烂小米煮成，除非家里格外照顾，才有改善机会；而段参谋则不然，每逢开饭时，总有人往铁窗上（木笼的外墙上有一小铁窗，专门为传递东西或家属探看用）放上四个馍两碗粥，喊一声“段参谋！”广兴便来拿去享用。这是李东方的安排。虽然没菜，却也足够充肠。

次日，军法官把段广兴传到法庭上，除讯问了他“验明正身”那一套外，也就是问了问他认不认得侯连瀛和韦广学。段答：“都认得。他们都是十五军的老人。”

第三天又传讯。法官问段说：“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和共产党有没有关系？”

段明快地回答：“这些问题用不着问我。我自小在偃中上学，后即到军事政治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结束后，我即到中条山追随刘主席从事抗战。日本投降后，我跟王专员在豫西山中‘剿匪’。我想刘主席和王专员不会不知道我的情况，请问他们好了。”

法官抓住段的话柄问：“对啊！你在偃中上过学，后又到军事政治训练班，中学生思想激进，训练班学员复杂，你就把那里面都有谁是共产党说出来也算你立一功。”

段答：“偃中情况我不知道。训练班里很多人跑陕北去了。我想他们就是共产党。”

法官说：“这话你算说对了。我问你，你和到陕北去的那些人有无密约，有无联系，有无通信往来？”

段答：“‘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和他们既无密约，也无暗中联系和通信往来。”

法官：“你别装正经，我们是有证据的。你要说实话。”

段：“我说的全是实话。”

“你好好考虑一下。”

“用不着考虑。我的事情我知道。”

法官看见段态度坚决，死不承认，只得暂时宣布退庭。段又回到木笼中。

这次审讯后，法官向刘茂恩作了书面报告。刘批：“严讯”。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在一个风卷黄沙的早晨，段广兴又被押到法庭上。这一次比前两次形势严重。段广兴一进去就瞥见刑具累累，气象森严。法警肃立于堂内，法官昂然坐在公案后，书记官坐一旁秉笔待记。法官问段：“你考虑得怎么样？咱们的政策是自白从宽，顽抗从严。我们不是吃饱饭没事干，无缘无故把你从洛阳解来。你是主席的学生，我们若非铁证在握，谁敢招你的‘糖担子’！？”

段：“杨法官，咱们不能说空话，不管铁证铜证，你拿出来叫我看！”

“好。”法官说。“这是物证，”他手里举起一个深紫色封皮的小本子晃了晃。

段：“这是谁的本子，与我有什么相干？”

法官：“这本子不是你的，可是上面记载着你的事情。写着段广兴是共产党。”

“请你念给我一段，有关我的事情。”

“你听着！”法官把日记本摊在公案上，念道，“据侯其敬区长报告，段广兴是我地下党员……”法官念到这里不念了。一顿，他又说：“这个本子是我们在豫东剿匪时从死匪身上搜来的。你是不是就叫段广兴？”

“天下重名重姓的有的是。光凭段广兴三个字，不能断定就是我。再说，侯其敬这个人我也不认的。”段广兴竭力否认，但他心里明白：侯其敬就是侯连瀛的侄子，这明明是从侯高参那里出的事。

法官狞笑了一声说：“你不必狡辩。这日记本上还记得别的一些人的红色事例，这些人也都是段广兴沆瀣一气的朋友。你不老实交待，只有叫这些东西向你问话。”他指了一下摆在一旁的累累刑具。

“杨法官！”段说，“你叫我受刑，历史上屈打成招的故事，罄竹难书。我若受刑不过可能满口胡说。我从学校出来就投在刘主席麾下，我若把刘主席的部曲咬了一大堆，你觉着好吗？”

法官一听不是滋味，只怕弄得不可收拾，只得宣布“还押！请示主席再说。”

段又回到木笼里。经过这次审讯，段已知道事情不简单，便托李东方到处去游说。李先找了杨军法官。杨说：“我愿意帮忙，但他的事不只这一宗。在抗日时期，刘主席就对他有怀疑。……”李东方一看杨军法官的话不好说，便离开这里去找军法处长李维忠，请他为段缓颊。但李处长说：“广兴这事没办法，刘主席直接管。”李东方碰了两鼻子灰，已经感到很棘手。一日碰到王士俊，便向他探听有关段的消息。因为他知道王是刘茂恩的亲信同乡，一定知道情况。只听他说：他见主席时，提到段的事，主席

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日记给他看，说：“段广兴这人滑极了。对他怀疑很久，多年来抓不住证据，这回算他倒楣，可算抓住了。”

广兴听了李东方向他汇报了活动经过后，他心中颇为苦闷，便写了一封信，托李东方送给杨章武，信中大意是：“我已被捕入狱，在司令部看守所。有些风浪，但不会波及别人。请放心！盼转告侯高参，请他忘了我这后生，万勿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面前提我。千祈！”

这次审讯后，报到刘茂恩处。刘批：“再讯”。接着刘茂恩就把在通许县敦叙天伦的侯高参找来，想从他口里找出破段案的线索。侯连瀛应召来到了刘茂恩办公室。分宾主坐定后，两人未经寒暄，刘茂恩劈头就问侯连瀛：“你最近在家干什么，都来往些什么人？”

侯答：“我在家环境不好，尽跟共产党打交道。”

刘一听，喜形于色，认为破段案有了希望。但又眉头一皱，佯为关心地问：“你怎么尽跟共产党打交道。你那里不是驻有咱们的两个团吗？”

“两个团顶啥用？人家白天不来晚上来。有一天晚上，我刚刚睡下，忽然听见院里扑嗵一声，把我惊醒，我慌忙坐起撕破窗纸一看，原是一条大汉急匆匆向我屋门走来。我情知不妙，急忙披衣起床，走去把门开开，原来是一位白净脸，细长条，有二十多岁，自称原是主席副官，现在在新四军工作，特来向侯高参请安。我没请他，他已经进了房内。我只得陪他坐下。点灯一看，原来素昧平生。这岂不成了‘开门揖盗’，但悔之何及。他一看我神情冷淡，便把我大肆吹捧。说我是老青年、军事家、威望高、人缘好，他们新四军里很缺我这样人才，要我到他们那里高就，为国分忧。……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打断他的话说：你别啰嗦

了！我活是党国人，死是党国鬼。跟你去了，我连刘主席也对不住。

“那人朗言说：‘侯高参！不怕你不去，我有办法叫你去。’说罢，扬长而去。我正要来向主席报告此事，并来省城躲躲。适逢主席找我，真是‘无巧不成书’。”

“通许还有个侯其敬你认得吗？”

“那是犬侄。不肖之子。已经附匪。我回到家已有年余，他就不敢回来见我。”

“哦！”刘茂恩笑着频频点头。觉着这老头还刚正不阿，便吩咐他说：“你回去吧！别无事。”

“不。”侯说，“我不能走，我回去，人要再来找麻烦……”

刘茂恩皱眉一想：这可难了。找他来本是想找点破段案的线索，现在线索没找到，反而叫他赖着不走。这个老资格，留下还得给他安排，不如打发他回去。遂拿出一只手枪递给他：“给你一只手枪，他再来找你，你就和他不客气。还是回去吧！”说罢就往外推他，侯只得拿上手枪回去。

紧接着就是第四次审讯。这比前三次都更严厉。法庭上军警环列，刑具阴森。公案后边，除杨军法官昂昂然坐在中间外，在他的左右两侧，还各坐了一位陪审官。

段被两名法警押到法庭。进门时段被两名法警用力揉了一下，他踉跄得几乎碰着公案，法官立即呵斥他“站远点。”他往远处一站，法官立即向他说：“你的案子报告主席后，主席手谕‘严讯’。据主席面谕，段广兴过去就鬼头鬼脑，很不老实。说在中条山时送你到中央军校深造，在别人来说这是巴不得的好机会，可是你呢？到洛阳转了一圈儿就又回来了。在豫西剿匪时，你竟

敢把急电扣压五天，致使王希仲部因候援不到被匪消灭。这次从匪区剿获的日记本中有你的名字和附匪恶迹，主席说：‘决不能把他轻易放过’。”

段从容回答说：“过去的事情，都有案可查，‘事实胜于雄辩’，用不着我来饶舌。至于这次日记本的事，这是近因，我倒想问个明白。侯其敬是谁，他又向谁报告的？”

“这你不必问我们。你的事情你知道。”

“我确实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段双眉紧锁，显出一脸愁苦相。

“段广兴！你别胡搅！日记本上写的段广兴，注明是洛阳警备司令部段参谋。我问你：洛阳警察司令部有几个段参谋？”

“许是他和我有仇故意陷害我。古代军中用离间计的记载很多。”

“段广兴，主席指示不叫轻易放过你。你看看今天法庭的阵势。”法官说着环顾了一下气象森严的军事法庭，又补充说：“你放明白点。”

段：“怎么处置我，权在你手里；但我承认了，对不起刘主席。”

被告与法官睚眦相对地僵持了一会儿，陪审官都一声不吭。法官只得宣布退庭。叫段先下去。等以后再调查。

之后，没过几天，新花招又来了。韩桂三请示了刘茂恩，派刘的亲信副官刘秀甫屈尊枉驾来到警卫看守所的三连，向李东方连长说：“你去把段广兴叫出来，我和他有话说。”

李东方请刘坐在连长室，转身便去叫段广兴。少顷，段至。刘对他十分客气，让座让茶，和颜悦色。可是段心中有底。他素知刘副官是刘主席的亲信。他这番来定是“笑里藏刀”。所以不

坐，站着问他：“刘副官找我有啥事？”

刘秀甫还是要段坐下谈。段坐下后，刘才说：“韩高参叫我来看看你。说主席一向对你不错，现在也还很关心你。主席指示，只要段提供一些材料，便可从宽处理。”说罢用两只期待的眼光盯着段。

段说：“主席对我好，我不是现在才知道。可是叫我提供材料，莫非是首先叫我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然后再指供一些别人。别人我不认得，只有指供主席的部下。你们要是觉着这样好，我就照这样办。”

“那不能。”

“我也不能昧着天良说瞎话。”

刘秀甫不再言语了。他冥思了一会儿，向段说：“你先回去，我给主席汇报了再说。”

段又回到了木笼里。

接着章武便来见主席。问：“广兴的事怎样了？”

“他妈的！”刘茂恩气呼呼地说，“一点口供也没有。”

“没有口供，你可不能杀啊！他是你的学生，又追随你多年。没口供杀了，岂非自己给自己往脸上抹黑！”

刘茂恩再没吱声，章武便起身而去。

到了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处长，由李维忠换成了曲星耀。章武为段做曲星耀的工作，李东方再去做杨军法官的工作。所托的这两人都到刘茂恩面前为段缓颊，使刘茂恩对段杀不能，放不愿，就这样把事情拖了下来。

转眼到了一九四七年春节，在特务横行，物价飞腾的蒋管区，也没有什么好过的。但尽管自己家中如何困难，只要家中有人在监狱，总要千方百计给他送些好吃的。因此段广兴这几天也分享到

难友们家中送来的菜。不懂国事的儿童还照样嬉戏。一日，段广兴突然从铁窗的缝隙，望见了天空中的风筝，便有感赋诗：

鹏程万里胜雄鹰，
岂意弋人箭中翎。
壮志未酬縲纆陷，
身囚牢笼志不沉。

过了几堂后的开始一段，广兴在木笼里，只要一想起法官念的缴获的那本日记中所写“据侯其敬区长报告，段广兴……”这一段话，心里便惴惴不安。一日，他从铁窗条缝中看见了军法处一个勤务兵，便喊他来问，“我的案子怎么样了？”他说：“报国防部了。”使段心中更是不安。

后来，因为贪污案，从朱仙镇抓来一个保安独立大队长，也姓段，和广兴押在一个木笼里。闲谈中，他告诉广兴，那个日记本是他随县保安团到通许“剿匪”时，半夜袭击“匪”县政府，他们仓皇逃遁，没来得及挎挎包。“我把挎包拣起，从里边搜出这本日记本。日记本的皮子上写有李子明三字，这是通许县长的名字，日记本当然就是他的了。上面记有好多人的事，如段广兴、林孟平、韦广学、崔士学等。”说到这里，他还歉疚地说：

“那时我不知道段广兴就是你，我要知道就不往上交了。”真是事后人情，说得好听。稍后，保安司令部杨子良参谋也和段说过这个日记本的来历和段队长所说的情况差不多。

刘茂恩是每逢失陷（即解放）一城一地，就要大抓一批，狠杀一批。有一天就大杀了一批，听说是解放军在巩县解放了神堤村（刘茂恩的家乡），把刘茂恩母亲的灵柩给挖掉了。当时他母亲的灵柩是安厝在一个窑洞中。每逢特务营来狱里抓人，广兴就想：“这次该着我了。”忽然有一天，丁振乾（刘茂恩的“龙阳”副

官)来狱里闲逛。见着段广兴时,主动向他说:“广兴!你的人缘好啊!认得的也替你说话;不认得的,也替你说话。不然的话,有一百个段广兴也杀掉了。”从此以后,段广兴想开了。心想:人民都还需要自己,自己更不能自暴自弃。心怀一开,诗兴大发,赋诗二首。

其一:

四个馒头二碗粥,
读书唱戏画银钩。
坐监也有坐监好,
利用空闲且进修。

其二:

丈夫莘莘气若虹,
“大理”常监有功臣。
寒夜无钱茶当酒,
举杯且向患难朋。

当一九四七年夏天,刘邓大军南下后,他深有感慨地咏:

春到人间已多日,
不见长堤杨柳青。

时日匆匆,段广兴到狱中,不觉已经两年,一照镜子,容颜大变,又感慨赋诗:

铁窗风味两度秋,
黑发竟成老白头。
胸臆仍怀凌云志,
不知何日“出幽州”。

段广兴在狱中,恰巧和胡万杰同志住的一座木笼。他俩志同

道合，互相钦佩。当胡就义后，段作诗凭吊：

知君怀壮志，
不惜抛头颅。
断脰不挥泪，
千古大丈夫。

与胡一同遇难的爱人郭向新同志也给广兴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一次在放风时间，他和向新碰上，俩人都站在西墙根攀谈了一会儿。向新告诉他“一次审问时，法官说：‘你丈夫都承认他自己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还替他隐瞒’。‘我立即回答说：他承认了，我可不能承认。我准知道他不是共产党，我不能瞎说。’”还有一次，他们又碰上了。向新悄悄和段说：“段参谋，我们免不了一死；杀我时，我泪也不挥。”段暗暗钦佩，自己在喉咙里依稀有声地说：“谁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她有为国捐躯的雄心壮志，是个好同志。”

段好唱京戏，有时兴致来了，就在木笼中引吭高歌。好在警卫看守所的特务营三连都把他看成上级，没人敢来干涉。下面一曲是他常唱的歌词：

“闻道时危党国（钹）急，伤心不许问国疾。忍见山河成破碎，收泪一坐东山石。嵯岩四顾觉身孤，俯瞰龙潭深千尺。引吭欲作九噫（后汉梁鸿过京城感时而作《五噫歌》）歌（此处言九噫，取“肠一日而九回”之意。），下有毒蛇歌不得。歌不得，心如结，敌骑踏遍江南北。满眼狼烟何日息，我欲飞上昆仑脊。拔矢弯弓射落日。飞鸣镞。”

广兴在狱中，章武和士学都不断派人来看。嘱咐他沉住气，外面尽力营救。但不久我军已大军围城，炮声隆隆。广兴的饭也没人送了，监狱已无人管理。犯人们不单喝不上稀饭，茶炉没人

烧，连开水也喝不上了。平日段看见打开水不公平，揶揄说：“此间须臾有炎凉”。而现在一例连凉水也紧张了。致使百余犯人，宛如涸泽之鱼。

经过两天的忍饥挨渴，第三天早晨，忽听铁窗喊了一声“段参谋！”广兴扭头一看，原来是看守所长杨栋喊他，他刚欲启齿问杨栋情况，杨栋给他放到铁窗台上一个烧饼，仓皇而去。此时特务营及其看管看守所的三连队伍同时仓皇而去。过了一会儿又都回来了，但已都换了便衣。不到一小时又都撤走了。段又晃见了杨栋的影子，忙喊他来问。他惶惶地说：“段参谋！不好了。新四军打进来了。”说罢就又要逃走。段把他喊住，说：“杨所长，你别跑！听我说，你把木笼统统打开，带镣铐的给人卸掉镣铐，听我指挥，一律跟我走，连你也在内，保你一条命。”

杨说：“不行。新四军已经把门堵了。”

段：“搭梯跳墙也得出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好，从西墙洞出去（这是二门外西墙上出死人或枪毙、活埋时出犯人的洞）。”杨栋说罢立即去把各个狱门打开。百余犯人如笼鸟获释，蜂拥至西墙洞口出狱了。越过小街又穿了几家民房（因作战，国民党军把各家围墙都打通了），遇上了新四军。新四军一看这些人都是蓬头垢面，大眼瘦骨，衣不蔽体，就知道这都是从狱里跑出来的人。便问：“哪些是政治犯？”段挺身向前说：“我是政治犯。”接着，他又回头把杨栋给新四军介绍了一下，说：“就是他把我们放出来的。”解放军作战任务紧急，顾不上对他们详细查问，遂派人把他俩送至南关三野八纵司令部。杨栋抓住段的胳膊说：“段参谋，你的命真大，要不是新四军来得快，你今天晚上就没命了。我曾看见准备今晚要杀的犯人名单

中，有段广兴。”段一笑置之。他俩在八纵经过政治部审查。杨栋被打发回郟县原籍为民，段广兴被介绍到郟陵豫皖苏第五军分区分配工作。

第二十二篇 卡住他的脖子

——忆郑州电信局的反饥饿斗争

郑州电信局的组织概况及其性质

在解放战争中的郑州电信局，全称为：郑州电信指挥局，属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西安电信管理局领导。下设：办公室、人事室、业务科、工务科、总务科等科室。业务科下又有：有线股、无线股、有线报房、无线报房、营业部快机班等部门。快机班人员穿军服，掌管直通陆总郑州指挥部通讯处的快机专线的电报收发业务。工务科下设有发报台、收报台、载波室、线路队等单位。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在局里设有一个区党部，还有局里命名而组成的防奸组织。群众团体有郑州电信局职工会——黄色工会。另外，郑州还有一座由西安电信管理局直属的材料站，实际等于郑州电信局的器材库。

郑州电信局的主要设备有：4000KW发讯机一部、其他型号发讯机多部、小型发电机数部。以上为发报台的情况。在收报台方面有：无线电话终端机一部、收讯机多部。此外，还有载波机有线通讯设备等多部。

郑州有、无线电路联络网点，紧密配合着国民党党、政、军、商，快速转达情报和信息的需要。线路除以郑州为中心，东通开封、归德，南通许昌、驻马店，北通新乡、安阳以及西通洛阳等河南境内各大要埠外；更远通南京、徐州、武汉、西安等各管理局。无线电话每日定时同南京、武汉、西安联系。

平时有、无线报话线路同时使用，当我军切断四外交通，国民党军固守孤城时，电信局的无线报房就成为反动当局的唯一信息耳目了。所以国民党郑州当局把电信局置于重要部门之列。它的局长人选，就非同小可了。

当时郑州电信局长为杨尧年。他原是老河口某局的一名三等报务员。他之所以一跃而上升为郑州电信指挥局的局长，据说是和刘峙有裙带关系，刘峙当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后，点名要交通部越级提拔上来的。因此，他和公署或指挥部关系（一九四七年后半年绥署迁往徐州后郑州改为陆总指挥部）都很密切，经常进出公署或指挥部参加会议，汇报情况或领取旨意。

杨尧年上抱刘峙粗腿，凭着后台庇护，下用金钱、地位，收买拉拢或打击报复局内重要头目，也算是“恩威并重”吧；就这样，使用各种卑鄙手段控制着郑州电信局直至解放。杨利用职权还兼营商业。据说电信局隔壁的百货商店就有杨的股份。杨家住商店后院，开有角门通电信局，真是“公私两便”。

举例言之：人事室主任范某，线路队长某，都先后担任过职工会理事长。由于他们支持过职工斗争，杨尧年便以封官手段把他们拉过去了。总务科长是杨的亲信，所以稳坐泰山。总工程师兼工务科长秦某，同杨沆瀣相投，利害与共，因之如胶似漆。有线股长梁某是国民党局区党部主任却对杨唯命是从。老业务科长回文汉因支持过“饿工”斗争，被降职调开封当报务员去了。新

提的王某任总务科长，当然是杨的亲信了。最后一任职工会理事长李某，完全倒向杨尧年，到处替杨歌功颂德，成了抵制群众运动的帮凶。

以杨尧年为首的这伙统制电信局的恶棍，作威作福，鱼肉职工，谁敢抗争，就采用变相报复手段。即使他们扣压迟发三百多人的工资，一天的银行利息，就够他们一个月的享受了。在物价飞涨，一般职工家无隔夜之粮的情况下，他们都成袋的私分好米白面，这是当时职工们有目共睹的。这些当权的反动派和一般职工之间的矛盾程度，不就可想而知了？

内战形势与郑州处境

郑州，地处中原之中，扼京汉、陇海两大铁路之交叉点，在当时已是河南新兴的商业经济中心。但它的郊野一漫平川，除北有黄河外，实无险可守，向称四战之地。国民党军为了巩固郑州城防，除凭藉旧城原建筑加以深沟高垒外，又沿旧城外廓筑了一转土寨墙，当作它的“万里金汤”。

在驻军方面，有交警纵队的主力师担任城防，设有陆总郑州指挥部。先后派有刘峙、顾祝同担任主任。此外还设有警备司令部，配有警备部队和地方保安队、宪兵队、榴弹炮营和军运部队、辎重部队等。政权方面设有县、专署等党政机关、地方警察和各种特务机关。军警宪特充斥县内，通宵戒严，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自从刘邓大军、陈谢部队和陈粟大军开抵中原，建立了大别山与伏牛山等根据地，并经常攻击陇海和京汉铁路和淮河之间，郑州时常被围困。它的处境便成了“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局面。

虽然蒋介石把刘峙调往徐州，派顾祝同镇守中原，但也丝毫未能改变郑州的颓局。不过政权总是靠武力夺取的，任何统治者都不愿自动退出政治舞台。蒋介石为了“苟延残喘”，在罗掘俱穷时，便抓紧印钞机的工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吮吸人民的膏血，致使物价扶摇直上。起初是早晚时价不同，后来便成了一日数涨，临了时就成了时、刻都在涨价，虽法币改成金元券，也阻止不住物价飞腾。终至一袋票子换不来一袋粗粮。和第一次欧战末期德国的马克一样，理一次发就得拉上一架子车票子。

那时一般在职职工有工资来源，生活尚无保障，一般市民的处境，更是置身水火，不啻倒悬了！而反动派的贪官污吏们，却个个脑满肠肥，家家纸醉金迷，朝朝左抱右拥，夜夜灯红酒绿。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蒋家王朝早已积薪厝火，国共两党“中原逐鹿”，鹿死谁手，何待著龟！？

反饥饿运动的前奏

远者不提，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我曾四次往郑州派人，不幸一九四六年这里出了一个叛徒，组织破坏很大，不得不把一部分同志撤退。郑州这样重要城市，不能不重新派人。经工委研究，即派不能继续在五团工作的张以诚同志前往。他表示服从。并明确表示：他去郑决无问题，陆焕郑州指挥部决想不到它指名逮捕的人，敢来到他们的营垒。

张以诚同志以开封一个民办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携家带口（他在开封的户口是报的张路平，也不是张以诚）来到郑州。

张以诚同志全家来到郑州后，寄居二七广场东边的万寿路路

西的河北沿一小胡同内，仅有一间门面，连住带做小买卖，以卖烟为生并作掩护。他一到就开展工作。首先发展了一个盐店经理刘彦根为候补党员，刘又发展了电信局技术员周舟为候补党员，此二人均系张以诚同志在开封住家时的老邻居，彼此原系知己。闲话少说，自从周舟于一九四七年初秋被吸收为候补党员后，电信局的地下工作立即就展开了。经过一段工作后，周舟于一九四七年末，就发展了发报台的三等技术员霍炳昶为候补党员，次年春又发展了收报台的无线报房的雷丙寅为地下团员。此二人均系局里老人儿，人事熟悉。周伙同他俩大力开展了局内情况调查及团结群众的工作，除团结了西安大部分同学（周原系国民党西安电讯管理局的无线技术人员训练班毕业，该班同学在郑州指挥局工作的不少）外，同时对发报台和局内机、电等单位的不少职工也搞好了同事关系。周以朴实诚恳态度待人，同收报台职工都很合得来。有事外出或回开封（周家住开封），给他们一打招呼，便会有人主动替班。

在电信局内建立了组织并掌握了群众后，头一场斗争就是抵制国大代表的选举。

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政府曾搞了一次国大代表选举，准备召集行宪国大，妄想以实行“还政于民”的欺骗口号，挽救危亡。郑州电信局举行较晚，已经是一九四八年新春了。当时电信局系统，由交通部指定了二人作为候选人。据说是电信总局的什么长。郑州电信局当局奉命唯谨。通知各单位职工于某月某日到某地集会投票。候选人的情况介绍只是姓名、职务和简历。通知下达后，职工便纷纷议论起来，开封工委在电信局的党团员们受张以诚同志指示，便乘机以群众面貌积极加入议论，并分头在群众中策动：揭露国民党选举不民主，候选人不能由上级指

定；制造群众对候选人不信任情绪，说候选人没有给职工谋过福利，不知道他的贡献，不能代表职工；因而拒绝投票，表示反对。策动结果，收到了良好效果，使两个候选人的选票都未达到选举人数一半以上。并对以后的反饥饿斗争，进行了思想准备。

反饥饿斗争的开展

郑州电信局的反饥饿斗争，经当时开封工委在郑州的地下党研究，命名为“饿工斗争”。这实际是全国反内战、反饥饿斗争的一环。那时郑州电信局的职工，常因迟发工资或物价津贴而闹停工，但多系报房人员下楼一哄，局长很快答应要求就完事了。而这次“饿工斗争”却坚持了半月之久，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影响面最宽的一次斗争。震惊了陆总郑州指挥所，震惊了西安电信管理局和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威武不能屈”直到“差强人意”的解决。其经过情形，梗概如下：

基因：由于物资短缺和物价飞腾，一般只靠薪俸度日的职工，每月关饷的当天，或至迟在一、二日内，必须抓紧时间奔走抢购本月一家生活的必需品，尤其是口粮和燃料等，否则到了月末，连糊口也成了问题。这样一般家庭的零用余钞也就所剩无几了。当然由于物价飞腾，即使薪俸稍高者也不敢多留现钞。所以一般职工，只要到了月末，没有不银根奇紧的。少数甚至一文不名。广大职工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是电信局反饥饿斗争必然爆发的根本原因。

导火线：一九四八年的初夏之月，受讯台的技术人员，多数人在月中已囊空如洗，后半月怎生度日，茫然无计。在无可奈何之中，经过酝酿，大家决定，向局长打报告，提前借支。报告上

去之后，杨尧年置之不理。大家又公推技术员周舟和刘某去找局长交涉，也被当面拒绝。周、刘代表回来给大家报告交涉结果，大家都十分气愤。遂决定首先鼓动全体受讯台无线报房人员，以罢工方式威胁，要求当局发放救济金。

党的领导：群众情绪既起，揠拳撻臂，暴风雨即将来临。周舟为了把群众斗争引向胜利，乃急将实情向以诚汇报，经他俩磋商，决定了以下办法。第一，电讯局为陆总郑州指挥部的咽喉，附近即驻有城防部队保护，如果公然喊出罢工，并依此实行，等于卡住陆总郑州指挥部的脖子使它不能出气。“狗急跳墙”，它必然用高压手段镇压职工，使职工遭到失败并流血牺牲，就泄气了。第二，如果采用怠工方式，就会打击闹意昂然的职工情绪，也不能使当局慑于职工的声势怕人而解决问题。第三，最后决定以“饿工斗争”方式为佳。因为这是个实际问题。“枵腹从公”只能作为唱高调的空谈口号，“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肚里慌。”糖糍饥肠，站且不稳，谁还能从事工作呢？

决定以“饿工斗争”作为行动方针后，又规定了三条策略。即：一、广泛发动群众，尽量争取团结广大职工参加斗争；二、争取社会同情支持；三、谈判交涉不出书面代表名单，必要联名签字时，要给反动当局造成一种群龙无首、一哄而起的错觉。

两场哄斗：周舟根据组织决定，推动霍炳昶和雷丙寅，在收发报台和局本部同时展开工作。首先以收报台无线报房全体机电人员名义向杨尧年提出给全体职工发放救济金等要求。杨收到群众要求后，即到受报台来向群众进行说服工作。群众先礼后兵，先是和他讲理请求批发，但杨拒不吐口并拐弯抹角指责群众无理取闹，因而激怒了群众，有的冷嘲热讽，有的大吵大闹，无意中形成了一场小型批斗会，使杨尧年陷入舌战重围。杨尧年面红耳

赤，张口结舌难于应付，便找了一个借口溜之乎也。但他知道事情不能平息，便又指派工会理事长李某来受报台进行调解。群众知道李某来也没有好话，便事先大贴辱骂他的标语。李的大驾一到，一看满眼都是辱骂他的标语，又见群众脸色都阴沉而可怕，使他未敢开言，便垂头丧气地转身走了。

杨尧年一计不成又来一计。这时局里已经乱成一片，无人干活。杨尧年便想用局务会议来恫吓压制解决。于是抓紧发出通知，召集局务扩大会议。通知局属各单位负责人、工会全体理事，并要求收报台除负责人当然出席外，还须另派职工代表与会。经收报台全体机电人员酝酿，决定派代表与会并扩大了要求条件。除原提的发放救济金外，又增加了：提前开支薪俸和物价补贴；改革无线报房值班制度，缩短工作时间等。收报台派出两名青年无线报务员带着新旧并提的条件参与了会议。经代表在会上把这些条件提出后，杨尧年大怒，不但不答应要求，反而指责群众故意给领导出难题，因而激怒了代表，当面揭发了杨尧年等一伙贪官污吏狼狈为奸克扣职工等丑闻，弄得会议大闹一场，不欢而散。

全面铺开并推向高潮：局务扩大会议散会之后，代表们回来给大家一说，大家一听局长毫无诚意解决问题，经过紧急磋商，遂决议把事态扩大，收报台全体机电人员纷纷出动，分别到其他局属单位，进行鼓动，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得到普遍响应，于是“饿工斗争”就在全局普遍展开了。与此同时，党又发动全局职工利用各种关系对铁路、邮政等单位进行联络、宣传，向多方面做了争取社会同情工作。收报台的报务人员，还通过无线电话终端机，对西安、武汉和南京等局职工进行了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声援；对发往郑州的官、商电，他们都婉言拒绝

了。

“饿工运动”既然在郑局全面展开，又影响到郑州社会上及武汉、南京、西安各局。西安电信管理局是郑州电信指挥局的直接上级，有线电路已被切断，工作人员又全体闹事，使郑州电讯网点陷入混乱状态，陆总郑州指挥部不能置之不理，不能不责成交通部处理。西安电信管理局负有管理责任，便从速往郑州局拨来一批专款，令郑州局答应职工要求，先把救济金发下。可是款到之后又被杨尧年存在银行生利息，所以运动就陷入僵持状态。可是这件事十分机密，杨尧年又密而不宣，怎么会被群众知道的？不过有句古话，我们都记得，“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来真巧，那日正遇上周舟值班，西安电信管理局刘副局长，通过无线电话终端机，质问杨尧年为什么郑州局工潮问题一直不解决？杨推说郑局无钱。刘又问：管理局两天以前已把款汇去，怎么说没钱？杨无言以对。哼哼了几声，推说声音不好，听不清。值班员周舟便灵机一动代刘转话，对杨说：“刘局长问你为何扣款不发？”杨尧年含混其辞地说：“再查一查。”就把话筒一撂而去。

周舟一看局长走了，便又拿起话筒，叫通西安，向刘局长揭发了杨的不法行为并说“饿工运动”是杨“官逼民反”。因此使管理局对杨十分不满。紧接着，周舟便把这一情况向全局职工宣扬了一番，全局职工闻听之下，愤怒已极，遂纷纷起来和杨斗争，把运动推到了高潮。

军方出面干涉：当“饿工斗争”展开之际，正是我二野大军围困郑州之时，周围铁路及有线电讯均被切断。里应外合，“天赐良机”。而且局势越紧，南京国防部要求陆总郑州指挥部汇报情况更急迫而频繁，电信局的无线报房，就成了他们相互通气的惟一

咽喉要道了。双方军事对峙，情况随时变化，加上工作人员不正常工作，无线电报也不及时，所以他们只有用无线电话终端机作口头汇报。终端机又只有一部，而且是保密的。但值机人员为了调整话音，可以随时监听全部通话内容。所以我开封工委在郑州的地下组织对郑州的敌情掌握得一清二楚。

在“饿工斗争”全面展开之后的第二、三天的一个下午，周舟和技术员主任潘某正在收报台无线电话终端机室值机，突然气势汹汹如临大敌地由一戎服佩枪的上校军官率领，闯进来一伙荷枪实弹的丘八，周和潘各事其事，未予理睬。该上校自己找座位坐下，自称他是指挥部的通讯处处长。接着就指责无线电话声音不好，影响通话。并声言“戡乱时期影响军事工作，你们要负责任。”等。潘一面检修机器，一面解释“气候不好（那几日正值阴雨连绵），天电干扰大……”应付着他。但该处长还立眉瞪眼，口涎唾沫地说什么“这我内行，已干了多年通讯工作，你们瞒不了我……”。正在值机的周舟，耐着性子，平静站起，据理而讽刺地说：“先生既是内行，话就好讲了，怕的是无知。我们都很清楚，当前世界科学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能胜天的程度，这是有识之士不能不承认的现实吧！？你来看，”他看了一眼上校。“我们这台机器，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一台老掉牙的破机器，面对这样的条件，我们工作人员除作到‘尽人事以听天命’之外，请问阁下，你认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又说：“我们是交通部最下层的工作人员，上面有科长、局长，有事找他们谈不更好吗？”这位处长一时无词以对，便把态度也缓和下来。立即打圆场：“你们要尽快加紧维修，尽力调整好，不要影响使用。……”站起身来往外走。潘某打趣说：“不送。”真是俗语所说：“来得极紧，走得极松。”

指挥部武装人员突然出现，虽未提“饿工”问题，显然是来恫吓一番，想把“饿工斗争”夭折。好在当时在场人数不多，除潘、周外，还有一名机务佐刘某值班。潘在国民党军方有不少重要社会关系，毫不在乎；周有军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也有恃无恐；惟有刘某惴惴不安。武装人员走后，周即向刘做了工作，给他鼓了勇气，并要求他不要声张出去，他点头同意。其余无线报房人员均在楼上，大概没听到楼下有此插曲，所以“饿工运动”继续坚持了下去，未受影响。武装人员此举，无疑是和杨尧年有关；不然的话，人家为何不直接找他。

金宝光飞郑，军方出面干涉无效后，事件震动了蒋党中央，交通部不得不派使正在南京开会的西安电信管理局长金宝光作速离开会场飞往郑州解决问题。

金宝光一到郑州，即乘车至电信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向职工滔滔不绝地训话，妄想以他的声威和朗言威吓职工复工。其实，职工连军方武装威吓都不怕，一个赤手空拳的管理局长算个啥。当他用指责的口气讲到职工闹事时，会场就喧哄起来，线路队的工人怒不可遏，便蜂拥而上，揎拳掬臂要揍金宝光，会场秩序大乱。吓得金宝光目瞪口呆，浑身哆嗦，摘下眼镜，等着挨打。杨尧年等慌了手脚，一面挤在前面劝阻工人，另有几个人保护金宝光退出会场。大会自行解散。次日，局里提前发了工资及物价补贴等，职工便复了工。

当时《郑州日报》还在报上发表了专题报导，宣称郑州电信局的“饿工斗争”，满足了全部要求，胜利结束。

复工后，金宝光得知此次斗争是受报台发起的，特意到受报台召集先后在西安无线电技术人员训练班毕业的全体机电人员讲了话，采取了怀柔政策拢络人心。说什么“大家都是我的学生，

要同心协力搞好工作等。……”只字未提“饿工运动”，也未指摘。

斗争收获：首先是本局职工得到了经济实惠，经受了斗争锻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觉悟；其次，由于“饿工”停止了官、商、民电，郑州孤城得不到外地物价行情消息，事后听商民反映，郑州物价半个月未大波动，这是“饿工”给商民带来的福利；第三，斗争开始后，正值解放军大军围城，里应外合地动摇了敌人负隅顽抗的信心，直接配合了我军围城攻势。

报复、软抗与护厂

复工后，天气好转，围城的解放军搬往别处去了。四外铁路、电信线路都逐步恢复，郑州一时又现出平定状态。可是不久，郑州电信局突然宣称，由于局势紧张，要疏散职工。在旧社会，电信职业和行政官场不同。它靠技术吃饭，毋庸溜须拍马，请客送礼；只要不想往上爬，就用不着拉人事关系。即使当官的看不上给调离，也不过换个地方，照样供职、吃饭，所以有铁饭碗之令誉。职工当然也以此有清高、自豪之感。对疏散职工之事，并未引起惊慌和揣测。可是大家麻痹了，忽视了时局的发展，国民党政权已到了垂死挣扎阶段。它岌岌可危，自身难保，地盘越来越小，军队越来越少、用人的机会当然就没有从前多了。首先是老业务科长回汉文调开封降级使用，当了一名普通报务员。前已言之，他是在“饿工斗争”中支持过群众，说过对梅尧年不满的话就落了这么个结局，当然是打击报复。接着又把无线报房四名青年报务员疏散徐州，但他们去而复返。原来这是个骗局：他们持调令到徐州报到，徐州电信管理局拒绝接收。说是已

得郑局通知：调令无效，此四人已开除。大家听到这种骗局，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害怕自己也受这样处理。

是否可以重新掀起群众斗争反对当局报复并营救这四位受害青年？当时周舟和以诚同志研究分析：第一，解放战争发展很快，国民党“困兽犹斗”，如果再发动群众，不只是这四人的失业问题，不如“饿工运动”牵连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好发动，而且国民党也会镇压得更毒辣。第二，可借此揭露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激发群众仇恨国民党。第三，要充分理解群众很多携家带口害怕失业的心理。第四，可了解这四人的觉悟程度，如有可能，送解放区分配工作。研究后，周和四人谈话，都要先回到西安。最后，由收报台的同事们全体出钱举办了饯别酒会。会后，送他们回西安去了。

解放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周舟曾先后听到一些当时杨尧年等处理此事的内部情况，说金宝光在郑州局复工后要回西安，杨等为金钱行。在宴会上，金问：“‘饿工’是谁带头发动？”杨对此问，在业务方面提出了无线报房四人即上述用变相方式开除的那四人；总工程师兼工务科长秦某，在机务方面提出了周舟。但秦某所提，金未听清，再追问时，工程师武羨庭等插话作了解释，因而周得幸免。谈话中还定下了开除这四人的方式，并派三人秘密小组到收报台监视周舟。因周有军闻通讯社的关系，他们未敢动手。

护厂：约在一九四八年的夏秋之交，地下党接到上级指示，大意是：解放战争形势胜利发展，城市很快就要解放，要求地下敌工人员设法开展保护敌伪物资设备的工作，以便胜利接收，使财富顺利回归人民，满足支援战争和城市建设的需要。

为此，我们开封工委在郑的地下党团员全体动员起来，利

用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各个线索，对国民党设在郑州的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所有大的仓库地址和库存情况都作了调查了解。对电信局的设备和仓库，掌握更为全面。

霍炳昶同志是郑州发报台技术员，忽一日向周舟报告了郑局要拆迁4000KW发报机的消息。周舟同志立即向以诚作了汇报，并商议了对策。决定鼓动发报台职工和负责人向局长提出不能拆机的建议。理由是：发报台现有其他发报机频率均小的多，遇到天气不好、干扰大的情况，就会影响正常通信，特别是无线电话，届时如影响指挥部通话，恐怕是要追究电信局的责任的。此建议上去，拖延了一阵，可是后来到军事吃紧时期，局里又下通知，非拆不可。并从外埠各大局调来十来个技术人员“代拆代行”。郑局职工不好公然反对，只是要求他们慢慢拆，想着“事款则变”。又发动本局发报台工作人员尽可能予以制肘，如借领工具时给予不便等。就这样，一磨二拖，迨拆完装上火车时，尚未起运，郑州已经解放。

郑州解放后，中原军区中州电信管理局为周、霍等护厂有功进行了通报表扬，并在《中原日报》专题报道。据说还颁发了实物和奖状。

第二十三篇 军闻通讯社 记者的神通

郑州军闻社的性质、概况与打入经过

郑州军闻社的全称为国防部军事新闻通讯社郑州分社。顾名思义，它是负责军事新闻采访工作的。其政治背景，据说是因C.C.在军事部门没有掌权，故成立军闻社作为它打入军事部门的楔子。

郑州军闻分社设在西门外大街胡同里。内有社长一人，名杨炳灵，是上校军官，曾带过兵，风闻曾加入过军统，后改入C.C.。社长下有总编辑一人名赵明五，原系一中学教员。记者五、六人，分负本地及本省其他各地的军事新闻采访工作。另有行政军官及司务长各一人。勤杂兵和伙伕等数人。

分社负责郑州军事新闻采访的记者名邱士衡，籍属考城（即现今兰考）县，也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员。他和赵明五一起曾在豫西某中学任教，因失业来郑。赵参加军闻社当了总编后，遂拉邱进去当记者。邱和周舟同乡，是周舟的家兄同学。邱在郑州别无熟人，遂常和周来往。邱在郑人生，当然，采访面较窄，只是陆

总郑州指挥部新闻处和专署情报科。周当时在电信局收报台管无线电话终端机，机要在握。陆总郑州指挥部情报处向南京国防部汇报军事情况，多通过周手。

二野大军第一次进攻洛阳战役中，同时也围困了郑州。邱到指挥部新闻处采访洛阳防守情况，答复是“还在激烈巷战”。及至邱来到周处时，周告诉他“洛阳已经失守，除几处着火未熄外，战斗已全部结束”。邱问周消息来源？周答：“是指挥部向国防部报告情况时讲的，并且说是派飞机到上空侦察的结果。”邱向军闻社写了关于洛阳情况的两条不同的消息，但军闻社认为周的消息和新闻处的不同，未敢据以上报。过了两天，邱才从新闻处得到洛阳失守的消息。这才引起了社里对周的重视。接着社里了解周的情况，邱便把周的情况向社里做了介绍。社里拟聘周为特约记者，周因需向组织请示，未立即答复，只说：“考虑、考虑。”之后，周即急速找张以诚，把这个问题汇报请示。张立即表示同意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打进去，对我们开展对敌军事情报工作有利。不过不应随随便便进去，应和他们讲些条件。”经两人当场商定条件如下：一，参加军闻社不能脱离电信局，因为离开电信局专搞军闻社，消息来源就不广了。二，因此，正式上班在电信局，军闻社有事时可以去。三，为了采访方便，须给正式记者名义，不要特约。四，和正式记者一样，希望发军装，挂军衔并给与证明卡片和符合身份的名片等。薪俸可以不从军闻社领。

周带上述条件去找邱。邱即按周所提条件反映给社里。可能也有赵明五的帮忙，杨炳灵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经过约定时间，由邱、赵陪同，领周去会见了杨炳灵。杨很客气，对周表示欢迎，并感谢他来帮忙。当即发给军服两套，军衫两件，蓝皮工作

证一个、名片一本。周瞅空问邱：“挂什么军衔”？邱说：“记者都是尉官，但为了采访方便，社里允许挂校级衔。”周要求挂中校衔，经邱向杨说了一下，同意了。从此，周便穿上军服，成了中校记者了。但这时邱常向周提出要走，周舟了挽留他，在地下党当时只发展困不发展党的情况下，周把邱的情况（他有个胞弟名邱固，已在石家庄参加了革命工作，因而周几次想离郑赴石）反映给张以诚，经张同意，周把邱发展为候补党员。

对郑州过境部队招待所的工作

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令所属部队凡调防途经郑州者，可接待部分队伍进入城关体整几天，组织文体活动，改善调剂一下生活，以示抚绥和慰劳。因此，指挥部下面特设了一所过境部队招待所。该所办事处正设在东三马路电信局收报台南面一条南北巷内。它的接待处寄宿营房有百余间建筑在陇海道南郑州外圈土墙东南角。有时也利用碧沙岗和土城西北嘴口的房子搞些活动。该所设所长一人（少校），尉官四、五人，分别负责行政、财务和营房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和文体、娱乐等活动。再下有司务长一人和士兵若干，负责所里勤杂事务、营房接待和炊事等工作。

该所负责交际、组织文娱活动的军官名何长概，是所长某的内弟，他在日伪末期，曾在开封电信局工作过，原和周舟同事。周穿上军服后又挂中校衔，何更主动和周往来，周为革命工作，也就夤缘和他携手。周常到该所去找何玩，经何介绍，周便同所长及其他所内军官都很快搞熟了。每逢他们组织戏曲晚会或球类比赛等文体娱乐活动，都主动邀请周舟参加。可能是因周是军闻社记者，参加就可能给他们写好的报导。所以周到该所活动引

起任何怀疑。周在同他们交往中，随便聊聊，就可得知因调动过境而被接待的部队情况。如他们的“来龙去脉”、番号、人数和武器弹药配备等。

周从该所取得的军事情报，虽然都及时汇报给张以诚同志，可是张当时无电台配备，不少情报都不能及时转给我军，只有关于国民党军固定的军事设施情况，了解后才送回开封交曾洁光同志再转送我军。

对郑州炮兵阵容的掌握

由于上述原因，周在同过境部队招待所的交往中，偶然发现了郑州的大炮阵地，随即开展了这方面的活动。

郑州大炮阵地与过境部队招待所接待营房相距不远。招待所每次组织晚会或其他文体娱乐，都邀请大炮阵地官兵部分或大部参加同乐。既增加了睦邻友谊，也表示了指挥部对他们的关怀。周舟同志借招待所文娱活动邀请大炮阵地官兵参加之机，常想和他们的人接触而苦无良机。一天夜晚，又逢招待所组织招待晚会，在备有烟茶的特设雅座上，有幸和炮兵营一位中尉排长并肩而坐，适值何长槌在场，便相互介绍得以认识。散会后，就一起离开会场，边走边谈，十分融洽。一会儿，三人一起来到大炮阵地门首，那排长当然要客气一番，邀请周、何进去坐坐。周、何便随排长进去，被邀进排长的房子。他们分宾主坐定后，相谈之下周了解到此排长系广东人，黄埔分校炮科后期毕业生。出任军官时间不长。在谈话中，周打量这间房子，是一间办公兼卧室。除有床铺外，还设有办公桌。桌上置有一部军用电话，墙上挂有一把南胡。这次因夜已深，他们又是第一次来，因此不便多坐，

聊了一会儿，旋即辞去。“一回生，二回熟”，从此以后，周便以爱好广东音乐、游泳和骑马等为借口常和他来往。但他始终不提进入阵地参观事。周也不能操之过急，以致引起怀疑。后来不久，忽然听说该排有个大力士，可以一个人移动榴弹炮的炮位，这是个稀奇事情。因为榴弹炮的移位，一般都需三、四个人搬抬，而大力士一人就可办到，这可非想法看看不可。于是，周认为机会来了，遂鼓动何长挺去向该排长提议让周和他参观一下大力士移炮表演。该排长也想显示一下他排里有人，便欣然同意并约好了时间。至时周、何来到，在排长下令大力士所在班集合时，周、何早先钻进了那尊大炮掩体内。“流水无心、落花有意”。周首先看了大炮型号，一转身又瞥见了墙壁上挂了一圈小木牌。当时思想很集中，浏览了一遍，便把十几个木牌的内容全铭刻在心上了。随后，即观看了排长按实战指挥的大力士一人转移炮位表演。周、何看后当场对大力士高跷拇指，夸奖并向排长和士兵表示了感谢，旋即回到排长房内闲谈。周顺藤摸瓜很自然地 向排长了解了郑州全城炮兵兵力、装备及其部署。

周、何向排长告别出来，周即回到宿舍把这场见闻一一作了追记。现在回忆其内容大体如下述：配备镇守郑州的炮兵部队为一个独立炮兵营，归指挥部直接指挥。营下没有设连，直辖四个排。每排有八个班，约百余人。每排配有日制昭和十年式榴弹炮四门，高头大马三、四十匹和机、步枪若干挺。四个排的炮兵阵地，分别设在城内、南阳站、黄河桥和飞机场。

城内大炮阵地设在郑州外围土城东南哨口马路的东面。东邻过境部队招待所接待营房。南边是土围城墙，墙里是一溜大苇坑。在坑北沿分别建筑了四尊大炮的掩体。西边是大炮排的几排营房（包括士兵宿舍和伙房、仓库等）。围绕大炮阵地的东西北三面

均筑有土围墙。大门开在土围墙的西端。北墙外有一条马路通向过境部队招待所的接待营房。这一带无居民住户，商民及乡下人都很少从此通过。

每尊大炮掩体为一土堡，内圆直径约十米，堡高约三米，厚一米多。有进出口和输送弹药通道。大炮放在中央，炮座及大炮口尾距堡墙都有一米多空档，供士兵转移炮位走动。堡内的墙壁一转，约在一人高处挂了十几个木牌。牌上写有：地名、距离及炮口高度等，都是早已测算准了的射击目标。如战时命令射击某地，士兵按牌上标志调好发射即可。每排的四尊大炮掩体设置相同，必要时可集中火力共射某地。余类推。

以上情况，周记好后即向张以诚同志作了汇报，由张转给我军。

到郑州警备司令部活动的效果

郑州警备司令部有位军法处长，姓名忘记了。他是周舟在开封发展的地下党员王鹏的表兄。当时王鹏的父亲在郑州法院工作。因王鹏认识了他父亲，又经他父亲介绍，认识了这位军法处长。周因王鹏的关系，也以表兄呼之。在交往中，周觉得该处长身份较高，因此对他存有戒心；闲谈中间些什么也较警惕。所以从他这里没有得到多少可以上报的情报，但也和他未终止联系，愿意保留这么一个关系，万一地下党出了什么事，好多一条奔走营救的路子。

郑州警备司令部设在旧城西门外大街西头路北，进大门往里走，有前、中、后三进院落。军法处和秘书处在此办公。此外，在这所房子后面，顺小河向东去，下坡后的路南北几处新房，也是

司令部和它的其余所属单位办公和寄宿的地方。军法处设在西外大街的后院里。一次，周到军法处拜访处长，坐了一会儿，便告辞而出。处长送他至中院，不意碰上了秘书处一位文书陈叔雅。陈和周曾因其他同学介绍有一面之交。今见周系军法处长的宾客，特凑到跟前热情地招呼，并邀周到他办公室坐坐。于是，周请处长留步，便随陈进了他的办公室。陈把周安排坐在桌旁椅子上，他却忙着在沏茶让烟。周打量陈室设备，有办公桌、油印机、还有床位和卧具等。周判断这是陈的办公兼卧室。他来坐下后，周问他具体担任什么职务。陈答：“抄写或印刷文件”。周想：这里倒是可以利用的地方。头一次当然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但以后彼此就常来常往。一个想沾恩沾贿，一个想窥伺机密。

电信局收报台里，有一位收报员是陈叔雅在开封的中学同学，熟知陈的底细，也是周在西安训练班的同学，看见周和陈过从甚密，便善意地告诫周说：陈某为人很滑，同他来往要加小心。但周为了开展地下工作，仍和陈不断来往。到后来陈借周一个金戒指就没有还，不过这只是一宗小事。“将欲夺之，必古（固）予之”。老子之言，岂能忘记！

在“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当时的郑州完全处于战时状态之中。晚九、十点钟，就要全城戒严，通宵达旦。戒严中是任何人都不许通行的，除非你得了口令，口令一般是分普通和特别两种。后者是准备在特殊情况或戒严中用的。每天的口令和特别口令都是由警备司令部秘书处印发的。秘书处是由陈叔雅印制的。有一次，周舟去找陈，他正在那里印口令，一般是一印一周。如遇有战争情况或失密事情发生，就得另行规定印发。周看见陈在那里印口令，即“顺手牵羊”拿了他印好的一份。以后陈就每次都主动送周一份。一直到郑州解放。所以，自那时起，周

在郑州，无论白天和黑夜，无论战时和平时，他都是通行无阻的。便利了我们很多工作。周每次得到口令都报告张以诚，所以张以诚和周舟一样行走方便。

又有一次，周来找陈，陈正在抄写文件。周问陈：“忙什么呢？”陈答：“抄写一个黑名单。”周问：“什么黑名单？”陈答：“通共嫌疑犯。”“有无认识的？”“没有。”他说着已将名单交周。说：“你看有无认识的？”周接过来一看，那张公文纸上列了十来个名字，其中有宁静二字。周说：“我在开封一个老同学家里，曾见过一个人叫宁静的。不知名单上写的是不是他？”陈说：“这都是下面特工人员报上来的。你所知道的宁静是个什么人？”周：“我认识的那个宁静，听说原是开封农林中学学生，日伪时期在警务厅作事，原名叫宁金陵。”陈：“宁金陵是我的同学，后改名就不知道了。很可能是他。”他踌躇了一会儿，又说：“不管是不是，想法告诉他一声才好。”

周看陈态度诚恳，便说：“这个任务交给我吧，由我想法通知到，”陈点头同意。周又把名单细阅了一遍，还给陈，告辞而去。

周离开这里后，未回单位，便速去找张以诚同志汇报。张对周所报告的名单，一个也不熟悉，但吩咐周“既然认得宁静，又了解他在开封，应该赶快去通知他躲避一下。”周当即遵嘱返汴。下车后，先到同学王纪善家（因周就是在王家认识的宁静，又不知他的住址），叫王速去找宁静来会面。王去后不久便偕宁静来了。坐好后，周即把从郑州警备司令部所看见的黑名单上有宁静的名字讲了。当时宁静听后莞尔一笑说：“那决不会是我，天下重名重姓的多。我认得国民党很多要人，决不会出什么事。请放心！”说罢匆匆起身而去。使周感到空跑一趟。直到解放以后，

周回开封，在市委组织部偶然又遇上宁静，他才说明他的情况。原是八路军当时派在开封的敌工人员，共有七、八个人。一看送信的人是中校军官，就害怕，故瞎吹一气，即告辞出来布置转移。再三向周表示感谢。还说：“当夜就都转移了”。

此外，在周和陈的来往中，还可随时得到一些情报。如警备司令部的人事调动，兵力部署和国民党军城防攻守之势等。通过陈，周还认识了一位军警宪联合稽查队的军官某。有一次，周到东南哨口接人，就得到了他的帮助；只向他一招呼就把人带进了郑州城内。

陈叔雅是开封人，家有父兄和房产。为人实较刁滑，颇有些浪荡公子的派头。周在同他交往中，给他写过条幅、对联、刻过印章。借于金戒指也未索取。这对联络感情，保持并利用关系起到了一定作用。解放后，陈曾向周交心说：“开始交往之初，觉得同中校交友有利无害。”以后，从周打听的问题中感觉到有些属于机密，多少有点怀疑，但又觉得军闻社记者采访这些消息可能是正常的；加上朋友交情不错，便采取了有问必答，不问也说的态度。

到专员公署的活动与城防地图

当一九四八年春，我军攻打郑州前夕，开封工委受上级的指示，要搞到开封和郑州等地的城防图。张以诚和周舟得到指示，即商量了一下，由周舟和邱士衡两位记者同志跑这项工作。

周和邱奉命唯谨，分别到过境部队招待所、专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等处探询，接触到的人都连城防图的名字也不知道，更无人看见过。后经他俩研究，可能指挥部机要部门和警备司令、专

员等处有此图，须努力设法同他们的机要人员拉上关系，然后再从其中想法盗图。可是经过一番努力，机要人员的关系并未拉上。不过邱士衡同志到专署采访，交上了朋友，弄到一张郑州详图。这在市面上也是没有卖的。周想：就在这地图上分别标上城防部队和城防设施不也可以代用吗？经他和张以诚同志商量，经张同意后，周便在图上标注了如下一些情况、部署和设施。

一、郑州外围城墙轮廓和各大哨口位置及工事情况。

二、各军事机关所在地和重要军事设施位置。大体上有郑州指挥部及其过境部队招待所、新闻处、话剧团、警备司令部及其所属办公和住处、军闻社、炮兵阵地、空军对空设施、交警部队、辎汽部队、宪兵队、专署保安队、各大军需仓库、驻军营防、城内各要道哨口及其工事设施等。

三、重要行政机关和企业所在地：如专员公署、县政机关、县党部、警察局等以及铁道、邮政、电信、民航、商务会及其下属仓库等。

四、兵力配备情况：如城防部队一个师，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师、宪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营、辎汽一个团和保安一个团等。

五、高级文武官员的高级娱乐、社交活动场所等。

周将以上情况在地图上标注明白后，即携图返汴交曾。周与曾会面的方法是经过方宝璋（地下联络员）接洽。方当时住开封大南门里路东一小巷内路南一所房内。周在进城后到家前，先到方家，见了方或其爱人说一声“郑州姓周的回来了”，别无他言，也不进去，便转身出来回家老等，直到曾来找，办完事才得自由。当时周家住北道门。一家几口人住一间房子，还是借别人的，不便谈话，曾来时他们便外出转悠，寻觅僻静处谈话。这里

离铁塔近，这次他们的谈话是在铁塔公园的小土山上。四下无人。周把标注了的郑州地图交曾并加以说明。曾顺便给了周一本解放区传来的秘密文件，叫他带回去和以诚阅后销毁。

交通护送工作

一、是护送张以诚同志及其家属往返郑州、开封。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周舟曾数度护送张以诚同志及其家属往返于郑州、开封之间。尤其在周打入军闻社以后，穿军服、乘火车，不单个人可以不买票，所带同行人员等也可免却车费。

在开封发展周雷入党时，周、张为介绍人。所以周和张及其家属偕行同车回到开封。经约定曾洁光和张以诚同志在周舟家会面。当时周家住在南关一家小旅店里。该旅店极为简陋。一个大院，原有一周较厚的土墙，就墙搭盖了一转草屋，有十余间客房。大门朝南，一间门房作了旅店帐房。舟父在店里管帐，舟母就住在东屋一排房的最南头紧靠门房的一间。当时正值春节，曾、张以及张的爱人王佩英携带小孩，以拜节为名来到周家。临时借用了小店东北角一间较为僻静的客房接待了他们，周雷也早来到。当曾、张同周雷谈话时，王佩英则以领小孩玩为名在院里走动而放哨。时间不长，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即决定吸收周雷为候补党员，候补期半年，旋即散去。

随后发展王鹏同志入党及以诚同志因其他事情回汴，也都是由周护送的。有一次，在车上遇到荷枪军人查票，以诚同志用礼帽盖脸在睡觉，王佩英同志带小孩坐在一旁未吱声，周站起来为他们向查票的打招呼说：“这都是自己人。”查票的兵二话没说，敬礼而去。

周舟个人往返郑汴之间，不单不买票，还要登上二等车厢。有一次，在车厢里遇到一位铁面无情的列车长，反复纠缠叫补票，周对此人也有些了解，并通过在铁路局工作的同学，早已掌握了铁路局局、处、段长的名字，当即递给他一张名片，并说：

“大名早已久仰，今日有幸相会，就此机会认识认识。”接着就给他来了些气氛，说：“你们的局长某，总务处长某都是朋友，列车段长某和警务段长某也都见过面，你回去后向他们打听周某人……”

他一听认为这人不简单，补票的事不提而去。

一九四八年六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周雷同志被开封空军站电台开革了。他在开封一时找不到职业，便到郑州来找周舟。周舟把周雷先安置在自己宿舍，便独自去找以诚汇报。经研究，周的失业，可能是空军站对他有怀疑。因此考虑到把他安置在郑州也不合适。即决定把周雷的候补党员提前转了正，把他送往中原军区。同周雷谈后，周雷同意，还要他带一个比他年岁略小的男孩同去。这个男孩的家长是以诚同志的朋友，都是早已讲好的。他们走需有人把他们送出国民党封锁线。不消说，这任务也是派周舟完成的。

周舟把二人带出刀枪森横的西哨口，一直把他们送至二十里开外的某村保长家，当即委托该保长负责再送荥阳县特工队，交该队（一地下关系）张某转送出蒋管区封锁线。后来听说二人安全到了中原军区，送入了中原军政大学学习。

再就是护送曾洁光同志去县西联系工作。一九八四年夏天的一天，曾洁光同志忽然乘早车由开封抵达郑州。张以诚同志即陪他到电信局收报台找到了周舟。为了迷混同事们的视听，周向他们撒谎说，“这是我的表兄，在省警务处供职，来郑出差，顺便看

我”。支吾过去，未引起怀疑。随即一同出去，到僻静处说话。曾说要立即出城，叫周护送。周即回去换上军服，带上名片，走出门来与曾同去。以诚同志自去忙别的，不在话下。

周和曾走到西北哨口，一眼瞥见那里拥拥挤挤，汇集了很多商民都在等候检查。他自忖不能按部就班，那会误事的。即偕曾作速越队走到负责军官面前，向他招呼说：“我们有事去西郊。”该军官并未多问就放行了。

十点钟左右，他们到了某村保长家里；周以前到这里联系过，和这位保长也认识。曾叫保长速去约某人来面晤。时近中午，那人才来。曾同来人谈话时，周有意回避到村外踯躅了一圈，同时也是为了放哨以防不测。

曾和那人谈话完毕，已是一点多钟，他们未在村里用饭，即返回城里。

当天下午，曾回开封，张、周送行。临别时曾赠周二元现洋，说是组织关怀，在以诚的怂恿下，周接住了，但未用。后值曾的胞兄来郑，周又把二元现洋赠给了他。

郑州突然解放与先头部队接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开封第二次解放后，郑州亦即四面受困。忽一日，周舟听到郑州警备司令易人消息，周即到警备司令部找陈叔雅探听。那时陈已不在西大街原址办公。打听的结果，踪迹到原址后街去找，可是到了后街西头，向东一望就看见警备司令部所占路南路北的机关大门口，出出进进的人员都相当忙乱，急遽仓皇。走到跟前问了一下，得知陈在南院。进南院找见他，他正清理文件，室内东西已很凌乱。周忖度此地不能久呆，便简要地

问了一下情况，知道司令已经调离，由地方部队担任警备。周舟离开这里去向以诚汇报。张一听，忖度这是解放郑州的信号，不过还未想到国民党军要自动撤离。

次日军闻社社长召集会议，通知周去参加。会上杨炳灵宣布了该社奉命全部撤退的决定，但未提战局情况。周说：“电信局还未有任何消息。”杨未予理睬。会后，周向以诚汇了报，以诚兴奋地说：“我军随时有攻城的可能，准备和先头部队联络。”

没几天，听说郑州城北南阳站发生了战斗，但详情不知。因指挥部新闻处近来已很少用无线电话终端机向国防部汇报了。后来得悉这一仗消灭了专署保安团的两个营。

一天早上，周舟到车站看动静，在大同路西口，碰上军闻社一位留守记者某，问他：“情况如何？”他答：“目前形势很紧，有新情况再告诉你。”结结巴巴说了这么两句，就仓皇而去。这时候，周舟忽然听到行人传说：“电信局的职工包围了局长的家，堵住大门要求局长发救济费。”他便转身赶到现场，看见果真如此。杨尧年总工会理事长李某正在向群众作解释，还是“哭穷”说没钱，因而激怒了群众，群众哄闹得更厉害，前拥后挤想闯进局长家里。杨、李一看：“众怒难犯”，忙答应下午开支。群众才行散去。下午，局里果然通知职工领钱。周去领了钱以后，大约已是下午四、五点钟。

周从电信局出来，看见市面如常，商民熙来攘往，各行其事。走到德化街南口，便听路人相互传说：有八路便衣队已从西北哨口进城，经万寿路北头村边，向县府、地方法院方向去了。周当即转身去向张以诚同志报告了这一消息，周、张相互分析：郑州的国民党军已无抵抗能力，解放军今晚一定进城。张叫周再

去探听情况，天黑再来商议如何和先头部队联系之事。

周返回宿舍吃过晚饭，从宿舍走出，已是“薄暮日沉西”，沿途所见，各重要街口，都有解放军站岗，有的解放军还站在簇簇拥拥的老百姓面前作街头演说，宣传我党政策。周到张处讲了这些新的见闻。张决定叫周出去找先头部队司令部联系，并做下述汇报的请示：

一、用郑州地下党代表名义，汇报一下郑州情况和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原地址。二、着重汇报各重要仓库地址和敌伪物资情况，要求我军尽快派兵驻守以免遭受损失。三、问这次解放郑州是否还要放弃；因为这关系到地下党公开与否的问题。四、问先头部队对地下党有何指示和要求？……。

周从张处出来，因当时郑州停电，为取手电照明又返回宿舍。适值宿舍职工在纷纷议论。有的要走，有的要留。周这时尚不知解放军还走不走，所以不敢明确反对逃跑。只建议大家等等看，便拿起电棒要走。有人问：“街上已有八路军站岗，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干啥？”周应付他们说：“我和你们不同，穿过军衣，得防备一下。”匆匆而去。

周离开宿舍后，向北拐一直走去，直到西门外大街也未见到解放军。便左转向德化街北口奔去，忖度那里是交通要道定有解放军站岗。果然向西去走了不远，尚未到街西口就被哨兵发现，喝问：“干什么的？”回答：“老百姓。”却继续向前走。哨兵已经迎了上来。周凑到眼前低声说：“同志！你帮我找一下指导员，我有要事相谈。”该战士有十七、八岁，听罢向另一战士说了一声，回头和周说：“跟我来！”说着已头前领路走去。周随他到了大同路西口火车站前，他又向别的战士打问了一下，叫周跟着又向南去；边走边问，直到旧城南门上，才找见指导员。周

向指导员说明来意，指导员即把司令部地址告诉那带路的战士并吩咐他送周前去。该战士把周送到西大街路南一家饭店里就回去了。

周进来饭店后，在餐室见到了司令部几位领导，经说明身份和来意后，首长们饭已摆好，一定要周坐下先吃饭。周倒不是客气，怎奈真正不饿，便说：“刚吃过。”司令员只好叫赵参谋长同周到一旁去谈话。周即按照预先和张以诚拟定的四个问题挨次谈了。赵参谋长一手秉笔，一手端着日记本随听随记。谈完后，参谋长对周表示感谢，称赞地下党同志主动联系和提供情况。对仓库问题，参谋长说：“将马上按汇报地址派兵驻守。”不过，他补充说：他们在这里呆不住，要继续前进，但要周放心，他们会把仓库守卫任务移交后续到郑的部队接管不会有失。又说：郑州不会放弃，市政人员日内到达，你们再同他们联系。最后，他叫周转达他们对地下党同志们的问候并对地下同志们冒生命危险、坚持斗争表示敬意。

周、赵谈完后，司令员等同志已吃完饭。周告辞要走，司令员同志也走过来向周表示了对地下同志们的赞扬，并风趣地说：“这回你们也得解放了。长期埋在地下，今后可以出头露面了。白色恐怖压着你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并偕参谋长一道把周送出门外，一一握手而别。

周兴冲冲地离开这里，回到张以诚处，向他作了汇报。次日，张以诚同志和周一道出来联系。当晚，他们和郑州市军管会接头，见到了开封工委委员王鹏飞（现名唐醒民，原来就分管郑州一带地下工作）同志，即时参加了军管会联络组工作。王鹏飞同志任联络组长。

向指导员说明来意，指导员即把司令部地址告诉那带路的战士并吩咐他送周前去。该战士把周送到西大街路南一家饭店里就回去了。

周进来饭店后，在餐室见到了司令部几位领导，经说明身份和来意后，首长们饭已摆好，一定要周坐下先吃饭。周倒不是客气，怎奈真正不饿，便说：“刚吃过。”司令员只好叫赵参谋长同周到一旁去谈话。周即按照预先和张以诚拟定的四个问题挨次谈了。赵参谋长一手秉笔，一手端着日记本随听随记。谈完后，参谋长对周表示感谢，称赞地下党同志主动联系和提供情况。对仓库问题，参谋长说：“将马上按汇报地址派兵驻守。”不过，他补充说：他们在这里呆不住，要继续前进，但要周放心，他们会把仓库守卫任务移交后续到郑的部队接管不会有失。又说：郑州不会放弃，市政人员日内到达，你们再同他们联系。最后，他叫周转达他们对地下党同志们的问候并对地下同志们冒生命危险、坚持斗争表示敬意。

周、赵谈完后，司令员等同志已吃完饭。周告辞要走，司令员同志也走过来向周表示了对地下同志们的赞扬，并风趣地说：“这回你们也得解放了。长期埋在地下，今后可以出头露面了。白色恐怖压着你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并偕参谋长一道把周送出门外，一一握手而别。

周兴冲冲地离开这里，回到张以诚处，向他作了汇报。次日，张以诚同志和周一道出来联系。当晚，他们和郑州市军管会接头，见到了开封工委委员王鹏飞（现名唐醒民，原来就分管郑州一带地下工作）同志，即时参加了军管会联络组工作。王鹏飞同志任联络组长。